麦克·布洛维的分类，存在着四种社
专业的社会学；政策的社会学；批判的
；以及公共的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是所
学的基础。但是，社会学家基于自己的
础，却可以而且应当发展出其他的社会
。公共社会学以公民社会的存在和成长
的基本目标，即在维系和发展公民社会
，达到对公民社会的认识。

PUBLIC SOCIOLOGY

www.ssap.com.cn
ISBN 978-7-80230-646-2
9 787802 306462 >
ISBN 978-7-80230-646-2/D · 185
定价：39.00元

清华社会学教参

公共社会学
PUBLIC SOCIOLOGY

〔美〕麦克·布洛维/著
Michael Burawo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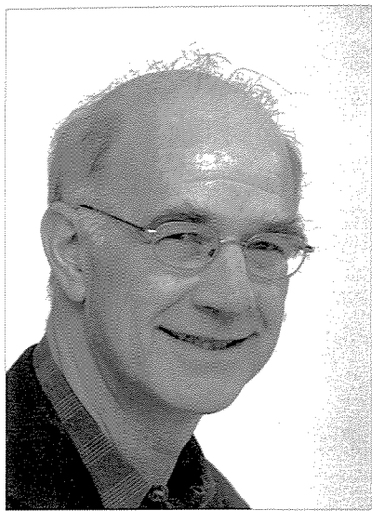
540
8553
c.2
政治大學圖書館
D1479195

清华社会学教参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策划

麦克·布洛维论文精选

公共社会学
PUBLIC SOCIOLOGY

〔美〕麦克·布洛维/著
Michael Burawoy



麦克·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2003～2004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始终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主张将阶级带回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劳工社会学领域最重要学者之一，曾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在赞比亚、美国、匈牙利和俄罗斯的多个工厂当过工人，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制造同意》、《生产的政治》和《辉煌的过去》构成了他的劳工研究三部曲，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劳工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学术工人”的经历也已成为某种传奇。在研究方法上，他发展了所谓的“拓展个案法”，并提出“全球民族志”的概念，对定性研究和民族志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岁月使他再也不能重返工厂的生产现场时，他又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学的学术生产本身。近年来，他大力提倡“公共社会学”，强调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在社会学界产生了非常之大的反响。

360
0765
c.2
↓
540
8553
c.2

清华社会学教参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 策划



麦克·布洛维论文精选

公共社会学

Public Sociology

〔美〕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 著
沈原 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社会学/〔美〕麦克·布洛维著；沈原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5
（清华社会学教参）
ISBN 978-7-80230-646-2

Ⅰ.公… Ⅱ.①麦… ②沈… Ⅲ.社会学 Ⅳ.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6156 号



Public Sociology

Copyright©Michael Burawo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印行中文版

总 序

自 2000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正式建系伊始，本系同仁即明确提出了学科和学术建设的宗旨如下：“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句话是本系同仁总结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发展状况才提出来的。所谓“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是说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不应来自依据经典大师语录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剪裁，也不应该来自权力机构的“长官意志”的提示，而应该来自社会学者作为一个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经由积年累月的探索和体验而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必定是靠近这个社会的实作逻辑的；所谓“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是说社会学对于这些本土问题的研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又不应该仅仅囿于本土范围，而必须超越本土，尝试着与西方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对话，以期丰富甚至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本系同仁深知实践这一宗旨殊属不易，将其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而逐步践行之。过去六年间，本系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清华社会学讲义》系列，便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面向，其成果以《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与政

治运动讲义》付梓出版，以飨学界。讲义保留了口语化风格，力求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使读者对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既能掌握全盘线索，又能应用于中国实际。该讲义系列将在日后继续出版。

与此同期进行的，是本系着手组织《清华社会学教参》的出版。本系同仁深知，在今日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单纯依靠局限于“在地”的研究，都不可能引发知识的更新与再造，唯有将眼光置于国际学界研究进展的背景下，才能真正使得“在地”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边界了然于胸。因此，阅读、掌握甚至参与全球社会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实在是又一项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引介当今社会学知识潮流中发挥重要影响的著述遂成为包括本系同仁在内的这一代社会学工作者之不可推脱的责任与义务。

《清华社会学教参》仍然是一套系列丛书，其特点是精选当今在世界社会学界发挥重要学术影响的那些学者的代表著述，翻译出版，以便配合《清华社会学讲义》的使用，同时也为对社会学深感兴趣的读者提供阅读原本、感受大师洞察社会眼光的机缘。当然，这套《清华社会学教参》篇目的选取，也契合于本系六年多以来所努力推进的研究方向。

希望《清华社会学教参》的出版，有助于我们的社会学建设，也有助于我们当今正在开展的社会建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

2007 年 4 月 17 日

公共社会学 目录
Public Sociology

公共社会学

003 保卫公共社会学
058 社会学和社会的命运

民族志

077 拓展个案法

马克思主义

139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188 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安东尼·葛兰西和卡尔·波兰尼的互补合一
288 从资本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一个学术工人的回顾与反思



公共社会学

公共社会学

保卫公共社会学*

作为对社会学的精神气质与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之间日益呈现的罅隙的反应，公共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是使得各种公众以多种方式参与进来。这些公共社会学不应该受到冷落，而应该将其纳入我们学科的框架之中。这样我们可以将公共社会学变成一项可见的、合法的事业，从而激活整个学科。因此，如果我们绘制出社会学的劳动分工，我们会发现在四种类型的知识中存在着对立性的相互依赖：专业的，批判的，政策的和公共的。

---

* 译自“For Public Sociology”，为美国社会学会2004年度主席致辞。原文发表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5，VOL. 70（February：4－28）。无数无法得知其姓名的人对本文作出了贡献。作者感谢美国社会学协会办公室的萨利·赫尔斯曼（Sally Hillsman）、波比·斯班尔特－洛斯（Bobbie Spalter-Roth）和卡拉·赫威利（Carla Howery），他们在很多方面给予的帮助，如提供事实与数据，组织发言参与等。作者还要感谢芭芭拉·利斯曼（Barbara Risman）、唐托·马斯科维克－德威（Don Tomaskovic-Devey）以及他们的学生，还有查斯·卡米可（Chas Camic）和杰里·雅各布（Jerry Jacobs）对本文初稿的评论。这个演讲的现场版本可以从美国社会学会的DVD中看到。

译者单位均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两位译者的分工如下：胡丽娜（序言和论题一到六），闻翔（论题七到十一）。

在最佳状态下，每一种社会学的繁荣都是整体学科繁荣的条件，但是它们也同样很容易成为病态的形式或者成为排斥和服从的牺牲品。这个权力领域召唤我们去探寻这四类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它们随不同的历史和国家而变化，并且它们为不同的个人职业生涯提供模板。最后，学科之间的比较指向了将社会学连向公共世界的脐带，强调了社会学在保卫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投入，后者自身受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围攻。

这就是人们描述历史天使的方式。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感知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个单个的灾难。该灾难正将残骸不停地堆积起来，扔到他的脚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已被粉碎的整合起来。但是，风暴从天堂里吹过来，淋湿了他的双翼；力量如此狂烈，以至于天使不能再合上双翼。风暴不可抵挡地驱使他去向他所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废墟堆正在向天空增长。这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瓦尔特·本雅明在纳粹军队逼近文明许诺的神圣避难所——他心爱的巴黎时写出了他历史哲学著名的第九论题。他将这个许诺用历史天使的悲剧性形象刻画出来，后者徒劳地与文明通过毁灭而进行的长征作斗争。1940 年，对于本雅明，未来从来没有像从资本主义变成法西斯主义，同时从社会主义变成斯大林主义来蹂躏世界这么凄凉。今天，在 21 世纪的开端，虽然共产主义遭受挫折，而法西斯成为一种不易忘怀的记忆，残骸依然向天空

伸展。放任的资本主义引燃了市场专制和全球范围内的极大不平等，而复活的民主主义往往又成为权势利益、公民权剥夺、谎言和暴力的一块稀薄的面纱。历史的天使再一次被卷入风暴，这是一场从天堂刮来的恐怖主义风暴。

社会学在其初期渴望成为历史的天使，在现代性的残损碎片中寻找秩序，以解救进步的许诺。因此，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将社会主义作为异化的解救方法；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有机团结从失范与利己主义中拯救出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尽管预示了“冰冷黑暗的极夜”，却依然在理性化中发现了自由，并且从祛魅中抽取意义。

在大西洋的此岸，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倡导将泛非主义作为对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回应。而简尼·亚当斯（Jane Addams）则尝试从战争中寻找和平与国际主义。但是这时，进步的风暴侵袭了社会学的翅膀。如果我们的前辈去改变世界，那我们往往最终只能是保存它。为了在学术的阳光中取得一席之地，社会学发展出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无论是以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1949）的才华横溢与博学的形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神秘宏大的设计，或者是彼特·布劳（Peter Blau）与奥蒂斯·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67）早期对分层与流动的绝顶统计分析。回顾 20 世纪 50 年代，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与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可以耀武扬威地宣称社会学的道德史前史终于结束，而迈向科学的道路全面敞开。孔德式观点吸引了社会学专业精英的注意并非第一次。在此之前，“纯科学”有着短暂的辉煌。一些年后，学校——尤其是社会学比较强的学校——被为争取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与和平的政治抗议点燃，控

诉民意社会学及其对科学不加批判的信奉。历史的天使再一次在风暴中展翅。

进步的辩证法主宰了我们个人的职业生涯与我们的整个学科。对于追求社会公正、经济平等、人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治自由或者仅仅就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最初激情，使得我们许多人投奔了社会学，而它现在却成为对学位证书的追求。进步成为一组学科技术——标准化的课程、正确的阅读书目、科层化的排位、密集的考试、文献回顾、剪裁得体的论文、被引用的出版物、优秀的简历、工作的寻求、任期档案，然后告诫我们的同事与后辈遵循同样的路线。尽管存在职业生涯的规范性压力，原生的道德动力却依然很少消失，社会学的精神并不会这么容易被熄灭。

虽然有局限，学科——在这个名词的个体与集体意义上——结出了它的果实。我们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建立专业知识，将常识转化为科学，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去进行一个系统的反向转化，将知识回归到创造它的人之中，将私人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从而再生社会学的道德本性。

为了理解公共社会学的产生、它的可能性与危险、它的潜力与矛盾、它的成功与失败，在过去的18个月中，我在美国40多个地区进行了讨论与辩论，从社区大学到国家组织再到精英部门——还有英国、加拿大、挪威、中国台湾、黎巴嫩和南非。对公共社会学的呼吁引起了我所到之处听众们的共鸣。辩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公共社会学的研讨会，包括在《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February，2004）、《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June，2004），以及《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Summer，2005）发表了一组文章。《脚注》（*Footnotes*），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实事通讯发展了关于公共社会学的专栏，最终结果辑

结为《公共社会学之邀》出版（*An Invitation to Public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2004）。社会学系组织了关于公共社会学的奖励与博客，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网站以公共社会学作为主页，而社会学入门书籍也将公共社会学作为主题。社会学家在我们国家报纸的观点栏目上出现得更为经常。2004年，美国社会学的年会以公共社会学为主题，创造了最佳的与会记录。这些黑暗的时期将历史的天使从他的睡眠中唤醒。

我提出11个论题。它们以今天呼吁公共社会学的理由为始，继而到它们的多样性和它们与整个学科的关系——学科既被理解为劳动分工又被理解为权力的领域。我考察专业、政策、公共与批判社会学的矩阵，它们随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国家而变化；然后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比较，最后讨论是什么使得社会学如此特别：它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与政治的力量。

论题一　剪刀差运动

对公共社会学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而其实现却越来越困难，因为社会学正在向左转而世界却在向右转。

我们应该将目前对公共社会学的呼吁归因于什么呢？它固然提醒了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成为社会学家，但是公共社会学曾在某些时刻造访过我们，那它为什么又突然离去呢？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学政治重心在向一个批判的方向移动，而其所研究的世界却在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因此，1968年，当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员被要求为表明会员反对越南战争的决心投票时，在投票的人中，2/3的人反对美国社会学协会参与

其中。而在回答一个独立的观点问题时，54%的人表示他们个人反对战争（Rhoades，1981：60）——这个反战的比例与当时总体人口的反战比例是比较接近的。2003年，也就是35年后，在一个类似的反伊拉克战争决心的会员投票中，2/3的人表示赞成（*Footnotes*，July-August，2003）。更值得注目的是，在相应的民意调查中，75%的投票者表明他们反对战争（late May，2003），而当时总体人口的75%是支持战争的。[①]

在20世纪60年代的左倾趋势下，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除了在1968年波士顿年会上的骚动，包括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著名的、对“权势社会学”（fat cat sociology）的无畏攻击，以及来自黑人社会学家、激进团体、女性社会学家团体的坦率要求，反对的声音仍然是少数。大部分会员都成长于早期的战后社会学，并吸收了其自由的保守主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在专业中扩散，尽管是以削弱的形式。女性与少数种族的出现和参与的增加，以及60年代的人在社会学系与我们协会中领导职位的增多，标明了一个与社会学同步的批判性转向。[②]

于是，政治社会学从研究美国选举民主的功效转移到研究国家及其与阶级的关系、作为政治过程的社会运动以及民主参与的

① 有关公众支持越南战争的数据来自穆勒（Mueller，1973：Table3.3），而有关公众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数据来自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s）。

② 1968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组委会的19个选举产生的会员都是白人男性，只有一个是女性，她是米拉·科马洛斯基（Mirra Komarovsky）。2004年，组委会的20个会员中正好是50%的女性和50%的少数民族。对于广泛的专业领域来说，1966～1969年之间，18.6%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由女性获得，而2001年的这个数字是58.4%。种族的数字变化开始得较晚一些。1980年，14.4%的社会学博士学位由少数民族获得，而2001年这个数字是25.6%。

深化上。工作社会学从适应过程转向对支配和劳工运动的研究。分层从研究职业声望层级内的社会流动转向研究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结构变化——阶级、种族与性别。发展社会学遗弃了现代化理论，取而代之的是低度发展理论、世界体系分析以及国家主导的发展。种族理论从同化理论转向政治经济学再到对种族形成的研究。社会理论引入了更多对韦伯与涂而干的激进理解，并把马克思收录为经典。如果女性主义没能成为经典，它至少对大多数社会学的实质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全球化正给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单元——民族国家——带来灾难，同时将我们的学科广义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些反向运动——比如，移民研究中的同化论或者研究美国制度在世界扩散的新制度主义者都占统治地位——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占主导地位的运动是朝着批判方向发展的。

如果政治性一代的延续与社会学的内容变化是剪刀的一边，那么向相反方向移动的另一边则是我们所研究的世界。即使平等与自由的花言巧语在强化，社会学家却记录下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与统治。在过去的25年中，人们早期获得的经济安全与公民权利被市场的扩张（以及附带的不平等）和强制性的国家取消，后者在国内外肆意侵犯权利。通常，市场与国家结盟反对人权往往被称作新自由主义。很自然的，社会学家变得更加敏感，将注意力放在更加负面的方面。但是他们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倒退在如此多的领域存在。当然，当我写作时，我们被一种精神上强烈反社会学的政体统治，它与“社会”的观念相敌对。

在我们自己的后院，大学受到了无数来自国家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攻击，它们认为大学收留了太多的自由主义者。同时，由于面临减少的预算，以及日益加剧的竞争，公共大学采取了市场方案来回应——与私人公司联合，

对学校进行宣传以吸引学生，讨好私人捐赠者，通过远程学习商品化教育，雇佣便宜的临时教员，更不用说大量的廉价服务工人了（Kirp，2003；Bok，2003）。市场方案是唯一的方案么？我们是否要遗弃大学作为“公共”事物（public good）的观念？对于公共社会学的兴趣，部分是对各种事物私有化的一种反应和反动。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复兴“公共”的观念——另一个进步风暴的受害者。于是矛盾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社会学精神气质与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激发了对公共社会学的需求，而同时也为其创造了许多障碍。我们应该如何继续？

论题二　公共社会学的多样性

公共社会学有很多种，它们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公众以及接近它们的多种方式。传统与有机的公共社会学是相互补充的两极。公众既可以被毁灭也可以被创造。有一些永远不会消失——我们的学生是我们第一批入迷的公众。

公共社会学究竟应该意味着什么？公共社会学将社会学带入与公众的对话中，就好像人们自己参与谈话那样被理解。因此，它需要一个双向的交流。显著的候选者包括杜·波伊斯（Du Bois，1903）的《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贡纳·麦都（Gunnar Myrdal，1994）的《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1950）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以及罗伯特·贝拉等的（Robert Bellah et al.，1985）《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这些书的共同之处在哪呢？它们都是由社会学家写的，它们都在学术

界之外被阅读，并且它们成为引起关于美国社会本质的公共讨论的载体——关于美国社会价值的本质、它的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它的病症、它的趋势。我们可以将在我们国家报纸的观点栏目写作和评论具有公共重要性事务的社会学家称为传统公共社会学家（traditional public sociologists）。记者也可以将学术研究带入公共领域，如克利斯·尤根和杰夫·曼扎（Chris Uggen and Jeff Manza，2002）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发表的关于剥夺重罪人公民权的政治意义的文章；德瓦·佩杰（Devah Pager，2002）关于种族如何加重犯罪记录对青年人就业前途影响的学位论文。在传统公共社会学中，被研究的公众往往是不可见的，他们微弱，因为他们没有产生内部的互动；他们被动，因为他们没有组建运动或组织，并且他们通常是主流。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家能激起公众内部或公众之间的辩论，尽管他自身并不一定参与其中。

不过，还存在另一种公共社会学——有机公共社会学（organic public sociology），即社会学家与一个可见的、稠密的、活跃的、地方性的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公众联系紧密。多数公共社会学是有机性的——社会学家与劳工运动、邻里协会、信仰团体、移民权利团体、人权组织等共同工作。在有机社会学家与公众间存在一种对话，一个相互教育的过程。对公共社会学的认知必须扩展到有机类型，它常常是不可见的、私人的，而且通常被看做是与我们的专业生活相分离的。公共社会学的事业就是要使不可见的变得可见，使私人的变为公共的，使这些有机的联系成为我们社会学生活的一部分。

传统的公共社会学与有机的公共社会学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一种可以启发另一种。社会上最广泛的辩论，比如家庭价值，可

以通过我们与福利客户一起工作来启发和被启发。关于 NAFTA 的争论可以形塑社会学家与地方性工会的合作；与犯人一起维护他们的权利可以引发关于小型联合体的公共辩论。伯克利的研究生，格雷琴·波塞、艾米·斯查莱特和欧弗·雪伦（Purser, Gretchen, Amy Schalet, and Ofer Sharone, 2004）研究了校园内廉价服务工人的困境，将他们带出黑暗，并将他们构建为大学应该为之承担责任的公众。报告以更加广泛的关于贫困工人、移民工人以及大学的私有化和企业化为基础，并激发了对学术界作为一个有原则的共同体的公共讨论。在最佳情况下，传统公共社会学构建了有机公共社会学的框架，而后者规诫、界定和引导前者。

我们可以区分公共社会学家的不同类型并且谈论不同的公众，但是学术界与非学术界是如何加入对话的呢？为什么人们应该听我们的而不是从媒体获取其他消息呢？我们是否太具批判性而无法吸引我们公众的注意？阿兰·沃夫（Alan Wolfe, 1989）、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以及赛达·斯科奇波尔（Theda Skocpol, 2003）走得更远，并告诫我们公众正在消失——被市场毁灭，被媒体殖民化，被科层制侵袭。然而，公共社会学的大量存在表明公众并非缺失，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他们。但关于如何使公众参与进来，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我们仍然处于我们事业的初级阶段。我们不应该将公众看做是固定的，而应该将他们看做是流动的。我们应该参与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转变。确实，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一部分职责就是定义人的类型——艾滋病人、患乳癌的女性、同性恋——而且如果我们与他们合作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就创造了公众。女性范畴成为公众的基础——一个活跃的、稠密的、可见的、国家而非国际性的反公众——因为她们之中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将女性定义为边缘化

的、被排斥的、被压抑的、被消声的，也就是将她们定义为她们自己所认为的方式。从这个简单的题外话到多样的公众，很明显，公共社会学需要发展出一个公众的社会学——与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 1972 [1904]）、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 1922）、约翰·杜威（John Dewey, 1927）、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 1958）、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91 [1962]）、理查德·森纳（Sennett, 1997）、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 1997），以及麦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 2002）等人一个体系并超越这个体系——来更好地理解公共社会学的可能性与缺陷。

除了创造其他公众，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也构建为一个在政治场域行动的公众。正如涂尔干著名地坚持专业协会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必要元素——而不仅仅只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狭隘的专业利益。因此，美国社会学协会可以而且确实已经对公共辩论作出了许多贡献，当它在密歇根肯定性行动一案（Michigan Affirmative Action Case）向最高法院呈递法官顾问的辩护状时，当它宣布社会学研究证明了种族歧视的存在并且种族歧视有其社会原因和后果时，当它的会员采取反对伊拉克战争和反对宪法修正案宣布同性婚姻不合法的决心时，或当美国社会学协会理事会抗议对埃及社会学家萨达·艾布拉赫（Saad Ibrahim）的监禁时。代表所有社会学家发言是困难和危险的。我们应该确信通过公开的对话，通过自由平等的参与，通过深化我们的内部民主来到达公共的位置。公共社会学的多样性不仅反映了不同的公众，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公共社会学没有内在的规范性，除了投入围绕由社会学提出的问题的对话。它也能支持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就像支持解放社会学或者共产主义那样。如果社会

学实际上支持更多的自由主义或者批判的公共社会学，那将是社会学共同体精神气质进化的一种结果。

有一群不会在我们行动之前消失的公众——即我们的学生。我们每年创造大约25000名主修社会学的新本科生，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潜在的公众，那将意味着什么？它显然不意味着我们将他们作为空的容器向里面倾倒我们成熟的葡萄酒，也不是空白的石板让我们在上面雕刻我们深奥的知识。我们必须把他们看做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经历的载体，使得他们对于将他们塑造为现在这样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自我了解。在我们强大的社会学传统帮助下，我们将他们的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我们让他们的生活参与进来而不是将他们悬空，从他们的现状出发而不是从我们的现状出发。教育成为在我们培育的社会学领地上的一系列对话——我们自己和学生之间，在学生与他们自己的经历之间，在学生自身之间，以及学生与大学外的公众之间。“服务型学习”（Service learning）就是一个典型：当他们学习时，学生们成为面向更广阔的世界的社会学使者，正如他们将自己参与到多样的公众之中的经历带回到教室一样。[①] 作为教师，我们都是潜在的公共社会学家。

通过认识到公共社会学的存在，从而使之合法化和有效化，并将它从私人领域带入公共领域来审视和分析它，是一件事情；而使得它成为我们学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则是另一件事，这把我带到论题三。

① 关于服务型学习有许多研究文献。与社会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两本书的作者是奥斯特（Ostrow et al.，1999）以及马如罗与爱德华（Marullo and Edwards，2000）。

论题三　社会学劳动的分工

公共社会学是一个较广阔的社会学劳动分工的部分，社会学劳动分工还包括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

传统公共社会学的拥护者，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9），以及他之后的许多其他人，都会将所有的社会学变成公共社会学。米尔斯回到19世纪晚期的先驱者那里，对于这些人而言，学术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学术革命之前，转向早期这种状况并不存在。实际上，我们不得不继续向前，从我们真正所在之处出发，从社会学劳动的分工出发。

第一步是区别公共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是一种为某个目标服务的社会学，它的目标是由一个客户定义的。政策社会学的存在理由是提供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来合法化我们已经达成的解决方案。一些客户通过一个精确的合同来规定社会学家的具体任务，而其他客户则更像定义更为广泛的政治日程的赞助人。作为一个专家见证人，比如，对社区的一项重要服务，是相对而言与客户较好定义的一种关系，而在国务院的赞助下去调查恐怖主义或贫困的原因则可能提供更为开阔的研究议程。

相反，公共社会学在社会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其中双方的议程都被拿到桌面上来互相调适。在公共社会学中，讨论经常包括并非由双方自动共享的价值或者目标，因此互惠，或哈贝马斯（1984）称为的“沟通行动”，往往很难达成。尽管如此，公共社会学的目标仍然是发展出这样的对话。

芭芭拉·艾赫伦里奇（Barbara Ehrenreich，2002）的畅销书《镍币与银币》（*Nickel and Dimed*）——一本关于低收入工作的民族志作品——指出，在与其他对象的比较中，沃尔玛（WalMart）的雇佣实践是公共社会学的一个例子，而威廉·柏比（William Bielby，2003）对同一家公司进行的关于性别歧视一案的专家证词，则是政策社会学的一个例子。公共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方法既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往往是互补的。政策社会学可以转变为公共社会学，尤其是当政策失败时。比如当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校车提案失败时，或者当政府拒绝支持诸如威廉·朱利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提出的创造工作以减轻种族化贫困的建议时，或者保罗·斯达（Paul Starr）对克林顿执政期间医疗改革的介入失败时。同样，公共社会学往往也能转变为政策社会学。基于黛安·沃恩（Diane Vaughan，2004）以往对挑战者号灾难（Challenger disaster）的研究，她与媒体合作对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灾难（Columbia Shuttle disaster）的介入广为人知。这为她的观点被哥伦比亚意外事故调查委员会（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2003）在报告中采用，尤其是对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组织文化的控诉铺设了道路。

如果没有专业社会学提供真实、可检验的方法，积累的知识，定向的问题以及概念框架，就不可能存在政策社会学或者公共社会学。专业社会学不是政策和公共社会学的敌人，而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为政策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提供合法性与专业基础。专业社会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是由多样交叉的研究计划组成的，每一个项目都有其自身的假设、范式、定义

的问题、概念构成以及发展的理论。[①] 大多数子领域都包括发展完善的研究方向，比如组织理论、分层、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种族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子领域内也往往有研究方向，比如组织理论中有组织生态学。研究项目通过解决它们定义的谜团向前发展，无论是来自外部的失常（预测与经验发现之间的不一致），还是内部的矛盾。因此，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是通过替代集体行为的“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t）和心理学理论，建立一个以资源动员概念为中心的新的分析框架来完成的。这个新框架继而导致一个政治过程模型的形成，包括最近将情感包含进去的尝试。在每一个研究之内，案例研究在解决一系列难题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难题，将研究引向新的方向。当研究被失常和矛盾湮没，或者当解决谜团的尝试变为一个保存脸面的方式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创新时，研究就退化了。古德文和杰斯波（Goodwin and Jasper，2004：chap. 1）认为，这就是社会运动理论的命运，当它变得过于一般化和内生化时就退化了。

批判社会学，我的第四个类型的社会学，其角色就是来审视专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清晰的和含蓄的、规范性的和描述性的。这使我们想起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1939），他抱怨社会科学正在放弃它直面当代的、紧迫的文化与制度问题的责任，而着迷于技术与专业化。米尔斯（Mills，1959）指控20世纪50年代专业社会学的离题——转向深奥的“宏大理论”或者毫无意义的“抽象经验主义”，后者使得资料与时代背景分离。

① 在研究项目的观点之形成过程中，我受到了埃默·拉卡托斯（Imer Lakatos，1978）以及他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卡尔·波普（Karl Popper），还有其他人辩论的重大影响。

埃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1970）检验了结构功能主义关于共识社会（consensus society）的假设领域，共识社会与20世纪60年代不断升级的冲突是背道而驰的。女性主义、同性恋理论和批判种族理论都指责专业社会学忽视了性别、性和种族压制的普遍性和深奥性。在每一种情况下，批判社会学都企图使得专业社会学认识到自身的偏见、失声，从而在其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批判社会学是专业社会学的良知，正如公共社会学是政策社会学的良知一样。

批判社会学也为我们厘清四种社会学的关系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由阿尔弗雷德·麦克朗·李（Alfred McLung Lee）在他的主席致词中提出的，即“社会学是为了谁”（Sociology for whom）。我们是否只与自己对话（学术听众），还是我们也在与他人（非学术听众）交流。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很少有人会主张一个封闭的学科，或者只是为了追求知识而追求知识。为非学术的听众参与做辩护，无论是为客户服务还是与公众对话，都不是否认与之相关的危险与风险的存在；而只是说，尽管这些危险和风险存在，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做。第二个问题是林德的问题：“社会学是为了什么”（Sociology for What）。我们是否应该关心社会的目标或者只关心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这个区别正是韦伯关于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讨论的基础。韦伯，以及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关心的是技术理性正在取代价值的讨论，也就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谈到的理性的式微，或者他与其合作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69［1944］）称为的启蒙辩证法。我将一种知识称作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 knowledge），无论它是解决谜团的专业社会学还是解决问题的政策社会学。我将另一种知识称作反思性知识（reflective knowledge），因为它关注的是关于目标的对话，无论是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关于某项研究的基础的对话，还是学术与各种公众之间关于社会发展方向的对话。反思性知识同时质疑了社会及我们所从事职业的价值前提。表1总结了这整个方案。①

表1　社会学的劳动分工

	学术听众	非学术听众
工具性知识	专业的	政策的
反思性知识	批判的	公共的

在实践中，任何社会学的片断都可以横跨这些理想类型或者随着时间推移在它们之间穿越。比如我已经注意到，公共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之间的区别往往很模糊——社会学在为客户服务的同时也能激发公共辩论。

范畴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学劳动的范畴化，重新定义了我们认识自己的方式。我现在从事的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86［1979］，1988［1984］）称作的分类斗争（classification struggle）。通过把中心放在两个问题——“我们从事社会学是为了谁和为了什么”上，我们取代了关于定量与定

① 这个主题与帕森斯（Parsons，1961）著名的四种功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四种功能分别是——调适、目标达成、整合与模式维持（AGIL）——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以它们为前提来生存。如果批判社会学与以价值为基础的模式维持功能相对应，而公共社会学与整合相对应，其影响是通过以交换为中介，那么政策社会学就与目标达成相对应，专业社会学以其经济信度与调适相对应。哈贝马斯（Habermas，1984：chap.7）给了帕森斯一个批判的转向，将生活世界（模式维持与整合）看做是被系统（调适与目标达成）殖民化了。我们将看到论题七结合了哈贝马斯的殖民化理论与布迪厄（Bourdieu，1988［1984］）对学术界的田野分析。

性技术、实证主义与解释性方法论、微观与宏观社会学的辩论。余下的论题企图合法化与扩展这个分类系统。

论题四　内部复杂性的说明

> “知识是为了谁”（knowledge for whom）与“知识是为了什么”（knowledge for what）的问题，定义了我们学科的基本特征。它们不仅仅将社会学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也使我们理解了每一种类型是如何内在构建的。

我们知识的四种类型不仅代表社会学功能的差异，而且也代表了四种看待社会学的不同视角。从批判社会学的立场来看社会学的劳动分工与从政策社会学的立场来看社会学的劳动分工是十分不同的。确实，批判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与专业（“主流”）社会学的对立来定义自己的，它视自身为与背弃政策社会学不可分割。政策社会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攻击批判社会学政治化了社会学，从而败坏了我们的学科。因此，从每一个范畴内部，我们企图简化、同化和形塑其他范畴。因此，我们必须尝试认识到所有四种社会学类型的复杂性。通过再次提出我们的两个基本问题——知识是为了谁以及知识是为了什么——来认识这种复杂性是最佳的方法。这导致了每一种社会学的内部分化，因而呈现出一个更加细致的图景。我们同样也能看到每一种类型内部驱使其向某个方向发展的张力。

让我们从专业社会学开始。它的核心是多种研究的创造、详细阐述以及退化。但是专业社会学也有一个政策的维度，来为在更加广阔世界中的社会学研究辩护——为政治竞争性研究的基金

辩护，比如对性行为的研究；对人类主体协议（human subjects protocols）决定性因素的研究；还有争取政府支持的行为，如族群奖学金项目等。专业社会学的政策维度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办公室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并且呈现于其实事通讯《脚注》的页面上。专业社会学也有一个公共的面向，将其研究发现以一种可接近的方式展现在外行观众面前。这就是我们的新杂志——《语境》（*Contexts*）所公开宣布的目标。但同样的功能也由美国社会学协会办公室组织的常委会简报完成。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很多教师在传播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发现，当然，还有社会学教科书的写作。在专业社会学的公共面向与公共社会学自身之间只有一条微弱的界线，但是前者与维护我们核心专业活动的条件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

最后，专业社会学也有批判的面向——研究项目内部与研究项目之间的辩论，比如关于阶级与种族的相对重要性、全球化的影响、过度工作的模式、选举政治的阶级基础、低度发展的原因等等。这些批判性的辩论是《社会学年度评论》（*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中文章的主题，并且它们将必要的动力注入我们的研究项目。专业社会学的四种分类展现在表 2 中。

表 2　分解专业社会学

专业的	政策的
在研究项目之内做的研究，这些研究项目定义假设、理论、概念、问题和谜团	维护社会学研究、人类主体、基金和国会简报
批判的	**公共的**
研究项目之内或之间的批判性学科争论	关注社会学的公共形象，以一种可接近的方式呈现研究发现，教授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与写作教科书

由于专业社会学的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功能分化，或者如阿伯特（Abbott，2001）称作的，专业社会学的“碎片化”（fractalizaion）。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学内部则较少发展得如此充分，所以我们最好是谈论它们的不同面向或者维度。因此，公共社会学的核心活动——社会学家与他们的公众之间的对话——是（或不是）由专业的、批判的和政策的面向（moment）支持的。以波士顿学院的媒体研究与行动项目（Media Research and Action Project）为例，它将社会学家与社区的组织者集中到一起来研究如何能最好地将社会议题呈现给媒体。对于这个项目，存在着以威廉·盖森（William Gamson）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的专业面向，以媒体运作的有限方式为基础的批判面向，以及与社区组织者的具体目标相斗争的政策面向。夏洛特·莱恩（Charlotte Ryan，2004）描述了项目内的张力，这种张力源自公共社会学的及时性与专业社会学的职业生涯节奏之间的矛盾需求；而盖森（Gamson，2004）解释了高等院校为地方社区赋权之项目的经济条件限制。

政策社会学同样也有其专业的、批判的和公共的面向。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茱迪·斯德西（Judy Stacey，2004）作为一个专家证人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湖维护同性婚姻的经历。同性婚姻的法律反对者以她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Stacey and Biblarz，2001）中广为阅读的文章为基础。作者们认为，虽然研究表明，同性恋家庭对孩子的抚育效果中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即这些人对性的多样性更为开放——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影响在任何方面是“有害的”。同性婚姻的反对者认为，斯德西与比布拉兹的研究基础在科学上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不应该由此产生任何结论。因此，茱迪斯·斯德西发现，她在为自己的结论的科学严

格性做辩护时是十分尴尬的。而且，她对同性恋的公民自由的辩护引起了对婚姻的辩护——一个在她的学术写作中受到强烈批判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政策社会学有多大的局限性，而且它对专业社会学的依赖是如何使它与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对立的。任何一种社会学的四个面向与其他面向都可能不是和谐的。

我们在批判社会学中也能看到这种状况。在多罗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经典文章《女性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Woman*）中，她从男性的立场检验了社会学的普遍化，尤其是从掌握社会宏观结构的统治层男性立场。从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经典著作出发，她阐述了植根于日常微观结构的女性立场——即女性作为支撑宏观结构的不可见劳动力。帕特丽夏·希尔·科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1991）进一步发展了立场分析，她坚持认为，对社会的看法来自那些被多重压迫的人群——贫困的黑人女性——但是她自己也以传统的社会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她运用了乔治·齐美尔和罗伯特·默顿的理论来阐释对专业社会学的批判。并且，对她而言，也存在着一个公共的面向——黑人女性知识分子与贫困的黑人女性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于给专业社会学带来更大的普遍性是必要的。这样，我们看到了批判社会学的专业与公共面向，那它的政策面向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能否认为这里存在着为普遍性之内的批判思想的实力政治辩护的空间，这些空间可能包含跨学科的项目、机构以及为代表权所做的斗争？

这些只是用来证明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复杂性的例子，以帮助我们认识它们的学术与非学术维度，以及工具性与反思性维度。当我们再次关注这四种主要类型的关系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它的内在复杂构成。

论题五　定位社会学家

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社会学与它的内部分工进行区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对社会学家与他们的道路进行区分。社会学家的生命是由他或她的社会学习性与整个学科领域的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推进的。

我们应该区别开社会学劳动的分工和占据其中一个或多个位置的社会学家。大约30%的博士是受雇于大学之外的，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领域，他们可以从这里走向公共领域（Kang，2003）。在大学中任教的70%的博士占据了专业的领域，进行研究或者传播其研究成果。但他们也可能在其他领域占据职位，如果他们至少拥有任期路径职位的话。相比之下，临时工的大军——助手，临时的演讲人，兼职教师——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他们通常全心投入教学却只领着微薄的薪俸（一门课程2000～4000美元），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并且往往也没有福利（Spalter-Roth and Erskine，2004）。他们在高知名度的大学中更加普遍，他们构成了雇员的40%并教授40%的课程。这些廉价劳动力为永久教员补贴了研究与工资，使得他们能从事更多的活动。

因此，我们很多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占据了多重位置。比如，科尔曼同时在专业和政策两个领域内工作，而对批判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持敌视态度。克利斯多佛·杰克斯（Christopher Jencks）虽然在相似的政策领域内工作，却不同寻常地将批判和公共面向与专业和政策事业结合起来。阿里·霍奇柴尔德

（Arlie Hochschild）的情感社会学在专业与批判社会学之间徘徊，而她关于工作与家庭的研究将公共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结合起来。当然，这些社会学家占据或者曾经占据了一流社会学系的舒适职位，拥有能够占据多重位置的工作条件。我们大多数人在一个时段只占据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也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职业生涯上。

社会学家不仅同时处于不同的位置上，也随着时间推移在我们四种类型的社会学中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专业的职业生涯巩固之前，社会学家在各领域内的运动是十分不稳定的。越来越对学术不满并且在学术内由于其种族而被边缘化的杜波伊斯，在1899年完成了《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并且于1897～1910年间在亚特兰大大学建立和运作亚特兰大社会学实验室（Atlanta Sociological Laboratory）之后，离开了学术界去创建了国家有色人种发展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并成为其杂志《危机》（*Crisis*）的编辑。在这个公共角色中，他写出了各种流行的散文，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社会学的影响。1934年，他返回学术界就任亚特兰大社会学系主任，并且在那里完成了他另一本经典专著——《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不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结束后为了国家与国际公共事务再次离开。他为种族公平所做的不懈活动是公共社会学的顶点，虽然他的最终目标总是为了改变政策。公共社会学往往是政策领域内被边缘化的、被封锁在外的一条道路，并且也被学术界排斥。

当杜波伊斯选择了学术外的道路时，他的对手，种族社会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则向着相反的方

向发展。[①] 在做了多年记者后，包括激进地揭露了在刚果发生的比利时暴行，他成为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私人秘书和研究分析师，之后他又进入、塑造和专业化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Lyman，1992）。

米尔斯是之后的一代，但是和杜波伊斯一样，他日益对学术界不满。当他在得克萨斯大学拿到了哲学的本科学位之后，他去了威斯康星与德国移民汉斯·格斯（Hans Gerth）一起工作。在那里，他写出了关于实用主义的博士论文。默顿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将他招聘到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他展现了作为一个专业社会学家的潜力。由于无法忍受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应用研究中心（Bureau of Applied Research）的“狭隘的实用性”，他从工具性社会学转向公共社会学——《权力新贵》（*New Men of Power*）、《白领》（*White Collar*）和《权力精英》（*Power Elite*）。在他短暂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他充满灵感的《社会学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他重新回到了社会学的允诺与抱负上。这个向批判社会学的转向与社会学走向公共知识领域的转向相契合，如《听着，美国佬》（*Listen, Yankee*）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这些书与社会学只有微弱的联系。[②]

今天社会学的职业生涯比米尔斯时代更加严格。一个典型的

① 感谢斯蒂文·斯坦博格（Setphen Steinberg）指出这个巧合。尽管帕克在专业化社会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尽管他支持中立的社会科学，宣称对赫尔地区的女性行动社会学持反对态度，但他并没有放弃社会变革。

② “公共社会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专业种类，他们将公共评论限制在一个业已建立起来的专门领域，而不是阐述更具一般性的主题（Gans，2002）。

研究生，可能被他的本科老师激励或者被一个社会运动激发——带着批判的性情走入研究生院，希望学习更多关于社会变迁的可能性，无论这是减少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还是减轻青少年暴力、土耳其和伊朗的女性主义运动成功的条件、作为道德源泉的家庭、死刑支持的变化、公众对伊斯兰教的误解，等等。在那里，他会面临一系列必修的课程，每一门课都有其需要掌握的深奥的文本或者抽象的技术。三四年后，他就可以参加三到四个领域的资格或预备考试，之后他将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这整个过程需要至少五年时间。研究生院似乎是为了抹煞掉最初激起人们对社会学兴趣的道德义务而组织起来的。

正如涂而干强调契约的非契约因素——作为契约不可或缺的认同与信任基础——同样我们也必须重视职业生涯中非职业因素的重要性。熬到拿到博士学位的50%～70%研究生中的很多人，通过从旁从事公共社会学保持了他们最初的动机——这往往是背着他们的导师进行的。我总是听到一些教师建议他们的学生远离公共社会学，直到拿到终身教职——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得太清楚？）公共社会学是保持社会学激情蓬勃的事物。如果他们听从了他们导师的意见，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临时教员从而使从事公共社会学的时间更少，或者他们十分有幸能找到一个终身教职，这样他们就必须考虑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者在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籍。一旦他们得到了终身教职，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沉浸于他们年轻时的激情，但那时他们已经并不年轻了。他们可能会对公共社会学丧失兴趣，倾向于在更加有利可图的政策领域做顾问，或者取得专业社会学的一个职位。最好是从一开始就沉浸于公共社会学之中，这样可以点燃专业社会学的火炬。

社会学劳动的分化与其产生的专业化可以造成对社会学惯习

的渴望：渴望反思性知识与工具性知识的结合，或者渴望一个需要学术与非学术听众的惯习。制度与关系之间的张力驱使社会学家不断从一个领域走向另一个领域，在那里，他们可以为仪式性的位置暂时稳定下来，或者放弃整个学科。尽管如此，总有人的惯习对于专业化调适得很好，并且他们的精力和热情总是很有感染力，溢出到其他领域。我现在就要说明专业化与公共社会学并不是敌对的。

论题六　规范性模式与其病理学

> 我们学科的繁荣取决于一个共享的精神气质，它是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公共社会学与批判社会学互惠共存的基础。然而，如果过于重视自身领域的听众，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都可能采取病态的形式，从而威胁到整个学科的活力。

那些支持公共社会学的人往往对专业社会学采取公开的蔑视态度。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1987）的《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引起了一系列评论，哀悼公共知识分子退隐到专业化的茧中。因此，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2002）赞扬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是“最后一个社会学家”（The Last Sociologist），因为里斯曼以及他同代的其他人处理的是具有重大公共意义的问题，而今天的专业社会学只是模仿自然科学，检验狭隘的假设。通过提问“社会学发生了什么”（*Whatever Happened to Sociology?*），彼特·伯格（Peter Berger，2002）回答说，这个领域已经成为方法论

拜物教的牺牲品和对琐碎主题的迷恋。但是他也抱怨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将社会学从一门科学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他描绘了很多专业社会学家对公共社会学的冷漠接受，后者害怕公共参与会腐蚀科学，会威胁到学科的合法性以及它能够调动的物质资源。

我持相反的观点——在专业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之间应该有，而且通常确实存在尊重与配合。它们不仅不是不相容，而且是像孪生双胞胎那样。的确，我对社会学学科的规范性看法，是我们的四种类型存在着互惠共存的关系——一种有机的结合，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从它与其他类型的关系中得到活力、意义和想像力。

正如我已经坚持的，我们学科的中心是它的专业部分。没有专业社会学，就不会有政策或公共社会学，也不会有批判社会学——因为那将没有可以批判的对象。同样，专业社会学的活力也取决于以公共社会学为媒介的不断的公共事务的挑战。正是公民权利运动改变了社会学家对政治的理解，也正是女权主义运动给社会学如此多的领域指出了新的方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参与到运动中的社会学家给社会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同样，琳达·维特（Linda Waite，2000）对婚姻的公开辩护在我们的专业中产生了活跃的辩论。批判社会学对于专业社会学而言可能是眼中钉，但是强迫我们对自己做出的假设有清醒的认识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不断修改那些假设。古尔德纳（Goulder，1970）对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对政策社会学可能成为压迫性社会控制的无意识载体之方式的挑战是如此大胆与爽快。今天我们可以在批判社会学的门类中加入“纯社会学”运动（movement for “pure sociology”），即一个没有公共参与的科学社会学。专业

社会学的昨天可能成为批判社会学的今天。政策社会学，从它自身而言，已经通过对贫困和教育的研究重新激活了关于不平等的社会学。近期，医学研究与所有四种社会学联姻，通过与诸如患有乳癌的公民群体合作建立起了新的科学参与方式（Brown et al.，2004；McCormick et al.，forthcoming）。

这种相互配合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们应该谨防认为我们学科的融合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四种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往往很难达成，因为它们在很多不同的维度上有着十分不同的认知实践，在相当多的维度上存在差别，比如知识形式、真理、合法性、可说明性，还有政治，而且在它们各自特有的病理学上达到极致。表3列出了这些不同。

表3　对社会学知识类型的详细阐述

	学术的	非学术的
工具性的	专业社会学	政策社会学
知　识	理论的/经验的	具体的
真　理	一致性	实用的
合法性	科学的规范	有效性
可说明性	同　行	客　户
政　治	专业性自利	政策干预
病理学	自我指涉性	屈从性
反思性的	批判社会学	公共社会学
知　识	基础性的	沟通性的
真　理	规范性的	认　同
合法性	道德视角	相关性
可说明性	批判的知识分子	指定的公众
政　治	内部辩论	公共对话
病理学	教条主义	时尚性

与专业社会学相联系的知识是基于研究项目的发展之上的，它与政策客户要求的具体知识以及社会学家与他们的公众之间交流的沟通性知识不同，从而与批判社会学的基础性知识也不同。从这里产生了每一种社会学拥护的真理的概念。专业社会学关注的是生产与经验世界一致的理论，政策社会学的知识必须是“现实的”或者“有用的”，公共社会学的知识是基于社会学家与他们公众之间的一致认同，而对批判社会学而言，没有规范性的基础来引导的真理什么都不是。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都有自身的合法性。专业社会学以科学规范为基础来合法化自己，政策社会学以其有效性为基础来合法化自己，公共社会学以相关性为基础来合法化自己，而批判社会学必须提供道德的视角。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也有其自身的可说明性。专业社会学对同行的评论是可说明的，政策社会学对其客户、公共社会学对一个指定的公众，而批判社会学对一个能够超越学科边界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是可说明的。进一步说，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学都有其自身的政治。专业社会学维护科学的条件，政策社会学提出政策干预，公共社会学将政治理解为民主的对话，而批判社会学致力于在我们学科内部展开辩论。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社会学都要忍受自己的病理学，后者是从其认知实践和对不同的机构的嵌入中产生的。如果只对一个狭窄的学术圈说话，那么就很容易退回到一种隔绝的岛国状态。专业社会学在解决那些由我们的研究计划定义的问题时，就很容易变得只对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感兴趣。[①] 当我

① 我之所说“看似”无关紧要，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因为每个人的研究计划定义了什么是反常的和矛盾的现象。如果得到的研究结果看上去价值不高，那么研究计划本身肯定得承担没有眼光和缺乏相关性的批评。

们努力捍卫我们在科学世界中的一席之地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垄断那些不易接近的知识，而这样则会导致晦涩的宏大理论或者狭隘的“方法论主义”。不仅是专业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也有天生的宗派主义的不好倾向——成为一个墨守教条的共同体，而不再与专业社会学提供任何合作或者为公共社会学注入任何价值。另一方面，政策社会学也很容易被客户左右，他们为自己的资助添加了很多强制性的附属条件，因此造成的扭曲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到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如果市场研究已经如米尔斯当年曾经担忧过的那样控制了对政策社会学的资助，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胁迫。社会学家向商学院、教育和政策学院的流动可能缓和了这一病症，但肯定无法将这个学科与这些压力完全绝缘。公共社会学也不比政策社会学好多少，它同样可能被外部力量胁迫。在追求普及性的同时，公共社会学往往会为了迎合和取悦大众而牺牲掉专业的和批判的承诺。当然了，公共社会学还存在着另一种危险，就是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对公众说话，一些知识分子先驱可能就曾如此。事实上，我们或许能从米尔斯对“大众社会”的轻视中发现这一点。

这些病症都是确实存在的趋势，因此雅各比、帕特森、伯格等人对专业社会学的批判并不是无本之木。但这些批评家的错误在于，他们将病态的当成了常规的。他们轻巧地忽略掉专业社会学重要的、关系重大的研究，比如在《语境》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同时他们也没有看到自己那种社会学的缺陷。那些专业社会学家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轻蔑地称公共社会学为“通俗社会学”，而忽视了无处不在生机勃勃而往往又不那么轻易就能理解的公共社会学。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却轻易就互相干起仗来，而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分歧的知识是需要相互

依赖的。我们大家需要扛起一面共同的旗帜，使专业的、政策的、公共的和批判的社会学能够相互理解。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容纳病理学的不断发展。制度化、互惠的相互交流也要求我们发展出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质，以实现所有这四种类型的社会学的有效性——依据我们所研究问题的紧迫性的承诺。在这样一个最好的状态中，从这样一个规范性的视角出发，我们不必一定要成为一个公共社会学家才能为公共社会学作贡献，我们也可以通过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批判或政策社会学家来贡献于公共社会学。每一种社会学的繁荣都将促进所有社会学的繁荣。

论题七　社会学作为一个权力场域

在现实世界中，学科是权力的场域，其中相互依存变成相互对抗。结果造成了，至少在美国，工具性知识压倒了反思性知识而居于支配地位。

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兴盛过一阵子，但是在80年代却又被一场暴风雨给打回原形。当时，社会学处在危机之中——本科生入学率直线下降，社会学家的工作环境也不断恶化，出现了很多社会学系要关闭的传言；从学术上看，这个学科也似乎失去了方向。欧文·路易斯·霍诺维茨（Irving Louis Horowitz，1993）的《社会学的崩溃》（*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抱怨社会学的政治化。詹姆斯·科尔曼注意到政治正确的危险以及社会规范对学术界的入侵。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2001）主编的《社会学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收集了一些杰出的社会学家包括彼特·伯格、琼·休伯（Joan Huber）、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马丁·李普赛特、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梅伊·扎尔德（Mayer Zald）、阿瑟·斯廷施凯姆（Arthur Stinchcombe）、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等人，他们哀悼社会学的碎片化、不一致，不能够像一门真正的科学那样可以积累——在这里，主要是与自然科学或经济学相对比，后两者总是统一的、一致的和可积累的！他们这种20世纪50年代的乐观主义被60和70年代对共识社会学的重大挑战打破。现在，胆小鬼都回家歇着了，而社会学，在他们眼中，正面临着危机。

也许能够代表此种类型写作的最有趣和最彻底的著作就是斯蒂芬·特纳和乔纳森·特纳（Stephen Turner and Jonathan Turner, 1990）的《不可能的科学》（*The Impossible Science*），这本书从一个黯淡的立场上重建了社会学的历史。他们宣称，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受众群，也没有可靠的赞助者和庇护人。它不断被政治力量干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因为科学主义占上风而被中断过一阵。如果说在这些关于衰败的叙述中有一个共同线索的话，那就是将社会学的“不适”（malaise）归因于其反思性知识中蕴含的颠覆性力量，不管是以批判社会学还是公共社会学的形式。

我认为，社会学不仅是一门劳动分工尚未被整合的学科，也是一个权力场域，一门各种相互竞争的知识或多或少以一种固定的等级秩序展现的学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那些“衰退论者”的说法。但是，我不能同意他们对于社会学现状以及社会学内部权力平衡的判断。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仅仅是一个短期现象，今天的社会学早已克服了萧条，进入一个前所

未有的好时光。社会学专业的学士数量从1985年来稳定增长，超过了经济学和历史学，几乎要赶上政治科学。社会学博士的数量虽然要落后于这些相邻学科，但是绝对数量从1989年以来也一直在增长。可以预测的是，这些数字还要增长下去，以满足本科生教学的需要，尽管从事临时或辅助性的工作是总的趋势，且没有改变的迹象。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员数目在过去四年里也增长迅速，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最高值。相对于一个不利于社会学的政治气候来说，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当然也可能恰恰是这样的气候使人们被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公共价值吸引。

我第二个不能赞同“衰退论者”之处，在于他们对社会学所受威胁的看法。我相信，是社会学的反思性维度而不是工具性维度处在危险之中。至少在美国，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前者提供职位后者提供资金——支配着整个学科的取向。提供价值的批判社会学和提供影响的公共社会学则与职位和金钱的力量无法匹敌。可能会有人对表1的纵向维度提出争议，但真正阻碍这四种社会学共生与合作的则是在水平维度，它制造出来的是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统治联盟以及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在底层的相濡以沫。这种支配模式源于这个学科嵌入于一个更加宽泛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之中。在我们这个社会，金钱和权力远远比价值和影响有力量得多。在美国，资本主义尤其压制公共领域；后者不仅弱小，而且被大量的专家和过剩的媒体占据。社会学的声音很轻易就被湮没了。就如同公共社会学需要面对一个竞争激烈的公共空间，批判社会学也需要面对学科的“割据化”，结果是，批判的对话从它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中被抽离出来——也就是其他学科中类似的批判论述。

权力的天平似乎倾向于工具性知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我们的学科变成我们自己的，创造一个能够生产出更加勇敢和更有生机的思想的空间来。当然，专业社会学对同行负有责任，公共社会学对公众负有责任，但这必然就会导致敌对的阵营么？一定要相互诟病么？同样的，尽管批判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并不一致，一个坚持自身的自主性，另一个则为自己的客户负责，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够承认对方的一部分，共生就可以取代对抗。与其将社会学陷入分裂状况，我们或许可以发展出某种相互协作的多样化以及富有成效的结合。

在这里，我无法更进一步地讨论这个权力场域内部潜在的对抗与联盟。但我们有理由说，如果社会学能够被一种支配体系统合起来的话，那么让这种体系是一个霸权体系要好于是一个专制体系。霸权体系意味着，处于从属地位的知识（批判的和公共的）能够获得发展它们自身力量的空间，并且能够反哺支配性知识。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也应该为批判的和公共的社会学的繁荣奉献自己的力量。不管短期内如何分裂，长远来看，工具性知识离开了反思性知识的挑战也不能够繁荣。因为，从更为广阔的社会中得到的和不断被检讨的价值，巩固了其研究的基础，而价值是需要不断更新和重置的。

我们已经勾勒了这个权力场域的轮廓，在这里面包含了这四种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尽管是以一个相对而言有些抽象的方式。它们之间真实的联系将随着院系、时间、国家甚至全球结构变迁的不同而不同。相应地，剩下三个议题将通过一系列比较的方式来探讨当代美国社会学的特殊之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加深对那些形塑社会学的国内和全球力量的理解。

论题八　历史和等级制

专业社会学在美国的支配地位是从与公共、政策和批判的社会学的持续对话中得来的。但即使在美国，专业社会学的力量也集中在高度分化的大学教育体系的一些顶尖研究院系，而公共社会学则往往在大学体系的底层扮演着比能够看到的要更为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们已经将专业社会学的统治地位视为美国社会学的一个规范性特征，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较为近期的现象。我们可以根据专业社会学地位的逐渐加强，将美国社会学的历史划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

专业社会学开始于19世纪中期，最初是作为改良派、慈善团体和改革团体为一方与另一方的早期社会学家之间的对话。后一方往往具有宗教背景，但他们将自己的道德信仰寄托在羽翼未丰的世俗科学——社会学之上。美国内战后，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劳动力数据以及对贫困的社会调查而发展起来。借助收集数据来展示下层阶级的困境变成一场运动，在它身上已经奠定了专业社会学的基石。在这样一个初萌的公民社会中，社会学家与各种形式的团体保持紧密联系，即使在1905年美国社会学会成立以后也是如此。从源头上讲，社会学内在的就是公共的。

第二阶段则见证了社会学的承诺从公众到基金会和政府的转向。从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社会和宗教研究中心（后来这个机构资助了著名的中镇研究）以及支持芝加哥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社区研究开始，基金会就逐渐在推动社会学研

究中扮演一个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同时，农村社会学也想方设法在国家内部创造一个研究基地（Larson and Zimmerman，2003）。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作为总统研究委员会的主席，推动出版了规模巨大的《美国近期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资助的社会学研究继续开展，最著名的要数萨缪尔·斯托佛（Samuel Stouffer，1949）关于美国军队士气的多卷本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出现了，即财团法人对调查研究的资助，以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中心为代表。社会学越依赖于商业和政府资助，它就越发展出一套严格的分析经验数据的统计方法，这也招致了很多方面的批评。

美国社会学的第三阶段，以批判社会学卷入专业社会学为标志。最初的灵感来自罗伯特·林德（Lynd，1939）对社会学的画地为牢和价值中立的批判。其后最有名的继承者也许就是赖特·米尔斯（Mills，1959）了。他将社会学在第一阶段对公众的承诺称为“自由主义的实用性”，而将第二阶段对财团和国家资金的承诺称为“狭隘的实用性”。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第三阶段的“批判社会学”的登场开辟道路，而后者将同时改变这个领域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两方面的取向和趋势。埃尔文·古尔德纳（Gouldner，1970）为第三阶段奠定了里程碑，他攻击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以及这一派的社会学家，并且为新的受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趋势开辟了空间。这一批判社会学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专业社会学的重建在背后提供了能量和想像力。

下一个推动社会学的力量将来自哪里？论题一宣称，社会学气质和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推动社会学进入公共舞台。并且，

专业社会学如今已经足够成熟和自信到去回归其公民的根源，和从一个优势地位上来推动公共社会学——这是对理解我们时代的那些深刻而烦扰的全球趋势的承诺。如果19世纪初萌的公共社会学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的话，它毕竟还是为20世纪雄心勃勃的专业社会学打下了基础；而后者，又将反过来为它自身的卓越创造基础——那就是21世纪的全球向度的公共社会学。

这并不是说要忽视地方性的公共社会学的重要性，后者恰恰是社会学家和他们直接所处的社区之间的有机纽带。而且，毕竟全球进程也只能通过以及由地方的进程来构成和表现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已经有如此之多的地方性的公共社会学正发生在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里，在这个体系中，教员们肩负了沉重的教学负担。如果他们能够挤出一点点教学之外的时间，他们就将他们的公共社会学带到了课堂之外、社区之中。我们不了解这些正规课程之外的公共社会学，因为这些实践者没有时间把它们写下来。幸运的是，凯利斯·特兰德、萨姆·马若罗，尼可·卡特福斯、兰迪·斯多克还有帕特里克·多诺修（Strand，Kerry，Sam Marullo，Nick Cutforth，Kandy Stoecker，Patrick Donohue，2003）等人为我们揭开了这个隐秘的领域，他们编辑了一本关于有机公共社会学或者他们所谓的“立足社区的研究”的手册。这本书展示了一组原则和实践，也包括大量的实例，其中很多将研究、教学和服务结合起来。

更加宏观地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一套乱七八糟的机构的结合，其中存在着显著的等级制和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四种社会学的形态在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地方就显得各不相同。研究和专业人员在大学体系上层的集中，是通过，或者说至少部分是通过我们的教学机构，包括四年制和两年制学院的不堪重负来

实现的。社会学在这些机构的分配就如同在世界上资源匮乏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下一个议题，我将揭示美国内部的多样性，这也反映了在全球水平上的多样性。

论题九　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美国社会学看似是一个普适的，实际上却是特殊的——不仅在于它的内容，也包括形式，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四种社会学。同时，美国社会学又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学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对后者并不一定都有好处。因此，我们不仅要改造社会学的国内劳动分工，也要改造其国际劳动分工。

“公共社会学”是一个美国式的术语。如果说在别的国家，这是社会学的精髓所在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它可能仅仅是这门学科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实际上，对于某些美国社会学家来说，它可能甚至都不属于社会学。当我去南非宣讲公共社会学时，很多听众都困惑地望着我。在他们看来，除了参与多种多样的公共生活和公共议题之外，社会学还能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存在。但是在美国，美国社会学协会将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定为“公共社会学”，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专业社会学在美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此外，在一个国家的专业社会学可能都弱于公共社会学的世界中，专注于后者也意味着对美国社会学国际霸权的挑战，并且直指美国社会学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重建。

四种社会学的型构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在南半球，如

我刚才所说的，往往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共社会学的存在。我1990年访问南非时，惊讶于那里的社会学和反种族隔离斗争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劳工运动，当然也包括各种公民组织。在美国，我们是在理论上研究社会运动，而在南非，社会学家却是在从事社会运动！这样一项事业促使南非的社会学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社会运动的工团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美国社会学在20年之后才发现了这个领域，还把它当作一个全新的想法。并且，南非社会学不仅仅关注社会动员，也关注社会动员的目标。社会学家分析了种族隔离国家的特征和趋势，争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策略。他们讨论自己是应该作为这场运动的服务者还是批评者。如今，在南非的种族隔离被废除10年之后，公共社会学面临的处境却并不乐观，社会学家纷纷进入非政府组织、公司或是国家机器；新政府要求他们从公民社会的阵线中撤离出来，专心从事教学；社会研究也转向直接的政策议题并追求所谓的“国际化”，比如拿美国的专业社会学作为标准（Sitas，1997；Webster，2004）。

类似的趋势在别的国家也存在，不过各有其特点。以苏联为例，社会学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转入地下，重新露面时是作为对后斯大林政体之下一个官方或非官方的批判的武器。在20世纪60年代的解冻时期，民意调查成了公共社会学的一种形式，但很快被苏共垄断。在塔提亚娜·查斯拉夫斯卡亚（Tatyana Zaslavskaya）的强力领导下，改革使社会学家大规模地走出学院。社会学开始与公民社会的发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后苏联时代，随着公民社会的“空心化”，羽翼未丰的社会学在抵抗市场力量的入侵时显得软弱无力。除了极少数例外，社会学被放逐到商学院和民意、市场调查中心。在那里，社会学成了一个

重要的学术事业，往往是由西方基金赞助，雇用的是在英国或者美国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

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又非常不同，因为这些国家拥有非常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这里的社会学伴随着福利国家成长起来，既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却又有着同样强烈的公共意含。挪威社会学虽然受到美国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但也适合于政策世界，且女权主义在这里的影响非常大。挪威总共不到 500 万人口，其中注册的社会学家不超过 200 个；这个学术社群很小，反而更刺激了其在广阔的社会中寻找一席之地的抱负——无论是在政府，还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学家经常为报纸、电台和电视写稿。挪威还积极地将他们的公共社会学带到国外，它已经成为一个连接美国、欧洲和南半球各国的国际枢纽。

欧洲的其他国家则各不相同。法国拥有非常久的专业社会学传统，同时又培育了一个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其中包括雷蒙·阿隆、皮埃尔·布迪厄和阿兰·图海纳等领军人物。英国的专业社会学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非常之新；在撒切尔时代，又通过束缚公共和批判社会学而形成了一个防御性的内向性格。工党政府重新执政使社会学又获得了生机，扩大了政策研究的范围，也将其最杰出和多产的公共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送进了上议院。

在勾勒各个国家的社会学时，我们不仅看到美国的社会学是如此不同，也看到了美国社会学的强大影响力。每年制造 600 个社会学博士，美国社会学如同一个巨人大步走在世界社会学的版图上。许多在其他国家任教的第一流社会学家，都是在美国受到的训练。美国社会学协会拥有 14000 名会员和 24 个全职工作人员。不仅仅是数字和资源上的支配地位，现在各国政府都在要求

它们的学术界，包括社会学，向“国际”水平看齐，这意味着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不仅发生在南非和中国台湾，也发生在那些拥有相当多资源的国家，比如说挪威。为了向西方看齐以及用英语发表文章，各国的社会学丢掉了它们对于本国问题和地方性议题的关注。在各国内部，全球化的压力加剧了社会学的劳动分工，使四种社会学的裂痕越来越大。

由于在其实践者一方缺乏共谋或者说深思熟虑，美国社会学取得了世界性的霸权。因此，我们肩负特别的责任使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本土化，将它从普适的神座上请下来，实现其独一无二的品质和国家性的力量。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展开对话，理解它们的地方性传统或它们本土化社会学的抱负。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出发，来认识正在出现的社会学的国际分工。如果美国社会学凭借专业社会学主宰世界，那么我们也需要鼓励南半球的公共社会学和欧洲的政策社会学。我们需要鼓励批判社会学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要超越学科还要超越国家的界限。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社会学应用于我们自身，对操纵我们学科的全球性力量保持更加清醒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控制它们，而不是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论题十　区分各个学科

社会科学与人文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既与工具性知识又和反思性知识相结合——这种结合本身就是变化的，因此也给公共和政策干预以不同的机会。跨学科的知识在四种社会学的每一个里都采取了不同形式。

有人说，学科分工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武断产物，我们现在的学科专门化不过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因此我们应该向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迈进。这种实证主义者的幻想最近又在沃勒斯坦主编的古本根委员会关于重建社会科学的报告（1996）中被旧事重提。这个想法看上去没什么坏处，但它却忽略了以下问题——知识为了谁？知识为了什么？——新的统一的社会科学太容易就会消解掉自反性，而这恰恰是社会科学的批判和公共的品质。在一个充满宰制的世界里，统一很容易就变成是有权势者的统一。仅仅因为它们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形成的，就做出学科分工是武断的这一断言，本身就忽视了它们形成中的和不断改变着的意义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利益。这实际上是犯了基因谬误（genetic fallacy）。为了勾勒学科分工的基础，同时也因时间所限，我将示意性地描述一下各个学科领域，在我的陈述中，不可避免地会忽略掉学科内部的分化以及随着时空而产生的变化。

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以工具性知识为基础，扎根于研究项目，它的发展是由科学共同体支配的。学术之外的阅听人来自政策领域——工业或政府部门，他们需要利用科学发现为其服务。逐渐地，他们还直接进入学术领域指导或者监督自然科学研究，以防止医学、核物理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共谋关系（Epstein，1996；Moore，1996；Schurman and Munro，2004）。常常会延伸到公共辩论中的批判的反思性，并不是自然科学的本质，而是人文科学的。艺术或文学作品的价值，最终是要在狭窄的评论界的对话基础上，或者在更加宽泛的公众中得到判定的。它们的真理是通过其审美价值（依据推论性的评估）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与批判的和公共的知识相似；但是，当然了，它们也可能被精心包装成工具性知识，甚至进入政策领域。

社会科学则走在人文和自然科学之间，因为社会科学既包括工具性知识，也存在反思性知识。在各种社会科学中，这两种类型知识之间的平衡并不一样。举个例子，经济学，是一门范式性科学，由一个主导的研究范式所支配（新古典经济学）。这一特点在学科组织上的表现就是：非常稀少的荣誉（克拉克奖章或者诺贝尔奖）、主要期刊的精英控制、对各个经济学系甚至是各个经济学家的清楚排名，以及组织上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缺席。异议经济学家只有当他们首先能够在专业上确立自己地位时才能生存下来。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将专业经济学比作共产党对其异议者的规训和其试图传遍世界的内在一致的信条，所有这一切，都以自由为名。[①] 经济学内部的一致性给了它在学术领域中很大的声望，同时也对政策领域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经济学像共产党，那么美国社会学则更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分权的参与式民主。它建立在多样的和重叠的研究传统之上，表现在：它有43个活跃的部门以及不断增长的各种奖项（Ennis，1992），以及超过200种社会学期刊（Turner and Turner，1990：159）。我们运作的制度化模式反映了我们多样的视角——尽管不总是那么充分。社会学，尽管也是一个等级制的和精英世袭的体系（Burris，2004），但它毕竟比经济学开放得多，从系所之间的教员流动以及研究生选拔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Han，2003）。这个学科在选举其学会的官员时也更加民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会员决议不仅仅局限于专业，只要获得3%的会

① 马里恩（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2004）的著作揭示了美国经济学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9）的观点出发，埃文斯（Evans，2004）勇敢地试图推动经济学走向有机的公共承诺，成为一门敏感于地方性议题和协商性民主的经济学。

员支持就可以参加选举。因此，如果说经济学在政策领域更加有影响力的话，那么社会学的学科结构则是以一种对应多样的公众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公共领域，我们更倾向于通过我们的公共参与间接地影响政策。

再看看别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处于“割据”状态，但它更倾向于政策而非公众，倾向于工具性而非反思性知识。如今，迈向理性选择模型的趋势已经在政治科学中导致了一个反思性取向的回应。政治科学的改革运动（The Perestroika Movement）支持以更制度化的方法研究政治，并主张政治理论应该是批判理论。人类学和地理学则都在工具性—反思性的分野之间呈割据状态，因此，文化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往往反对同行们的科学模型，而与人文科学相通。哲学，另一门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摇摆的学科，则在批判性知识中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学科分工在美国要远比其他地方显著，因此，“交叉学科”的知识在我们各个学科的边缘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存在。四种社会学的每一种都与相邻学科发展出自己的交换和合作关系。在专业化知识的分界面上，存在着一种跨学科的借鉴。当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从相邻学科借鉴一些东西时，它们仍然属于社会学的一个独特部分——市场和政治的社会根基。在批判性知识的分界面上，则存在着一种跨学科的输入。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都在批判社会学对专业社会学的参与中留下了印记。但是这种输入通常是被限制的。公共性知识的进展则通常来自多学科合作，比如，“共享行为研究”将各个学科的学术社群联合起来。每个学术社群确定一个研究议题——公共住房、环境污染、疾病、最低生活工资、教育等等——然后再通过一个跨学科的团队来框构和最终形成研究路径。最后，在政策领域存在着

所谓的“各学科联合协调”的方式，这通常反映了学科之间的不同等级。因此，国家资助的区域研究通常为了对某一明确的政策目标服务，这也就给了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以优先的地位。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学科分工及其与工具性和反思性知识之间的不同结合，那现在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不同意味着什么？特别是，社会学知识及其代表的利益有没有什么独一无二之处？我们可以既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同时又偶然地成了社会学家么——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一件个人生活的意外？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有没有自己的认同？这些问题将我带入最后一个议题。

论题十一　社会学家作为党人（PARTISAN）[①]

> 如果说经济学的立场是市场及其扩张，政治科学的立场是国家和维护政治稳定，那么社会学的立场就是公民社会和保卫社会性（the social）。在市场暴政和国家专制的年代，社会学——特别是其公共面向——捍卫着人类的利益。

社会科学不是一个学科的大熔炉；因为各门学科代表了不同的和相反的利益——首先也最重要的利益就是维护这些学科的知

① 标题来自埃尔文·古尔德纳的同名文章。与本论题相关的还有皮埃尔·布迪厄的挑战性论述：“民族社会学家是人类的一种有机知识分子，作为集体行动者，它们通过致力于提供一种植根于对特殊主义理解基础之上的普遍主义的知识，可以促成破除有关人类存在的自然论和宿命论。”转引自华康德（Wacquant，2004）。

识所赖以立足的基础。经济学，如同我们今天知道的，依赖市场的存在，其利益就在于市场的扩张；政治科学，取决于国家，其利益在于政治稳定；而社会学则依赖公民社会，其利益在于社会性的扩张。

但是，什么是公民社会呢？为了论述方便，我在这里将其定义为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时期出现了在国家和经济之外的结社、运动和公共领域——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育、信仰团体、印刷媒体和各种志愿组织。这种结社性的生活正是社会学独一无二的立场，所以一旦它消失了——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皮诺切特的智利——社会学也就消失了。当公民社会繁荣之时——比如改革的俄罗斯或者南非种族隔离的末期——社会学也繁荣起来。

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类似脐带般的联系，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社会学只研究公民社会。远远不只如此。但它是从公民社会的立场上研究国家和经济。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与政治学并不一样。它研究政治的社会前提以及社会正义的政治化，就如同经济社会学也与经济学不一样，实际上它关心的是经济学家忽视的东西，即市场的社会基础。

这种社会科学的三分法——我在这里没有空间将地理、历史和人类学等相邻学科包括进去——在19世纪它们诞生时是确实的，但是到了20世纪就变得模糊了（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边界的消融和重叠）。但是，过去30年来，这种三分法随着国家单边主义（state unilateralism）和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出现正经历着复苏。这一时期，公民社会被市场和国家殖民化和征用。尽管如此，对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也随之而来，且这种对抗一定是来自公民社会，通过其地方的、国家

的和跨国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与公民社会的从属关系，表现在公共社会学，是公共社会学代表了人类的利益——抵抗国家专制和市场暴政。

下面让我具体阐述一下我刚才所说的。首先，我确信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在它们之间，已经生产出将不受约束的市场和国家正当化的意识形态时间炸弹，这种不受约束正在摧毁公共大学的基础，而这也是它们自己学科存在的条件，就如同其他学科一样。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想要否定所有的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各个学科，归根到底都是权力的场域，每一个都有自己支配性的和对抗性的力量。想一想政治科学中的改革运动或是“反对闭门造车的经济学运动”（Post-Autistic Economics）——一种将个体视为成熟的和多重面向的人的经济学。我们社会学家可以并且事实上也已经从这些对抗性的知识中找到自己的同盟军并与它们合作。

社会学自身也是分裂的。毕竟，公民社会不是什么和谐的地方自治主义，而是被种族隔离、统治和剥削分裂。[①] 历史地看，公民社会是男性的和白人的。随着它逐渐变得更加包容，国家和社会也随之入侵进来，反映在社会学中就是对一些如社会资本这样的概念的不加批判的使用。公民社会绝对是一个竞争性的场域，但我还是要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也是捍卫人性的最有可能的场域——而培育一个批判导向的公共社会学将为这种捍卫提供帮助。

① 在这里，我与涂尔干视角部分一致，如埃特兹奥尼（Amitai Etzioni，1993）和塞尔泽尼克（Philip Selznick，2002），他们关注个体对社会的道德关系以及将等级制、支配和排斥等看做是不恰当的干预。因为没有以社会的分工为核心，他们也因此忽略了社会学内部的分工以及广义上的学术内部的分工。

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就像我在论题七里已经提到的，社会学劳动的制度化分工以及相应的权力场域到目前为止都在制约着公共社会学的壮大。我们没有必要去捍卫公共社会学，如果没有什么阻挡它实现的障碍的话。要超越这些障碍就需要不断地承担义务和做出牺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成了社会学家——不是去赚钱而是去为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这样说来，早就存在不少公共社会学了。但是也有新的进展。《语境》杂志在引导公共社会学方面迈出了很大一步。美国社会学协会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通过其会议简报和常规的出版发行物，以及通讯杂志《脚注》的专栏等等形式来普及和宣传公共社会学。本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还设立了一项旨在表彰媒体对社会学的报道的新奖项。我们需要在社会学和新闻业之间发展一个合作关系，因为记者不仅自身就代表着公众的一部分，同时也与我们以及其他公众站在一边。

美国社会学协会还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推动公共社会学的制度化，它主要将考虑三个关键议题。第一，它将考虑如何辨别和确认已经存在的公共社会学，使不可见的变得可见，使私有的变成公共的。第二，它将考虑如何建立对公共社会学的激励机制，以奖励在现有的考核和晋升体系中往往不占什么分量的公共社会学方面的努力。现在已经有一些社会学系设立了奖项和博客，并开始设计公共社会学的课程大纲。第三，如果我们要承认和奖励公共社会学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发展一个辨别好的还是坏的公共社会学的标准出来。我们还必须明确由谁来评估公共社会学。我们必须鼓励那些最好的公共社会学，不管它们是怎样的。公共社会学不能成为次等社会学。

尽管这些制度化的变迁非常重要，但是公共社会学的成功并

不会来自上面，而是从下开始。当公共社会学赢得了社会学家的想像力，当社会学家视公共社会学本身是重要的且有着自身的价值所在，当社会学家将它当作一场超越学术的社会运动来从事的时候，公共社会学的胜利就真正来临了。我期待社会学家与他们的大众之间的协作能够聚沙成塔，聚小流成江河，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他们将吸收一个世纪的广阔的研究、精深的理论、实际的干预和批判的思考，最后达到超越了各种界限（至少但绝不仅仅是国家的边界）的共同理解，通过这种方式从褊狭僵化的旧状态中摆脱出来。我们历史的天使也将会展开她的翅膀，在暴风雨之上自由翱翔。

参考文献

Abbott, Andrew. 2001.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 *An Invitation to Public Soci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lah, Robert,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Tipton.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njamin, Walter. 1968.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erger, Peter. 2002. "Whatever Happened to Sociology." *First Things* 126: 27 - 29.

Bielby, William. 2003. *Betty Dukes, et al. v. Wal-Mart Stores, Inc.*

Blau, Pet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Bok, Derek. 2003.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86 [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8 [1984].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Phil, Stephen Zavestoski, Sabrina McCormick, Brian Mayer, Rachel Morello-Frosch, and Rebecca Gasio Altman. 2004.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6: 50 - 80.

Burris, Val. 2004. "The Academic Caste System: Prestige Hierarchies in PhD Exchange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239 - 264.

Cole, Stephen (ed.) 2001. *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Coleman, James.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 1975. *Trends in School Segregation, 1968 ~ 1973*.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 1991. "A Quiet Threat to Academic Freedom." *National Review* 43: 28 - 34

——. 1992. "The Power of Social Norms." *Duke Dialogue* 3.

Collins, Patricia Hill. 1991. *Black Feminist Thought*. New York: Routledge.

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2003. *Report*. Vol. 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ewey, John. 1927.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 Henry Holt.

Du Bois, W. E. B. 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A. C. McClurg.

Ehrenreich, Barbara. 2002. *Nickel and Dimed*. New York: Henry Holt.

Ennis, James. 199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Modeling the Intersection of Special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259 - 65.

Epstein, Steven. 1996. *Impure Sci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tzioni, Amitai. 1993.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Evans, Peter. 2004. "Development as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Pitfalls of Monocropping and the Potentials of Delibe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 30 - 53.

Fourcade-Gourinchas, Marion. 2004.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Profession: The Case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raser, Nancy.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New York: Routledge.

Gamson, William. 2004. "Life on the Interface." *Social Problems* 51: 106 - 10.

Gans, Herbert. 2002. "More of Us Should Become Public Sociologists." *Footnotes* (July/August) 30: 10.

Goodwin, Jeff and Jim Jasper (eds.) 2004. *Rethinking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Gouldner, Alvin. 1968. "The Sociologist as Partisan: Sociolog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merican Sociologist* 3: 103 - 16.

——.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Habermas, Jürgen.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wo Volumes). Boston, MA: Beacon.

——. 1991 [196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n, Shin-Kap. 2003. "Tribal Regimes in Academ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cture Across Disciplines." *Social Networks* 25: 251 - 80.

Horkheimer, Max. 1974 [1947].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1969 [1944].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eabury Press.

Horowitz, Irving Louis. 1993. *The Decomposition of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oby, Russell. 1987. *The Last Intellectuals :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New York: Noonday Press.

Kang, Kelly. 2003. *Characteristics of Doctoral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atistics.

Kirp, David. 2003. *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rson, Olaf and Julie Zimmerman. 2003. *Sociology in Government: The Galpin-Taylor Years in the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19 ~ 1953*. University Park,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ee, Alfred McClung. 1976. "Sociology for Who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925 – 36.

Lippmann, Walter.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Neil J. Smelser. 1961. *Sociology: The Progress of a Decad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Lyman, Stanford. 1992. *Militarism, Imperialism, and Racial Accommodation: A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Writings of Robert E. Park*. Fayetteville, AK: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Lynd, Robert. 1939.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s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ullo, Sam and Bob Edwards (eds.) "Service-Learning Pedagogy as Universities' Response to Troubled Times." Special issue of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741 – 912

McCormick, Sabrina, Julia Brody, Phil Brown, and Ruth Polk. Forthcoming. "Public Involvement in 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 Analysis and Model for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Merton, Robert. 1949.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re, Kelly. 1996. "Organizing Integrity: American Sci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 1955 – 197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592 – 1627.

Mueller, John. 1973.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John Wiley.

Myrdal, Gunnar. 1944.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Ostrow, James, Garry Hesser, and Sandra Enos (eds.) 1999. *Cultivating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Service-Learning in Soci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Pager, Devah. 2002. *The Mark of a Criminal Record*.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

Park, Robert. 1972 [1904]. *The Crowd and the Public*.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 1961.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Pp. 30 – 79 in *Theories of Society* edited by Talcott Parsons, Edward Shils, Kaspar Naegele, and Jesse Pitts. New York: Free Press.

Patterson, Orlando. 2002. "The Last Sociologis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9th.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earch Trends. 1933.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Purser, Gretchen, Any Schalet, and Ofer Sharone. 2004. *Berkeley's Betrayal: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t Cal*.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16, San Francisco, CA.

Putnam, Robert. 2001.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Rhoades, Lawrence. 1981.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05 – 198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Riesman, David. 1950.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Ryan, Charlotte. 2004. "Can We Be Compañeros." *Social Problems* 51: 110 – 13.

Schurman, Rachel and William Munro. 2004. "Intellectuals, Ideology,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Process of Grievance Construction in the Anti-Genetic Engineering Movem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I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elznick, Philip. 2002. *The Communitarian Persuas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Random House.

Sennett, Richard. 1977.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Sitas, Ari. 1997. "The Waning of Sociology in South Africa." *Society in Transition* 28: 12 - 9.

Skocpol, Theda. 2003. *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Smith, Dorothy.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palter-Roth, Roberta and William Erskine. 2004. *Academic Relations: The Use of Supplementary Facult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tacey, Judith. 2004. "Marital Suitors Court Social Science Spin-Sters: The Unwittingly Conservative Effects of Public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51: 131 - 45

Stacey, Judith and Timothy Biblarz. 2001. "(How) Does the Sexual Orientation of Parents Matt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159 - 83.

Stouffer, Samuel et al.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rand, Kerry, Sam Marullo, Nick Cutforth, Randy Stoecker, and Patrick Donohue. 2003.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Turner, Stephen and Jonathan Turner. 1990. *The Impossible Science: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Uggen, Christopher and Jeffrey Manza. 2002. "Democratic Contraction?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Felon Disenfranchis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777 - 803.

Vaughan, Diane. 2004. "Public Sociologist by Accident." *Social Problems* 51: 115 - 18.

Waite, Linda and Maggie Gallagher. 2000. *The Case for Marriage*. New York: Doubleday.

Wallerstein, Immanuel, Calestous Juma, Evelyn Fox Keller, Jurgen Kocka, Domenique Lecourt, V. Y. Mudkimbe, Kinhide Miushakoji, Ilya Prigogine, Peter J. Taylor, and Michel-Rolph Trouillot. 1996.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cquant, Loïc. 2004. "Following Bourdieu into the Field." *Ethnography* 5 (4).

Warner, Michael. 2002.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New York: Zone Books.

Webster, Edward. 2004. "Sociology in South Africa: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ety in Transition* 35: 27 - 41.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New York: Knopf.

Wolfe, Alan. 1989. *Whose Keep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社会学和社会的命运*

第三波市场化（marketization）已经横扫世界，它摧毁了以往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为保卫社会而费心竭力建造起来，反对第一波和第二波市场化的那些壁垒。被一扫而空的有经由反对19世纪市场化的劳工运动而赢得的劳工权，以及经由国家反对20世纪的市场化而确保的社会权。世界再次被荡为平地。第三波市场化不仅废除了以往艰难赢得的成果，而且还把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拓展到新的领域。在20世纪最后25年间，对包括从身体到环境的自然界的商品化已经遭到恶报，在我们进入21世纪时汇聚了新的冲动。在这个第三波的背后，是一个全球维度的经济阶级，其为自己的目标驾驭了民族国家，挑起反恐战争，并且对绝望贫困的流动工人群体进行异乎寻常的剥削。反对这一经济风暴的最后据点是社会本身，它的组成包括：带有集体自我调节手段的社团、借集体意志形态而得到表达的运动，以及彼此承认和沟通的公共性。社会能够迎接这个挑战么？

* 本文译自“Sociology and the Fate of Society”，是作者于2006年6月21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译者及单位：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在直面这个对全世界因而也是对人类的威胁之际，社会学家有四种选择。他们可以同国家比肩而立，反对市场，希冀从国家抵抗的残留物中汲取些什么。在某些国家中，例如在那些带有社会民主政治的持续遗产，或是提供福利的强固遗产的国家中，这是有意义的。此种政策科学依赖于在国家内部发现空间，借以容纳市场崇拜（market juggernaut）——一种以不同的速度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消逝的空间。社会学家的第二种选择是把他们的脑袋深埋在沙丘之中，声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不能因投身于风暴而使我们的合法性，使我们的现实存在冒险。专业社会学家静观待变，期待风暴过去，对它不会把我们和社会的其余部分一网打尽心存侥幸。第三种选择是面对头两种选择拍案而起，撰写小册子反对他们的道德堕落，面对国家和市场的魔鬼共谋发出哀叹。但是人们发现，批判的社会学在风暴降临之际诉诸退场的听众。不过，还有第四种路径，它拒绝与市场和国家的共谋；它认为若没有政治，科学就是盲目的，若没有干预，批判就是空洞的；它号召社会学家在社会归于完全消逝之前直接参与社会。这就是我称之为“公共社会学”的路径。第三波市场化引发公共社会学的时代。①

市场化的三种面向：南非、俄罗斯和美国

第三波市场化是全球性的，虽说社会学的反应仍然是民族性的。让我以三个我多少通晓的国家，即南非、俄罗斯和美国作为

① 公共社会学有赖于其他社会学——政策、批判和专业的社会学，即便当它界定作为整体的社会学的性质时也是如此。

示例。我在22年未曾涉足之后，于1990年返回南非。我发现，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曙光中，社会学由于从事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特别是从事劳工运动而被赋予活力。社会运动的工团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就在其他的国际脉络下为人所采纳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向后种族隔离制度的过渡是在市场必胜论复兴时期发生的，其由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所触发。非洲国民议会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在其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雄心，在其掌握政权后随即蒸发殆尽。相反，南非向贸易开放了国界，并且将其大量的公共部门私有化了。廉价进口货从那些劳动条件甚至更为恶劣的国家如潮涌入，摧毁了经济部门，侵蚀了工会的力量，导致劳力的临时工化和非正规部门的增长。使饮水、电力、公共交通和电信私有化的运动，是针对城镇和村社中日常生活的第二次袭击。种族主义的非人性得到羁绊，但另外的非人性则被加深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与对劳力的商品化联袂而至，无论是经由削减社会保护，还是经由延缓工业调节。

南非社会学也不能逃脱国家和市场的勾连运动（pincer movement），它被推向专业化，并且落入国际水准基点的竞争游戏。因为大学的工资低于私人部门和民事机构的工资，所以社会学家或者逃向更高支付的工作，或者通过增加对政策研究的依赖来弥补他们的亏空。批判和公共社会学的遗产被削弱，不仅是由于更为科学化和商品化的知识压力，而且还由于社会本身即社团、运动和公共性的退却使然。第三波市场化不仅打碎了社会，而且也打碎了作为其表征的那个学科领域。

种族隔离制度是紧接着其意识形态对手，即苏俄秩序的崩解之后解体的，而苏俄的崩解有其自身未尝预料的结局。随1989

年东欧的连锁反应接踵而至的，是苏联发现自己与往昔的卫星国争相最为激进地转向市场经济。在“震荡疗法”（那已经被证明为只有震荡而没有疗效）和“大爆炸”（由西方经济学家鼓动的荒唐解构方案）的名目下，党国被拆除以便释放市场的自发增长。据说，解构得越快，共产主义就越无复仇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的重建也就越是彻底。市场倒是的确跳跃式地进入生活，但它却使生产陷入混乱。由于1992年开始的价格自由化，通胀摆脱控制如螺旋般上升，生意很快不成其为生意，而工资也不再发放。比起生产来，交换领域变得更为有利可图，所以资源注入跳蚤市场、商亭、超市、银行、黑帮、现汇投机、资产缩水和私有化。在一个急剧缩短的时限内，所有的东西都在大劫掠中准备出手。货币的商品化使得卢布在经济交易中毫无用处，经济交易退化到以物易物。俄国不是实现了革命或进化，而是面对经济内卷（economic involution），即消耗自身直至衰败的经济；在20世纪内，人们难以目睹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斯大林主义带来了原始积累，即占夺农民土地，并且创造了除劳动力可以出售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那么市场转型却带来了再农民化，即人们可以称之为反积累的过程。如此之多的经济维生手段落入生计生产，并且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发达社会退化为血亲网络，甚至更为狭窄地退化为核心家庭。

社会走多远，社会学就走多远。除了在苏联改革之中，公民社会产生时，在共产主义黄昏中那瞬间爆发的泡沫外，社会学已经成为党国意识形态的传送带。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社会学所继承的专业基础十分薄弱。市场化将社会学变成了民意调查和市场研究，而学术项目在新的商学院中几乎难以找到。专业社会学缺乏牢固的基础，一种粗糙的政策科学却大行其道。批判的

和公共社会学几乎很难找到其影子。

与此形成矛盾的是，我们可以在美国发现与此相反的趋势。第三波市场化同样影响了这里，其目标是摧毁并将社会连根拔起，同时也刺激了专业社会学的热烈回应；但这种回应的范围仍然固守于学术界，而没有引发更大范围的有效参与。与社会一起渐为世人所遗忘的，还有复杂以及生命力强健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只有公共社会学的潜在贡献在逐渐增长；但它在社会中被人接受以及采纳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以卡特里娜飓风为例，它在 2005 年 8 月的时候，摧毁了新奥尔良的防洪堤，并淹没了这座城市，造成了 1400 名公民的死亡。人们正确地注意到了联邦管理部门在处理非常规性灾难时的重大失败。因为这种大灾难并非不可预测，科学家们已经知道这种防洪堤在拦截洪水时的脆弱性，并预测到了它们在面对此种飓风时的崩溃，以及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后果。这些后果都一一应验了。但防洪堤仍然没有被重建，尽管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向国会申请过资金，但国家有优先考虑的其他财政预算。这不仅仅指的是近几年来在伊拉克的战争。实际上，黩武主义政策也同样解释了突发事件处理为何失败。一方面，路易斯安那州的地方部队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被征调一空，而在此前，他们是被组织起来以应对突发事件的。更为重要的是，当军事安全对于经济和社会安全取得优势时，自 911 之后新组建的国家安全部门，吞并了 FEMA（国家联邦应急管理机构）。与第三波市场化携手并进的，是已然受限的福利国家的被掏空，以及不平等的加深；所造成的后果是，新奥尔兰的那些穷人以及大量的黑人人口没有能力抵抗洪水的侵袭；他们失去了家园以及财产，他们现在住在汽车房子内游荡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没有理由去原谅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富

裕的国家，在一场可预测的灾难中丧失了如此多的人民。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在海峡的另一边，一个如此小的国家如古巴，将在飓风的边缘中死亡一个人视为一场民族灾难，即便如卡特里娜飓风时，我们就更难以原谅它了。

第三波市场化营造了一种国家应对飓风时的社会麻痹心理的情境，但同时，市场化也是这场灾难更为直接的原因。新奥尔良休闲产业的快速和无节制增长，占用了大量土地，而这是以吸纳洪水的关键性沼泽地的丧失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同时也促进了新奥尔良海岸附近海湾中的石油开采，这造成地表下陷，使得这个城市对于洪水的防范更为脆弱。最后，科学家们已经指出，全球变暖——这是第三波市场化的另一产品，通过使海洋变暖，加强了飓风的破坏性。因而，通过这一恣意以及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我们可以预测灾难性的破坏只会增长。美国政府听不到这些来自科学家的警告，无论是对更具破坏性飓风的预测、防洪堤的脆弱性，还是此类灾难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影响。

也许，对扩张市场有兴趣的经济学家，或者对为了市场扩张而保障其政治环境有兴趣的政治学家，可能会受到资本家和政府的重视，其意见也乐于被接纳，但对社会情有独钟的社会学家却丝毫不可能有此类幻想。实际上，美国政府，举例而言，不仅没有对社会进行布置以使其保卫自身的利益，反而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宣战，向它的一个又一个壕沟发起了进攻。因而，社会学家不得不离开国家和经济的政策领域，后者非常清楚他们不想要什么。社会学家只能去发掘并培养其他听众，也就是公众。这些公众有可能恢复社会为了自卫而组织起来的力量，并同时作为第三波市场化的对冲力量。

商品化的三波潮流：劳力、货币和土地

我的三个案例——南非、俄罗斯和美国——显示了第三波市场化如何强化以及被组织化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对去殖民化进行抵抗的最后力量强化的。

今天，国家调控深化了，而不是容纳了劳力、货币以及土地的商品化，或者如卡尔·波兰尼所称的虚构商品。波兰尼认为，对这些事物的商品化，使它们臣服于不受节制的市场交换，破坏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削弱了它们作为生产要素的效用。交换模式对生产模式具有背叛作用。

波兰尼《大转型》的许多章节都描写了英国在19世纪所发生的劳力的商品化。随着在斯宾汉姆兰劳动保护的废除以及院外救济的禁止，劳工在市场力量地震般的变动中颠簸流浪。资本可以随意雇佣和解雇劳工，而丝毫不考虑他们的生存；它同样也破坏了它原先嵌入其中的传统社区。然而，在同一时间，由于绝望，一个新的社会开始得到锻造：一是通过社会运动，比如，工厂运动限制了工作日的长度；一是通过结社活动，比如，丧葬协会、工会、协作团体，和乌托邦试验（如欧文的新勒拿）。简言之，劳力的商品化引发了社会自发的自我重构运动。

波兰尼将他的分析带入20世纪，其关注点从劳力转向货币。当货币变为不受限制的市场交换的主体后，正如在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之后的苏联，价值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巨，以致商业活动都无法开展。在19世纪，政府已然建立它们自己的国家银行，用来管理通货和汇率；但金本位制的采纳，以其通货价值的不可控制的波动，削弱了商业活动。政府的反应是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

或多或少有点严峻的政策将民族经济与全球市场隔绝开来。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社会民主主义和新政都是处理第二波市场化的各种手段，但它们同时也包含了一定劳工权利的恢复，并将其扩展到社会权利，包括最低工资、退休金、教育和福利。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与这些社会权利相伴随的是政治权利范围的缩小和对于社会的压迫性管制。即使殖民主义也可能包含在这种对于市场的保护性反应之内。这是一种间接统治的策略，它使工人阶级有渠道维持生计。第二波市场化和政府的对冲运动史与霍布斯鲍姆所谓短暂的20世纪，即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苏东共产主义崩溃的时间相一致。

波兰尼从未曾预测过第三波市场化浪潮。这可能是因为他从未在他的“大转型”中区分第一波和第二波浪潮，也可能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第二波浪潮的反应给人类的自由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也同时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波兰尼想象着人类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走市场原教旨主义之路了。相反，他规划了这样一个更为乐观的前景：其中，市场和国家都服从于自组织的社会的监督和管理。在这里，他有两点是错误的：第一，将会有第三波市场化浪潮，而我们正身处其中；第二，强大到能够使市场和国家走投无路的自我调节的社会并不会出现。我们如何来刻画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三波市场化的特征呢，我们能观察到社会怎样的反应呢？我提出了三个维度。

遵循波兰尼，我们看到，第一波市场化产生了反对劳力商品化的对冲运动，而第二波市场化产生了反对货币商品化的对冲运动。第三波市场化，我认为，产生了反对土地、环境或者更宽泛而言，反对自然商品化的对冲运动。尽管土地和环境在第一和第

二波市场化中已经被商品化了，但它们现在已经导致了困扰这个星球的规模巨大的灾难。自然商品化的后果已经开始接近我们，而且它们还具有累积效应。于是，围绕土地获得权的斗争在今天接连不断：无论是那些居住在公地或简陋小木屋里的人，为了他们的权利而与地方政府将他们从都市版图上驱逐出去的企图作斗争；那些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反抗高楼的开发商；那些当地人拒绝放弃他们的土地；或者农民反对建设将毁坏他们生存环境的水坝；还是那些为了清新的空气，反对倾倒有毒废料，反对水和电私有化的斗争。这样的单子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当然，劳力和货币的商品化也仍然十分重要，实际上，它如我在考虑南非、俄罗斯和美国时所显示的同样重要，但对于自然商品化的反应是第三波市场化的重要特征。

第二条刻画第三波市场化特征的是其规模。它的原因和后果都是真正全球化的。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小一点程度上来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路障被清除之后，任何地方都将被披露于市场化的风暴之中。对市场化的反应的规模也在增长之中。如果对于第一波市场化中劳力的商品化的反应经常是地方性的（但也经常会上升到国家层次），而且如果对于第二波市场化中货币的商品化的反应是国家层次上的［但也经常上升到全球范围（IMF，世界银行）］，那么，对于第三波市场化中自然的商品化的反应则是从地方性出发而上升到全球范围。既然全球变暖、核事件、传染病的后果是全球化的，那么，反应也将是全球化的，即便这种全球反应包括连接地方性的运动。

第三种刻画随之而来的市场化浪潮的方式并不是从一种虚构商品推进到另一种，而是根据用以反对市场化的防御的持续被击退这种状况。如果第二波市场化在国家社会保护的障碍建立起来

之前，首先就摧毁了劳工组织的障碍的话，那么第三波市场化就同时击退了劳工和社会权利。这种情况随处可见，比如，工会衰退了，工人阶级的真实工资下降了，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福利收缩了；而且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尽管其程度十分不均衡。在何种基础上，下一轮的防卫措施将会被建立——这种防卫措施将会防止自然的退化，并覆盖劳工权利和社会权利？对于人性以及共同体的挑战越强烈，其反应也就越强烈——对相互承认为人的共同体的保卫——这将必然包含劳工和社会权利。

人权，正如所有权利话语一样，会轻易地被挪用以及窄化以适用于特殊利益。美国将保卫其帝国前景和殖民性职业作为对人权的推进，却始终拒绝其公民的基本人权。在为海外侵略、杀戮以及镇压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时，选举式民主变成了一种人权；而在国内，这种人权却被藏在背后。在保卫人类自由选择权利和私有财产权的名义下，市场自身被推进了。人权，就其自身而言，是普遍性的而非特殊性的，因而同样包括劳工权利和社会权利，必须从保护人类共同体开始。这首先就需人类共同体要像终极目的而非手段一样来相互承认以及对待对方。因此，人权是一个复杂的斗争领域，其中各个群体在它们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申明自己的权利；但最终而言，人权是有关人性保护的事物，刺激全球范围内的种族对第三波市场化的斗争。

社会学的三种潮流：乌托邦社会学、政策社会学以及公共社会学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对于每一波市场化，都有一门特殊的社

会学与之对应。社会学成长于19世纪，公民社会也如此。它自身就是对第一波市场化的反应。当新兴的无产阶级化的、贫困的以及堕落的群体开始以城市为家时，社会学作为一项道德事业开始发展起来，它保卫社会免遭市场的破坏，尤其是使共同体免遭摧毁。社会学沉湎于各种能够战胜或者超越市场的方案，比如欧文在英格兰的试验、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以及美国的协作公社运动。

这是一个乌托邦社会学的时代。人们可能会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共产主义设想中最原初的乌托邦居民。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个共产主义将会在最终不可避免自我毁灭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中成长起来。奥古斯特·孔德想象了一个由社会学家领导的家庭式秩序，而涂尔干则设想了一种建立在具有劳动分工的法团主义组织基础上的有机团结——这是一种行会社会主义的形式。

当然，马克思和涂尔干会抱怨给他们贴上乌托邦的标签。毕竟，他们视自己为科学家。借助社会运行法则，他们将毕生精力都投向了是什么以及必然会是什么的问题。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对于所有他们带给社会研究的革命性突破而言，他们的科学仍然发人深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生的第二波市场化，冲击了劳工通过工会和政党所取得的权利。但这是国际贸易所产生的破坏性产物，这种商贸活动威胁了资本积累的环境，从而促使政府做出保护性反应。从法西斯主义到美国新政，从斯大林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都属于这一反应范围；但是它们都构筑了社会（而非政治）权利保护措施，包括失业救济、退休金、福利、教育等方面的权利。社会学也相应得到了发展。在这些以威权方式对第二波市场化做出反应的国家中，无论是法西斯德国还是斯大林式的

苏联，社会学被削弱了；而在以某种社会民主主义形式做出反应的国家中，无论是美国还是瑞典，你可以看到，随着国家为了保护社会而反对市场，一种新型的社会学得到了发展。这是一个政策社会学的时代，这些政策社会学都由国家资助而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在英国，自主性社会学几乎很少存在，相反，社会管理的学术领域开始成长，而这是跟福利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美国，我们看到了专业社会学的发展，后者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尽管如此，这种社会学还是跟社会的稳定化相联系的：分层理论基于一个给定的职业声望体系；功能论基于一个稳定的家庭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有效调控；产业社会学关心的是对劳工的榨取以及维持和平关系；政治社会学关注的是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以及对极端主义的容纳。总体理论框架由结构功能主义来定义——划定功能性要件从而保持社会系统的均衡，以及这些要件是如何由社会制度来满足的。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发展了它自身的实证科学，也就是关注经验研究、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的新方法，以及对所谓中层理论的精雕细刻，后者被安置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脚手架中。实证科学是对早期思辨科学（它由道德改革所驱动）的一种反动。它希望将道德问题驱逐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个领域与科学完全对立。如果第一波社会学是乌托邦式的，则第二波政策社会学倾向于认为，乌托邦已经来到，并且误将其当成了现实。这种错觉顽固地影响了今天的思路，使其只关注如何消除其中的小小的不合理性。

因而，我们要问，什么类型的社会学标志着对第三波市场化的反应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近一轮的市场化已经击退了国家对社会的保卫，它对劳工权利和社会权利发动了进攻。与激

表 1　社会学 vs. 市场

	第一波市场化	第二波市场化	第三波市场化
虚构商品	劳　力	货　币	自　然
反应场所	地方社区	民族国家	全球公民社会
权　利	劳工权利	社会权利	人　权
社会学取向	乌托邦式社会学	政策社会学	公共社会学
科　学	思辨性	实证主义	反思性
地理场所/发源地	西　欧	美　国	半边缘

起国家反市场反应（比如，保护主义、计划、工资保障、福利、生产方式的公共所有权）的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不同，第三波市场化引发了国家的共谋。尽管仍然是一个管理型国家，但它的管理与其说是反对市场，不如说是保卫市场。它废除了所有在反抗第二波市场化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因而，社会就处于来自经济和国家的双重威胁之下。由于无法在政府或者市场上施加更多的影响，社会学的命运也就取决于社会的命运。社会学的自身利益存在于在几乎不存在公民社会的地方对其的构建中，存在于在公民社会逐渐衰退的地方对其的保护中。如此，我们才可以声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共社会学的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返回 19 世纪的第一波市场化。当然，这里存在一点差别。首先，社会学不能将自身的参与范围限制于地方公众，正如我已经申明过的，社会学必须关注编织全球公民社会的事业。第二，这里存在乌托邦的维度，但其所指向的不是想象的乌托邦，而是实际存在的乌托邦。其存在的条件以及扩大的再生产，正是我们需要借助我们所能支配的所有工具手段进行探索的一项任务。第三，它所召唤的是一种十分不同于 19 世纪思辨科学的科学。它召唤的这种科学不再植根于价值

共识和稳定性，而是要去发展一套替代性价值。由此而言，韦伯所称之为的价值讨论，以及我所称之为的批判社会学，就具有其重要性。我们不再去追求一种单一的范式性科学（paradigmatic science），我们追求的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由多种相互交叉的研究项目构成，建基于不同公众的价值观之上；而且，通过介入外部的异常事务以及内部的矛盾冲突，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框架。我将其称为反思性科学。这种科学既不会惧怕对其价值基础的反思，也不会惧怕对其进行公开的阐述；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门科学。

如果第一波社会学起源于欧洲，第二波社会学在美国达到了其完美的典范，那么，第三波社会学将在何处发现其能量呢？在思考充满生机的公共社会学的过程中，我转向另外一些国家：南非，尤其在它处于反种族隔离的巅峰时；处于后极权主义政体时期的巴西；具有知识分子化公共领域的法国（这里的公共领域欢迎社会学视角的参与）。或许我们可以说，一方面，公共社会学受到构建或者保卫一个具有自主性公民社会的需要的驱动（这是相对于公民社会缺席或微弱的地方而言的）；另一方面，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的推动，这个社会引发了一门参与性社会学的出现。对于公共社会学而言，也存在其他一些条件。如果拥有一个在专业社会学中发展良好的科学基础，公共社会学就会更加长寿；当然，它也需要一丝来自批判社会学的对于自身价值的意识。当社会学变得更具全球性时，跨越国境的借用（borrowings）就变得更为可行，也变得更为重要。比如，葡萄牙，在 1974 年革命之后，推翻了长达 50 年的独裁统治，吸收了美国和法国社会学中的批判和专业传统，并利用它们发展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全球性的借用在呈现可能性的同时也显示了其危险：美国专

业化社会学可能会限制民族社会学（national sociologies）对地方性事务的敏感性。面向国外专业性受众的英语写作，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地方性公共社会学的生命力。尽管充满灵感的公共社会学会首先出现在半边缘国家，它们的影响仍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但即使此类反霸权运动，也仍然依赖来自其他国家的输入。尽管社会学霸权式的全球化可能会使得公共社会学变为政策社会学以至居支配地位的专业社会学，一种反霸权式的全球化还是会使专业和政策社会学臣服于公共社会学扩张的条件，尤其是如果这种公共社会学是有机公共社会学的话；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嵌入于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无中介性互惠关系之中的公共社会学。

结　语

在这篇短小的文章中，我已经试图阐述了为什么社会学需要有一个公共转向。社会学与社会生死与共。当社会受到威胁时，社会学同样受到威胁。我们不能再依赖国家去包容市场，因而，社会学家必须去锻造他们自身与社会的联结，也就是说，去发展公共社会学。我们不能仅仅消极地去服务社会，而应当去保存以及建构社会。在这项事业中，我们在社会中拥有很多潜在的盟友和伙伴，他们也同样处于来自国家和市场越来越多的侵犯的状况中。这就是社会学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当代广阔情境。

对当代情境的思考，我们不能脱离其过往历史。市场化的三波浪潮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学构型（configuration），并不能被理解为前后相继以及处于不同时期的独立部分。以辩证性的回归或进步（regression or progression）的方式，每一波浪潮都将其遗产

留给了下一波。当它们以回归的方式从劳力转向货币和自然时，商品化的浪潮在深化，每一波浪潮都将前一阶段的商品化吸纳于自身；这正如相反的运动进步性地从劳工权利扩展到社会权利（其包括劳工权利），直至涵纳三者的社会权利。而社会学的辩证性运动则有些不同。政策社会学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实证科学是对乌托邦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后者含有道德内蕴以及思辨科学。而公共社会学则试图将第一阶段的价值承诺结合进第二阶段的科学进步中。商品化及其去商品化的反运动，在每一波浪潮中都得到深化，而社会学则通过正（题）、反（题）和合（题）而得到发展。即使在这里，我们也需要谨慎，即不能按照非连续性的社会学这样一种思路去思考。我们思考的出发点，是社会学四种要素的重新型构；在这种型构中，社会学的专业、政策、批判以及政策的权重会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变动。实际上，除非有批判社会学的推动，以及扎根于专业社会学，否则，公共社会学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

在不同国家中，浪潮波动的周期以及间距都会不同。在今日之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些波动在时间上呈现明显的离散状态。相反，在诸如俄罗斯、印度或者中国等国家，波动则呈现密集状态。当然，在俄罗斯，劳力、货币以及自然的商品化是与苏联的崩溃同期发生的，其强度在此时期也相当大。如此状况，以致与之相抗衡的反动力量还没有发生作用就被湮没了。社会学也受害甚深。中国则呈现另一种状况。劳力、货币以及自然的商品化的激烈程度在后毛泽东时代在时间上也重合在了一起，但它们依然在中国政府的管制之下。政府管制的后果是经济得到了发展而非经济内卷化，并且在社会学的不同遗产中留下了自身的烙印。尽管存在国家间的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将当下时代视为一个

整体。其中，自然的商品化更为一般地集中体现了商品化的积聚性后果。它已经成为这个星球最为紧迫性的问题，成为激发社会运动的最具影响力的问题。这些社会运动以人权的名义组织在了一起。

社会学能够面对第三波市场化的挑战么，社会学能否在全球层次上参与将组织、运动以及公众编织在一起的行动么？或者它就屈服于商品化浪潮了——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知识生产的商品化；臣服于利润的法则，以及由大众传媒主导的知识传播的商品化？在这两种考量上，社会学必须与组织、运动以及公众一起工作，这样，它的成果及其散布就会在市场和国家的控制之外构成一种联动过程。



公共社会学

民族志

拓展个案法*

论文摘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拓展个案法”做了一番详细的阐述和整理。所谓拓展个案法，就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加以考察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体现了“反思性科学”的原则，但却一直受到另一种科学模式，亦即实证科学的指责。实证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体现，是调查研究，它将研究者和调查对象区别开来作为工作的原则，追求研究的可靠性、可重复性和代表性。作为回应，作者以他在赞比亚的研究经历为例指出，实证科学其实也无法实现它的原则，因为在实践中它一定会受到四种“情境效应”（访谈、回应、场所以及情景效应）的限制；相反，通过四步层层递进的拓展（从观察者拓展到参与者、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从过程拓展到力量、拓展理论），拓展个案法却能够很

---

* 本文译自“Extended Case Method,”原文发表于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March 1998。论文摘要是译者根据原文重写的。

译者及单位：吕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好地落实反思性科学的基本原则，使得干预、过程、结构化和理论重构成为可能。当然，拓展个案法也有缺陷，那就是它会受到四种“权力效应”（支配、沉默、客体化以及标准化）的限制。所以，既不应该用实证主义的批判来要求反思性方法，也不应该用反思性批判来要求实证方法。研究者最终要问的是，何时、何地以及为何采用两种方法模式中的一种。

方法论只能够带给我们关于手段的反思性理解，而通过将手段提升到明确意识的层次，它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与解剖学知识不是“正确”走路姿势的前提一样，方法论不再是丰富的知识性工作的前提。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的确，就算知道了解剖学知识，通常也不能保证“正确”的走路姿势。但是当脚下的大地一直在摇晃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支架。作为社会科学家，通过我们研究的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在场”、通过被吸收进我们观察的这个社会、通过与那些我们使之成为“他者”的事物生活在一起，我们失去了平衡。于是，超越个人的“卷入”成了民族志的普遍困境：因为，我们生产的理论、概念和事实，却破坏了自己试图去理解的那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可以使自己保持站立的方法论，因为即使在考察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在移动和改变。

和别的不利条件一样，民族志的上述情况可以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来解决：①对不利条件进行限制；或者，②把它转为有利条件。在第一种策略中，我们将自己的尴尬处境最小化，手段则

包括：避免被牵涉进我们所研究的世界，把我们自己从研究对象中隔离出来，从外部观察它们，通过中间人来询问它们等。这样，通过一系列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数据采集手段，我们仍然站稳了脚跟。这就是实证的方法，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则是它最好的体现。后者的每一项努力都是要中止我们参与到自己所研究的世界中：我们要试图避免影响我们所研究的环境，使数据的收集标准化，对外部的情况进行归类，并确保我们的样本富有代表性。

在另一种策略中，我们把参与到所研究的世界中当作主题。通过与引导我们参与对话的理论保持联系，我们站稳了脚。卡尔·波兰尼就曾详细阐述过这一思想（Polanyi，1958）：他反对实证主义的客观性，他认为这种“客观性”建立在对理论的“合理性”，亦即我们理解世界的认知地图，表示支持的“感觉材料”（sense data）的基础之上。他所提倡的“栖居”理论（“dwelling in” theory），则是我所说的科学的反思模式（*reflexive* mode of science）的基础，这种反思模式将“参与”（engagement）而不是“超然”（detachment）看做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以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中“我们的参与”为前提，反思性科学利用多重对话来慢慢实现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它从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一个虚拟的或真实的对话开始，再把这个对话嵌入第二个对话，亦即地方过程和外部力量之间的对话中，而这第二个对话只能够通过不断扩大的、理论与其自身的第三个对话才能够理解。在这里，用来测量客观性的标准，并不是那些确保对世界进行精确测绘的步骤，而是知识的增长，亦即通过对理论富有想象和谨慎的重建，以容纳那些不符常规的事物。

拓展个案法（the extended case method）将反思性科学应用

到民族志当中，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建立连接以预测“未来”——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事先存在的理论。在我本人对拓展个案法的应用中，我就曾利用自己在赞比亚铜矿工业中做人事顾问的经历，来详细阐述法农（Fanon）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当我在南芝加哥的工厂做操作工的时候，我试图将葛兰西关于霸权的理论运用到我的经历当中，以暴露“同意”（Consent）的根基；通过联系塞勒尼（Szelényi）关于阶级结构和科尔奈（Kornai）关于短缺经济的理论，在匈牙利各种工厂——香槟、汽车和钢铁——劳动的基础上，我曾经探讨过社会主义情况下工作组织和阶级形成的性质。最近，我已经从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家具厂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商业和金融资本的观点，向外开展我的工作，以发展从社会主义转轨到资本主义的理论。我如何才能使这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从个别到一般、从尘世到20世纪晚期广泛历史议题的丰富的跨越性话题中获得合法性呢？这就是推动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所在。

虽然对民族志研究来说，更常见的做法是将自己限定在所研究的日常世界的“容积”之内，但我并不是唯一从田野中“拓展出去”的人。实际上，这是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标志之一，是他们首先创造了“拓展个案法”这一术语（Garbett, 1970; Gluckman, 1958, 1961a, 1961b, 1964; Van Velsen, 1960, 1964, 1967; Mitchell, 1956, 1983; Epstein, 1958）。与那些从“线人”那里收集“土著们”“应该去做什么”的素材的人不同，他们在自己的笔记中开始记载“土著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以及在不同地点和时间内发生的真实事件、斗争和戏剧性场面。他们把标准规定和日常实践之间的不一致带了进来，这些不一致

不仅使他们探寻到了殖民主义内部的矛盾，而且还有它的侵扰。他们开始把非洲人群体重新放回更广泛的、世界历史性的情境当中。

不仅在非洲，在英美也有一个丰富但未成形的、隐约体现拓展个案法风格的学术传统。例如，社区民族志就并不总是拘泥于前人的足迹，而是把种族主义和劳动市场中更广泛的情境（Liebow, 1967; Bourgois, 1995）以及城市政权（Whyte, 1943; Susser, 1982; Haney, 1996）融合进来；传统上隶属于“工厂社会学”的车间民族志，也考虑到了诸如“种族”和“族群”（Lamphere et al., 1991）、公民身份（Thomas, 1985）、市场（Smith, 1990）以及地方政治（Blum, 1991）等外部因素；关于社会运动的参与观察研究将自己置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Fantasia, 1988; Jobnston, 1994; Ray, 1998）；学校民族志总是试图去解释教育如何受到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以及随后的权力类型的塑造，又同时反过来对后者造成影响（Willis, 1977; MacLeod, 1987）；家庭民族志发现它不可能忽视家计之外因素的影响（Stacet, 1990; Devault, 1991; Hondagneu-Sotelo, 1994），从而支持了多萝西·史密斯的女性主义要求，亦即将活生生的体验放到其超地方性的决定因素中加以考察（Smith, 1987）[①]。

① 史密斯的“女性社会学”戳穿了抽象的、去情境化的、普救论的社会学的假面具，而将其视为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并将具体的活生生的女性体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女性掌握的日常生活的微观结构成了由男性控制的宏观结构的基础和隐藏的前提。这看上去像是拓展个案法，但是与史密斯把它的合法性建立在“女性立场”上不同，我把它建立在另一种科学概念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我更接近于桑德拉·哈丁（Harding, 1986, 1990），她研究的是由男性支配的科学和对科学的后现代消解之间的地带。她并不是要向属于男性的科学投降，而是呼唤一种继承性的科学。

拓展个案法的雏形在这些例子中和别的地方大量存在。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做的是，通过把它提高到“明确意识的层次”，将“反思性理解”带回到拓展个案法中。但是，与韦伯的主张相反，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以澄清为目的的活动，它对我们建构社会科学的方式有实际的影响。实际上，它会导致一种社会科学的替代性模式，以及随后的替代性解释和阐释性实践。当然，有的社会科学家也许并不完全支持我的主张，他们宁可争辩什么技术更合适，甚至完全容忍科学的拒斥，也不会去面对两种科学模式共存的可能性，而恰恰是这种可能性将对我们的方法论教条造成重创。我希望说明的是，反思性科学有它的好处：在既不放弃民族志也不放弃科学的情况下，它为探索广泛的历史类型和宏观结构提供了条件。

所谓民族志，我指的是站在参与观察的立场上书写这个世界；所谓科学，我指的是对经验现象的证伪的、一般化的解释。为了推进我的主张，有必要做出如下区分：①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在这里包括调查研究和拓展个案法；②经验调查的技术（techniques），在这里包括访谈/访问和参与观察，研究方法正是对最适合的技术的应用；③科学模式（scientific model）——实证的或反思性的，是它决定了科学生产的前提和原则。在详细阐述拓展个案法不同维度的过程中，我希望改进它的技巧，将它合法化为科学（尽管是一种反思性科学），并且指出它对我们研究世界之方法的更广泛的含意。

我以 1968～1972 年间，自己在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赞比亚所做的研究为例，来阐明和解释拓展个案法。之所以在我所有做过的研究中选中这一个，是因为它最为有效地同时展现了拓展个案法的长处和缺陷。首先，长处在于：拓展个案法能够深挖出殖

民者和被殖民者、白人和黑人、中心和边缘、资本和劳动的政治二元对立，从而发现多样性的过程、利益和身份。与此同时，赞比亚后殖民地的环境，为重新凝结这些围绕在地方、全国和全球环节周围的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其次，缺陷是：拓展个案法要遭遇的正是它要展现的力量。正如“殖民地”研究的新进展所清楚显示的那样，殖民地不仅是异族新奇事物的场所，而且是权力新策略的实验场所；它们在殖民地溜了一圈之后，再输回到各宗主国（Stoler，1995；Mitchell，1988）。支配发生的形式既赤裸又夸张，使社会学家们，尤其是人类学家们牵涉其中，用未被详细阐明的方式渲染他们的观点（Clifford and Marcus，1986；Asad，1973）。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权力政体使内在于拓展个案法的各种缺陷陷入混乱状态。

因此，这篇文章的构成如下。我从我关于赞比亚殖民工业的研究（Burawoy，1972a，1972b，1974）开始，重点突出反思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然后，我将展示我的研究如何逐一违背了实证科学的四项原则。如果只有这一种科学模式，那么我将不得不要么放弃拓展个案法，要么放弃科学。然而，不是只有拓展个案法违背了实证原则。接着，我要指出的是，调查研究这种最典型的实证方法也违反了它自己的各项原则，因为不可避免的“情境效应”（context effect）制造了访问员与被访者之间不可分解的联系，以及访问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场域中的嵌入性。于是，我们要么生活在实证原则和实践的裂缝中，一直努力着去将它缝合；要么，发展出一种替代性的科学模式，将情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使我们研究的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在场”（our presence）成为主题。这个替代者就是科学的“反思性”模式，当它被应用到参与观察的技术中时，就产生出

了拓展个案法。

不过，为了同时挽救科学和拓展个案方法，我并不打算抹杀它们之间的裂缝。使情境（context）和对话（dialogue）成为替代性科学的基础，将不可避免地把明显的“权力效应”（power effect）带了进来，这样，拓展个案法与反思性科学的原则之间，也就存在裂缝。后现代主义就在突显这些权力效应上做了不少事情，但是，与其说这是在设法应付一门不充分的科学，不如说它把科学也给排斥掉了。我自己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边界上工作，从没有逾越那些边界：既然选择了仍然站在科学这一边，我们就必须生活在它自我设定的各种限制之内，不管它们是实证科学的情境效应，还是反思性科学的权力效应。如果考虑到这个世界既不可能没有情境，又不可能没有权力，那么，就必须承认这两种科学都各有缺陷。但是我们得有一个选择。所以我最终要问的是，何时、何地以及为何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模式中的某一种。

一　被采用的民族志

反思性科学开始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话，亦即社会科学家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对话。它既不会从一个外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阿基米德点突然发力，也不会创造像白板一样干净的知识和理论。它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学术理论的某一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既存的民间理论（folk theory）或本土叙事；而在真实世界中，这两个方面一直互动不断。

我自己关于赞比亚铜矿的研究就开始于和殖民主义“遗产悖论”有关的公开争论。1968 年，我到“铜带”旅行，以寻找向后殖民政权转轨的公司的政策和战略。那里有两个矿业公司，

盎格鲁美利坚公司（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和罗恩精选托拉斯（Roan Selection Trust）。它们都在北罗得西亚（Northern Rhodesia）[①] ——它直到 1964 年都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地——的殖民秩序中有着很深的根基。这些曾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公司，对赞比亚的独立有什么反应？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铜矿工业雇佣了大约 5 万人口，其中 90% 是非洲人，10% 是外籍人员（expatriate）。在独立之前，这些矿山为这个国家提供了 90% 的外汇兑换和 50% ~70% 的政府税收。对白厅（Whitehall）[②] ——后来是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基金会（Found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而言，北罗得西亚存在的原因正是它的铜矿。公路和铁路交通、土地和农业、税收和贸易、劳动和教育、国籍和种族，所有这些，都是为铜矿出口的最大化服务的。赞比亚是原始的“飞地”经济，而铜矿则是使它组织起来的要素。

与揭开“盎格鲁美利坚公司”和“罗恩精选托拉斯”神秘的企业实践相比，研究矿工们如何生活要简单得多。我所要做的并不是一个通过文件梳理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因为正如我不久之后发现的那样，文件所能揭示的东西少得可怜。从外到内的访谈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因为管理者都很难接近。不过，我不久前获得的数学学位帮了我的忙，我在英国总部的熟人靠它给我在铜矿工业服务署的人事研究机构谋了一份差事。这个机构位于基特韦

① 北罗得西亚是赞比亚在殖民时期的名称，它与南罗得西亚（即津巴布韦，位于赞比亚东南部）、尼亚萨兰（即现在的马拉维，位于赞比亚东北部）原为英国殖民地“中非联邦”的三个成员，使用联邦通用货币“罗得西亚—尼亚萨兰镑”。——译者注

② 白厅，英国政府办公地。——译者注

(Kitwe)，这里是矿区的心脏地带，既是政策又是实践层面的工业关系的中心。

一旦到了那里，我的关注点就转向了更加具体的问题：劳工力量的地方化，或者被称为“非洲人的提升”（African Advancement）——不过自独立后，这就被改称为“赞比亚化”了（Zambianization）。殖民统治给赞比亚留下的是：400 万的人口中，只有 100 名大学毕业生，以及刚刚超过 1200 名的有中学文凭的黑人。所以，这个国家仍然严重地依赖白人管理者和专家。在历史上，矿产工业曾经是按照种族隔离的原则来组织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黑人能够对白人行使权威。而反殖民地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彻底消灭所有这些白人优越性的痕迹。那么，在后殖民时期，事情是如何变化的呢？我的研究从新政府的赞比亚化委员会所描绘的图景开始。这个委员会粉饰了一幅成就美好的图画：独立后四年，在“外籍人员”（白人）曾经占据的位置上，外籍人员越来越少，赞比亚人越来越多。可是，这幅“去种族化”的画像背后，实际上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对管理者战略的理解主要受阻于我的外来者身份的话，那么，任何关于赞比亚化的严肃研究都是被完全禁止的。我很难对那些曾经在种族隔离制度中生活过的继任者们做公开的调查。当然，由于种族隔离仍然像一块乌云一样飘浮在工业关系的各个方面之上，我其实也无法找到比这个职位更好的位置来观察工作中的不同力量：我不仅在矿区工业的数据收集中心坐班，而且成了《新工作评估方案》的一名积极撰写者。这个方案的目标就是调整白人和黑人的薪资标准。于是，作为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知道了管理层、工会和政府之间的利害关系。

至此，自上而下的视角已经很多了。如何从内部和底层来观

察赞比亚化呢？在这个时候，我必须更加隐蔽。我组织了一项并不涉及赞比亚化的调查，以进入黑人矿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选择了年轻的赞比亚人事官员作为访问员，而且由于他们位于赞比亚化的“风暴眼”中，我完全有理由去相信他们。我们能够每周在名义上取消了种族隔离的罗卡拉俱乐部（Rokala Club）见面，既讨论这项研究，也讨论赞比亚化的进程。不过这还不够。我在人事研究机构工作了一年半，接着，当我成为赞比亚大学的一名文学硕士研究生之后，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继续这项研究。在那里，我吸收了本科生参与我关于（地下的和在台面上的）“后殖民”工作组织的研究——至少在正式场合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还从底层，从最多数的没有技术和半技术化的工人的立场上来探究赞比亚化：他们是如何感受监工和低层管理者的赞比亚化的？

我们的拓展观察显示，白人管理层通过两种类型的组织花招来应付政府的赞比亚化目标，从而维系种族隔离和自己的利益。第一种策略是“掩盖”赞比亚化（*blanket* Zambianization）。在殖民主义时期，人事经理就是国王，统治着他的非洲下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白人下属也是如此。人事部门支配了公司的商业中心、矿区和“隔离区”的生活（Epstein，1958）。到了后殖民时期，一个明显的花招是，一个部门完全和快速地赞比亚化了，但是与此同时，它的权力，尤其是针对外籍被雇佣者的权力却被转移和剥夺了；那些外籍被雇佣者，由新任命的“员工发展顾问”保护着，而后者原本就是前白人人事经理中的一员。

第二种策略是“阴影”赞比亚化（*shadow* Zambianization）。在我调查的三年半里，矿头（mine-captain）的位置——这是地下管理最高的职位——已经赞比亚化了。许多旧的白人矿头被提升到了新成立的地下经理助理的岗位上，带走了许多他们原来的

权力和职责。任何一个赞比亚的继任者都得在他前任的阴影下工作。他成了夹在他的下属和“真正的”矿头之间的黄油，而后者只不过是转到了地上更舒服的办公室里而已。

这些维系种族隔离的花招产生了好几种其实并不难预测到的后果：第一，因为管理层膨胀，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头重脚轻；第二，工人和他们的新赞比亚监工之间的冲突增加了，因为尽管与他们的前任相比，新监工们没有那么盛气凌人，但也更没效率。通过赞比亚化而得以维系的种族隔离造成了组织破裂、冲突和低效。

如果说掩盖和阴影赞比亚化暗中破坏了组织的运转，为什么它还能够继续？种族隔离得以保留的背后力量是什么？一个民族主义的黑人政府如何会在它关于赞比亚化的报告中高唱凯歌，忽视种族隔离的延续？我从更广泛的利益格局中找到了答案：第一，虽然政府接受了赞比亚化的辞令，但是代表无技术和半技术矿工的各种黑人工会，更感兴趣的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向上流动成为监工。第二，赞比亚人继任者，夹在底层黑人和白人老板中间，是种族和阶级紧张的避雷针（lightening rod）。不过，他们在组织上比白人管理层要弱，因为后者保持着对知识和经验的实质性垄断。

第三，工业公司的主管长期以来一直为提高种族隔离的水平，用黑人代替白人而斗争，因为这会降低劳动成本。如果说以前他们面对的是来自白人员工的有组织的抵抗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受到的是大批人移民国外的威胁。第四，赞比亚政府将矿山工业看做是（祭祀的）“圣牛”，亦即它“国家建设计划”的税收来源。它不敢承担铜矿利润下降的风险。此外，它很乐意让外籍人士管理工业，因为，虽然他们有经济权力，却没有政治威胁。外国人受到以三年为期的、可以随意终止的合同的限制。赞比亚

人管理者，作为支配阶级中有权势的一部分，可能给赞比亚政府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这些力量的平衡意味着，尽管赞比亚独立了，但是矿区内总体上的阶级和种族类型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从赞比亚化这个微观世界，我“拓展”到了造成不发达的根源。发展的障碍不仅来自对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世界经济中铜矿的依赖，而且来自从殖民主义继承而来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维护种族秩序，符合业已出现的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尽管这么做会抑制经济的转型。因此，我的研究重建和改造了本土的叙事，使之成为关于后殖民主义的阶级分析——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它用一种未曾预料的方式反作用于我所研究的社会。

二　重访实证科学

什么是实证科学？对孔德来说，社会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玄学体系并揭示社会的经验法则。它是最后进入科学王国的学科，但是一旦被承认，它就将统治不守规矩的学科，生产秩序，并将混沌的过程驱逐出去。于是，实证主义立刻成了科学和意识形态。在大部分情况下，今天的社会学已经将它的主张变成了一条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可以将这种关于实证主义的精练观点称之为实证科学。将实证科学与反思性科学区分开来的前提假设是，有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与研究它的那些人不一致，并从中分离出来的“外部”世界（outside world）。埃尔文·古尔德纳（Gouldner，1970）曾经把这一前提假设称为“方法论二元主义”——社会科学家与他们关于别人的理论之间脱离了关系。实证科学要求与研究的对象保持观察者的距离，亦即一种不偏不

倚的姿态；它的目的是生产出对外部世界最为精确的制图（mapping），去反映这个世界（Rorty，1979）。

将观察者建构成外来者要求前者努力将自己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这就需要程序上的客观性来推进。在杰克·凯兹关于“分析性田野工作”的经典讨论中（Katz，1983），他提出了“4R”原则。我把它们视为实证科学四种约定俗成的信条：第一，社会学家必须避免影响并因此“破坏”他们研究的世界。这是防止“刺激反应”（reactivity）的禁令。第二，外部世界多种多样，所以我们需要有标准地挑选数据。这就是“可靠性”（reliability）原则。第三，被挑选出来的事物，其编码规范要清晰明白，这样任何一个研究同一个现象的社会科学家都能够得出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原则。第四，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所研究的片断是整体世界的典型部分。这就是“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原则。

凯兹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科学的可靠权威。他试图展示，如果参与观察者遵守“分析性归纳”或者他更愿意称之为“分析性研究”的东西的话，他就能够实践4R原则。不过，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他却严重地破坏了他自己的方法论原则，支持了而不是排斥了“刺激反应”，消解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并且要求读者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复制结论。与他仍然坚持4R原则不同，我的行动方针正好相反，我放弃实证科学转而支持更加适合于拓展个案法的“反思性”科学。通过如下步骤，我为援引和阐述这一替代性的模式提供了合法性：首先，展示拓展个案法如何协调4R原则；其次，我要说明，即使是调查研究也不能实现那些实证原则。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反对实证科学，而是展示实证科学如何排斥拓展个案法，尤其是我关于赞比亚化的研究。

1. 被违背的实证科学

在实证科学眼中，拓展个案法没什么好炫耀的。第一，我关于赞比亚化的研究打破了防止刺激反应的禁令。我绝不是一个不干涉的观察者。我加入人事研究机构，就是因为它正在开展一项庞大的工作评估活动：对复杂的职业结构进行归类，从而把黑人和白人的薪资结构放到一个单一的等级体系中。关键的是，在每一个种族群体中业已确立的职业等级应该得到维持。为了制造“公平”的印象，两套薪资等级的整合建立在一个由管理层和工会的“专家”组成的联合团队的基础上，这样每一方面都可以根据一系列事先给定的特征、经历、教育、灵活程度、努力程度等因素来“阐述”各自的工作。一家英国咨询公司被介绍进来，试图使职业评估和过去的等级制相匹配，却输得很惨。而我却能根据自己的数学训练，把这一任务转化为一个简单的线形规划问题，从而帮助了这一种族秩序的再生产——这也成了我在《阶级的肤色》（*The Colour of Class*）一书中的研究焦点。

可靠性原则也被违背了。这样一个固定的结局或观察和抽取信息的棱镜，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流变毫无反应。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他所要研究的时空当中，就很难把这个世界套进一个事先界定好的模板中。他会从某一系列问题开始，却以不同的问题结束：我进入铜矿工业，本来是为了搜寻一些指导它们和赞比亚政府处理关系的公司政策，但只有在和公司行政人员一起工作之后，我才认识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战略。正如我随后意识到的那样，它并不是理性地遵循一条事先决定好了的策略，因为环境非常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既包括了政治不确定（经常性的政府危机、部委的人事变动，或者诸如矿产国有化这样的突然变化）、经济不确定（尤其是世界铜矿价格的不稳定），也有技术

不确定（挖掘中无法预测的问题、塌矿）。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中，管理层需要的是变通，而不是被详细的计划裹住手脚。正如我发现的那样，那些存在的政策都是以“事后方式”形成的，亦即由像我这样的“专家们”来使已经做出的决定合法化。如果我不曾成为这些过程的参与者，我就会仍然寻找那些难以琢磨的公司政策，或者，更有可能从公司的理性化当中编造出一个政策。简言之，对拓展个案法而言，参与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对话为收集数据提供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筛子。这并不是否认我们去做“田野”时要带着假设、问题和框架，而是说，它们更像是棱镜而不是模板，它们不是固定在那儿，更多的时候，它们是不断涌现出来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可重复性原则也有问题。我所收集的数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是谁——我是一个白人男性，刚刚从一所英国大学毕业，拥有数学学位，对殖民主义而言是个“新手”，此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些特征中的每一点都塑造了我在社会环境中的进入（entry）和表现，以及人们如何和我谈论与种族有关的话题。此外，任何一个在随后的时点上重复我的研究的人，都将遇到非常不同的情况。历史并不是实验室里的实验，能够在相同的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而且民族志写作中的遭遇，也有一些“无法言说”的东西。其他的人去重复我的研究，不管是共时性的还是历时性的，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但都只是我自己研究的延伸而不是重复。[①]

① 在另一项研究中（Burawoy，1979），当我在南芝加哥的一家工厂时，我发现自己所在的车间在30年前曾被另一个社会学家研究过。我本可以指出，为什么他关于“产量限制”的理论是错误的；不过最后，我将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基线，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回了历史当中。

当然，因此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代表性的问题。我的两个个案中关于赞比亚化过程的观察有多大的代表性？在所有可能以我研究过的矿山为对象的个案研究中——更别提其余六处矿山或者别的工业了——我的个案研究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如何能够超出我的两个特殊个案来做结论？而如果我不能使之一般化，为什么我要自寻烦恼地在这里投入三年半的时间?!

从实证科学的立场看，这些都是正当的指责；而如果这真的就是科学的唯一模式，我就确实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过，还有另一条通往科学的途径，那就是反思性科学，它也寻找一般性的和能证伪的解释。这个替代者并不是子虚乌有、编造而来，而是有它自己的原则，来自于对实证科学的批判性支持。不过首先我必须展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即使是最好的调查研究，能实现实证原则，因为实证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断裂，而这正是反思性科学的原则迅速生长的地方。

2. 受限制的实证科学

调查研究自以为在方法上是实证的。它试图通过表达4R原则来实践4R原则。第一，为了克服“刺激反应”的问题，访谈被塑造成一个始终如一的、中立的“刺激物”以引出多样化的回应。回答者被假设只是对问题做出反应，而问题被提出的媒介则被剥去了。第二，为了面对可靠性的问题，并为选择数据建立一系列连贯一致的标准，访问被标准化了；每一个回答者都要回答用相同的方式提出的相同的问题。第三，针对可重复性，不仅问题成了与访问“隔离”开来的刺激物，而且外部环境也必须得到控制，也就是说，把不相关的事物“稳定”或“确定”下来。最后，针对代表性，回答者必须是一个从更广阔的目标总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样本。

不过，尽管他们十分努力，调查研究者通常还是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访谈是一种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嵌入在别的情境当中；它们又都依赖于问题本身，并给问题赋予不同的意义。有四种类型的情境效应。第一，访问效应（interview effects）。已经有许多文献证明了它们的存在，正是它们制造出了刺激反应的问题；也就是说，访问者的特征（例如，民族或性别）或者访问提纲本身（例如，问题的顺序或形式）明显地影响了回答（Hyman et al.，1954；Converse and Schuman，1974；Schuman and Presser，1981）。第二，回答者效应（respondent effects）。问题的意思越模棱两可，对它的理解就越依赖于回答者的不同生活经历，而问题的标准化也不能够消灭回答者效应（Cicourel，1967；Forsyth and Lessler，1991）。第三，场所效应（field effects），简单地说就是，访谈不能够脱离它们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境。对不同时间和地点进行的访问的回答，将由这些外部的情况来塑造。重复性就是被这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外部因素破坏的。我们甚至不能够从访问本身产生的间接影响中摆脱它们对回答者的非间接影响。[①] 最后，威胁到代表性原则的情景效应（situation effects）。只要意义、态度，甚至知识是在各

① 控制情境效应是多么困难，可参见那些眼光还算敏锐的民族志式调查研究。为了降低“访问效应”，调查研究者对访问员和被访者的民族进行匹配，但是这会夸大“回答者效应”和“场所效应”。桑德斯就曾指出（Sanders，1995），更广泛的种族场域会严重侵入访谈，以至于一些黑人被访者将“白人”的罪名推给他们的“黑人”电话访问员。此外，那些把访问员当成白人的黑人会选择更加调解性的态度。另外两名学者在他们的书面实验（pen experiment）中指出：在此之前的1991年，尼加拉瓜大选中分散的投票结果就应该归咎于调查对象对投票组织的党派偏见（Bischoping and Schuman，1992）；他们的结论认为，这是尼加拉瓜两极化政治环境的人为产物，但是这一场域是如何影响受众的，仍然并不清晰。

种社会情景中形成的而不仅仅是个体现象[①]，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社会情景的总体而不是个人总体（population of individuals）中抽取样本（Stinchcombe，1980）。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决定有意义的社会情景的总体，更别提如何抽取样本了。

这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严肃的调查研究者把他们的时间花在试图最小化及（或）控制情境效应上：他们把情境效应假设成一种干扰，如果不能够被清除，至少也能够被调查。如果说早期的调查研究只是暴露出了访问效应的话，那么更多近期的作品则开始将这些效应理论化（Suchman and Jordan，1990；Schaeffer，1991；Tanur，1992）。访问被看做是一场其中一个对话者（研究者）缺席的、被破坏了的谈话（conversation）。这场谈话和被规定的回答一起，遵循事先决定好了的轨迹，而对话（dialogue）则被排除掉了（Clark and Schober，1992）。[②] 由于不

① 在这里，我们要求的是以方法论的情境主义（Knorr-Cetina，1981；Cicourel，1964）代替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调查研究也许会试图将社会情景当成一个“变量”，来考察诸如一个人的民族如何受到情景的影响这样的问题。但这与方法论的情境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情景而不是个体才是分析的单位。因此，塞科莱尔（Cicourel）引出了“指涉性”（referentiality）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从交谈中了解一个在另一个情景中发生的特定情景。

② 通过与回答者展开事先设计好的辩论，辛德曼和比萨试图将对话带入他们的调查（Sinderman and Piazza，1993）。例如，回答者首先会被问道，他们对政府给予黑人的支持是否满意。如果回答者称赞政府针对黑人的支出增加了，接着他们会被问，如果黑人被挑选出来享受特殊待遇，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相反，如果回答者不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了，他们会被问，如果这意味着黑人会继续比白人穷，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他们的数据显示，44%的白人被“说服”放弃原来的立场。在做出肯定性回答的例子中，只有20%的人在面对辩论时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尚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辛德曼和比萨是否是在挖掘情境中特殊的态度？是否白人关于种族的态度是肤浅和柔和的？或者是否这只是回答者做出预料之中的回答的访问情景自身的人为产物。不管怎样，回答中的这些变化指出了将访问本身作为社会情景加以研究的重要性。

能和回答者建立共识，访问员无法避免误解和错误。因此，有的回答转向了更加“叙事”的访谈。访问员不再把标准化的访问兜售给回答者，而是允许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提供他们自己的“叙事”（Mishler，1986）。这样，访问通过对话得以继续，减少了歪曲，却损害了反应性、可靠性、可重复性，以及可代表性。

换句话说，没有人否认情境效应的重要性。调查研究者将它们看做是一种挑战——它们必须得到测量、约束和控制。不过，如果情境并不是扰乱事实的杂音而是事实本身的话，那么，改进调查研究就是用错误的工具处理错误的问题。因此，许多人将情境效应的必然性视为实证科学无法医治的顽疾，主张完全放弃科学，转而支持一种通往社会世界的解释学取向（interpretive approach）。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学科中发现这种“解释学”学派的代表：诸如伽达默尔和罗蒂这样的哲学家就将社会科学简化为对话和交谈（Gadamer and Rorty，1979）；诸如格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则将人类学的技艺视为深度描写或者挖掘地方性知识（Geertz，1973，1983）；诸如鲍曼这样的社会学家则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放弃他们立法者的自负，转而扮演阐释者的角色，在各种团体之间居中调节（Bauman，1987）；诸如哈拉维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则呼唤“处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网络（Haraway，1991：chap. 9）。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要在下面采取的进路。面对实证原则和研究实践之间不可避免的裂缝，我既不会完全放弃科学，也不会让自己听从于改进实践的建议，以接近不可能实现的实证原则。相反，我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替代性模式，亦即反思性模式，将情境看做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三　界定反思性科学

在社会科学中，反思性常常被视为科学的敌人。很久以前，温奇（Winch，1958）就主张，个人的反思，亦即行为的自我监督，会导致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使科学预测变成幻影；社会科学所能做的，就是揭示它所研究的人们的推论性和非推论性的世界。类似的观点在“语言学”或“阐释学”转向之后的人类学界也十分普遍。它的极端形式，就是主张我们受到自己以前概念的束缚，除了审视自己的经历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能做。在社会学内部，反思性更多被用于实证用途。古尔德纳用它来揭示“西方社会学”统治范式中的“支配性假设”，主张它们逐渐地脱离了它们曾声称要反映的世界（Gouldner，1970）。最近，布迪厄（Bourdieu，1977，1990）在他的对话者华康德的帮助下（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提出了一门以深化社会学的科学基础为目的的“反思社会学”：在学科场域中接受我们自己的位置，将能够使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客观化，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科学家。

我采取的是一条明显不同的进路。与主张有一种最好地贯彻了反思意识的科学模式不同，我提出了一种方法论的二重性，亦即两种科学模式——实证科学和反思性科学——的共存和相互依赖。[①] 实证科学主张将主体从对象中分离出来，而反思性科学则

① 这种区分能够拓展到自然科学。一些关心自然科学的哲学家——例如，迈克·波兰尼（Polanyi，1958）——就拒绝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他关于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的理论，将自然科学家放到了他们与之联系、栖居其中的“自然”的中心位置。类似地，福克斯·凯勒认为［Keller，（转下页注）

将对话（dialogue）提升为它的界定原则，并将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作为它的前提假设。实证科学要分离的东西，都是它喜欢的东西：参与者和观察者、知识和社会情景、情景和它的位置场域、民间理论和学术理论。反思性科学的四项原则可以避免各种情境效应，正是后者成为实证科学的阻碍因素。

1. 干预

上面讨论的第一个情境是访问本身，它不仅是揭示被访者真实状况的刺激物，而且是对她生活的一个干预。访问将她从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中抽取出来，使其服从访问者的时间和空间。在反思性科学看来，干预不仅是社会科学不可避免的部分，而且是一个值得深入开发的长处。通过彼此的互动，我们发现了社会秩序的性质。干预的确制造了紊乱，但那不是要予以消除的噪音，而是值得欣赏的音乐，因为它传递出参与者世界中的隐秘。在压力下或危机中，当制度既面对出乎意料的事情也面对日常公事时，它就会更多地暴露自身。与禁止“刺激反应”——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不同，反思性科学要求干预并对其加以利用。

2. 过程

第二种情境效应就是附属于访问者“刺激物”的多种多

（接上页注①）1983，1985]，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一样，可能也是他们所研究的世界的一个部分，在调查中，他们与对象之间也有一种人际关系；从她的女性主义观点出发，她认为造成区分的事物不是科学的对象，而是我们接近对象的性别方式。最后，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莎斯卡尔（Bhaskar，1979）坚持将干涉和实验作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中心：反思性科学和实证科学之间的区分并没有什么本体论的基础；它并不依赖于正在研究的世界的性质。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并不依赖于它的对象（与非人类对照下的人类），而是科学家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样的意义，是它破坏了研究的可靠性。人们可以使问题标准化，但不能标准化回答者对问题的理解。回答者带着从不同情景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体验来面对访问，却被要求对一个个数据点做出反应。甚至询问某人的民族或性别都可能变得复杂，更别说要求回答者将多样化的体验简化为一项单一的列表了。这里有一种双重简化：先是聚集，然后是对经验的压缩。

反思性科学要求观察者通过移动（move）参与者的空间和时间，来揭示那些体验的意义。这种移动可以是虚拟的，比如在历史解释中；也可以是真实的，比如参与观察；或者是两者的某种结合，比如在诊断式访谈（clinical interview）中。但更复杂的情况在于，每一种体验都不仅生产出它自己的“情景知识”（situational knowledge），而且这种知识可能可以通过推论得出，也可能相反。如果社会互动的推论维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叙事（narrative）——可以通过访谈得到，那么，获得非推论性的，亦即没有详细阐明的、未被承认的，或者默认的知识——它们有时被归为实践意识，构成了所有社会互动的基础——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例如，这也许可以通过“分析”，或者通过参与，亦即与那些将被研究的人一起“做事”而得以发现（Garfinkel，1967）。

反思性科学的任务不能仅仅是理解情景，恢复“情景知识”。第一，总是有多种多样的知识在反映社会情景中的不同行动者，如果反思性知识的目标是将这些多种多样的情景知识全部展现出来，那么它就会变得十分笨重。更糟糕的是，情景知识取决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空间和时间随时都在变化，所以情景知识也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因此，像别的科学一样，反思性

科学必须做一些简化。在这个时候，简化就是聚集：把情景知识聚集成社会过程。就像调查研究将从大量个案中得来的数据合计成可以做因果推论的统计分布一样，反思性科学收集一个个案的多重解读，并把它们聚集成社会过程。这种从情景到过程的移动在不同的反思性方法中的实现方式不同，但是它总是依靠先前的理论。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正是它在拓展个案法中是如何工作的。

3. 结构化

第三种情境是访谈发生的外部场所。场所不可能持续不变，所以实证科学的重复性目标就受到阻碍。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风格和不能重复摹写的方式形塑了他们研究的世界，而且因为外部的场所有它自己的动力机制。各种关系的广阔场域不能被固定或者悬置起来，而它也超出了参与观察的活动范围。因此，我们将外部的场所看做是研究发生的那个地方的存在状况。我们于是用社会过程来刻画出各种社会力量，以将它们印刻在民族志的发生地点上。这些社会力量是其他社会过程——它们中的大多数处于调查进行的场所之外——的结果。这些社会力量被看做是处于观察者之外，因此可以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从而成为反思性科学的陪衬。[①]

因此，反思性科学坚持以结构化的立场来研究日常世界，也就是说，把日常世界看做是各种外部“力量场”形塑的结果，

① 换句话说，我遵从阿博特（Abbott，1992a；1992b）以及萨默斯和吉布森（Somers and Gibson，1994）的做法，将社会过程的“叙事”与社会力量的因果联系区别了开来。但是他们要用前者来代替后者，而我坚持要为社会力量留下地盘，以将其作为方法论的手段和经验事实来构造和限制诸社会过程。

并同时反过来形塑对方。[①] 这一“力量场”也许有它自己的系统特征，依据它自身的原则运转；当它对各种地方性因素施加自己的影响时，它有自己的动力机制。

4. 重建

第四种情境效应与第二种有关，也就是说，社会情景相对于个体的优先性，使得以个体为基础的抽样成了一个问题。如果代表性原则行不通，有没有别的办法生产出一般性？与直接从数据中推论出一般性不同，我们从一种一般性移动到另一种，一种更加包容的一般性。我们的研究从自己喜欢的理论开始，但并不是要寻找证据来支撑我们的理论，而是要寻找反证来深化我们的理论。我们要做的，是阐述现存的理论，而不是发现入土的理论。[②] 我们并不担心我们个案的独特性，因为我们对它的“代表性”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对理论“重建”的贡献。[③]

① 安东尼·吉登斯已经将“结构化”作为他作品的主旋律（Giddens，1984）。他试图以二重性的观点——实践同时再生产了使其成为可能的情景——为替代，超越主观和客观、行动和结构、微观和宏观的二元对立。他强调结构是如何推进而不是限制了行动——就像是语言（language）允许了言说（speech）。最后，关于结构的直觉式观点消失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唯意志论的观点：强调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控制。我回归到关于结构化的更加常见的观点：“结构”，或“社会力量”确实限制了什么事情有可能实现，虽然它们自己也在不停地改造。被吉登斯理解为“结构化”的东西更接近我所说的“过程”，但是即使这样，我也要给超越了个体控制的微观权力结构以更大的确定性。

② 有一种关于科学哲学的实质性主体——它通过对知识增长的历史解释而被人熟悉——主张，科学既通过对范式（Kuhn，1962）或研究程序（Lakatos，1978）内部反常事物的吸收，也通过范式或研究程序之间的竞争而得以前进。

③ 埃米已经指出了“异常个案分析”（deviant case analysis）和“反面个案分析”（negative case analysis）之间的关键区别（Emigh，1997），前者是外人增加了我们理论的一般性，而后者则增加了理论的“经验满意度”，我把它称之为理论重建。

我们的理论出发点，可以从参与者的民间理论，一直跨越到一条抽象的法则，我们只需要考虑它们当中值得发展的部分。

但是用什么来区分“进步的”重建和“退化的”重建呢？顺着波普尔（Popper，1963：chap. 10）和拉卡托斯（Lakatos，1978）的思路，我们的重建并不触动事先存在的理论的核心假定，而是谨慎地吸收进反常的事物，提供新颖的视角。最后，重建应该引出令人惊讶的预言，其中的一些应该得到确认。这些要求分量很重，很少有人能够实现，但是“进步的理论重建”应该以此为引导。

对话（dialogue）是反思性科学的统一原则，后者的四个维度都是对话性的。它要求观察者干预参与者的生活，并在社会情景内对干预进行分析；它通过展示各种社会力量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地方性的过程；它认为理论的“生长点”不仅存在于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对话之间，而且存在于现在已经被视为“科学共同体”的参与观察者们中间。理论并不是从数据中突然蹦出来的一块白板，而是要通过知识争辩和分工得到发扬。然后，它们重新进入参与者的广阔世界，在那里被采用、被驳斥，并且以设计好的或未曾预料的方式被拓展，再循环回科学当中。[①] 科学并不提供终极真理，不提供确定无疑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持续的状态中，它始终存在。

四　拓展个案法

反思性科学之与拓展个案的关系就如同实证科学之与调查研究的关系，亦即一种模式对方法、合法原则对情景实践的关系。如同我们对调查研究所做的那样，我们现在必须对拓展个案法做一番整理：在这一部分，我将回到赞比亚化的研究，来详细阐明拓展个案法的内容，并指出它从更广泛的方法论意识中获得启迪的可能方式；在第五部分，我将用相反的方式来使用赞比亚化的研究，以指出反思性科学的内在不足。

1. 从观察者拓展到参与者

以实证的观点看，参与观察通过亲近研究对象而带来了洞察力，但这是以失真为代价的。然而，反思的视角将参与作为干涉来采用，恰恰是因为它的扭曲和破坏。社会秩序通过对压力的反应方式来表现自己。就算是最被动的观察者也能得出值得思考的涟漪，更别说那些最积极的、试图改造这个世界的观察者了，他们可以从所研究世界的冷酷无情中学到更多的东西。[①]

最容易引发震动的干预经常发生在进入和离开田野的时候。任何一个小组都会经常在所要研究的地区附近遇到一大堆正式和非正式的抵制，不过恰恰是这些抵制透露了许多核心的价值及其成员的利益，以及它预防危机的能力。把田野留在那里不动，也是一种“干预”，因为接着，参与者经常就会透露内心的秘密，或者提出发人深省的、他们以前从不敢去问的问题。但是最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和人物，经常发生在参与者重访他们的调查结果之时。这里有许多原因：有少数人喜欢被边缘化，或者用一些方式逃避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第二，很多社区因为冲突太多已

① 再一次地，吉登斯（Giddens，1992）详细阐述了学术和民间理论（lay theory）之间的互换，主张社会学之所以看上去裹足不前正是它的发现成了大众常识；而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则是现代性众多与众不同的因素之一。

① 我在这里的立场与约翰·范·马阿南（Maanen，1988）所说的“田野的三种叙述”并不相同。这三种叙述分别是：给参与者赋予特权的现实主义叙述、给观察者赋予特权的忏悔叙述，以及强调两者互动的印象主义叙述。最后一个，也是他最欣赏的一个，与我在这里提倡的干涉主义方法比较相似。

经破裂，以至于不管观察者多么小心，都不太可能协调到让每个人都满意。不过，不管如何棘手，民族志写作者通常能够从他们最后的干预中学到很多。

当我完成了关于赞比亚化的研究之后，我决定从雇佣并实际上资助我在矿区从事研究的盎格鲁—美利坚公司高管那里寻求许可，以出版我的著作。他们并不知道我已经花了三年半的时间研究赞比亚化。当我把我的研究给他们看了之后，他们很震惊，并对我胆敢捅出如此“敏感”的议题感到沮丧。在阅读了草稿之后，他们生硬地拒绝了这份报告的公开出版，理由是它在政治上极有争议。我反驳说报告的基础是他们自己的数据。他们最终给了我一个象征性的许可。其实，既然矿山已经国有化了，那么出版决定就不再是他们的而是政府的责任。我带着我的草稿去找负责赞比亚化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外籍人士，在这份工作上是个新人而且和矿山没有关系，他认为这份报告挑战了矿业公司的实践，可以作为获取政绩的途径；而且由于这是一份认真、详细和来自内部的研究，他还把它看做是推进赞比亚化的一件有力武器。“因为它批评了政府、工会、赞比亚继任者、外籍人员和公司——因为它批评了所有人，它一定是客观的。”他竟然这样对我说！

可见，没有任何关于“公正”的声明，能够把我们从我们已成为自己所研究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一悖论，或者我们写作的非预期性后果中解救出来。我们所写的东西，会循环进我们试图去理解的这个世界。正如我在下面要指出的那样，这种反应既代表了对《阶级的肤色》一书中陈述的理论的肯定，也对它提出了挑战。

2. 对于时间和空间观察上的拓展

如此奇妙的研究高潮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民族志写作者

在延伸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里，加入到参与者中间。每天，他们进入田野，准备去测试由前些天的“干预”而产生的各种假设。田野工作是一系列的试验，一直会进行到某人的理论与他所研究的世界相协调为止。当然，这是一个连续的近似过程，人们可能会走错方向。观察和期望之间的紊乱，表明的是理解上的贫乏；而偶尔的震动，则会促使人们好好地重新思考已经浮现的理论框架。在这个层次上，建立理论（theorizing）就是将“情景知识”编织成关于“社会过程”的“说明”（account）。这一工作该如何去做呢？

情景包含了各种共同在场的关系，提供了再生产这些关系的实践环境。对“生产”现象的马克思式处理，就是一种将社会情景概念化的绝好例子。当工人们把自然改造成有用的东西时，他们也同时生产出了自己的生存手段（必要劳动）以及利润的基础（剩余劳动），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再生产了工人，另一方面再生产了资本主义。但是这一过程还得继续；那就是，工人们第二天还得回来，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替代性资源去生存。他们因而受到资本权力，或者“生产的政治政体”的支配。这里的要点很简单：生产只有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下才会导致再生产。[①] 我们之所以能够将“情景知识”编织成关于“社会过程”的“说明”，正是因为将“权力结构政体”由“情景”（situations）转变成了“过程”（processes）。

这种套路也可以被应用到我的个案研究中。赞比亚化发生在这个国家从“殖民压迫”向稍微宽松的生产政体转变的时期，

① 因此，我更加接近布迪厄和福柯，而不是吉登斯和休厄尔，因为后者几乎没有去说权力是如何进入我们生存环境的构成当中的。

但它仍然建立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上。借用吉登斯（Giddens，1984）和休厄尔（Sewell，1992）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在政治政体内，金钱、技术、教育、声望等“资源”（resourses）沿着种族界限得以分配，而这种界限得到了规范、信仰、理论等种族优越性“图式”（schema）的支持。当一个赞比亚人获得提拔以代替一个外籍人员的时候，赞比亚化的过程就开始了。外籍人员试图保住他的工作（一种资源），并视新上任的在职者低他一等（一种图式）。管理层进来干涉，为外籍人员设立了一种新的职位，使他能够带走某些旧的权威和责任，而只给继任者留下很少的资源。而继任者的下属们，将他看做是前任的“缩水版”，自然没有那么多的支持和信心。而新的赞比亚人监工又不愿或不能从他的白人老板那里获得支持，所以就会求助于更加威权的统治，而这又加深了他下属们的怀疑。在他们的眼中，赞比亚人继任者比他的白人前任更坏，因为他试图去重建过去的压迫。因此，下属们不再与继任者合作，而这种循环要一直等到一种新的力量平衡和“甘愿”得到实现才会停止。于是，权力政体，亦即种族隔离，得以再生产。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社会情景之所以成为社会过程，是因为社会行动预示和再生产了权力政体（regime of power）。只有行动者按照种族隔离的方式参与进来，种族隔离才能够再生产。第二，在围绕权力政体的斗争中，历史和宏观结构被作为社会情景内的资源和图式被援引了进来。赞比亚人继承者抱怨白人仍然当着家，独立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赞比亚的工人们则认为他们的新黑人老板们重新建造了过去的压迫，或者强加了一种新的种族优越性。第三，来自外部社会情景的干涉结果，已经被权力政体结构化了。管理层也许为不在位的外籍人员创造了“帮助”赞比亚人继承者的位置，但结果却是削弱了后者。管理层也许从大学毕业生中吸纳人才以改善员工管理的质量，但是它的后果却是加剧了“老资格”和青年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

种族隔离的再生产导致了社会等级关系的改变：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而黑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通过对资源和图式的利用，权力政体的再生产从内部获得了保障。它也从外部获得再生产的保障，但这超越了参与观察的范围，因此需要对社会力量进行分析。

3. 从过程拓展到力量

我本可以以一项关于种族隔离一般法则的陈述来结束我关于赞比亚化的研究：不管组织如何变化，权威总是指白人对黑人的权威。我甚至可以通过从美国这一不同的情境中抽取证据来强化这一法则的效力——在那里，性别和种族界限同样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再生产自身。[①] 这大概就是“推论性一般化”的策略，亦即从各种各样的个案中，寻找出普遍的模式，而情境则被忽略不计。这还可以被称作分离的或历史的方法：诸个案被集中起来，尽管它们是独立的原子。然而，拓展个案法利用了一种不同的比较策略，探究造成外部力量之细微差别的资源——这也许可以被称作是整合的或纵向的方法。在这里，比较的目的是在因果关系上将各个个案连接起来。与将个案简化为一般法则的情况不同，我们使每一个个案与其他的个案联系到一起。

① 关于这一点有许多重要的文献，从坎特尔（Kanter，1977）对组织过程的分析、米克尔曼（Milkman，1987）对塑造性别界限位置的各种力量的分析开始，一直延续到布拉姆（Blum，1991）对促成肯定性行动和同工同酬思想——这两者与“非洲人提升”的两个意图非常相似——的各种竞争性力量的阶级分析。

《阶级的肤色》提供了两个这样相互关联的比较。支配性的一个，是独立后的“赞比亚化”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的提升”的比较。第二个，展开得稍差一点，是矿山自下而上的赞比亚化与政府自上而下的赞比亚化的比较。为了理解为什么尽管已经实行了民主化，种族主义也已正式消亡，种族隔离在赞比亚的铜矿区仍然得以维系，我回头扎进了历史当中。在殖民统治时期，矿业公司就已经不断地努力“推动”非洲人进入一直由白人垄断的位置。但是由于职务分解和白人职务的去技术化，此举仍然收效甚微。黑人工会总是对这种“非洲人提升”的观点举棋不定，因为他们大多数成员更感兴趣的是工资的增长和工作环境的改善。在矿业公司和伦敦殖民办公室的压力下，殖民政权支持渐进的非洲人提升，实际上是把它当作安全阀来阻止黑人的抱负以保证利润。此外，白人定居者社区也是一个有影响的反对力量，它反对任何形式的黑人向上流动。在大多数时候，殖民政府都试图置身于争论之外，只有当工业生产的机器停滞下来的时候，它才会以裁判员的角色进来干涉。

后来的赞比亚政府，虽然不再附属于伦敦，但却更加依赖于将矿业公司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虽然白人管理者失去了他们的正式政治权力，但是影响还在，因为矿山要依靠他们的技术专长。对赞比亚的政治精英来说，他们仍然将外籍人员放到铜矿业的指挥位置上，因为它并不想依靠具有潜在竞争力的本土经济精英。不过，后殖民主义的政府还必须对民族主义要求赞比亚人管理自己国家的呼吁做出回应。它做到了这一点，但不是通过对赞比亚化更加有力的推动，而是把矿山国有化，让国际组织碰它不得。来自首都的自上而下的赞比亚化，推动了铜带的自下而上的赞比亚化。

这两个个案不但不相互排斥，反而彼此相互决定。种族隔离

在“铜带”之所以能延续的根基，就在于政府内部的自我削弱。这就是结构化的原则——把社会过程当作研究的基点，探讨它与外部社会力量之共同决定因素的关系。但是我们能否更进一步，去质疑这些超地方性的力量是否展现了自己的运作特征？它们是否有某种再生产自身的“系统性”倾向？再一次的，我们只能够在理论的帮助下推进这些问题。在这个个案中，我们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的肤色》参与到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争论当中，主张后殖民主义的国家之所以维系了总体的阶级结构，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工具，而是因为它虽然在制度上享有自治，但却依赖于资本。这里出现了一个关于阶级力量结构化过程的新理解：对它们来说，这是一种在国家权力政体的基础上，以本土的方式再生产自身的趋势。

我本可以通过将赞比亚内部的国家和阶级格局视为一种根植于外部国际力量联盟的结构性过程，进一步地拓展这一结构化的原则。不过，我在国家的层面上停了下来，并没有将“国际力量”视为一种限制，反而把它当成了一种受统治精英调动以合法化其支配的资源。新的非洲精英之所以关注超越国家控制的各种力量——贸易、铜矿价格、西方专家、跨国公司的各种费用——目的是搅混后殖民主义的阶级性质：他们以自己想象出来的“新殖民主义”为幌子，否认自己的阶级权力，而是宣称在外部力量的面前自己是多么得虚弱无力。新非洲精英的这种视角在学术话语中找到了“欠发达理论”作为它的代表。这一理论经由巴兰和弗兰克的努力而流行开来，不过后来受到了各种比较研究的挑战。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今日，不过纯粹的“发展主义”规划（developmentalist project）已经被视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灾难而遭到了断然拒绝（Escobar，1995）。

不过，那个时候我的兴趣仍然是将“新殖民主义”和欠发达理论与阶级分析相对照，亦即把地方和超地方的因素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现在回想起来，我低估了国际力量的重要性。赞比亚对铜——它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已经持续地下跌——这一单一商品的依赖，使它陷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结构调整方案的迷咒当中。在铜矿国有化25年之后，现在的赞比亚政府正努力地把它们卖出去，把它们私有化。他们把移居海外的经理人招回来，让矿山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显得更有吸引力。赞比亚经济在它自己的黑人政府的命令下，正在被重新殖民化。

4. 拓展理论

我们的前三个“拓展”——干预、过程和结构化——都呼唤更重要的理论。但是我们奔向理论的姿态却是“神风敢死队式”（kamikaze）的不顾一切。在田野工作中，我们渴望的不是对理论的确认而是对它的反驳。我们首先要有树立自己信念的勇气；然后，要有勇气去挑战我们的信念；最后，用想像力来支撑继续理论重建的勇气。如果这些重建代价太大，我们也许不得不完全放弃我们的理论，从一个新的、有意思的理论重新开始。

在《阶级的肤色》中，关于理论拓展，我还没有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但是这一策略遍及全书。“继任”（succession）这一概念就来自于古尔德纳关于经理人继任后组织反响的个案研究（Gouldner，1954）。[①] 但是他指的是一种“自然继任”，而赞比

① 从韦伯关于科层制分析的内在张力开始，到拒绝韦伯的整体特征，古尔德纳提出了三种类型的科层制：模拟的、代表性的，以及以惩罚为中心的。在这么做的时候，古尔德纳就把他所研究的石膏厂的情况当成了一个类别，而丢掉了他各个理想型的历史特殊性。如果换成拓展个案法，我们就会将这个工厂置于它的政治、经济和地理情境中加以研究（Burawoy，1982）。

亚化则是一种“被迫的继任”——由上层推动却受到了下面的抵制。赞比亚的继任者因此不得不与来自下属的怀疑、上级的抵制和冷漠，以及他对自身能力的怀疑作斗争。

社会过程的理论化可以拓展到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的理论化。一方面，我解构了政府的赞比亚化报告。种族隔离原则下“被迫继承”的真实过程，被隐藏到了数据背后。与政府报告中所说的不同，外籍人员仍然像过去一样牢牢地控制着工业。另一方面，我对“后殖民主义”的诸命题进行了反驳，后者指责赞比亚持续的倒退，乃是因为国际力量的共谋。再一次的，我在这里不是要说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很明显，赞比亚受到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的盘剥，但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不公平遮盖了新统治精英的利益。

我更直截了当地反驳了将赞比亚的不发达归咎于赞比亚工人的文化落后，或者更加普遍地，归结为他们的原子化的和未被规训的工业行为的理论。例如，贝茨就声称，后依附时代的赞比亚政府未能控制住它的矿工（Bates，1971）。不过，如果仔细检查他和别人关于生产力、旷工率、人员调整、规训个案以及罢工的数据的话，就能发现这些数据并不能为他的主张提供支持。他只是简单地采纳了管理者和政府关于“懒惰的赞比亚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态，指责工人的低效和冲突——而实际上，低效和冲突的根源是在别的地方，比如种族隔离的延续（Burawoy，1972b）。

法农关于“后殖民地革命”的研究（Fanon，1968a，1968b）引导了我的分析。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如此明确的重建理论的抱负，但我当时确实曾试图将他的理论拓展到赞比亚这样一个没有以农民为基础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殖民地当中。我关于跨国公司、矿工、赞比亚管理者以及外籍人员的分

析，类似于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阶级利益的解剖。我利用政府关于工人不守纪律、好逸恶劳、举止失范的报告反过来反对新统治精英自己，后者的铺张浪费和自我放纵都来自他们飞速的向上流动。至于矿工，则是法农所说的“劳工贵族”（labor aristocracy）的典型：他们追求自己狭隘的经济利益，很少关心种族隔离，将矿山的国有化视为政府推行更加严酷的规训的诡计。《阶级的肤色》不仅重新改造了法农的阶级范畴，而且通过将各种宏观力量联系在一起，通过把“非洲人的提升”推进到赞比亚化以及继任者的微观过程，使得关于阶级的图景活了起来。

理论在拓展个案法的每个维度中都是必需的。它引导干预，把情境知识建构成社会过程，并将那些社会过程置于它们更加广阔的决定性情境中。此外，理论并不是储藏在学院里的什么东西，它自己也成为对它试图去理解的世界的一种干预。实际上，《阶级的肤色》变成了它自己的“自毁预言”：先是部委里认识我的人，接着是媒体，最后是矿业公司，都试图改变我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他们都试图推翻新统治精英在“铜带”再生产种族歧视的利益。

这种“自毁”，和别的东西一样，并不是理论低落的原因，而是理论扩展的机会。我在著作中所揭示的力量，确认了矿业公司会温顺地采纳政府的倡议这一事实。它们还显示了：政府并不总是对种族隔离的延续一无所知，后殖民主义国家的各种利益并不像我所展示的那样一致，社会力量是社会过程的偶然结果。在实证模式中，社会科学站在它所研究的世界背后观察它；但是在反思性模式中，社会理论干预它试图去理解的世界，破坏它自己分析的稳定。

五　权力效应

在界定反思性科学和拓展个案法的时候，我没有声称任何包治百病的灵药。就像调查研究和它试图去模仿的实证科学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裂缝一样，也有一道相似的裂缝将拓展个案法与反思性科学隔离开来。如果说第一道裂缝是情境效应的结果的话，那么第二道则应该归咎于权力效应。干预、过程、结构化和重建受到支配、沉默、对象化和规范化的威胁。不过，反思性科学的自身缺陷虽归咎于无所不在的权力，但不能推论出应该放弃拓展个案法，就像不能因为情境效应而推论说放弃调查研究一样。考察这些缺陷的目的是为了将它们纳入视野，也许，甚至能弱化它们。

1. 支配

从事干预的社会科学家不可能避免支配：支配别人或被别人支配。“进入”就经常是一场外部的“破坏者”和内部的抵抗者之间持久的和私下的权力斗争。[①] 当我搜索矿业公司的记录、在较高层次上参与协调的时候，我决定向他们隐瞒我的真实目的。

① 克利福德（Clifford，1988：chap. 2）对法国人类学家马赛·热约尔（Marcel Griaule）的研究就突出显示了各种权力策略，亦即外来者用来记录难以管束的被殖民者的监视技术的应用。民族志就建立在观察者和参与者之间不加掩饰的权力斗争之上。克利福德用这个与热约尔的研究做对照，后者曾在一个头领的带领下进入多冈族（Dogon）的生活当中，因而成了多冈族“可信”文化的解释者，一名能够在殖民世界中保护他们利益的使者。提供信息的人从故意的抵抗者和说谎者变成了研究者的合作者和教师。但是两个人的研究中，都没有民族志描写所需要的对接对称结构（joint symmetrical construction）。权力在两个人的“剧本”中到处弥漫。

为了穿透权力的隐秘之处，社会科学家必须幸运或狡猾。无权者相对容易接近，但是即使他们也有自己的防卫之术。因此，在调查种族隔离的另一面的时候，我不得不以调查为借口与赞比亚人事官员联系，借助赞比亚学生的帮助来了解无技术和半技术工人的观点。但是这带来了研究团队中的另一层权力：我是白人，拥有所有的资源，而他们是黑人；学生们在地下、冶炼厂和拖拉机旁工作，而我在表面做着访谈。毫无疑问，我是“老板”，而他们则根据我所制订的法则工作，向别人陈述田野须知，却隐瞒自己的观点。一句话，我在研究团队内重复着种族隔离。

支配和抵制不会在进入田野时奇迹般地消失。进行干预的社会科学家会面对两个相互联系的支配场合，一是作为参与者，二是作为观察者。作为参与者，在这种等级明显、意识形态竞争、为资源而斗争的地方，我们被嵌入于权力的网络之中。不管我们站在哪一边，管理者或工人、白人或黑人、男人或女人，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被牵涉进支配的关系当中。作为观察者，不管我们多么喜欢欺骗自己，我们都“站在自己的一边”，总是在那里做进一步的归因（Gouldner，1968）。我们的使命也许很崇高——扩大社会运动、提升社会正义、挑战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但是，不管知识分子和他们宣称的支持对象如何不可分割，两者之间基本的利益分歧却是无法回避的。简言之，支配的关系也许并不像它们在赞比亚“铜带”中直露的种族和阶级秩序那么明显，但是它们始终存在，反映着我们知识的局限性。

2. 沉默

这就带来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沉默。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将支配阶级的利益装扮成所有人的利益。赞比亚化报告的民族主义辞令掩饰了多样化的阶级和种族利益。人们如何能够揭示这些利

益的隐秘布局呢？当不同车间的参与观察者在矿山出入的时候，我们将工人、外籍人员以及赞比亚继任者不一致的声音记录下来。这就是田野工作的“最有趣的部分”（meat and potato）。因为我将我们在不同情景中所做的拓展观察都编织成了社会过程——亦即将赞比亚化的过程理解为被迫的继承——所以这些声音就被简化和凝练成为各种利益。于是，我就可以揭示出藏在民族主义辞令背后的各种特殊的和相互抵触的利益。但是，这种新的利益结晶，必然会排斥、边缘化和破坏别的声音。

因此，如果我是法农早期著作《黑皮肤、白面具》而不是晚期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的信奉者的话，那么我也许就会探讨殖民地的各个主体，尤其是赞比亚继任者的形成——他是法农所说的“殖民地黑人”（colonial Negro）的代表，但白人世界却拒绝“他”有什么种族优越性。如果我自己的肤色不曾带来什么妨碍的话，我会考察殖民和后殖民政权产生出不合格的病态继任者，并因此再生产出白人和黑人的二元世界，导致黑人反对黑人的方式。既然沉默不可避免，我们就必须注意那些受压抑的或者新的声音，因为它们很可能打破那个人为制造的冷淡局面；同时，我们还必须准备好在没把这些随口泄漏的秘密弄明白的情况下，将新的声音纳入进来，以重新构造我们的理论。

3. 客体化

在拓展个案法中，紧跟着第二个拓展（从社会情景中的声音拓展到社会过程中的利益）的第三个拓展，是将社会过程中的利益拓展为社会机构中的力量。结构化需要将社会过程置于它们外部决定性因素的情境中。因此，尽管种族隔离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互对立，赞比亚化还是会伴随着种族隔离，因为外部力量的平衡似乎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客体化，也就是将社会力

量视为外部的和自然的客体，是这一进路上的固有危险。它限制了参与观察的时空接触，限制了我们将力量替代为过程。

不过，客体化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策略，它同时反映了针对生活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真实权力的运作（Habermas，1987）。但是这些系统的权力不应该被夸大。第一，力量一直是隐秘过程人格化效应的表现，也就是说，每一个系统都依赖于它自己内部生活世界的移动过程。第二，生活世界（那些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和被简化成力量的事物）自己也受到权力的制约，这就产生了躲进社会领域的需要。在这些推论出来的需要周围，聚集了能够将系统力量驱逐出去的各种社会运动（Fraser，1989）。最后，系统力量有它自己的矛盾，这些矛盾会出人意料地突然爆发，例如我在部委的熟人就号召对矿业中的赞比亚化行为进行公开的打击。即使我们对客体化加以利用的时候，也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秘密进行的过程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喷发，把力量的场域彻底打碎。

4. 规范化

最后，重建理论本身是一个双重适应的强制过程。一方面，复杂的情景被修改得适应一个理论；场域的地点被简化成一个个案，尽管它与对应的理论并不一致。另一方面，理论被修改得适应个案，被重写以领悟异常之事。这种彼此适应创造了一种将世界简化成能够调查的范畴的机制：场所能够被评估，人们能够被控制。[①]

为了将赞比亚化比照为管理继承的一种形式，我通过引入自

① 殖民的冲突为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了尤其生动细致的例子。例如，可参见 Mitchell（1988）和 Stoler（1995）。

然继承和强制继承的区别，扩展了古尔德纳的理论。平常人们注意的是“自然的”继承，但赞比亚化是一种强制的继承。在将实际上控制转移的东西标准化的过程中，我直接做了许多对矿业公司有益的事情。种族继承给他们提供了概念上的武器库，来规训他们自己的管理者。在针对于我著作的一篇书评中，马古巴尼注意到了这一将“继承”规范化的努力忽略了“民主化当中紧张却沉默的阶级斗争”（Magubane，1974：598），而事实情况是，赞比亚正受到外籍员工的勒索。

但是，马古巴尼忽视了我分析的另一面，亦即将法农关于去殖民化的理论应用到赞比亚的个案中，将赞比亚化的微观动力机制拓展到支持种族隔离的阶级力量。但是在这里，规范化也仍然在起作用。目睹法农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种重建如何能够在政治上被它所谴责的力量利用，自然是令人震惊的。不过如果想到在历史上曾有人借马克思主义之名来压迫群众的历史的话，人们就应该不会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了。

不过，法农在殖民主义分析中指出的某些正式因素，后来确实被跨国资本借用。例如，他预见了前殖民文化的自我毁灭，以及随后的“地方”知识或被征服知识的脆弱（Lazarus，1993）。我自己对文化争夺的关注也不够，没有想到它能够从殖民政权的地下权力——亦即底层和后殖民研究发现和赞美的反抗模式——中获得支持。对规范化的挑战和调节要求将分析嵌入自上而下的视角当中，更加严肃地选择他们的概念；而且，简言之，更加接近那些号称自己的研究要为他们利益服务的人群。[①]

① 例如，可参见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他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家应该与他所研究的社会运动中的参与者在一起（Touraine，1983，1988）。

这四种权力效应只不过是为处于后现代危机中的“工厂”增添了有意思的材料。如果说情景效应道出了科学之不可能，权力效应则指出了它是多么危险和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将科学完全放弃，留下的将是不受攻击的权力，而实证科学的霸权却丝毫未损。所有对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解构，都忽视了实证科学和反思性科学之间的关键区分。[①] 实证科学的自我批判集中于情境效应，但也因此制约了权力的功能；“公正”和“距离”的建构，只有在各种权力关系“非问题化”之后才有可能。另一方面，一门自我批判的反思性科学，将情境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也应该将权力效应展示出来，这样它们才能够被更好地理解和控制。通过展现人类自由的局限，反思性科学的局限为社会批判理论铺设了基础。

六　两种科学模式的意含

对方法论的思考能够带来的东西比韦伯声称的更多，而不仅仅是对已经证明了的实践的反思性理解。在利用实证科学的时候，我们使其附属于它的内在批判，以凸显原则和实践之间的断裂。这样我们的关注就不仅有了改进实证方法的可能性，而且形成了一种科学的替代性概念。表 1 总结了我的主张，它描绘了两种科学模式及其相应的方法，以及每一种情况中模式和方法之间的裂缝。两种模式之间有一种循环：每一种都将别人的缺陷当作自己的基础。实证科学受到“情境”的限制，而“情境”正是

① 对“定性方法”——它倾向于后现代的进路，但还没有成为教条——不同进路的精确测量和评估，可参见丹森和林肯的著作（Denzin and Lincoln, 1994）。

反思性科学的基础；但反思性科学受到“权力”的限制，它却是实证科学隐藏的假设。知道了每一种“方法—模式”的倾向，我们就能够有针对性地来控制它们。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框架，那么下面，我们就必须面对一系列我至少应该在这里间接提及的新问题和含意。

表 1　科学原则和实践之间的断裂

实证科学			反思性科学		
实证原则	调查研究方法	情境效应	反思性原则	拓展个案法	权力效应
反　应	刺激/反应	访问	干　预	观察者到参与者的拓展	支　配
可靠性	标准化	回应	过　程	对于时空观察的拓展	沉　默
可重复性	情况的稳定化	场所	结构化	从过程到力量的拓展	客体化
代表性	从总体中抽样	情景	重　建	理论的拓展	规范化

1. 技术、方法和模式

收集数据的技术和模式—方法的关系是什么呢？参与观察，亦即在别人的地盘和时间内研究他们，是不是必须采用拓展个案法和反思性科学？访问，亦即在被访者的时间和地点所开展的研究，是不是必须采用调查研究和实证科学？对每一种情况来说，答案都很明显：不是。正如表 2 所显示的那样，参与观察和访问的技术，既可以遵照反思性的方法，也可以遵照实证的方法。

表 2　科学研究的四种模式

科学的模式		
研究技术	实证的	反思性的
访　谈	调查研究	诊断研究
参与观察	扎根理论	拓展个案法

参与观察如果依照实证原则去做的话，就成了扎根理论，后者将干涉视为偏差，关心的是从数据的系统分析中得出去情境化的一般性结论（Glaser and Strauss，1967；Strauss，1987；Becker，1958；Becker et al.，1961；Gans，1968）；在这里，理论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社会科学家和民族志写作者都是在陌生人之外，而后者的客观性则通过距离得以保证；非参与观察优先于参与观察。换句话说，刺激反应是被禁止的，但为了达到可靠性，民族志写作者要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收集和分析他们的素材。将田野笔记编码和重新编码成出现的范畴，则为未来的观察提供了棱镜。可重复性以一种号召的面目出现，要求研究者清晰说明范畴是如何从素材中产生的，但并不十分关心素材收集的可重复性；它还制造压力，让情境中止，目的是使个案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最后，为了在他们的结果中确立代表性，民族志写作者应该通过不停的比较，寻找被称之为“理论”样本的极端个案，在田野中使对象的变化程度最大化。①

① 在别的地方我已经详细阐明了拓展个案法与扎根理论的区别（Burawoy et al.，1991：chap. 13）。扎根理论的一个当代范例是扬科夫斯基的《街中孤岛》：一份耗时 10 年，对 3 个大都市中的 37 个城市青年团伙所做的研究（Jankowski，1991）。这份研究从头到尾都在明显落实实证主义的原则。第一，作者把自己建构成一个民族志的写作者和外来者，他试图使自己的卷入最小化，虽然如果他要生存的话，这个从不会实现。第二，为了寻找三座城市中青年团伙组织、商业行动、暴力类型，以及它们与社区、刑事司法体系、地方政治以及媒体的关系的一般性结论，他必须使他的证据和范畴标准化，以空洞的而不是深度的描写、相互关系而不是过程为取向。第三，为了使他归纳的个案能够与地理和历史文本相比较，他将空间和时间同质化，全然忘记了特殊的城市情境和研究进行的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第四，为了从“根部”建设出他的理论，他将所有的证据做了系统性的编码和归类；他倾向于排斥（或者有时候支持）别的理论，却很少与它们进行持久的对话。

就像参与观察可以遵循实证原则一样，访问也可以遵循反思性科学的规则，我把它称为“诊断法”（clinical method）。精神分析的变种就是诊断法的一个典型，尤其当分析者被看做是反思性的人类学家的时候（Chodorow，2001）。首先，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和相互干涉的，每一方都重建了另一方。其次，分析者试图通过以梦的解析和自由沟通为媒介的情景性特殊体验，使对方恢复原状，于是过程成了精神分析的主题。不过，作为第三个因素的结构化，亦即将精神分析的过程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也许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能够做到；但是在这里，法农是一个榜样，他关于殖民主义的精彩论述，就来自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诊断工作，而且阐明了心理过程和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最后，分析与理论的某一分支通力合作，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关注而不断地将理论推向前进，最终实现理论的重建。① 诊断式的访谈不仅是反思性科学原则的一种示例，而且使后者的各种限制成为研究的主题：分析者对被分析者的支配、被分析者对过去的保密、人性结构的客体化，以及理论自身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的困难。

2. 拓展到历史研究

这种关于科学的二元观能否被拓展到除了访谈和参与观察之外的技术上？把反思性科学拓展到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这里还不是做出彻底回答的时候，但是请允许我比较一下斯科奇波尔（Skocpol）和托洛茨基（Trotsky）对经典革命的不同研究进路（Burawoy，1989）。除了都对成功的和失败的革命做了比较之外，

① 女性主义者也对用诊断或者对话的方法进行访谈进行了探索，可参见 Oakley（1981）和 De Vault（1990）。

他们的方法正好相反：一个遵循实证科学，而另一个则是反思性科学。斯科奇波尔把她自己置于历史之外，试图发现革命的必要前提，而托洛茨基则站在历史的中心以重建马克思关于革命的理论。斯科奇波尔将革命标准化，为的是发现使它们成功的三个普遍因素，而托洛茨基则将每一个革命区分开来，以揭示确定其特征的社会过程。斯科奇波尔发展出了一套跨越三个世纪的关于革命的单一解释，似乎历史时间并不重要，而托洛茨基则展示了，世界历史的运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不平衡发展）是如何激起了每一个革命的不同过程。在前一个例子中，展现的是不偏不倚、因素分析、去情境化以及归纳；在后一个例子中，则是干预、过程、结构化和重建。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科学的两种模式和两种方法。

再一次的，我选择斯科奇波尔和托洛茨基来突显实证和反思性方法之间的对比。但是人们对拓展个案法的理解，应该比韦伯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中所做的说明走得更远。在回答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生活在一个祛魅的、理性化的世界中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个世界从何而来的时候，他将自己放到了历史当中。实际上的参与给了他将加尔文主义的预设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心理过程，然后，他将这些东西放到了历史力量的广阔队列当中，以推导出法律秩序、系统算计和雇佣劳动的出现。他的论述始终都在与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论“交战”，却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当然，历史学家在方法论规则上的自我意识通常比较弱，而且他们的作品很难被简单地归入一种或另一种科学模式。不过，我在这里的目的是开启从事社会科学不同方式的想像力，而不是当 4R 似乎遥不可及的时候，将科学完全放弃。

3. 科学的工业和手工模式

在确立了科学的两种模式之后，我们现在必须问：对每一种模式而言，区分“好”科学和“坏”科学——执行得好的科学和执行得坏的科学——的标准是什么？实证科学的调整原则（反应、可靠性、可重复性、代表性）界定了一个程序上的客观性（procedural objectivity），一个收集知识的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过程保证生产的工业模式。概念与执行相分离，工程师界定劳动分工中的每一项工作以保证最终产品的质量。以科学的观点来看，理论是与调查实践相分离的，后者依据事先定义好的程序来操作。工业模式的代表是调查研究，在那里，不同的工作在劳动的细致分工中被分配：研究者、设计者、访问员和回答者，依照一种等级结构排序。访问员和回答者都从属于调查问卷，由研究者来建构。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刻画出收集知识的程序，来获得这个世界尽可能精确的图式。

反思性科学的调整原则（干预、过程、结构化和重建）靠的是一种嵌入性的客观性（embedded objectivity），就“住”在理论中。这里，我们有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手工模式，在这里，产品决定过程。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确立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权威“事实”，而是在于现存理论的持续改进。理论和研究的关系是解不开的疙瘩。拓展个案法因而是知识手工生产的一种方法，在那里，知识的设计者同时也是知识的执行者。通过与她的研究对象合作，个人在参与观察中完成了研究过程的所有工作。研究过程并不随意专断，但是不可以被简化为一系列始终不变的程序。不管重建推动了理论，还只是使它变得更加复杂；不管重建导向的是有着更多经验文本却更加小气的理论，还是导向了对令人惊讶的新事实的发现，对反思性科学的评估，重点看的是产品。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按照韦伯的术语，我们可以区分出一种建立在形式理性基础上的客观性和一种建立在实质理性基础上的客观性，前者我把它称为程序客观性，而后者则是嵌入性客观性。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声称在科学两种模式背后的，是关于两种不同行动的理论：一方面是工具行动，另一方面是沟通行动。

科学的两种模式以及它们各自调整原则的共存（它们对什么是好科学、坏科学的观点，亦即它们自己对于客观性的观点），对评估任何特定的研究作品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既不应该用实证主义的批判来要求反思性方法，也不应该用反思性批判来要求实证方法。也就是说，要求拓展个案法遵循4R原则，和把干预、过程、结构化和重建强加给调查研究一样，是不恰当的。人们不能够漠视拓展个案法，是因为参与者选择了她要研究的世界，她的素材带有作者个人特有的风格，是因为她将个案从地方拓展到了超地方的层次，或者因为她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个案！拓展个案法只是在按照另一个调子起舞，在评价她的舞姿之前，请先听听她的曲调。

4. 关于两个陪衬的叙述

两种科学模式的共存对于我们思考方法论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上，既然只有一种科学的“模式”，而且通常还难以辨认，那么“方法”和“技术”就会被合为一体。[①] 在这种独裁性的方案中，方法论的思考关心的是技术的相对长处。一些人

① 即使是某些最好的方法论教材也将技术、方法、模式这三种不同的层次混合到了一起。瑞金对“变量”分析和“个案研究”的比较——不过重合了调查研究和拓展个案法之间的某些区别——就假设只有一种科学的模式，一种我们所有人都共享因此无需解释的模式（Ragin，1987）。

会主张，一个人选择的“技术或技术混合体”必须适应他正在调查的问题（Sieber，1973）；另一些人则宣称某些方法优于其他的方法。因此，在芝加哥学派的全盛时期，与社会调查相比，那些超然的男性职业社会学家的参与观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并以与揭发时弊为己任的女性改良者的关联为耻（Blumer，1984；Fitzpatrick，1990；Deegan，1988；Gordon，1992）。只是到了后来，当定量社会学的要求得到承认以后，调查研究才被认为比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的方法论要客观和科学。在学科霸权的斗争中，每一种技术都试图通过暴露别人的缺点，来表明自己的优越性。不过，对科学二元观点的详细阐述，却把争论从技术上引开，将矛头指向了对方法的阐明，并与科学的替代性模式联系起来。

当只有一种科学模式的时候，各种技术也许要竞争的是太阳的位置。有了两种科学模式，任何一种特定的方法也许会将某一种对立的方法当作是附属的组成部分。调查研究忍受着情境效应之苦，但情境效应却能够在反思性方法中得到最好的研究和最小化。为了最小化访问、回答者、场所和情景效应，调查研究者使用了诊断或者拓展个案的方法。反思性方法成了实证方法的陪衬。[①] 实证方法能不能也成为反思性方法的陪衬？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拓展个案法将社会过程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力量的队列

① 伯吉斯写道：“拓展个案法第一次被介绍到社会科学中的时候，是作为统计的陪衬。”（Burgess，1927：114）他指的是诸如勒普来（LePlay）这样的早期社会学家，后者使用独裁性的研究以作为更大的统计研究的基础。但是，伯吉斯继续写道，对于以分类、关系感和对后果的描述为假设的个案研究来说，没有什么生来就是不科学的东西（同上：117）。当然，他把这些看做了获取事实的两种技术而不是方法，这倒是与关于社会科学的两种观点相一致。

当中，后者对于观察者来说是外部特征，因此可以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之。毕竟，韦伯之所以依赖他在《经济与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经验上的一般化结论，目的就是为了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拓展个案的分析。在对赞比亚化过程的拓展中，我就使用了调查的方法，将矿山描绘成一种劳工贵族专注于保护他们特权地位的社会力量。就像反思性方法能够为调查研究服务一样，实证方法也能够为拓展个案法服务。

5. 科学的阻碍：从情境到权力

也许有人会主张，选择实证科学还是反思性科学的方法，应该以正在研究的问题为导向：实证方法更加适合于支持系统性特征的研究；而反思性方法更适合于对日常社会互动进行研究——实证方法针对的是客体，反思性方法针对的是主体。这种对于方法的工具性观点忽视了科学两种概念间的深层区别，而恰恰是这两种概念决定了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研究世界：是站在一边还是干预，是试图不偏不倚还是进入对话。通常，不是问题决定方法，而是方法形塑了问题。我们对于一种或另一种科学模式的信奉，会生产和支持我们选择去调查什么样的问题。

接着我们应该问，是否有更加广泛的因素预先决定了一个人去采用某种或另一种科学模式？我们能不能让拓展个案法反对自己，并在历史上为每一种科学模式定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实证方法的挑战是最小化和控制情境。访问在事实上越少受到访问员特征的刺激性影响，回答者越以一致的方式解释问题，外部的环境越保持固定，情景越少地生产出不同的知识，调查研究就越没有问题。情景的特性和地方性越多地被破坏，调查研究就越能与实证的目标相协调；而在一个使所有的经验都同质化的世界中，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系统世界殖民生活世界的时候

（Habermas，1984，1987），它就能发挥到极致。当我们无力去反抗更广阔的经济和政治系统时，实证科学就能够实现自身。关于信息社会、后现代性和时空伸延（space-time distanciation）的一些分析就暗示我们正在转向一个没有情境的世界，它将大大有利于调查研究的开展。

另一方面，反思性科学将情境和环境作为它的出发点，它在情境中茁壮成长，试图简化支配、沉默、客体化和规范化等权力效应。权力效应被消灭了，生活世界获得了解放，反思性科学就能够实现自身。即使乌托邦正在消退，拓展个案法也能够丈量出它移动的距离。它突出强调了民族志式的地方世界，挑战了被假想出来的全球全能主义，而不管它是什么国际资本、新自由主义政策、流动的空间，还是大众文化。反思性科学将情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挑战了抽象概念的具体化，并由此确立了实证科学的缺陷。

参考文献

Abbot, Andrew. 1992a. “What Do Cases Do?” Pp. 53 - 82 in *What is a Case?*, edited by Charles Ragin and Howard Bec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2b. “Of Time and Space: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the Chicago School.” Sorokin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Southern Sociological Society. New Orleans, Louisiana.

Asad, Talal (ed.) 1973.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Bates, Robert. 1971. *Unions,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auman, Zygmunt.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er, Howard. 1958. "Problems of Inference and Proof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 652 – 60.

Becker, Howard, Blanche Greer, Everett Hughes, Anselm Strauss. 1961. *Boys in Whi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haskar, Roy. 197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tlantic Highland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Bischoping, Katherine and Howard Schuman. 1992. "Press and Polls in Nicaragua: An Analysis of the 1990 Reelection Survey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2): 331 – 50.

Blum, Linda. 1991. *Between Feminism and Lab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arable Worth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urgois, Philippe. 1995. *In Search of Respe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lmer, Martin.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Zambia.

Burawoy, Michael. 1972a. *The Colour of Clas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Zambia.

——. 1972b. "Another Look at the Mine work." *African Social Research* 14: 239 – 87.

——. 1974. *Constraint and Manipulation in Industrial Conflict – A comparison of strikes among Zambian workers in a clothing factory and the mining industry*. Institute for African Studies, Zambia.

——.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2. "The Written and the Repressed in Gouldner's Industri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11: 831 – 51.

——. 1989.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 759 – 805.

Burawoy, Michael et al. 1991. *Ethnography Unbou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gess, Ernest W. 1927. "Statistics and Cases Studies."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12 (2): 103 – 20.

Chodorrow, Nancy. 2001. *The Power of Feeling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icourel, Aaron. 1964.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1967. "Fertility, Family Planning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Family Life: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 (4): 57 – 81.

——. 1982. "Interviews, Surveys, and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Validit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7 (1): 11 – 20.

Clark, Herbert, H. and Michael F. Schober. 1992. "Asking Questions and Influencing Answers." Pp. 15 – 48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edited by Judith Tanur.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Clifford, James.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Marcus. 1986.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nverse, Jean, M. and Howard Schuman. 1974. *Conversations at Random*. Ann Arbor, Michigan: Wiley.

Dagan, Mary Jo. 1988. *Jane Adams and the Men of the Chicago School, 1892 ~ 1918*.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Denzin, Norman and Yvonna Lincoln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

De Vault, Marjorie. 1990. "Talking and Listening from Women's Standpoint: Feminist Strategies for Interviewing and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37 (1): 96 – 116.

——.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migh, Rebecca. 1997. "Th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 The Use of Negative Case Method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26: 649 - 684.

Epstein, A. L. 1958. *Politics in an Urban African Commun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Escobar, Arturo.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non, Frantz. [1952] 1968a.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 [1961] 1968b.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rdenfeld.

Fantasia, Rick. 1988. *Cultures of Solidar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itzpatrick, Ellen. 1990. *Endless Crusade: Women Social Scientists and Progressive Reform*. New York: Oxford.

Forsyth, Barbara H. and Judith T. Lessler, "Cognitive Laboratory Methods: A Taxonomy." Pp. 393 - 418 in *Measurement Errors in Surveys*, edited by Paul B. Biemer et al. New York: John Wiley, 1991.

Fraser, Nancy. 1989. *Unruly Practi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ans, Herbert. 1968. "The Participant Observer as Human Beings." Pp. 300 - 17 in *Institutions and the Person: Papers Presented to Everett C. Hughes*, edited by Howard Becker, Blanche Greer, David Reisman and Robert Weiss. Chicago: Aldine.

Garbett, Kingsley. 1970. "The Analysis of Social Situations." *Man* 5 (2): 214 - 27.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 *Local Knowl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laser, Barney and Anselm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Gluckman, Max. 1958. *Analysis of a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Zulu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

——. 1961a. "Ethnographic Data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9: 5 - 17.

——. 1961b.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Af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Pp. 67 - 82 in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Africa*, edited by Aidan Southa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 (ed.) 1964. *Closed Systems and Open Minds: The Limits of Naivety in Social Anthropology*. Chicago: Aldine.

Gordon, Linda. 1992. "Social Insurance and Public Assistance: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in Welfare Thou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 ~ 193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1): 19 - 54.

Gouldner, Alvin. 1954.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3. "Sociologist as Partisan." Pp. 27 - 68 in *For Sociology: Renewal and Critique in Sociology Today*. London: Allen Lane.

——.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Two: Life 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 Beacon Press.

Haney, Lynne. 1996. "Homeboys, Babies, Men in Suits: The Stat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Male Dom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5): 759 - 78.

Haraway,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New York: Routledge.

Harding, Sandra. 1986. "The Instability of Analytical Categories of Feminist

Theory." *Signs* 11 (4): 645 - 64.

——. 1990.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Anti-Enlightenment Critiques." Pp. 83 - 106 in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edited by Linda Nichols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Hondagneu-Stelo, Pierrette. 1994. *Gendered Transitions: Mexican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yman, Herbert et al. 1954. *Interviewing in Soci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nkowski, Mártin Sánchez. 1991. *Islands in the Str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hnston, Paul. 1994. *Success While Others Fai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in the Public Workplace*. Ithaca, New York: ILR Press.

Kanter, Rosabeth.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Katz, Jack. 1983. "A Theory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Social System of Analytical Fieldwork." Pp. 127 - 48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obert Emerson. Prospect Heights,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Keller, Evelyn Fox. 1983.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New York: W. H. Freeman.

——. 1985.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norr-Cetina, Karin D. 1981. "Introduction: The micro-sociological challenge of macro-sociology; towards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p. 1 - 48 in Karin Knorr-Cetina and Aaron Cicourel,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oston an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uhn, Thoma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mphere, Louise et al. 1993. *Sunbelt Working Mothers: Reconciling Family and Factor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zarus, Neil. 1993. "Disavowing Decolonization: Fanon, Nationalism, and the Problematic of Representation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 24 (4): 69 - 98.

Liebow, Elliot. 1967.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 Corner Men*. Boston: Little Brown.

MacLeod, Jay. 1987. *Ain't No Making It: Leveled Aspiration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Magubane, Bernard. 1974. "Review of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 (2): 596 - 98.

Milkman, Ruth. 1987. *Gender at Work*.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ishler, Elliot,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Clyde. 1956. *The Kalela D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

——. 1983. "Case and Situation Analysis." *Sociological Review* 31: 187 - 211.

Oakley, Ann.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Pp. 30 - 61 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edited by Helen Rober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olanyi, Michael.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pper, Karl.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agin, Charles.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y, Rake. 1998. *Fields of Protest: A Comparison of Women's Movements in Two Indian C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nders, Lynn. 1995. "What is Whiteness?" American Politics Workshop University of Chicago.

Schaeffer, Nora Cate. 1991. "Conversation with a Purpose-Or Conversation? Interaction in the Standardized Interview." Pp. 367 – 91 in *Measurement Errors in Surveys*, edited by Paul P. Biemer et al. New York: John Wiley.

Schuman, Howard and Stanley Presser. 1981.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Attitude Survey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well, William.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 1 – 29.

Sieber, Sam. 1973. "The Integration of Fieldwork and Survey Metho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1335 – 59.

Smith, Vicki. 1990. *Managing in the Corporate Inter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nderman, Paul and Thomas Piazza. 1993. *The Scar of Ra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omers, Margaret and Gloria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Pp. 37 – 99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Blackwell.

Stacey, Judith. 1990. *Brave New Famil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Stinchcombe, Arthur. 1980. "Erving Goffman as a Scientist." Unpublished Lectur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toler, Ann. 1995.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nselm.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chman, Lucy and Brigitte Jordan. 1990. "International Troubles in Face-to-Face Survey Interview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85 (409): 232 – 41.

Susser, Ida. 1982. *Norman Street: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an Urban Neighborhood*. New York: Oxford.

Tanur, Judith (ed.)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Thomas, Robert. 1985. *Citizenship, Gender and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ouraine, Alain. 1983. *Solidarity: Poland 1980 – 8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Return of the Ac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Van Velsen, Jaap. 1960. "Labour Migration as a Positive Factor in the Continuity of Tonga Tribal Socie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8: 265 – 78.

——. 1964. *The Politics of Kinship*.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hodes Livingstone Institute.

——. 1967.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 Pp. 29 – 53 in *The Craft of Urban Anthropology*, edited by A. I. Epstein. London: Tavistock.

Van Maanen, John.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hyte, William Foot.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Westmead, England: Saxon House.

Winch, Peter. 1958.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公共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针对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讨论典型地采用了下面四种立场中的一种。

1. 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用以理解社会世界的综合性的世界观。她为抨击资本主义的故弄玄虚提供了理论武器，为动员群众进行斗争提供了真知灼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即使之特别地在受压迫阶级中产生不断增长的影响。虽然这种立场往往采取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义来进行教条式阐述的形式，但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并不必然要求严格的、教条式的信仰。中心问题是必须使之变得容易让人理解，并且使之内在化为一种内心的重要信仰体系。

2. 埋葬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事实上经不起认真的社会质询的教义。完全是由于它作为和政党、社会运动以及国家联系着的起着动员作用的意识形态角色，而不是它的论点的科学可信性，成就了马克

---

* 译自本书作者与 Erik Olin Wright 合作的成果“Sociological Marxism”。
译者及单位：傅春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思主义的历史延续。受马克思主义激励的政权的消亡也许最终标志着这种陈旧的，而且通常是有害的教义的迟迟不肯到来的死亡。现在是埋葬它的尸体的时候了。

3. 运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有趣味的、有启发的想法的一个来源，很多这些想法对于当下的社会科学分析仍然有着用武之地。虽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深刻的缺陷，另一些则也许失去了理解当下社会的实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仍然包含了许多有用的见解和论点，这些应该作为永久的遗产被保存起来。许多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标题下所做的研究有着这样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有选择性地运用个别的概念和主题去理解特定的经验问题。但是以这种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不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4. 构筑（building）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理论的有力分析传统，用以科学地理解当代社会变迁和社会再生产的困境和可能性。特别当人们想以平等主义和解放的方式改造世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现存的每一个部分都经得起考验。如果马克思主义立志于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她必须不断地经历挑战和转变。构筑马克思主义也意味着重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不是业已建成的真理大厦，她也不简简单单是为有趣味的见识创建目录。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增强理解世界的能力以改变世界，那么构筑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关键的任务。

前两种立场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一种为人们所坚持并提供给人们对世界的解释和行动动机的信仰体

系。两者都对马克思主义试图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热望感到紧张：前者是因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有效性，它更关注的是其劝说的力量；后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容置疑的错误，并且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极其有害的。

社会学，至少就其在当下美国的表现，主要是站在第三种立场上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当然，仍然有社会学家呼吁要埋葬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社会学史上，也的确有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几乎完全被边缘化。[①] 在某种情况下来说，构筑马克思主义现已成为社会学内部的一个重要知识趋向。但是，通常美国社会学只是简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学想像力”的一种来源。社会学理论课程一般都会包括对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恭敬的讨论，并把他们看做社会学历史上主要研究潮流的奠基者：涂尔干对应的是社会整合的规范和在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韦伯对应的是理性化和关于有意义行动（meaningful action）的文化社会学，马克思则对应于阶级和冲突。对于政治和国家的研究，例行公事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鉴了对商业活动产生的影响、国家行为的经济约束、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动员的关注。关于世界经济的

① 直到冷战前，美国社会学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不理不睬。结构功能主义把马克思看做一个功利主义者，认为他的思想的实用性很少能超越19世纪；同样真实的，芝加哥学派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和社会科学毫无关联的宣传。冷战把马克思主义污名化了。特别是政治社会学，以反对被理解为一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埋葬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反而为她提供了生存空间并使她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这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发觉主流的范式已经脱离了现实。复兴的马克思主义转而关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对抗美国的既定秩序以及极权主义。现在，那些认为阶级已经不再适用于对当代社会分析的人，又在重新尝试埋葬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这种观点。相反，我们认为，阶级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动力学（dynamics）和再生产的中心。

讨论通常会涉及资本的全球化、大型跨国公司的势力、国际市场撞击乡土社会的方式这些重返马克思的经久不衰的马克思主义论题。关于工作的讨论在频繁地探讨劳动过程、对工人的榨取以及科学的应用对技术的影响这些问题。关于社会变迁的讨论则经常谈到这个过程中的矛盾。也许最重要的是，关于社会冲突的讨论被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影响着——并非简简单单是主观认同，而是结构性的社会裂缝产生了冲突。通常，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主题和思想的谱系被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仅仅是被吸收进扩散的主流社会学而已，人们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仍然能够成为一种施展这些思想的有自我意识的实践，这种实践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社会学学术之间的持久联系。

构筑马克思主义是面向马克思主义传统最具雄心的立场，超越了仅仅是明晰抑或含蓄地展开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以解决一系列的社会学问题。她的目标是通过认识其缺陷和重构其论点，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条理分明的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实践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需要坚定的、规范的承诺（strong normative commitments），而不仅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功效的信仰。如果没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批评和对于资本主义平等主义的、解放的政治替换设想的承诺，就不会有动力去和构筑、改造（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ng）作为条理分明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颇费精力的智力难题作斗争。[①] 构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智力方案因此深深地连接着对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作出挑战的政治方案。

在这篇论文里，我们将首先详细描述这四种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基本轮廓。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描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的核心成分，以此作为构筑我们将称之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一　设置舞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成分

在马克思主义者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论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很少就什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素达成过共识。大多数评论者会同意：不论除此以外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部分是关于作为一种阶级社会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的理论。[①]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密切地连接着其根本挑战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的面向。我们将关注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面向。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中心论点落在三个理论论题上：①关于资本主义轨迹和命运的理论；②资本主义矛盾再生产的理论；③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规范化理论。这三个论题相互内在关联，然而又不失各

① 当然，人们可以认可对资本主义进行平等主义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范方案，但仍然拒绝构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案，既然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缺陷使这个任务没有希望得以完成。

① 因为有很多种马克思主义，所以谈论“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更为合理的。例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80，1985）认为，存在两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和科学的），它们构成了一个“言说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一个争论场域（a terrain of debate），一种批评性话语的文化，而并非一个统一的理论。虽然佩里·安德森（Anderson，1976）也认为有两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和西方的，但他认为后者是对前者正确路线的偏离，反映了革命运动的失败。即便如此，他也创建了一种内部的对话，从而给予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内部一致性。

自相当大的自主性；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不同时期，它们交替占据着显著的位置。

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里，最明晰和系统的论点是这三个论题中的第一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最重要的功绩，是说明了资本主义运行的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如何沿着一条朝向特定目标的轨迹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投入了极少的精力去阐明关于这种命运本身——社会主义——的真实理论，不论是根据社会主义应该包含的规范原则，还是根据制度设计会向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提出的问题。作为替代，马克思著述的规范面向首先采取了对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形式，这种社会秩序通过异化、剥削、拜物教、神秘化（mystification）、退化（degradation）、贫困化（immiserization）、市场无序（the anarchy of the market）等等被描绘出来。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并且最终被共产主义超越被假定为对这些特征的简单否定，这是一个暗含的未经阐明的摈弃了资本主义所有道德缺陷的理论乌托邦：一个没有异化、没有剥削、没有拜物教等等的社会。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一些短的篇幅涉及对社会主义更为积极的讨论——《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段落提出了规范原则的论题，关于巴黎公社的一些著述则引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可能设计原则——然而这些论题没有被给予持续的、理论的关注。

马克思更多地关注于当资本主义沿着它的历史轨迹发展的同时，矛盾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很明显的也许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纲领性陈述中[①]，和在涉及再

① 科恩（Cohen，1978，1988）对马克思在这篇导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般理论的简要陈述的含意进行了最为严密的剖析。

生产的矛盾本质的地方[①]，马克思对阶级关系再生产中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角色做出了重要的、有启示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劳动过程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马克思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理论元素。[②] 但是从总体来看，资本主义关系矛盾再生产的理论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展开：没有关于国家的真实理论，只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碎片，以及关于生产自身内部阶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起点。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持续失败，开始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问题。葛兰西对这些问题的早期讨论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他关于霸权和同意（hegemony and consent）的物质基础问题的写作中。[③] 社会再生产的论题在 20 世纪中叶被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进一步展开了，特别是以功能主义的方式。[④] 但是真的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在 20

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国家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一般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有一些关于国家和意识形态更为功能主义的理解，马克思努力指出了民主的扩大如何挑战了资本主义，以及普选权怎样给阶级斗争解开了锁链。

② 见《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是第一和第七部分。

③ 大量研究被葛兰西的狱中著作激发：不仅是他标志性的霸权概念，还有他对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理解，他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理论，关于常识（common sense）和“善识”（good sense）的理论，阶级斗争作为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和运动战（war of movement）的再概念化，他对现在产生影响的被动革命概念的论述，对政党和工会的说明，以及关于法西斯主义、福特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比较社会学。他奠定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④ 虽然不如葛兰西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丰富，但是一些经典著作例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及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爱欲与文明》也都指出了资本主义支配的处处存在。他们强调了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诱惑群众阶级接受资本主义，并且产生出消除任何形式抵抗的心理过程的途径。他们的预言或者是意味深长的悲观，或者就被归为想象的乌托邦。

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复兴的时候，资本主义矛盾再生产的问题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广为传播的理论和经验争辩的主题。社会主义规范化理论的问题也变得重要了，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苏联特征的激烈政治争辩，接着是在更少热情的对于停滞原因的尝试诊断，最后是在尝试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的背景下。但是就像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规范化面向——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采取了对资本主义消极批评的形式，而不是对一种解放替代性的积极阐述。在共产主义政制受挫和资本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发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严肃积极的规范化理论已经变得更为迫切。

接下来我们首先将列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中心论点，并且说明为什么我们感到这些论点并不令人满意。然后我们会转向资本主义矛盾再生产的理论，我们认为它构成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最后我们会讨论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解放工程的规范化理论的问题。

二　关于资本主义轨迹和命运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于资本主义轨迹和命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在三个基础命题上。

命题1　资本主义不可能长期持续。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它的内在动力（运动法则）最终会破坏它自我再生产的条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特征不仅仅是它具有危机和衰落的事件，还在于这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加剧的内在趋势，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幸存越来越成为问题。

命题2　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激烈化。既然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下降了（命题1），那么由反对资本主义而组成的阶级力量挑战资本主义的时候，这种阶级力量在数量和能力上都有所增加。[①] 最终由反对资本主义而组成的社会力量会变得足够强大，而资本主义自身会变得足够衰弱，以致资本主义能被推翻。[②] 另有两个断言通常和这个命题联系在一起：①资本主义的破灭必定是决裂式的而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解组发生在一个时间上集中的历史时刻）；②决裂要求的是对国家的暴力推翻，而不是以民主的方式获取。尽管如此，任何一个断言都不是内在于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激烈化论题本身，并且不应该被看做历史脉络的主题，而应该被看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命题。

命题3　向社会主义的自然转变。假设资本主义的最终不可持续（命题1）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和能力，在加剧的阶级斗争导致资本主义解体的后果下（命题2），社会

① 对阶级斗争的激烈化进行讨论的经典著作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创造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播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无产阶级的斗争从对资本的零散攻击，发展到工会，并由此成立全国性政党代表阶级反抗国家。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描绘了加深的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之间的一致性，并最终导致“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

② 阶级斗争的激烈化命题并不是说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完全没落和极其不稳定的时候才有可能。既然相关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会走向不稳定，它们就有可能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到达完全内部崩溃之前推翻它。不稳定在这个革命性转变中之所以仍然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保卫资本主义的设置甚至在完全不可持续达到之前就被资本主义日趋紧张的危机削弱了；第二，对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认识在动员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主义是最有可能的继承者（这个命题更强的版本是：它是必然的继承者）。部分是因为资本主义自身为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些制度基础——通过托拉斯形成的所有权集中，产量的大量增加使人们从长时间劳动的必要中解放出来，工人之间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通过股份制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对在生产中作为积极主办者的资本家的排除，等等。但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没落中浮现出来，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会从社会主义中收获甚多，并且他们有力量创造它。经典马克思主义偶尔会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有其他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命运——比如在卢森堡的著名方案“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barbarism）”中——但是没有哪种非社会主义的后资本主义未来可以用理论精确描述。

这些命题有意于体现建立于对在社会世界中起作用的因果机制的理解上的真实预言，而不简简单单是主观愿望和哲学臆测的表达。这些预言源于对两个因果过程的考虑，这两个过程被认为传达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力学的基本逻辑：工人被资本家剥削，和资本家在各种类型市场上的彼此竞争。这两个过程所产生的因果链条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命运的这些命题的基本解释。

对工人的剥削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最显著的特征：生产能力的稳固增强、全球范围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持续的集中和中心化。尽管如此，这种发展动力存在着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是指资本主义有产生周期性的、日渐加剧的经济危机的固有趋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是复杂的，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因果过程可以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积累的瓦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最终命运的解释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总

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另一个特别被恩格斯论述过，是资本积累引起更为严重的过度生产危机的趋势。①

资本主义危机日渐加剧的固有长期趋势，意味着当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全球化的时候，它最终会变得越来越难以保持总利润率和寻找新的市场——这是持续的资本积累和创新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并最终达到它自我物质再生产的极限。用另一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来说，就是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② 由资本主义这两个内在关联的发生过程引起的因果趋势导向了命题 1 的强势预言：从长久来看，资本主义会变成一个不可再生产的经济体系。它不能永远维持下去。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长期脆弱性和成问题的生产能力，自身并没有对哪一种社会秩序会出来取而代之有太多说明。这里的重要论题，是资本主义对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的影响：资本主义不仅发展了生产力，并扩张到资本主义市场和竞争的世界体系，

①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部分）中，马克思认为，竞争驱使资本家创新，特别是通过引进新的技术，这在降低利润率的同时产生了过度生产的危机。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通过创新追求利润导致了不断加深的过度生产危机，过度生产导致了资本的集中，并最终使国家自身成为资本家——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并且一旦走到尽头它就被颠覆了。

② 这个论述是历史唯物论中更为宏大、更加抽象的历史轨迹理论的一部分。历史唯物论所提出的主要论点在于每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体系的特征：a）每一种阶级关系类型都有一个生产力可能发展到的极限；b）生产力最终会发展到这个极限；c）当极限达到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会变得日趋不稳定；d）最终，不稳定会导致生产关系的转变，并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提供了历史轨迹理论的基本动力，并且赋予它一种特殊类型的方向性。对于这种理论结构之逻辑的系统探索，见 G. A. Cohen（1978）。

而且它还创造出了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特别利益和挑战资本主义能力的社会代理人——工人阶级。工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有多种理由。最根本的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剥削。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也为工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包括在失业、工作条件恶化和其他有危险的情况下。工人的物质条件将会得到改善，如果生产的社会关系能够从基于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即资本主义——转向基于对生产组织的民主、平等控制，也就是“社会主义”。①

尽管如此，有一个具有反资本主义利益的阶级还不足以形成向社会主义的自然转变。那个阶级还必须要有能力挑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可能会越来越危机四伏和不理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了一套制度安排以保卫和再生产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见下文对社会再生产的讨论）。这些制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对阶级斗争和其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威胁的回应串联在一起。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这些辅助制度（flanking institutions）进行过系统的理论化，然而马克思本人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依赖于其反对者不断增长的动员有效挑战的能力。

① 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一样，“社会主义”有多种相互竞争的意义。通常，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设计，例如集中化的生产工具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然而，国家所有权不是被理解为“社会化的”私人所有权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重点是对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平等、民主安排。许多可能的制度形式都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同样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制度形式：家庭公司（family firms）；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s）；大型多项分工企业（large multidivision corporation）；工人共同决策制工厂（worker co-determination firms）；受国家管制的工厂；等等。社会主义——被理解为对生产的平等、民主控制——也被期望有多种制度类型：集中化的国家所有权；伴随着去集中化控制的集中化所有权；市场社会主义；工人合作社。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被认为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挑战能力。这出于多种理由：工人阶级变得越来越壮大；更大规模的生产单位变得集中；工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依赖增强；工人中的内部分化在巨大的和其他一致性力量的压迫下减小了；组织化的竞争增加了。资本主义的许多这些发展不仅增加了工人的斗争能力，而且也为社会主义自身创造了一些经济条件：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和股份制公司的出现使资本家个人变得更为多余；工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强使生产在性质上显得更加是社会性的。就像马克思主义者乐于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的条件孕育在“资本主义的子宫中”。最终，工人阶级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不仅是指它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意味着它有能力进行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命题 2）和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命题 3）。

把这些命题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基本预言：资本主义有这样一种本质的趋向，它不仅为自己的瓦解也为作为其替代者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再生产变得越来越成问题和不稳定的时候，有意于改造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也更有能力对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的反抗。在这种情境下，没有必要怀疑这种替代性的制度设计。给定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和能力，当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它就会被务实的、创造性的、集体性的实验主义过程创造出来。

这是一个精致的社会理论，对那些被承诺了平等、民主、社会主义未来的道德和政治日程的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既然为社会变革所作的斗争通常是艰巨的事务，特别是对那些对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有着热切期待的人来说，那么拥有这样的信念——即

相信“历史的力量”站在自己这一边并且自己的斗争所针对的这一体系最终会变得不可维系——会提供巨大的鼓励。[①] 对这种经典理论之真理的信念，虽然有待商榷，但仍然在面对不可抗拒的阻碍的时候帮助维持了共产主义的斗争。

不幸的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命运理论的科学有效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动力和发展的理论包含了许多对在不受管制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unregulate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时期资本主义内在运作方式，以及它尖锐的两极分化和混乱危机趋向的敏锐洞察，但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真实轨迹却没有支持这种理论的主要声明。

第一，资本主义不可持续性命题：资本主义的确包含了固有的危机趋向，但是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这些危机有激烈化的长期趋向。而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有它自我可持续性的内在限制，这个主要的理论论点也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马克思预言最为体系化的论点，利润率有不断下降趋向的理论，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相信总利润是由当前运用生产工具的工人劳动力单独产生的。既然资本强度（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于增强，那么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成本就随着时间增长，作为总成本一部分的资本主义利润产生能力却下降了，利润率也就趋向于下降了。这个理论论点被重复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既因为它作为基础的

① 资本主义衰落预言的决定论看似会引导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不论我做什么，资本主义的命运都已经被历史的规律决定了，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致力于斗争呢？”事实上，既然人们参与斗争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对牺牲之无意义的恐惧，那么对个人事业最终胜利的确信就能帮助动员人们参与行动，这使胜利变得更有可能。

劳动价值理论的缺陷，也因为它关于资本强度对利润率影响的论点的特殊缺陷。另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趋向于加剧的主要观点——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样不能得出危机内在加剧的结论。人们已经意识到，国家和其他创新机制有能力产生更多的需求以吸收过度生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轨迹的第一个基本命题——资本主义有最终变得不可再生产的固有趋向——于是就不能被支持了。[①]

第二，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激烈化命题和自然的社会主义转变命题：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支持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未来的论点，其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没有证据支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即认为结构性决定的（structurally-determined）阶级有围绕阶级利益组织成集体行动者，并且这样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声明的阶级利益有越来越变得反资本主义的压倒性趋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结构不是变得更为简单和更加两极化，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愈加分化。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生活的物质条件也没有变得更加无法保证和更为同质化，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异质性在许多面向上都增强了。而且，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将怎样影响阶级结构的预言失败（正如我们会在第四部分看到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料到，资本主义内部发展出的社会再生产的多种机制会那么有活力、有弹性和有

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对的反命题，即资本主义不确定是否可再生产的证据就存在。这也不意味着就不存在关于资本主义长期不可持续性的其他可能论点。资本主义可持续性之环境限制的论点可能也会有说服力，这些限制可能被资本主义内在动力的效力达到：由于资本主义企业趋向于忽略消极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资本主义市场也鼓励十分短视的行为，资本主义可能会毁坏它存在的生态条件。这里所指出的是，关于不可持续性命题，并没有哪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

效力。[①] 结果，在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中就看似存在更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即使从长期来看，那也是曾在经典理论中被支持的。

如果资本主义没有一步步被削弱并最终不可维系，而对抗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也没有集结得更为强大并更有能力挑战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向，那么即使从长期看来，也没有坚固的基础可以预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可能未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反的观点——即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可能未来，或者甚至是其不可能的未来——而只是说明传统理论没有为有关这种结果的可能性预言提供坚实的基础。

如果有人拒绝传统理论的历史命运命题，他\她也许会问：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也许所有剩下的——如果仍然有价值的话——也只是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零散洞察，正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暗示的。而我们认为正相反，仍然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核心，它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重新）建立的基础。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将会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它根植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矛盾再生产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轨迹理论。它会鉴别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显著的因果过程，这种因果过程由于这些社会中制度的性质和解放性社会变革的前景而有广泛的分叉，但是它并不会确定一个固有的动力过程，这个过程推动这些社会朝向一个特定的目的地。挑战资本主义的问题仍然是所

① 有关“上层建筑”的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里没有被充分展开，上层建筑通常被认为是刚性的（rigid）、很大程度上是压制性的机制，缺乏有弹性的适应和转变能力去应对变化中的社会再生产需求。对一个试图把握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建筑学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暗示了这种刚性（rigidity）。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要理解这些制度是如何作用、适应和改变的。

倡议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支点，但是社会主义不再被看做是历史的必然，而是策略、限制和偶然性的潜在结果。现在，让我们转向那些建构了被重建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核心概念。

三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概念性基础

复杂的科学理论常常能被一些简单的概念性短语把握住，这些短语勾画了这种理论的基本核心。例如，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被概括为“自然选择”这个概念，以及“生物进化可以通过经由生殖适应而进行的自然选择得到解释”这个命题。当然，现代进化生物学包含了更多附加的概念和复杂的命题。没有人会把这一理论简化为这一简单核心。而诸如遗传漂变这些观点，并不能与这一命题精确一致。尽管如此，这的确构成了能够使理论框架得到统一的某种底线。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例。位于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简单概念是这样一个观点，即“约束条件下理性效用最大化”；而伴随的命题则类似于，“市场产出是由约束条件下理性效用极大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解释的”。而这一理论的实际表述也会比这包含更多。例如，人们已经意识到，信息不完全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到理性假设。尽管如此，在经济学新古典主义范式核心的正是这些元素。

那么，什么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我们认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是“阶级作为剥削”（class as exploitation），而伴随的命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和转变的困境和动力由阶级得到广泛解释”。正如在达尔文生物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例子中一样，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转变的原因能被简化到阶级。在许多复杂局面和情况下，另外的因果过程起到了重要作

用。但仍然可以断言，“阶级作为剥削”这样一个概念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提供其解释一致性的底线。

在下一部分，我们将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矛盾再生产理论这一断言的含义进行详细阐述。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更为系统地解释“阶级作为剥削”这个概念本身。讨论将围绕对六个概念性议题的澄清：①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概念；②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补充概念；③阶级作为生产关系特殊形式的观点；④阶级关系变动形式的问题；⑤剥削和支配作为阶级关系中的中心过程；⑥从对阶级关系抽象分析到对阶级结构具体分析的概念性转变。

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

任何一个生产体制都要求配置一系列的资产、资源或生产要素：工具、机器、土地、原材料、劳动力、技能、信息等等。这一配置可以用技术术语描述为生产功能——那么多不同种类的投入被结合到一个特殊的过程中，从而得到一种特殊的产出。这一配置也可以用社会关系的术语来描述：参与生产的个体行动者拥有对生产投入的使用和这些使用的成果的各种权利/权力（rights and powers）。当然，对资源的权利/权力是社会关系的属性（attributes），而不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描述，正如：对于土地的权利/权力规定了某人和其他人之间产生于对土地的使用和对生产性使用土地所得收益的占有的社会关系。这些权利/权力的总和构成了“生产的社会关系”。

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

生产的社会关系——那些对生产性资产的权利/权力在其中得以分配的关系——并没有穷尽在生产体制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在劳动过程中，还存在行动者之间合作、协调和控制的社会关系。只要有劳动分工，不同的行动者就需要彼此合作，他们的活

动也需要协调以完成任务。这样的合作/协调互动在其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生产中的社会关系。[①]

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不是从生产关系中自动产生的。特别是，生产关系直接形塑了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工作场所支配（workplace domination）——在这种关系中，一组行动者控制着另一组行动者的活动。当一个管理人员告诉一个工人做什么的时候，这个行为同时牵涉源自生产关系的对资源的委派权利/权力的实施（管理人员可以因为不服从而将工人开除），以及对使劳动分工中的协作得以发生的协调信息的提供。支配能够以各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在严格的专制等级制中，工人的活动被严密监视，不服从会被立即制裁；在比较松散的控制体制中，相当可观的个人自由被允许；还有，通过创造集体监督队伍，实施高程度的内部相互监视；而在有的统治结构中，工人作为“工业公民”（industrial citizens）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在这些例子中，生产中的关系都建构了特殊的方式，并且以这些特殊方式，生产的社会关系被转化为工作组织中具体的权力关系。

阶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

当人们对生产性资源的权利/权力分配不公的时候——即当某

① 实际上，我们是用“生产中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个组合代替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有以下几点含义。第一，我们取消了和生产力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认为，生产力的增长恒常地推动着历史由一种生产方式走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现在我们使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和生产方式的转变都得以被揭示。第二，通过强调生产力的相关环节，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技术的创新，还有工作关系的再生产也同样提供了对支配更为细致入微的理解。第三，它迫使人们对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制（负责确保生产中的关系的再生产）的认知，并把政治带进了生产领域——即生产的政治（见 Burawoy，1985）。

些人对于特殊种类的生产性资源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权力的时候——这些关系可以被描述为阶级关系。[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持久矛盾存在于生产工具的占有者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之间，“占有”（owning）是对生产中配置资源的权利/权力的描述。让我们说得精确一点：正在被讨论的这个权利/权力不是指对一般事物的占有或控制，而仅仅是指对在生产中被配置的资源和资产的占有或控制。资本家不是占有机器的那个人，而是占有机器、在生产过程中配置这些机器、雇佣劳动力占有者使用这些机器并从中牟利的人。机器的收藏者，仅仅凭借占有这些机器，并不是资本家。如果要被看做阶级关系，仅仅使不平等权利/权力作用于对资源的纯物理使用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使不平等权利/权力作用于对使用结果的享有。大体而言，它是指对由资源配置产生的收入的享有。

阶级关系中的变异

不同的阶级关系被体现在生产关系中的权利/权力清楚地规定了。例如，在有些生产体制中，人们被允许占有他人的劳动力。当与这种所有制相伴随的权利是绝对的时候，这种阶级关系被称为“奴隶制”。当对劳动力的权利被劳动者和他人共同占有的时候，这种阶级关系被称为“封建制”。[②] 相反，在资本主义

① “权力”是指人们控制生产工具之使用的有效能力，也包括享有其结果的能力；“权利”是指由第三方对这些权力的合法执行能力。

② 这看起来不像是对封建制作为一种阶级结构的标准定义。封建制典型地被定义为这样一种阶级体制，其中经济之外的压迫（extra-economic coercion）被用来迫使农奴成为地主的劳力，或者以直接劳动所得（direct labor dues）的形式，或者以租金的形式。这里，我把“直接经济压迫”（direct economic coercion）当作是地主对农奴劳动力的财产权利的表述。这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反映出来，即农奴没有离开地主土地的自由。这就相当于说，农奴从土地逃离即是偷窃的一种形式——偷取部分被地主占有的劳动力。对封建制的概念化讨论，见 Wright（1985：chap. 3）。

社会里，这种对他人的绝对或分享式的占有是被禁止的。

阶级、剥削和支配

使阶级分析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是嵌入在阶级关系中的特殊机制。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剥削，虽然支配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剥削是一个复杂而有挑战性的概念。它有意要指出人们物质利益相互依赖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要满足三个标准。[①]

（1）福利反向互赖原则（the inverse interdependent welfare principle）：剥削者的物质福利依赖于对被剥削者的物质剥夺。

（2）排他性原则（the exclusion principle）：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福利反向互赖取决于对被剥削者取得生产性资源渠道的排除。

（3）占有原则（the appropriation principle）：排他性产生剥削者的物质优势，使他们能够占有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

剥削因而是对这样一个过程的诊断，通过这个过程，收入的不平等被对生产性资源权利/权力的不平等产生出来：不平等的产生至少部分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即剥削者依靠他们对资源的排他性权利/权力，有能力占有由被剥削者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剩余。如果只满足前两个原则而不满足第三个，那么经济压迫会存在但并不是剥削。其主要区别是，在非剥削性经济压迫中，享有特权的社会类别自身并不需要这种被排除的类别。当他们的福利依赖于排他性的时候，就没有他们活动间相互依赖的继续存在了。而在剥削的情况下，剥削者热切地需要被剥削者：剥削者依赖于被剥削者的努力为他们创

① 对这三个原则更为扩展的讨论，见 Wright（1997：9－19）。

造福利。[①]

这种深深的相互依赖之所以使剥削成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有两个理由：第一，剥削建立的这种社会关系，不仅使一个群体的利益和另一个群体相对立，同时也要求它们继续发生互动；第二，它赋予了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借以挑战剥削者利益的真实权力形式。这是重要的一点。剥削依赖于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行动者，而不是机器人，所以他们通常保留了对自身劳力付出的极大程度的真实控制。因而剥削关系中的榨取通常或多或少是有问题和不稳定的，它需要积极的制度设置来维持它的再生产。管理、监视、处罚等等形式的这些设置对于剥削者来说也许会变得相当昂贵。影响这些花费的能力构成了被剥削者中的权力形式。

支配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它指出了生产活动自身（我们称之为生产中的关系）相互依赖的一个面向，而不简单地只是由这些活动产生的物质利益的相互依赖。这里的重点在于，根据人们由对于生产性资源的权利/权力而进入的关系，一些人处在了这样的位置上：他们可以控制其他人的活动，指引他们，对他们发号施令，监视他们的活动，雇佣和开除他们。既然体现在

① 北美洲和南美洲原住民的命运反映了非剥削性经济压迫和剥削之间的差异。两地的原住民都被排除在他们主要经济资源——土地的获得途径之外。并且由于这种排他性，欧洲殖民者物质福利的增长都是以原住民的牺牲为代价的。两地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北美洲，原住民通常不是被剥削，而在南美洲则是。结果是种族屠杀即使在道德上是可憎的，仍然被作为对付北美原住民反抗的有效手段：白人殖民者不需要北美原住民，因而可以简单地把他们消灭掉。而在原住民被剥削的地方，这种策略是不可能的。尤尼斯（Younis，2000）用这种区别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非洲国民大会的不同发展轨迹作出了解释。因为巴勒斯坦人大体上被排除在以色列经济之外，所以他们不具有像南非广大非洲裔工人阶级那样的优势力量。

支配中的权力直接来源于生产的社会关系，支配也可以被理解为是阶级关系的一个方面。因此，阶级关系不仅意味着一些人承担着他们的劳动成果被他人享用的后果，也意味着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被他人控制着，并且被超出于他们自我控制范围之外的人引导。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后面这种状况被叫做异化。[①]

从抽象的阶级关系到具体的阶级结构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讨论阶级关系的概念。这些关系被完全两极化为存在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阶级结构远比这复杂得多，它们体现在各种方面。

- 多种不同形式的剥削并存：真实的阶级结构可能包含了资本主义关系、封建关系，甚至各种形式的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
- 剥削和支配不是完全相互对应的。例如，管理者有可能支配着工人，而他们自己却被资本家剥削。
- 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权利/权力不是完全两极化的：任何形式的国家管制都会剥夺资本家对生产工具无所约束的使用权利/权力；制度安排——如劳资协议会（works committees），工人共同决策制——会给予工人一定的生产组织权利/权力。

① 异化的概念也经常被用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况，即当一个人的生活被非人的力量——比如说市场——而不简单是被他人的力量控制的时候。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虽然他们并不被剥削，但是资本家——而不仅仅是工人——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异化：像工人一样，他们的生活也会被“异化的”力量控制——市场、竞争压力、通货膨胀等等。异化的概念也并非只和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生活被超出于自我控制范围之外的力量控制，不仅是因为他/她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也因为他/她和国家的关系，因为性别，等等。

• 个人与生产体制会有多元、并可能是矛盾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普通工人也能拥有自己的股份，或者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例如职工持股计划（ESOPs）］，或者在其他地方；家庭可能包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从而间接地通过多元途径使每个人都和阶级结构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将不再讨论概念化这些复杂情况的各种策略，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文献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对阶级结构的概念做了全面说明，以便于对这种复杂情况条理分明的理解。[①]

四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矛盾再生产理论

让我们回忆一下到现在为止所讲的内容。我们从宣称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开始，认为不应当仅仅是运用它（任由它被埋葬），因为它对理解平等、解放的社会变革之阻碍和可能性有着重要作用。这种规范化的政治议程提供了担心这些问题的核心动机。然后我们回顾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历史理论部分，这部分试图解释资本主义走向终结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这种理论虽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视角，但是它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阶级关系矛盾再生产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阶级作为剥削的概念。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概念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

① 对于涉及将这种复杂性清晰地汇入阶级结构这个概念的讨论，见 Wright (1989, 1997)。

理论中被展开，并且它将怎样构成发展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矛盾再生产理论基于三个基本命题。

命题 1　阶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命题。由于它们的剥削特征，阶级结构是社会关系固有的不稳定形式，从而要求为它们的再生产做出积极的制度安排。所以，凡是有阶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预言，会有各种形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发展起来保卫和再生产这种关系。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些机构特别是指再生产了经济基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①]

命题 2　资本主义矛盾命题。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制度解决，不论怎样及时都会有削弱的系统倾向，并日渐发挥更少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技术、劳动过程、阶级结构、市场和资本主义关系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地造成社会再生产的新问题。一般来说，早期的制度化手段，在这种变化了的状况下不再是最佳的方案。第二，阶级行动者为了利用现存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调整了他们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适应性的策略逐渐减弱了社会再生产制度有效规范和限制阶级斗争的能力。

命题 3　制度危机和革新命题。由于社会再生产制度的持续需要（命题 1），以及既定制度安排的再生产能力随着时间推移

① 通常的观点认为，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经济基础以使它免受挑战。这种观点典型地采用了具有浓厚功能主义色彩的解释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被解释为是由于再生产经济基础的功能需要。我们在这里避免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术语，因为这个术语倾向于暗示在涉入社会再生产中的制度间过高水平的整合与一致，就像是功能效率的一种幻象；而我们认为这并没有得到过证明。对于上层建筑概念解释逻辑的重要讨论，见 G. A. Cohen (1978, 1988: 155 - 179)。

日渐减弱的倾向（命题2），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再生产制度会倾向于周期性的革新。这种革新的典型环境是制度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社会行动者——特别是阶级行动者开始体验到制度支持并不令人满意，这通常是因为它们不再有能力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限制阶级冲突。这些制度创新有可能是逐步完成的，但也有可能造成戏剧性的制度重组。这里没有任何暗示说明新的制度解决方案是最优的，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会在不是最优的安排面前瓦解。可以断言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会被一系列的制度创新阶段标记出来，以回应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中的矛盾。

这三个命题提供了安排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议程的核心框架。就像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理论一样，它们并不是仅仅想要成为一种解释性的话语，而是想要指出存在于真实制度中的真实机制。

阶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命题

从基本的意义上来说，社会再生产的议题可以应用于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没有哪一种社会关系——不论是朋友关系、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性别关系，或者是阶级关系——仅仅是由于固有的惯性而持续存在于既定的形式中；通常会有某种类型的实践维护着这种关系。但是同样的，这些实践自身也被社会关系塑造着；它们不只是唯意志行动者不受约束的行动。这也许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元理论（meta-theoretical）观点：社会关系被社会实践再生产（和转变），而社会实践自身又被社会关系塑造。[①] 在这里，我们将关注再生产阶级关系的议题；在下一部分，我们

① 这个观点体现在马克思的著名格言中："（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人们参加能够转变社会关系的实践，但是在各种约束下，也被这些社会关系影响。

将讨论它们的转变。

社会再生产是所有社会关系的议题，但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再生产提出了不同种类的问题。由于其剥削特征，阶级关系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例子：由于这种关系，社会再生产成为一件特别复杂和成问题的事情，并要求对相当数量的资源、社会能量和制度设置做出配置。

阶级关系的剥削特征之所以使它们的社会再生产成为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有些关系中，某些人为其他人的利益而受到切实的损害。那些在其中有敌对利益产生的社会关系，有产生冲突的内在倾向，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会试图改变这种关系。[①] 会有积极的努力以改变这些关系，这种倾向存在的事实给再生产这些关系的实践增加压力；社会再生产不仅仅要反击这些关系随时间衰退或变动的趋势，也要反击挑战和抵抗的积极形式。第二，剥削赋予了被剥削者重要的权力形式。既然剥削依赖于对劳动成果的榨取，而人们通常会对他们自己的成果保留一定量的控制，那么通常当他们面对剥削者的时候，也至少有一些抵抗剥削的能力。[②] 因

① 有一些困难的（和模糊的）元理论议题被援引以支持这种论断，即断言剥削引起了"敌对利益"，并且这种利益反过来又有引起冲突的倾向。这个陈述所隐含的是，假设的利益对抗是客观给定的，而没有考虑行动者的主观理解。许多人拒绝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利益在任何有意义的情况下都是"客观的"。关系本身也许能被客观描述，但行动者的利益只作为主观意义而存在。无论如何，这个论断并不是说敌对利益自动引起了冲突，而仅仅是说敌对利益有引起冲突的倾向。这种说法和以下说法的实质不同还不清楚：即认为剥削关系有引起实质性敌对利益的倾向，而这种利益又倾向于引起冲突。

② 注意到这样一点是重要的，即人们并不必须接受"剥削"概念的规范化含义，以对劳动成果榨取问题的显著性以及引起冲突和抵抗能力的方式有所认知。这是关于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途径由成本转向组织的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对阶级和剥削问题特别是委托/代理这方面议题的讨论，见 Bowles and Gintis（1990）。

此，我们不仅仅有这样一种培育着敌对利益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些关系中的缺陷也为抵抗剥削提供了内在的权力来源。

给定剥削性阶级关系的这些特征，第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命题会预言：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稳定的地方，会有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设计存在以再生产这些关系。认识到这个预言随条件而定是重要的。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会一直保持稳定，而只是说这种稳定性只要存在，就要有行之有效的制度支持。因此，有一种准功能主义的解释在起作用；在它看来，阶级体制对其自我再生产提出了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会趋向于唤起解决方案的建构。尽管如此，并没有一种自我平衡的假设，即认为有效的功能解决方案总是会出现。的确，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再生产问题解释的中心关注之一，正是要研究社会再生产自我挑战、侵蚀和矛盾的方式。

这些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机制既存在于阶级关系的微观设置中，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宏观制度支持中。微观层面的关键问题是理解同意（consent）和压制在日常实践中，特别是在劳动过程中连接的方式。宏观层面的中心问题，则是各种机构——国家、媒体、教育——作用于阶级结构稳定化的方式。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探讨了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下面举几个例子。鲍尔斯和金提斯（Bowles and Gintis，1976）对教育的分析指出了学校的教育实践和孩子的阶级指向之间的功能对应性。他们指出，在那些最主要是由工人阶级的孩子参加的学校里，教育实践通常围绕于纪律与服从，从而便于这些孩子将来扮演在生产中被剥削劳工的角色；而为中产阶级或精英服务的学校则反复向学生灌输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他们更能够胜任生产中支配和管理的角色。

学校教育帮助解决了再生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使来源于不同阶级的孩子有效地扮演对应于他们阶级指向的角色。威利斯（Willis，1977）也对学校建构再生产阶级关系情境的方式做了探讨，但他的分析主要是关注抵抗的形式对再生产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起到作用的方式。布洛维（Burawoy，1979）对在工厂工人中“制造同意”的研究指出，工作组织和生产政制共同制造了对管理支配的同意，并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普尔泽沃斯基和斯普拉格（Przeworski and Sprague，1986）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的选举规则，将潜在威胁资本主义利益的工人阶级政治，导向了和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相一致的实践，从而为统治的霸权形式创造了条件。在这每一项研究中，都存在由抵抗资本主义剥削和支配的可能性引出的阶级关系再生产的问题。制度解决并没有同时取消这种可能性，但如果顺利的话，它们的确在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限制了这些抵抗。

资本主义矛盾命题

如果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关于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它会很容易被归入功能主义。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经常受到这样的（有时是正确的）指责：把所有的社会制度都看做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和保障资本家的阶级利益而做出的最优功能选择。对于阿尔都塞（Althusser，1971）关于意识形态和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3）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影响的研究，许多争论都关注的是，例如他们的观点所带有的过度的功能主义色彩到了哪种程度。[①]

① 对马克思主义里的功能主义解释问题的详细讨论，见Cohen（1978）和Elster（1985）。

资本主义矛盾命题避免了这种功能主义。它认为，阶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是内在不稳定和成问题的，一方面是因为再生产的制度本身会成为挑战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断破坏将要成形的功能性解决方案。

社会再生产制度随时间衰退的倾向也已成为相当数量研究和理论化的主题。奥康诺（O'Connor，1973）对国家金融危机的研究指出，用来压制资本主义的特定危机倾向和限制阶级冲突的国家开支模式是内在矛盾的，所以它们最终会唤起一场金融危机，从而要求某种制度转型。亚伯拉罕（Abraham，1981）对魏玛德国的研究指出，在魏玛共和国，不同阶级行动者利用制度机遇的适应性策略，最终使有能力再生产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的支配集团的产生，在既存的宪法框架下变得不可能。舒瓦兹曼（Schwartzman，1989）对葡萄牙第一共和国的研究表明，全球经济的脱节效应（disarticulating effect）使最终屈从于专制的统一的支配阶级的联合变得不可能。奥菲（Offe，1984）对“危机管理的危机”的分析揭示出，当国家需要更深地涉入生产领域以稳固资本主义再生产状况的时候，在国家机构内部发展起来以对付围绕再分配的社会紧张局势的理性形式将失去作用。法国规范学派（Aglietta，1979；Lipietz，1987；Boyer，1990）和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Gordon，Edwards and Reich，1982；Bowles，Gordon and Weisskopf，1990）的一些学者指出，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一种被称为“福特主义”的制度架构被巩固了，它使国家活动的特定形式与资本主义再生产模式和阶级妥协结合在一起。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的稳定和持续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这种制度架构激励着，却最终赋予工人力量以破坏这些制度维持再生产条件的能力，并导向

了“福特主义的危机”。

制度危机和革新命题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个核心命题是，社会再生产制度有效性的减弱将唤起制度革新的插曲，以特别回应已感受到危机的情况。可以预言的是，这些制度革新将趋向于保护资本家阶级的基本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解决方式对于资本家来说会一直是最佳的，当然也不是说资本家就此将永远不会被迫做出重要妥协以巩固新的制度。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通过怎样的过程，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问题新的制度解决方案被生产出来。詹姆斯（James，1988）分析了内战和奴隶制被破坏以后，南方种植园主如何面对阶级权力再生产的严重问题。他指出，在后重建时期（post-reconstruction era），美国南部种族化国家的建立，使在佃农耕作中劳动成果榨取的特殊压制形式的再生产成为可能。接着他说明了，20 世纪中叶佃农耕作制度的最终废除，如何为对种族国家的成功挑战打下了基础。爱德华兹（Edwards，1979）则指出，新的劳动控制的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以回应由新技术和劳动过程中的变革引起的压力。许多关于社会民主和新法团主义的研究，也可以被看做这样的分析，即“阶级妥协”的新形式如何制度化，以解决在面对经济危机时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再生产问题（Przeworski，1985；Pontusson，1992；Heller，1999）。

与资本主义矛盾命题合在一起，制度危机和革新命题的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可以用其内在的变革动力描绘出来。以此看来，它很像资本主义轨迹和命运的理论。但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雄心勃勃的历史理论不同，它并不声称制度变革的“间断性平

衡”（punctuated equilibria），正在走向某个可以被预言到的目标。可以被预言的，是资本主义和它的支持制度在面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衰落时的插曲式重组的形式，但不是说，这些插曲的积累就会有增加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趋势。①

五　迈向社会主义的规范化理论

如果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命运理论是有效的，那么一个详尽的社会主义规范化理论就不需要了。如果我们有恰当的理由相信：

（a）资本主义将最终变得不可持续；

（b）当资本主义变得愈加不能持续的时候，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制度支持也趋向于变得更加脆弱；

（c）随着资本主义可持续性的降低，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将越来越强大；并且

（d）那些在反资本主义力量中的人们的阶级位置意味着他们将毫无疑问地从生产的平等、民主重组中获益，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通过某种实际的、创造性的反复实验

①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比历史唯物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更像——而非更不像——是“进化”理论的一种形式。在生物进化论中，生物历史并没有走向某种命定目标的内在趋势。人类的产生不是30亿年前某种造物与生俱来的命运。物种演化的真实轨迹，不如说是被多种类型的动力过程和偶然事件共同决定的。历史唯物论预言了历史沿着某种特定路线的轨迹发展的一般趋势，因而更像是有机体的发展从孕育走向成年的理论，而不是进化论。对历史唯物论中的社会变革逻辑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见 Wright，Sober and Levine（1992）。

过程，某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会被建构出来。有志者事竟成；需要是发明之母。所以，如果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理论的断言是真的，也许一种实证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没有必要了，而这种理论会阐明它的规范化立场和制度性原则。尽管如此，一旦我们抛弃历史唯物论的乐观预言，就再也没有能够容纳这些论点的理论基础了。

当然，一种选择是继续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的传统。在这些传统里，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化面向主要被发展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压迫的理想化否定。

尽管这也许会提供给我们一个有价值的道德支点，但它却不会作为对现存制度的规范化替代模式而起作用。我们已经见证了若干试图在反资本主义革命之后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验，这些革命严重依赖于与“有志者事竟成”和“需要是发明之母”（这些论调）结合在一起的道德幻想。当然，问题在于，这种愿望所发明的不是对生产的平等、民主化组织。如果说，我们对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史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反资本主义不足以作为建构社会主义替代的充分基础。因此，除了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以揭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矛盾性再生产以外，我们还需要一种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以说明解放工程自身的性质和它的制度困境。这种规范化理论的发展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

就我们所知，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化理论的发展会有两个主要关注。第一，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透彻理解产生社会主义关系的历史尝试的困境与动力。它首先涉及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解散的理解。不管怎样，它们构成了尝试把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励的社会主义思想投入实践的主要经验案例。这些研究的

目的，部分是为了避免在将来重复同样的错误，但更基本的目的，是丰富我们对切实可行的解放替代选择的制度要求的一般理解。

第二，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对待对体现了解放原则的制度设计做出理论说明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对产生某种缜密的社会蓝图的幻想——这种蓝图可以被用以实践，并被某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实现。马克思本人确实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蓝图是难以置信的。但它更为系统地说明了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会推动真实制度的实际发展。这同时涉及思考出用以实现特殊解放理念的抽象设计原则，以及对把某些设计原则投入实践的经验案例的研究。我们把这种努力看做“想象真实的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理解国家社会主义

对于那些渴望埋葬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国家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形式，成了它的挽歌。对于他们，苏联共产主义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和极权主义危险。没有什么可被习得或重新发现。对于那些希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既然它已经声名狼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应该被避免的；或至少应该宣传这样的观点，即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无关；即使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也用不着它，除非它被看做一个消极的案例，一种对衰退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达。他们也想把自己和这个尸首分开。只有那些试图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且不是他们的全部，才有可能对其做认真的检验，并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持久实例中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如何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规范化理论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

三个论点的修正，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轨迹：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反社会主义挑战的加剧；以及朝向某种替代社会——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转变。

国家社会主义牵涉对剩余的中央再分配，这些剩余被“计划者”（planners）阶级从“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阶级那里占有。这种（擅自）占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必须以计划者对人们需求的更高认识的名义合法化（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背景下，当国家计划的中心任务是为基础工业化动员资源的时候，它将运作得相当有效率；而当中心任务变成在工业经济中增强生产力的时候，它则将面对越来越多的矛盾。

中央占有和计划导致了短缺经济，它的瓶颈在于供给（Kornai, 1980, 1992）。如果对于经济体系的全部要求仅仅是再生产——配置既定投入以获得既定产出，那么中央计划就是相当切实可行的，供给瓶颈也能被各种制度创新克服。那么从本质上来说，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失败所显现出的病态，和资本主义在面对需求瓶颈时产生生产过剩的长期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市场中各种形式的由国家产生的需求解决问题一样，国家社会主义也能通过各种形式的准市场机制克服国家计划的供给失败。①

国家社会主义没有能力克服的更深层次问题，在于它的动力

① 有大量文献讨论了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类似市场的实践——所谓“第二”经济或“黑色”经济——浮现出来以解决供给瓶颈的问题。例如，贝利纳（Berliner, 1957）、勒温（Lewin, 1985）对苏联的研究，斯达克（Stark, 1986）、塞勒尼（Szelényi, 1988）对匈牙利的研究。诺佛（Nove, 1983）对于苏联经济的全面评估可被列为最出色的研究之一。

特征，特别是它对在系统基础上创新的无能为力。为资源而进行官僚竞争不像市场竞争那样有激励持续创新的效果。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是长期的停滞和国家社会主义不断加深的可持续性危机。

国家社会主义还有激起对其连续性的挑战的倾向。因为合法性对它的稳定来说如此重要，国家社会主义在迫近的批评中极易受到非难：渗透到日复一日的实践中的主导意识形态转而反对统治阶级和政党国家，因为它们有负于实现所宣称的理想（Burawoy and Lukács，1992）。换句话说，国家社会主义被声称为是工人的国家，因而当工人无法再靠理想生存下去的时候，他们毫无疑问将起来反抗（Berlin，1953；Poland and Hungary，1956；Czechoslovakia，1968；Poland 1980－1；Russian miners 1989，1992）。最终，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如此具有戏剧性以致统治阶级丧失了进行任何可能改革的信心，而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资本主义。由于对任何形式社会主义的不信任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向某种资本主义的转变成了“自然的”解决方案。

当然，资本主义也有它的危机，有时是十分深重的危机，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它的崩溃。因为我们认为，正如葛兰西所说，资本主义发展出了扩展国家（an expanded state）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健全的社会再生产制度被说明能够有弹性地承受挑战，以及通过反复的制度革新过程回应危机。当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制度复杂性被热切期望并最初清晰显现的时候（考虑到期待产生公民社会的改革、试图创建参与制度的团结，和产生了有重要意义的第二经济的匈牙利），社会再生产制度却还没有发展成为羽翼丰满的上层建筑。这些实验没有被实现过，也没有稳定下来，

但它们手里却攥着民主社会主义的种子。换句话说，中央指导的国家社会主义造成了一系列替代性社会主义的民主特征，这些特征在不同时候引起了下层阶级的想象。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产生在一个更为有利的全球环境下，它也许就会避免那些刻画了这些政制特征的极权主义极端形式，并且顾及市民社会中更为活跃和开放的结社性生活（associational life）。面对中央计划的失败，它转而会产生出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有可能产生出更为连贯的社会主义反霸权设想。正如早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由辅助制度导向了组织化资本主义一样，在更为有利的环境下，国家社会主义也许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质性替代——资本主义——的提出发生在一个不断深入人心的信念背景下，即国家社会主义已经耗尽了更新或发展的能力。事实上，没有人相信资本主义的必然终结。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激烈的平等主义的替代景象看来不太可能靠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自然产生出来。当资本主义走入困境的时候，自然本能就试图去完善它，而不是废除它。如果马克思主义要使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变得可信，那么，给予这些替代以一致的和有说服力理论效力就是必要的。在这些条件下，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内容涉及对“真实乌托邦”的构想。这种“真实乌托邦”根植于真实的实践，并且体现了指向于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行制度设计。

展望真实的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者传统上最为怀疑，而且通常是极端地对立于任何有乌托邦色彩的思想。马克思对被他称之为“乌托邦社会学家”的人除了蔑视别无其他：他们的构筑梦想于天际，而不是

脚踏实地地为革命性转变而斗争。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构筑马克思主义需要超越于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性否定，而走向对替代模式的探究。就这些模式试图以各种方式体现传统的社会变革解放工程之核心价值——根本的平等，深入的民主，人道的共同体，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来说，它们就应该是“乌托邦”。但它们也应该是“真实的”，既然被展望的不是幻想，也不是纯粹的道德建构，而是能够有助于人类真实进步的可行制度设计。

为了充实这种想法，让我们较为详细地考虑这样一种乌托邦计划：无条件普遍基本收入保障（unconditional universal basic income grants）。普遍基本收入的想法由来已久，但是最近才又被人想起，特别是在有关欧洲的讨论中（Van der Veen and Van Parijs 1986；Purdy，1994；Van Parijs，1992）。提议出于多种名义：普遍基本收入；全民援助计划（demogrant）；公民股份收益（citizen dividend）。细节有所不同，但基本想法是相当一致的：每个公民都可以获得一份按月支付的生活津贴，数目（“贫困线”的125%）足以使其维持公认的体面生活。这份保障的无条件性表现在任何以劳动或其他形式作出贡献的人都能获得它，而它的普遍性是指它作为一项公民权利被每个人享有。基金面对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父母则作为未成年孩子基金的掌管者。

如果普遍基本收入准备就绪，那么大多数其他再分配转移将被废除——一般福利（general welfare）、家庭补助（family allowances）、失业保险、基于税收的养老金（tax-based old age pensions）——既然基本收入保障已经足以提供给每个人体面的生活。这就是说，在那些已经通过特殊化计划的大杂烩提供了慷慨的反贫困收入的福利体系中，由无条件普遍基本收入带来的网

络费用增长不会过于庞大，特别地还由于管理营业间接成本（adminstrative overhead costs）将会缩减（因为普遍基本收入体系并不要求信息的充分获得和对接受者行为的严密监视）。多种有特殊需要的补助金还将继续存在，例如残疾人补助金，但数目很可能比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要少。最低工资标准将被放宽或废除：没有必要用法律手段禁止低于生存标准的工资水平，如果所有获得实际上产生了足以自由支配的收入。

从激进平等主义的观点来看，普遍基本收入有许多非常吸引人的特点。第一，它极大地削弱了资本主义强迫性的面向。当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时候，他们强调了“自由工资劳动力”的“双重分离”：工人分离于生产资料，并因此分离于生存资料。这两个分离的结合迫使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维持生存。在这种意义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根本上是不自由的。无条件普遍基本收入打破了这两个过程的同一性：工人仍然分离于生产资料（它们仍然被资本家占有），但是他们不再分离于生存资料（生存资料通过再分配的基本收入保障而提供）。所以，为工资而决定工作变得更加是自愿的。比起雇佣者和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而必须为工资工作的工人之间的资本主义，甘愿的成年人（consenting adults）之间的资本主义更不易引起反对。通过增强工人拒绝雇佣的能力，基本收入产生了比通常的资本主义更为平等主义的真实自由分配。

第二，普遍基本收入很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中产生更为显著的平等主义。如果工人更有能力拒绝雇佣，那么相对于高度享受的工作的工资，令人讨厌的工作的工资也很有可能提高。所以，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结构将会更系统地反映不同种类劳动力的相对无效性（relative disutility），而不仅仅是相对稀缺性。这转而会

产生一种激励结构，促使工人寻求技术创新以消除不愉快的工作。技术变革因而不仅将具有劳动力节省偏好（labor-saving bias），而且也将具有劳动力人性化偏好（labor-humanizing bias）。

第三，普遍基本收入直接并极大地消除了贫困，同时并没有引起反贫困基金转移的病症。不存在污名化，因为每个人都得到了保障。在受益者和贡献者之间并没有被明确界定的边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和许多家庭会在边界两边来回地自由移动。所以，即使基本收入已经在某个水平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也不太可能有反对再分配的稳定大多数联盟形成，也没有由于转移合格的门槛效应引起的“贫困陷阱”。每个人都会无条件地获得这种转移。如果你工作并且赚取工资，额外收入当然是要缴税的，但税率是递进的，所以如果人们想获得自由支配的收入，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不会有阻碍的。

第四，无条件普遍基本收入是为一系列去商品化的照料（caregiving）活动规定价格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家庭内部的照料劳动，还有更大的社区内的照料劳动，市场很难满足对这些照料劳动的供给。虽然普遍收入自身不能转变这些劳动的性别化特征，但它能抵消一些特别是由妇女提供的不受薪劳动引起的不平等后果。本质上，普遍基本收入能够被看做一种间接机制，它满足了由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家务劳动工资”目标：即意识到照料工作是有社会价值的，是生产性的，并且应该得到资金支持。基本收入对于民主和社区的影响还不是太明显，但就基本收入扩展了各种不付薪自愿活动的范围来说，它却潜在地加强了社区中的民主参与并巩固了社区团结。

当然，关于普遍基本收入保障的实际可行性存在重大问题。两个问题经常被怀疑者提起：劳动力供给问题和资本逃逸问题。

仅当有足够的人继续为工资而劳动，并足够努力使生产出的产品和税收得以支持普遍保障的时候，普遍基本收入才是切实可行的。如果太多的人乐于仅仅靠保障生活［不论因为他们想要成为终日懒散在家的人，还是因为他们由于有足以自由支配的收入而对非收入生产性活动（non-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情有独钟］，或者如果边缘税率如此之高以致严重压制了工作动力，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定义“可持续的基本收入保障”，即它一旦建立，就会稳定地产生足够的劳动力供给以为这项保障提供必要的税收。所以，最高水平的这种保障就可以被称作“最大可持续的基本收入保障”。那么，经验问题就是这种最大可持续水平是否足以高到能产生上面所提到的有效结果。例如，如果最大可持续保障是贫困线的125%，那么它几乎不可能有使受薪劳动力产生不受压迫的自愿行为的效果，也不可能急剧地减少贫困。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最大可持续保障是贫困线的150%，那么普遍基本收入将极大地推进平等主义的规范化议程。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否能够发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经验问题，并取决于经济中工作偏好和生产力的分配。

除了劳动力供给问题，普遍基本收入在面对资本逃逸问题时也是容易受到批评的。如果高水平的普遍基本收入保障极大地增加了有讲价能力的劳动力，如果资本承受着支持保障的税收负担的重要部分，如果紧俏的劳动力市场急剧地抬高了工资水平而生产成本却不相应地降低反而提高，那么这恰恰就会成为普遍基本收入促成投资缩减和资本逃逸的例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真实且可持续的劳动力去无产阶级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实质上，可持续的高水平普遍基本收入的必要条件也许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对资本，特别

是对投资流动的强迫限制。那么，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也许是基本收入的规范化迷人模式的要求。但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在富余且高度生产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一个适当高度水平的基本收入能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相容。特别是在高福利国家（generous welfare states），为支持基本收入而增长的税收也许并不太多，而且资本投资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上层建筑的原因也意味着大规模资本逃逸并不可能。也许吧。

普遍基本收入不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图景的充分实现。它没有创造出对社会生产能力的民主控制，没有产生出激进的平等主义，没有消除生产中的支配，也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虽然它使剥削在道德上看来不再是那么令人讨厌的行为。尽管如此，它很可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它的规范化迷人特征推进着社会主义工程的一些核心目标。

普遍基本收入只是展望真实乌托邦模式的一个例子。其他例子包括罗默（Roemer，1994，1996）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可行形式的提议；通过在国家和次级协会（secondary associations）之间建立新的连接方式（Cohen and Rogers，1995），或者通过对公民在政治决策中被授权的协商参与的新形式进行说明（Fung，2001；Fung and Wright，2001），从而深化民主治理的各种创新计划；以及通过资产的有效再分配创造平等主义市场制度的建议（Bowles and Gintis，1998）。

所有这些提议以各种方式挑战了所谓不存在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流行观点。如果人们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在其生命周期里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厄运，那么这自身也削弱了这样的流行观点。但如果这样的信念落空了，那么阐明这些替代选择就是使之进入历史议程的必要条件。

尽管如此，展望真实的乌托邦不仅仅是挑战宿命论的意识形态策略。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再生产的矛盾性质，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些制度设计的某些方面也能潜在地成为社会改革实际工程的一部分。有多种可能的资本主义，这些资本主义有着对社会再生产的不同制度安排。对于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些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中，解放性制度安排的那些重要方面有可能被推行和坚持到哪种程度。虽然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的限制必然会使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任何一项解放性工程都变得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解放性替代选择的要素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实中被预想。[①] 展望真实的乌托邦因而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变革活动议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对超越资本主义命运的一种幻想。

换句话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是不提供确证的马克思主义（Hall，1983）。它用对真实乌托邦的设计代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终结”必然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议程的中心是明确阐述并广为散布替代选择——那些已经以胚胎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替代选择。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并不依靠那

① 解放的原则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预想，这样一个观点，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更为功能主义的看法背道而驰。从更为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重要的、可持续的制度创新在某种意义上都被认为是稳定和确保了阶级关系。比如，国家的一些制度变革可能使普通人的生活更为自如一些，但是这些至多是一些缓和剂，使得资本主义更加可被接受并因而更加稳定。那些有更为激进的表现、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替代选择的改革，或者是幻想，或者很快就被破坏和压制了。如果这种关于制度可能性的功能主义色彩更浓的看法被人们接受，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就几乎没有解放理想的空间能够即使以预想的形式被体现出来。

种会自动带来社会主义世界的运动必然法则，反而必须积极地传播那种会引起大众想象的真实乌托邦。这样的话，构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连贯的科学研究计划必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挑战资本主义缓解或嘲弄其替代选择的能力，并且为一种预想的政治提供基础。因此，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要成为科学，也要成为意识形态——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把真实的乌托邦嵌入具体的幻想，并推动人们走向集体行动。①

六 结 论

在这篇论文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思想能被组织为三个论题（broad clusters）：资本主义动力和命运理论——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矛盾再生产理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以及解放替代的规范化理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它敏锐地把握住了那个阶段的历史动力——资本主义转变世界、破坏先前存在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形式的不同寻常的力量，以及它导致危机和自我瓦解的固有倾向。资本主义这种自我瓦解的动力学逻辑被历史唯物论赋予了理论连贯性。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以胚胎的形式出现，但是只有在此以后才成为一个精致的、完善的理论框架，用

① 葛兰西（Gramsci，1971：125－6）谈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时说："（这种意识形态）既不是以冷静乌托邦的形式，也不是以学术理论化的形式，而是通过具体幻想的创造表达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幻想作用于分散化和碎片化的人们，使他们觉醒并形成集体意愿。"

以理解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周围的制度的新安排，这种安排抵消了其自我瓦解的倾向。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互为补充——一个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轨迹和最终命运，另一个则解释了资本主义沿着这个轨迹运动所遇到的阻碍。它们一起为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励的政党提供了基础，使他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就是克服这些阻碍——特别是那些体现在国家中的阻碍——并因此加快那个最终命运的到来。

只要历史唯物论仍然被接受，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必要亲切拥抱那种极大地超越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规范化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抛弃历史唯物论的中心论点——资本主义不可持续论和阶级斗争加剧论——那么发展一种规范化理论就成了构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既然资本主义的终点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固有的倾向，而社会主义的尝试又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那么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更加密切关注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仔细研究国家社会主义，以知晓什么应该被避免，而什么又可以被想象；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以资本主义真实制度为基础的真实乌托邦，以探究辅助制度自身潜在地孕育着替代社会萌芽的思想。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缺少规范化马克思主义会沦为对资本主义愤世嫉俗、悲观主义的批评，并最终导致在面对资本主义巨大再生产能力时的沉默。规范化马克思主义缺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则会落入对资本主义真实矛盾缺乏根据的、浮躁的乌托邦理想，也没有能力吸引人们的想象。只有通过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而构筑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看似的自然性和必然性才不至于使所有的替代选择都成为牵强的不可能之事。

参考文献

Abraham, David. 1981.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er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Althusser, Louis.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127 – 86).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Perry. 1976.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Berliner, Joseph. 1957.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90.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2),

——.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8. *Recasting Egalitarianism: new rules for communities, states and markets*. Volume III of the *Real Utopias Project*. Erik Olin Wright, editor. London: Verso.

Bowles, Samuel, David M. Gordon and Thomas E. Weisskopf. 1990. *After the Wasteland*. New York: M. E. Sharp.

Boyer, Robert.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Burawoy, Michael and János Lukács. 1992. *The Radiant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8.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Calrendon Press.

Cohen, Joshua and Joel Rogers. 1995.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Volume I of the *Real Utopias Project*, Erik Olin Wright, editor. London: Verso.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Elster, Jon.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els, Friedrich. 1978 [1880].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In Robert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pp. 683 – 717). New York: W. W. Norton.

——. 1988.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ung, Archon. forthcoming 2001.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hicago Style." *Politics and Society*.

Fung, Archon and Erik Olin Wright. forthcoming 2001. "Experiments in Empower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s and Society*.

Gordon, David,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ldner, Alvin. 1980.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1985. *Against Fragmentation: The Origins of Mar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all, Stuart. 1983.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In B. Mathews (Ed.), *Marx: 100 Years On* (pp. 57 – 84).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Heller, Patrick. 1999. *The Labor of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ames, David. 198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uthern Racial State: class and race determinants of local-state structur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191 – 208

Konrád, György and Ivá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ornai, János. 1980.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2 vol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Lewin, Moshe. 1985.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pietz, Alain.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 the Crisis in Global Fordism*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London : Verso.

Marx, Karl. 1963 [18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64 [1895].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 ~ 185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67 [1867]. *Capital, Volume 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67 [1894]. *Capital, Volume II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98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Verso.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0 [1947].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ove, Alec.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O'Connor, James.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Offe, Claus. 1984.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Pontusson, Jonas. 1992. *The Limits of Social Democra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oulantzas, Nico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zeworski, Adam. 1985.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dam and John Sprague. 1986. *Paper Sto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urdy, David. 1994. "Citizenship, Basic Income and the State." *New Left Review* 208: 30 – 48

Roemer, John E. 1994. *A Future for Soci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Equal Shares: making market socialism work*. Volume II of the *Real Utopias Project*, Erik Olin Wright, editor. London: Verso.

Schwartzman, Kathleen. 1989.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tic Collapse*.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Stark, David. 1986. "Rethinking Internal Labor Markets: New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92 – 504.

Szelényi, Iván. 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an der Veen, Robert and Philippe van Parijs. 1986.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Theory and Society* 15 (5): 635 – 655

Van Parijs, Philippe (Ed.) 1992. *Arguing for Basic Income*. London: Verso.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Farnborough, England: Saxon House.

Wright, Erik Olin.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1997. *Class Count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Erik Olin et al. 1989.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Wright, Erik Olin, Andrew Levine and Elliott Sober. 1992. *Reconstructing Marx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Younis, Mona. 2000. *Liber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South African and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esotta Press.

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安东尼·葛兰西和卡尔·波兰尼的互补合一*

后共产主义时代呼唤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要求它对社会这个不同于国家和经济的领域给予最多的关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述中。二人身世迥异，继承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却不谋而合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相似的批判和超越。葛兰西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扩张为特征。公民社会与国家相结合，既能稳定阶级关系，又为挑战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波兰尼认为，市场扩张威胁了社会，促使后者自我建设（或改造）成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以回应，从而孕育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萌芽。本文采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概念，用它来解释共产主义秩序的兴衰、阶级政治向认同政治的转变、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的过渡，和新兴跨国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阶级；社会；霸权；市场

在许多人看来，社会主义在现实和想象中所遭受的挫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消亡。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提供着最全面的资本主义批判，同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可行的替代制度。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的高龄保障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但漫长的时间也意味着有重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资本主义的重建来更新自己。作为一种理论传统，思想被认为是随着它力图了解、改造的物质世界而改变的。因此，每个时代都在改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以发展这个理论传统来解决时代的问题。本文旨在对发轫于20世纪中叶卡尔·波兰尼和安东尼·葛兰西著述中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做一概述。他们在理论上的共性不曾被预见，迄今也尚未有人做过考察。他们独立地从差别巨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相交于“社会”这个概念。殊途同归暗示了他们的发现是崭新的和重要的。事实上，这正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论

* 译自“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C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Vol. 31 No. 2, June 2003, pp. 193 – 261.

感谢 Gillian Hart, Malcolm Faribrother, Hwa-Jen Liu, John Walton, Sean O'Riain, 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Beverly Silver 和 Giovanni Arrighi 身边的学生们给予的评价、建议、鼓励和质疑。尤为感谢 Fred Block 不厌其烦地对本文的草稿进行阅读和评价，为我提供了波兰尼晦涩的文本，而且是他自始至终鼓励我写下和发展了这些和他对波兰尼的解读相左的观点。本文的缘起来自和我的朋友、同事兼合作者 Erik Wright 在共同探索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观点分歧。Erik 为了使我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以其独特的方式给予了我无数的批评性评论和新颖的范式。如果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话，这当然不是他的过失，不过，或许也并非我的错误。最后，我要向 Russell Sage 基金会表示感谢，是他们使我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来重写本文。

译者及单位：任政，密歇根大学。

题：处在国家和经济间的“社会”的进步既是发达资本主义经久不衰的保障，也是超越它的关键条件，正如社会的脆弱是造成苏联共产主义衰败的原因。后共产主义时代是凯歌高奏的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时代。后者正以惊人的效果败坏和瓦解所有可能替代它的制度。我希望能够揭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如何适应这个后共产主义时代的。

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向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正值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如火如荼之时，当时的经典社会学至少部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回应。马克思主义这个徘徊在世纪末知识分子前景上的幽灵，打下了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齐美尔（Simmel）和帕雷托（Pareto）建造原创性理论大厦的地基。俄国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全新的转向，从而再次迫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做出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社会学成为“自由世界”的捍卫者和抗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在此期间（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作为肩负消灭马克思主义这一新使命的一门新科学，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但是到了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随之而来的社会大爆发刺激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并把社会学拖入它自身的危机之中。80 年代，社会学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得以复苏。这就像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意欲走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消沉必须要借助于社会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支后裔都有不可归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和自主性。

从对抗走向和解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 20 世纪中叶基于涂尔干、帕雷托、马歇尔（Marshall）和韦伯著述的共性对社会学思想进行的综合，成功而有力地排斥了马克思的理论。[①] 在其晚年，帕森斯评价马克思的理论不过是过时的功利主义，其重要性完全限于 19 世纪。[②] 既然是根本上出了大问题，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了。因此，结构功能主义，这个被奉为救世主科学的帕森斯理论的经典象征，对马克思主义抱以全盘漠视的态度，不仅轻视它的死对头苏联马克思主义，连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也一并不理。

帕森斯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除有冷战意识形态的敌对原因外，还有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帕森斯的社会学，尤其是《社会系统》[③] 一书，关注的恰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欠缺之处。

---

① 参见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7)。帕森斯从韦伯、涂尔干、帕雷托和马歇尔的共性中衍生出了他的唯意志行动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我准备仿而效之，从葛兰西和波兰尼的共性中得出一种公共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过，帕森斯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而我正要发挥社会学的解放意义。

② 1965 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帕森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一次全会演讲中总结道：“卡尔·马克思很可能是理论影响仅限于 19 世纪的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他在知识史上的地位是稳固的。然而，若用科学的标准来评价理论家，他所属的发展阶段已被超越。今天，要在社会学中做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否定马克思以来一切根本的理论进展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可行的选择。”参见 Parsons, “Some Comments on the Sociology of Karl Marx,” In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 135。帕森斯所提的“马克思以来的理论进展”显然没有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思之后的发展！他发表演说不久，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就推翻了他自己的理论大厦。帕森斯给斯宾塞（Spencer）的评价应验到了他自己身上：现在谁还读帕森斯呢？

③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前者强调“社会”是一个自主的、无所不包的自平衡系统，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中根本没给“社会”留有一席之地。因此，两派根本没有可融合之处。帕森斯的社会学里没有经济和国家，而苏联马克思主义里没有社会。[①] 当时的美国，“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们正在为“社会”的稳定能力和自由民主制的固若金汤而弹冠相庆，而苏联的计划经济正在自吹能够无限扩大生产力，合理分配资源。两边都不乏持异见者：怀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把具有批判力的人文主义传统运用到阶级分析中，而布达佩斯学派（Budapest School）和克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则以黑格尔和早期的马克思反对极权共产主义。这些学者是真正的有先见之明的人，但在当时（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不过是两大阵营内鼓舞人心、协调一致的主旋律下微弱的杂音。两大阵营都将遭受震荡，先是社会学，而后是马克思主义。

就在社会学看来彻底埋葬了马克思主义之际，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复仇机会的到来。反攻并非来自垂死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却恰恰来自最难预料的地方，社会学的自家前院。社会运动（言论自由、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爆发在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粉碎了美国称霸下的和平时代。它们重新审视

① 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吸收“社会”的观念，帕森斯也发展出著名的 AGIL 模式，把调适［Adaptation］（经济上）、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政治上）、整合［Integration］（社会中）和模式维持［Latency］（支持价值观的家庭和其他组织）作为分离的制度领域。可参见 Talcott Parsons and Neil Smels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6); Talcott Parsons,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Theories of Society*, by Parsons et 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p. 30 - 84; and Talcott Parsons,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共识”社会学（“consensus” sociology），开始质疑社会学对美国社会过于乐观的估计，并复兴了一脉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这支马克思主义以《月评》（*Monthly Review*）杂志为阵地发展了许多新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不发达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英国的阶级社会史、德国的系统分析以及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学派。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年的社会学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敝屣，此时轮到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学彻底扫地出门。来自激进的、批判的理论的指责不容妥协：“共识”在社会学中是“虚构”的，就像它在社会中一样虚幻。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这位卓越的论辩家、《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辑更为激进。[①]不满于仅仅攻击外部敌人，他把矛头指向了内部敌人，试图清除马克思主义受到的一切资产阶级污染。他猛烈抨击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葛兰西和卢卡奇、萨特和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恶魔为伍，脱离工人阶级，缺乏革命远见。安德森坚称我们应该回到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开创的革命道路上。我已在别处专门论述，重新考察托洛茨基对苏联的论述大有裨益，但不幸他的论述偏离了发达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②] 托洛茨基基于对最为熟悉的俄国和苏联的反思，跟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否定了社会的真实存在（reality of society）。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贬斥推向了顶峰，但推翻这种贬斥的时机也由此成熟了。安德森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对抗共产主义

①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② 参见 Michael Burawoy,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ersu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 (1989): 759 - 805。

挫折和世界市场至上的重要概念工具。[①]

确诊了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埃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曾预言这场马克思主义的反攻。[②] 不仅如此，他还为遏制这场危机开出了有效的处方，即吸取批判性马思主义的精粹。社会学欲置马克思主义于死地的二元对立的“冷战”世界已被建设性的参与、和解取代。因为不再信任自己被打垮的基础，也不再信任衰败的福利国家，社会学把马克思主义重新吸纳到自身诸多领域中。吸取了20世纪60年代的教训，社会学在对社会的分析之外，恢复了对经济和国家应有的关注。复兴的经济社会学关注劳动的变型和堕落；政治社会学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或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特点；社会分层关注不平等问题和阶级的中心性（centrality of class）；文化社会学关注意识形态统治中的权力；比较历史的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和历史理论。在社会学的另一头，田野调查学者们（ethnographer）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当代的理论大师们，布迪厄（Bourdieu）、福柯（Foucault）、哈贝马斯

① 为庆祝《新左派评论》发刊一百期，佩里·安德森对葛兰西的“霸权”进行了长篇细致的剖析，指出了它的内在矛盾：高估了认同的重要性，低估了国家的压迫力量，忽视了国家的不同形式，害怕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到来而倾向于改革。安德森称，葛兰西理论的有用之处早就体现于考茨基（和卢森堡的辩论中）的改革形式或托洛茨基的革命形式之中了。他的文章最后以对托洛茨基双重权力论的敬意结束。尽管如此，他认为没有一个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先驱者发现了霸权和公民社会的联系，或把公民社会主题化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标志，因此谁也不能被视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参见 Anderson，“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00（1976－77）：5－80。

② Alvin 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70）.

（Habermas）以及女性主义和种族理论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经典著作被重新解读：涂尔干和韦伯成了解释统治的理论家、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甚至成了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被诋毁的他者，而是成了能为萧条委顿、支离破碎的社会学掘出活力的宝藏。虽然被借鉴使用必然削弱马克思主义批判力的锋芒，但它赋予了社会学新鲜的活力。[①]

当社会学终于逃出困境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它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共产主义的挫折、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取得世界支配地位，和抗议、革命的退潮。它们一起击碎了70年代以来留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乐观情绪。本文的论题正是要说明：当前，马克思主义的重生必须借鉴社会学的思想。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的配合必须是双向的：正如社会学曾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现

① 帕森斯等人可能会争论这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譬如，李普塞特（Seymor Martin Lipset）和贝尔（Daniel Bell）的著述。参见 Talcott Parsons，“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uthor，” i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edited by Max Black（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1），p. 362。确切地说，他们和帕森斯不同，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相当严肃的。1981年在对 *Political Man*（“Second Thoughts and Recent Findings”）的补充中，李普塞特把他的政治社会学称为一种“没有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依赖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假设”，包括阶级的概念。参见 Lipset，*Political Ma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1），p. 459。但是，他在系统地说明“意识形态终结”时，却认为美国社会已经解决了工业化的所有主要问题，因此，可以被当作是人类可以/应该达到的尽头，即使它本身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当代“马克思化”的社会学具有更强的批判性，尽管这种批判修辞掩盖了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前者对市场的关注忽略了生产，对各类斗争的时髦的兴趣遗漏了阶级本身，社会运动理论从对社会变迁的关注转向了研究集体行动原因的一般理论，而政治社会学对资本主义避而不谈，回到对公民身份和自由民主制的研究上。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社会学再次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

在马克思主义必须借用社会学中具有解放意义的“社会”概念。在30年的对抗之后［安东尼·葛兰西可能称之为“运动战”（War of Movement）］，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的战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葛兰西可能称之为“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此时的目的不再是击垮对手，而是在谋求与对方签订一份不平等条约。不平等的方向根据哪方吸收哪方而不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所在。当然，这两种混合体的共存既可互损，也可互益。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寻求借用社会学的批判意义。或许可以说，马克思本人就曾试图从黑格尔和圣西门那里吸收社会学思想，但他不可能有阐述清楚的“社会”的观念。正如埃尔文·古尔德纳的考证，社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最多只属于次要的概念。[①] 但是，古尔德纳引证的显然是两人关于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著述。后者完全是另一派景象。无论是《巴黎手稿》（*Paris Manuscripts*）中对异化的克服，还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反复强调个人只有在共同体（community）中才能全面地培养才能；无论是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倡导联合（association）的概念，认为在联合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还是从巴黎公社或《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提炼出对社会主义的具体设想；无论是在《资本论》（*Capital*）中提到的联合生产者（associated producers），甚

① 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Development of Theory* (New York: Seabury, 1980), chap. 12.

至是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中描绘的国家凋敝的景象——在所有这些著述中，共产主义制度的核心都存在某种社会的观念。马克思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欠缺是没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补充对社会的分析，而这个补充本可以使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设想更为清晰周密。补充这个分析即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曾几何时，当马克思主义确实在用社会学分析资本主义时，它却荒谬地以此举来哀悼社会的失落！我想到了两次世界大战间那些自觉吸收社会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这是一支面临双重挑战的被挫败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西方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俄国革命退化为独裁统治？在这双重任务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它的先驱们［柯尔施（Korsch）、卢卡奇］大量借鉴了韦伯和弗洛伊德的著述。但他们借鉴的不是后者的自主社会（autonomous society）理论，而是其统治和理性化的理论，即关于社会凋敝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挥舞着新的思想武器向第二国际机械马克思主义设想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一帆风顺的过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教条主义发起了进攻。法兰克福学派因时制宜地发展了一套资本主义理性/非理性和持久性的悲观理论。这种悲观的基调部分是来自德国社会学。

不过，还有一支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堕入时代的绝望，而是用大量的唯心主义思想（idealist thought）创建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其两大主要代表人物即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们二人影响深远，因为重视社会而显得特立独行。虽然其研究路径迥异，但都凭借对社会的探索保持了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和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最重要的是，“社会”是理解资本主义长盛不衰、没

有遵循马克思为之预设的规律的一个概念创新。藉此，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开始掌握社会的意义，而社会学对此却一直令人费解地毫无建树。①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不是一个可以跨越历史，通用于古代和中世纪、氏族体制和复杂体制、传统秩序和现代秩序的泛化概念，也不是一个由所有在形式上分开、功能上独立的制度构成的一个内部状态和谐、外部界限清晰的整体。葛兰西和波兰尼的社会是有历史针对性的。葛兰西的社会是指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般要放在它和国家的矛盾关系中才能理解。公民社会是指工会、政党、大众教育和其他志愿团体、利益群体的发展。所有这些团体都是在19世纪末的欧洲和美国大规模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新式的交通工具（汽车、铁路）、通讯媒介（邮政、报纸）和管理机构（警察）不仅把人与国家，而且把人与人联结起来。一方面，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以遏制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它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能够促进阶级斗争。

波兰尼的社会我称之为能动社会，一般要放在它和市场的矛盾的制衡关系中才能理解。② 虽然波兰尼对能动社会构成的说明

① Fred Block 在给我的评论中说："［你的论文］指出了荒唐性：社会学的传统竟然150年来都没有给出一个充分的或有用的'社会'的概念——而表面上，这却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② 必须说明我对"能动社会"这个概念的用法和 Amitai Etzioni 的《能动社会》（*The Active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是不同的。Etzioni 的"能动社会"是指"回应式的共同体"（responsive community）和"个人的需要"（individual needs）之间互相强化的平衡。这个概念是非常抽象的、空想式的，使人回想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概念。波兰尼的能动社会是对市场带来的堕落的一种反应。而 Etzioni 的反应什么也不针对，而是后现代秩序的一种固有属性。不过我们仍会看到，即使是波兰尼的社会也有空想的性质，他有时把它当作能够自行其是的行动者。

并不是一贯清楚的，但在19世纪的英国，能动社会包括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厂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和政党的初步发展。一方面，市场有毁灭社会的倾向；另一方面，社会以行动/回应来保护自己，制服市场。① 波兰尼认为社会具有本体，真实存在（reality of society），代表自己行动；而葛兰西则把公民社会看成一个斗争的场所。不过，他们都认为，"社会"占据了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国家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制度空间。其区别在于："公民社会"溢入了国家，而"能动社会"渗透了市场。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市场和国家对自我调节的社会（self-regulating society）的服从。这种社会即葛兰西所称的受规制的社会。

具备了这个社会的概念，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和社会学区别开来。第一，我已经强调过，"公民社会"和"能

① 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有交叉，但不一样。而且，葛兰西和波兰尼在使用中充满含混。我把"能动社会"的意思和"公民社会"相类比，指出它们有交叉性的做法已是相当放肆了。Berkeley Fleming 在一份未出版的手稿中再现了卡尔·波兰尼和迈克·波兰尼关于《大转型》手稿的部分通信。迈克试图把卡尔的"社会"理解为一个产生于历史过程，和市场分离的实体。只有这样，卡尔认为市场有毁灭作为市场前提的社会的倾向这一观点才能成立。参见 Fleming, "Three Years in Vermont: The Writing of Karl Polanyi'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unpublished manuscript presented to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Karl Polanyi Conference, Mexico City, Mexico, 2001）, pp. 20 - 21。波兰尼不断地提到"社会的本体"（reality of society），这证实了他对社会的看法：社会是不同于市场的自主的存在。我赞同 John Lie 的研究，认为波兰尼的市场不是嵌入在和市场分开的社会中的，而是被社会遏制的。同时，市场总有社会基础（social underpinnings）来保障交易，此即以社会网为基础的共识和信任。但是，社会基础和涂尔干的契约的非契约因素都不是波兰尼社会的意思。参见 Lie, "Embedding Polanyi's Market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 (1991): 219 - 35.

动社会”不是没有时间性的概念，而是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产物。事实上，“社会”在他们著述中的出现正好和经典社会学的诞生同时，从而戳穿了经典社会学标榜的普世性。这不是说在19世纪之前我们无法谈到“社会”，只是那个“社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在现代，“社会的”强弱、它的特殊结构，以及它和国家、经济的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结果。

第二，社会不是悬在自发的价值共识流中的一个自主领域。通过把社会特定为一个被政党、大众教育、志愿团体、工会、教堂，乃至家庭占据的制度空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关注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波兰尼）、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葛兰西）。虽然葛兰西和波兰尼没有特别强调，但是假设社会自身完整、和谐是错误的。相反，社会被各种微小的力量贯穿，经常分化或分割成带有种族或民族色彩的部分，分裂成具有性别特征的统治领域。我会在结论部分再来论述这个问题。

第三，尽管当今社会学已经借用了“公民社会”、市场的“嵌入”、“社会资本”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和有效的条件，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仍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稳定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条件。因此，如果说葛兰西的出发点是公民社会通过和国家相联结来建立共识、抑制阶级斗争的话，那么波兰尼则是从能动社会消除市场经济的去人性化作用出发的。但他们都止于一个问题：社会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使经济和国家都服从自我调节的社会。

第四，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采用并增加了社会学对功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反感。它将社会学自身的普世性主张、关于社会行动

和共同体的理论转变为批判的武器。由此，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和它的权力边缘化、潜在价值共识、互补的角色期待、平衡的自我规制，所有这些专门用来遏制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个人化和理性化描述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变成了对资本主义鞭辟入里的控诉。这点完全适用于埃特兹奥尼（Etzioni）和塞尔泽尼克（Selznick）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支持者。他们假设的“共产主义”和现实中的美国（甚至是美国的未来可能性）相差甚远。这成为一场对资本主义的大控诉。通过把市场和国家边缘化，社会学中社会的概念变成对社会主义的最初憧憬。简言之，就像社会学已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使其为我所用一样，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也在寻求用社会学来实现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

我在本文中揭示了葛兰西和波兰尼如何由不同的经历汇合于相同的思想，以及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互存分歧的批评是如何形成看待“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互补视角的。继而，我把两种视角汇合到一起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各个连续阶段、资本主义霸权和反霸权的模式，和世界秩序下资本主义的多种发展途径。在结论部分，我将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一个议程。这个议程归纳了关于社会的四个主题：第一，论国家社会主义的潜能、失败和余波；第二，论种族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中的断裂；第三，论社会和国家、经济、家庭的边界；第四，论社会跨越民族国家的扩张。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纪传史

把葛兰西和波兰尼相提并论或许有点奇怪。他们鲜被当作可

以并举的对象，甚至不被看做是有关联的思想家。[①] 葛兰西终身坚守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关注于列宁的权力和统治的问题。他的特殊贡献在于把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入政治理论的中心。葛兰西对社会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因而他和涂尔干、韦伯的关系易被忽略。[②] 对比鲜明的是，波兰尼则常和韦伯的经济分析相连，还把涂尔干的代表性概念——“社会现实”（reality of society）为己所用。和韦伯一样，波兰尼强调国家在形成、规制市场经济时的作用。现在，彼得·伊文思（Peter Evans）用“嵌入的自主”（embedded autonomy）深化了这套韦伯式的波兰尼理论。[③]

① 我知道有两个例外。Giovanni Arrighi 和 Beverly Silver 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时把波兰尼和葛兰西联系起来［从熊彼特（Schumpeter）那里得到了一些启发］。和世界体系论相仿，他们的综合排除了“社会”，这个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参见 Silver and Arrighi,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The *Belle époques* of British and U. S. Hegemony Compared,”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我会在第六部分再来讨论 Arrighi 和 Silver。另一个例外是 Vicki Birchfield。他发现了波兰尼的社会对市场的反应和葛兰西的政治统治和霸权式意识形态是互相补充的。参见 Birchfield, “Contesting the Hegemony of Market Ideology: Gramsci's ‘Good Sense’ and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6, no. 1 (1999): 27 - 54。

② 葛兰西对社会学宣称的能够发现社会规律的“科学性”是强烈批判的。他同样鄙夷那种认为社会是出离国家而“自治”的思想：“显然社会学所有的基本问题都不过是政治学的问题。如果还有什么是政治学所没有的话，那只能是一些假问题，也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参见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244. 有趣的是，在所有现代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或许是和葛兰西的观点最为接近的。虽然亨廷顿是保守派，甚至不用霸权这个概念，但他却不可思议地赞同霸权的力量。他对政治社会学遗漏了社会的政治方面、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非常不满。虽然亨廷顿没有参考葛兰西，但他从列宁那里借鉴了许多并不是巧合。

③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和涂尔干一样，波兰尼强调市场的社会基础，即涂尔干著名的契约的非契约要素（non-contractual elements of contract）和非契约式的社会（non-contractual society）。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认为，这套涂尔干式的波兰尼理论是在强调社会网络是市场交换的前提。[①] 另外，波兰尼关注交换领域而非生产领域，而且他经常忽视“大众马克思主义”（popular Marxism），所以他和葛兰西看上去更不可能有关了。[②]

所以，说这两位 20 世纪社会理论的思想巨匠毫不相关，我们反倒不会诧异。然而，更仔细地考察他们各自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的共性。他们都反对社会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著作中粗劣的“实证主义”。葛兰西把社会学归纳为一种粗劣的因果原子论，解释变迁的刻板规则；波兰尼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最经济主义的形式。[③] 我们会发现，他们对用来定义自身的这个“他者”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不过，两人“他者”的特征很相似，即，一种脱离生活经验和历史、缺乏阶级的集体意志、违背政治非决定论、不探索新思想和道德秩序的社会科

①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 - 510.

②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1944] 1957), chap. 13.

③ 葛兰西把最强烈的批评给予了布哈林（Bukharin）的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Popular Manual of Marxist Sociology*。此书在葛兰西看来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社会学”传统的最典型代表。葛兰西批判了它虚伪的客观性、经济决定论、所谓的经验规律的空虚本质、概念的抽象性，和其“唯物主义”方法从不结合现实的唯心色彩（*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419 - 72）。葛兰西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他也自称为“实践的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和布哈林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区别开来。

学。这就是他们对粗俗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共同控诉。

我试图以本文揭示他们的思想如何汇合，他们的分歧（一个强调政治，另一个强调经济）如何互补地促进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透过当时那些使他们表面上看来不同的论战，我把他们的理论重新放入他们的政治经历中。他们的著述总是像尸体般受到劫掠——最有用的部分被从产生其意义的环境中剥出来，移植到那些病入膏肓的理论中。我试图恢复他们理论的全貌和两套理论间的关系。这就需要考察影响他们平行的生命历程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他们和各种背景力量的遭遇和他们的理论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纪传不是背景资料的补白，而是理解他们思想整体的基础。只有确定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后，才能在下一部分考察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不同位置。

不同的身世

葛兰西和波兰尼不仅来自欧洲大陆的两端，而且来自阶级结构的对立两极。[①] 他们思想的最终汇合有力地证明了他们怀抱的人能超越身世的信念。葛兰西于 1891 年出生于撒丁岛农村的一个贫穷的大家庭。其父为下层官吏，在葛兰西七岁时因莫须有的小罪名在狱中失踪，把七个孩子留给了他的遗孀。葛兰西排行第四，自幼患佝偻症。由于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生活，而

① 葛兰西的生平，我参考了 Gluseppe Fiori 的 *Antonio Gramsci: Life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波兰尼的生平来自多方面，我用了三套选集中的文章：Kenneth McRobbie ed.,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4); Karl Polanyi-Levitt ed.,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0); Kenneth McRobbie and Karl Polanyi-Levitt ed., *Karl Polanyi in Vienna*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0)。

且对自己的身体畸形极度敏感，葛兰西从小就沉浸在书本和学习之中。然而，学业因为贫穷经常中断，转学成了家常便饭。这在心理和身体上是多么痛苦的挣扎！终于，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进入都灵的大学学习。他的大学生活是穷困、痛苦而孤独的。

波兰尼的经历完全不同。早于葛兰西五个年头，他在 1886 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上层的“犹太”（已皈依加尔文教）家庭。其父经营铁路生意有成，聚集了大量财富，并把钱投入最好的私人教育，聘请了许多家庭教师。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的波兰尼生长在一个出名的、浓厚的知识氛围中。当时布达佩斯一流的艺术家、作家和激进主义者都是其母举办的沙龙的座上宾。文化和教育对波兰尼来说都是轻而易举获得的。和葛兰西相较，何其天壤之别！然而，他们最终担当了相似的社会主义使命——一个在苦难中展开思想，另一个用思想发现了苦难。

波兰尼和葛兰西都受到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兄长影响，但他们参加的第一次政治活动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葛兰西像典型的南部激进知识分子一样，成为了撒丁民族主义者，把北部视为没有合法性的殖民国家。搬到北部工业城都灵后，他看到了那里星火燎原的工人运动，又在 1913 年见证了撒丁岛对来自农村的矿工们罢工的残暴镇压，他才开始认识到阶级的力量——北部工人和南部农民的潜在联合是对抗北部资本家和南部土地主日益勾结的必要条件。葛兰西放弃了大学学业，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都灵工人运动中。从他笔下奔腾而出的动人篇章是自由的代言人，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孕育者。

波兰尼早年的政治活动也有民族主义色彩。1908 年他还是

大学生时就成立了伽利略骑士团（Galilei Circle）。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旨在敦促匈牙利撕下封建的外衣，建立一个具有自由政治和现代教育的繁荣开放的资产阶级社会。该团的成员们，据波兰尼后来说有大约两千多人，试图复兴民族文化，并发起了工农扫盲运动。波兰尼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populism）兴致勃勃，曾在1914年短时间地加入民族资产阶级激进党（National Bourgeois Radical Party）。奥匈帝国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瓦解，匈牙利政权起初掌握在自由派手中，随后很快又归于激进却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波兰尼以局外人的态度反思了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事件，并于1919年7月离开布达佩斯前往维也纳。1919年8月1日，苏维埃共和国垮台。波兰尼憎恶无产阶级专政，但又认识到自由民主制有局限性，他走上了一条通往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虽然葛兰西和波兰尼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波兰尼比葛兰西更不确定），但他们对当时正统的德国马克思主义都不加认同。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相去甚远。他们执著地相信人类能按自己的想法创造历史。虽然他们的政治灵感来自俄国——波兰尼来自以农民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者，葛兰西来自受无产阶级支持的布尔什维克，但他们都吸收了当时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唯心论。

葛兰西着迷于正在进行的俄国革命。他写于1917年的名作《违背〈资本论〉的革命》（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即是对布尔什维克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力发展的历史规律的一曲颂歌——这些规律禁锢了多少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葛兰西的眼里，布尔什维克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他们没有把造物主的丰功编撰为僵死的教条……他们复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永恒的思想，它延续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唯心论，却在马克思那里被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外壳污染。这种思想不是把客观的经济事实，而是把人——社会中的人，相互关联的人，相互达成合意的人，在交往中（即文明化的过程）形成一种集体意志、社会意志的人——当作历史的主要生产者。人只有在能够认识经济事实（economic facts）、判断它们、以自己的意志改造它们后方可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①]

俄国革命使年轻的葛兰西投向了马克思主义——但不是那种科学教条主义，而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具体化的空想。这种空想捕捉了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的想象，激励起他们控制历史进程的集体意志。[②] 要注意，集体意志是由“社会中的人、相互关联的人、相互达成合意的人”形成的。这就是波兰尼后来暗示的“社会现实”（reality of society）。

波兰尼用相似的语汇表述了他的唯心论，但他的灵感来自神圣的匈牙利诗人安德烈·阿迪（Endre Ady）。在1919年的阿迪纪念日，波兰尼写道：“何谓真理？‘尽管有地心引力定律，小鸟仍能腾飞蓝天。它的腾飞不可归因于引力定律’；‘尽管有物质条件的制约，社会仍不断地向思想更崇高的阶段发展。它的发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 ~ 192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p. 34 - 35.

② 我在这里暗示的是葛兰西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定义：“既不是高傲幻想，也不是学术理论，而是对具体幻想的创造，把分散的人们的集体意志组织起来。”(*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26)

展不可归因于物质条件'。"[①]波兰尼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外壳的反对毫不弱于葛兰西。

> 从未有比相信人类历史是由独立于人的意志和行动的规律来支配的更为荒唐的迷信了。未来作为一个概念，被当作已在什么地方等待着我们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未来根本不存在。未来是被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不断重新创造的。只有当下才是现实的。不存在可以用来证明我们现在的行为合法性的未来。[②]

然而，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恰恰是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者——俄国民粹主义的真正传人，很快就被当权的布尔什维克消灭——引起了波兰尼的想象。民粹主义者的影响肯定是一个因素，让波兰尼把对市场的批判作为理论中心，就像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使葛兰西关注国家的问题。

他们都在寻找制度上的实例来具体体现“集体意志”，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找到现实基础。葛兰西寻找的是闻名遐迩的俄国苏维埃的翻版。他找到了都灵汽车业的工厂委员会。1919～1920 年，都灵工人控制了城市，但最终在 1920 年占领工厂的行动中败下阵来。身为《新秩序》（*L'Ordine Nuovo*）的编辑，葛兰

① 转引自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0。

② Karl Polanyi-Levitt and Marguerite Mendell, "Karl Polanyi: His Life and Time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2 (1987): 22.

西热情地投身于对这场运动理想的阐释之中。由于缺乏来自工会和社会党的更广泛的全国性支持，运动终于失败了。这场失败的实验促使葛兰西在此后的人生中不断反思，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两面：一面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另一面是需要一个能有效挑战这个霸权的工人阶级政党。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后来的意共总书记，葛兰西力图接触最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在节制派的“伪激进主义”和工会“失败的改良主义”之间取得折衷。

对波兰尼而言，虽然他一直有意疏远政党政治，但仍深受红色维也纳运动的城市社会主义的影响。该次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被奥托·鲍尔（Otto Bauer）理论化为“功能民主制”的运动追求赋权工人组织，加强工人阶级文化。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注释中评价维也纳的社会主义政权是“西方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文化成就之一”。[①]

> 受到维也纳体制保护的高度发达的产业工人阶级，在 1918 年兴起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道德与思想运动。他们经受了经济大混乱引发的负面效应，达到了未被任何工业社会的大众超越的水平。[②]

这里憧憬的工人民主制和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颇为相似，只是激进色彩较浅，持续时间更长。波兰尼本人只在工人大学教学期间和工人阶级有过直接的接触。1919～1933 年，他在维也

①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88.

②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88.

纳的大部分时间主要为《维也纳匈牙利新闻》（*Bésci Magyar Ujság*）和《奥地利财经报》（*Oesterreichischer Volksvirt*）从事关于英美和苏联的新闻工作。其余时间，他卷入了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反对冯·米塞斯（Von Mises）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公共论战之中。葛兰西对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促使他对国家进行批判，而波兰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形成了他对市场的批判。他们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摸索一条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将在他们的流亡途中逐渐展开。

流亡：研究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家

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奥地利革命失败的灰烬中升起，他们寄予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希望也旋即破灭了。这一打击对二人都是致命的。1926 年，葛兰西以叛国罪受到审判，被处以 20 年监禁。他在完成了《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这本使他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的大作后，于 1937 年死于狱中。对西方革命失败和法西斯崛起的反思促使他在俄国和法国革命的背景下分析西方世界。1933 年，奥地利法西斯掌权，使波兰尼无法再留在奥地利坚守社会主义观。他随即流亡英国。1940 年，他应邀赴美演讲。由于无法回到处于战时包围之中的英国，波兰尼在班灵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执教三年，开始写作酝酿已久的《大转型》。若把该书的副标题“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作为葛兰西狱中著作的副题，也是非常恰当的。

当法西斯中断了他们的政治、思想活动时，葛兰西和波兰尼的“社会生活”（the life of the world）也停止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发展已经终结，但他们的思想原创性仍在延伸。葛兰西在意大利被囚之时，恰好是波兰尼离开政界之日。1958 年，约在逝世

前六年，波兰尼回忆他的一生时说：“数十年来我远离社会生活……只是现在才开始获得成功。整整荒废了 30 年的光阴在无休止地等待，直到重新返回社会生活中去。”① 葛兰西的狱中生涯和波兰尼的流亡岁月并没有荒废。事实上，他们创造了 20 世纪最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这是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遭遇”。这次，葛兰西摈弃了青年时代的唯意志论，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意识形态，而是视为科学。他发现了一种更有决定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可能性的局限、阶级形成的限制条件、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对资本主义自发认同的起源。与之相反，波兰尼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巩固了他的唯意志论。波兰尼借鉴了马克思早期哲学的理论：资本主义破坏基本人性，把多样性的人转变为纯粹的利益计算者。② 和马克思对法国政治的分析相一致，他采取了当时乐观的正统学说——资本主义和民主制无法兼容。因此，世界必须在两个极端间做出选择：要么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制的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制）。③ 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他借鉴了资本主义具有危机倾向的观点，

① 转引自 Polanyi-Levitt and Mendell, “Karl Polanyi,” p. 12.

② 波兰尼曾明确表示他虽然尊重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中的永恒真理，但也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关注社会总体和人的非经济本质的马克思的基本哲学思想”相对比（*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51）。

③ 这个观点相当粗糙地表现在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之前的一篇文章里：“人类陷入了绝境。法西斯主义以道德和物质的倒退为代价提供了一条出路。社会主义通过走向功能民主制提供了另一条出路。”（“Marxism Restated,” *New Britain*, 4 July 1934）波兰尼不仅没有放弃这个观点，之后还用社会的概念对它进行了深化：“因此，社会的发现要么是自由的末日，要么是自由的重生。法西斯主义者顺从于废除自由，崇尚权力这种社会存在；社会主义者虽然屈从于权力，但支持对自由的要求。”（*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258A）

虽然他不认为危机是由过度生产或利润率下降造成的。[①] 相反，葛兰西拒绝考虑人类的归宿。他批判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两难选择，认为资本主义能像兼容于法西斯主义一样兼容于自由民主制。资本主义或许最后会遭遇危机，但这些危机不是致命的。它们至多只是提供了一个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空间。最大的可能是，它们成为资本主义重建自身的渠道。

虽然葛兰西和波兰尼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不同，但它对二人的重要性绝非夸大。这点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上尤为明显，因为正是法西斯主义促使他们探寻被它歪曲、破坏、吞并的“社会”的起源和作用。法西斯主义指引他们回到19世纪，看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遏制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倾向。波兰尼认为，这个“能动社会”具有自主性：社会把市场从其毁灭趋势下拯救出来，同时也束缚了市场，并可能超越和征服它。葛兰西认为，“公民社会”是把国家和日常生活进程相联系的一个新的

① 我对波兰尼第二次遭遇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Block的解释正好相反。Block认为，《大转型》是波兰尼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突破”。他认为，波兰尼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相对的自主经济的概念，转向了一个没有言明的、隐含的论题：经济关系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内。参见Block，“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forthcoming）。但是，认识到经济是由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实践所构成的绝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参见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Verso，1985）。而且，把波兰尼的理论简化为“总是嵌入的市场经济”，等于把他的成就简化为早在涂尔干、齐美尔和韦伯那里被更深刻地阐释的静态社会学。这样看待波兰尼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他著名的关于市场和社会的“双重运动”是不公平的。我将通篇论证，《大转型》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而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新发展，是与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完美匹配。

斗争场所。波兰尼对能动社会的制度构成没有做清晰的描述；葛兰西则用政党、书报媒体、大众教育和各种志愿组织填充这个制度空间。他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它脆弱的社会已被以密集、复杂的“公民社会”或“能动社会”为特征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取代，并且后者获得了更加发达、更有干涉性的国家的帮助和支持。

葛兰西和波兰尼摈弃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的繁荣萧条遵循线性进化规律、每个国家是依此排列在领头羊之后的观念。他们认为，国家、社会和经济有不同的特点和组合形式，因此资本主义应有不同的发展方向。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哪里的经济矛盾最激烈，哪里的生产力最发达，而是要解释通往自由民主制、社会民主制、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不同道路。他们都把美国归入单独的一类。葛兰西和波兰尼认为，每个国家的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中阶级力量平衡的回应，尤其是对代表普遍利益的某个“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回应。虽然国家社会是他们初始的理论单位，但他们非常关注民族国家间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他们都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际经济、政治势力带来的压力的一种回应。

葛兰西和波兰尼的全球视角并没有使他们忽视推动阶级运动的具体生活经历。葛兰西会把这种生活经历理论化为“常识”（common sense），其核心是代表了不同阶级解放潜能的“善识”（good sense）。波兰尼对各个被统治阶级生活经历的关注丝毫不少。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贡献给了各种形式的工人教育：从他的伽利略团开始，到在维也纳的工人大学教书，再到英国工人教育协会的全职工作。在工人教育协会任上，他敦促成人

教育应从工人阶级生活出发，并呼吁发展大众文化。[①] 与葛兰西一样，波兰尼认识到宗教的力量。不同的是，葛兰西猛烈抨击天主教令人窒息的影响，波兰尼则宣扬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各种潜能。

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犁与笔》（*The Plough and the Pen*），这本和他妻子杜可钦斯卡（Ilona Duczynska）汇编的匈牙利文学作品集中，波兰尼称赞了1956年领导布拉格之春的匈牙利早期民粹主义者和人文主义作家。波兰尼并非在谴责共产主义，而是要指出共产主义包含了通向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正如葛兰西的自由知识分子旨在把“善识”从传统知识分子控制的“常识”中解放出来，波兰尼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试图把共产主义的潜力从它的正统守护者手中释放出来。在20世纪的马克思理论大家中，葛兰西和波兰尼对知识分子发展大众意识的作用并把大众意识置于国家史、世界史背景下的关注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从未失去对社会主义未来可能性的关注。在这里，他们再一次显示了思想共性——经济应服从于“社会”，并受国家的监管。这里的国家是被动反应式而非主动干预式的，它的强制力已大为削弱。《狱中札记》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秩序，即葛兰西所称的“受规制的社会”的描写寥寥无几。但那场从工业生产中锤炼出团结精神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具有的持久影响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他在《新秩序》的文章和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极其类似——

① 关于波兰尼终生从事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记述，参见 Marguerite Mendell，“Karl Polanyi and Socialist Education，” in *Humanity，Society and Commitment*，pp. 25 – 52。事实上可以说，波兰尼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的先驱。

个人通过参与等级制的劳动分工而和生产的整个过程建立联系。[①] 同样，波兰尼受到了维也纳城市社会主义的影响。他称之为“功能民主制”，把它和源自19世纪社会主义的行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联系起来。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是波兰尼眼中的工业革命大英雄。欧文早就强调社会同是工人堕落和败坏的根源和出路所在。[②] 欧文基于“合作农庄”（Villages of Cooperation）和“劳动交易所”（Labor Exchange）的自给自足的工人社区的计划比葛兰西的工厂委员会系统还要早整整一个世纪。[③] 虽然工厂委员会和欧文的合作运动都没有成功，但它们激

① 涂尔干认为，“正常的”劳动分工通过把具体的劳动力和大目标联系起来而赋予他们意义和目的感，但他施加了限制条件：“为此，他不需要理解社会的广大领域；只要感觉到他的行为具有超越行为本身的目标就足够了。”参见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1893］1984），p. 308。太多的理解，在涂尔干看来是危险的，而葛兰西则认为具有解放作用！葛兰西看来，工厂委员会的意义在于几乎能够无限地扩大工人的知识视野：“这个最初的单元，即工厂，被视为制造了一种特殊产品的单位和行为。从它开始，工人开始理解更庞大的单位，直到国家本身……现在，工人成为生产者，因为他意识到了他在所有层次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从车间直到国家和世界。”（*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pp. 110 – 11）

②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pp. 127 – 29.

③ 欧文在新勒拿（New Lanark）和葛兰西在都灵的事业之间的可比性是需要限定的！新勒拿是欧文创造的，整个社区都围绕着他管理和拥有的工厂组织起来。但都灵的工厂委员会是工人运动的产物。欧文在他旨在减轻贫困和堕落的方案被议会否决以前，一直和富人过从甚密。他的想法带有保守的托利党的特点，因为后者向往的是和谐的等级制社会下的田园生活。随着他的思想转向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Ricardo）和马尔萨斯（Malthus）的学说的更激进的批判，他的方案和工人社区成为指引“社会主义”的灯塔。事实上，欧文主义成为对抗工业主义严酷性的一次真正的社会运动，虽然欧文可能反感任何阶级斗争的概念。参见 Robert Owen，*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 A. C. Gatrell（Harmondsworth，UK：Penguin，［1813 and 1821］1970）；G. D. H. Cole，*Robert Owen*（Boston：Little，Brown，1925）。

发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观念——即使只是昙花一现，却是引起工人阶级想象的一种新的道德和思想秩序。葛兰西和波兰尼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持久性，因此他们密切关注具体化的空想产生的动员力量。只有对资本主义的必然覆灭和日薄黄昏保持无上信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才会把工厂委员会或欧文制蔑称为乌托邦。

葛兰西和波兰尼对革命在西方的失败、法西斯的兴起和苏联革命的共同遭遇使他们成功地超越了悬殊的身世背景、迥异的政治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国家环境，独立地走向了相似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①] 他们都把社会主义设想为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后者是一个与经济、国家相离又相关的空间。他们都发现了社会，不过到此为止，他们的共性终止了。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和解释传承了极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谱系。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谱系

葛兰西和波兰尼致力于共同的事业——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反对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他们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以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应来自差别巨大的马克思主义谱系：一边来自列宁，另一边来自卢卡奇。列宁和卢卡奇的理论表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不完全突破——正是其不完全性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葛兰西和波兰尼都没有仔细研究过列宁或卢卡奇——葛兰西明确表达的是他对列宁的仰

①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葛兰西可能知道波兰尼，虽然他确实通过二手资料知道卢卡奇。参见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448。波兰尼于 1964 年去世，恰好在对葛兰西的研究兴趣复兴之前。

慕，而波兰尼本应该看出卢卡奇年轻时的著作有根本的错误。[①] 尽管如此，我在下文中建构的思辨性对话有助于突出列宁和卢卡奇的思想冲突——这一冲突被葛兰西和波兰尼各自构想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概念解决。这个对话通过把葛兰西和波兰尼置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传统的平行支系中而使他们具有可比性。所以，在我们转到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和波兰尼之前，我们先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开始。这些问题早已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有相当迷人耀眼之处。他揭示了三个进程是如何在时空上相重合的。在第一个进程里，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系统规律埋下了自我灭亡的种子。这是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通过去除人工技能和进行技术革新来改造生产，这样就会把工人排除在生产之外，从而增加失业人员储备，降低工资；最后，一方面引起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导致利润率下滑。危机接连不断，致使银行连连破产，直到剩下最大的（因此也是“最适合生存的”）资本家们。

进入第二个进程，随着危机深化，小资本家没入更同质、更堕落的工人阶级；财富集聚在社会的一端，而社会的另一头积累

① 波兰尼和卢卡奇是童年好友——卢卡奇生于 1885 年，比波兰尼大一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交际圈内。卢卡奇后来成为波兰尼母亲的文学沙龙里的常客。参见 Éva Gábor, “The Early Formation of Polanyi's Ideas,” in *Karl Polanyi in Vienna*, p. 297, and Ilona Duczynska, “I First Met Karl Polanyi in 1920,” Ibid., p. 309。在诗人 Endré Ady 的纪念仪式上，波兰尼与卢卡奇对“共产主义”的优点和缺陷展开了辩论。参见 Gyorgy Litvan, “Karl Polanyi in Hungarian Politics (1914 ~ 1964),”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p. 33。虽然他们在 1919 年的某个时候肯定都在维也纳，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密切合作——一位是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另一位是独立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着贫穷。因为无能控制危机，只能充当看客，资本家被视为无能多余之辈。阶级意识在日益壮大、日趋同质的工人阶级中增长。阶级的两极分化导致阶级对抗的激化：首先与单个资本家进行分散的斗争，然后发展成跨工厂乃至跨行业的工会联盟，最后在国家政治层面形成一个工人的政党。

第二个进程发展到顶点和第三个进程正好重合——资本主义的子宫内，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孕育成熟了。科技进步为缩短工作时间提供了基础，而垄断、托拉斯和国家所有制的形成提供了初步的计划模式。只差最后一步：夺取国家政权来实现共产主义秩序。换言之，社会主义是三个进程重合的一种完美构想：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阶级斗争的激化，社会主义物质条件的自发形成。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事实：三个进程没有出现，或者，至少没有重合起来。换言之，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除了三个进程在时空上的共生性。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制下选民权力的增强和革命势头的减弱，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通过着力于一脚的方式来平衡这个三脚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相信经济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到来，问题出在了社会民主派的改良主义上。她敦促形成一种以院外斗争取代选举政治的更加革命的政治策略。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抓住这次机会，她害怕会出现“野蛮状态”而不是“社会主义”。对此，考茨基（Kautsky）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最后的危机尚未到来。他主张在等待资本主义耗尽潜能的同时要耐心地建设工人阶级的力量。他把砝码放在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自我局限性上。伯恩斯坦（Bernstein）的看法与二人都相左。他反对卢森堡的革命主张，认为革命既不可能，也不适当。工人阶级不占据人口的多数；阶级结构并未两极分化，反倒由于中产阶级的出现而日益

模糊。此时，任何革命只能由少数派组织，而这个少数派最终必将颠覆革命的目标。他反对考茨基的自我局限论，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危机。伯恩斯坦侧重的是第三个进程——资本主义不仅自发地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而且正在变为社会主义。通过民主制必然的扩张，资本主义终将进化为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1899年首次提出之后，随着工会的壮大和社会民主党获取了选举实力，变得越发具有号召力。但是，这种逐步的改革也使该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和卢卡奇的著述都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都以各自的方式打破了后者宣扬的历史规律。一位是革命现实主义者，坐在俄国这座火山口上，夹在东西方之间，用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位是革命浪漫主义者，在奥匈帝国瓦解之时著书立说，被任命为命运多舛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公共教育副代表，用他的物化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论。列宁的著作回应的是俄国革命的成功，而卢卡奇年轻时的著作回应的是西方革命的失败。

从列宁到葛兰西

列宁在重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是最清晰的。让我们回忆一下三脚架的各支。第一，资本主义没有最终的危机。[①] 列宁

① 我在这里使用了许多列宁的基本文本。*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1899) *Collected Works of Vladimir Il'ich Lenin*, vol. 3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 House, 1960);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in *Selected Works of Vladimir Il'ich Lenin*, 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pp. 119 - 272;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7), in Ibid., pp. 667 - 768;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in Ibid., vol. 2., pp. 283 - 376;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1918), in Ibid., vol. 3, pp. 65 - 149; and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1920), in Ibid., vol. 3, pp. 345 - 430.

明白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不能持久，但他也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不平衡发展，它是如何把自己历史性地重构为一种垄断形式的。对内垄断和对外掠夺相结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必将崩溃的铁律不再成立。它没有崩溃，而是在走下坡路。马克思把早期资本主义的末日看做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列宁则认为，此时恰恰昭示了一个被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新时代的开始。

第二，阶级斗争不会自动激化。帝国主义制造了一批劳工贵族——大都市的工人，和资本家一起通过对殖民地的剥削促进共同利益。反殖民斗争在世界格局的边缘如火如荼，而在这个格局的中心，由于没有有效的先锋党，工人在形成工会意识后，就难有突破性的成就。此外，自由民主制对缓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模棱两可：它一方面创造了扩大阶级斗争的最佳条件，另一方面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迷惑工人（至少是暂时的）使其认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真正的选择。简言之，阶级斗争更可能发展为革命的地方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的那样，在最发达的国家。

第三，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创造社会主义的条件，尽管它确实创造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譬如也可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泰勒制（Taylorism）。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私有财产制的取代不能一夜之间成就。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毁灭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然后创造一种新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极端民主必将失败。如果像列宁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会进入最后的危机，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革命的工人阶级，那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不会自动建成。它只能是有意的、集体奋斗的结果。既然没有保证资本主义自动灭亡的

规律，列宁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由此他预见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列宁的表达方式使他的理论显得普遍适用。然而，正如葛兰西指出，列宁的理论在本质上只反映了他所生活的世界，那个生产力落后、“公民社会”羸弱的俄国专制政体。虽然列宁认识到民主制的策略意义、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但他没有洞悉西方对比俄国的鲜明区别。[①] 这留给了葛兰西来揭示：发达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也正是俄国没有的强势的公民社会是如何阻碍先锋党的使命的——公民社会如何协调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利益，如何加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力量来遏制革命趋势。总之，葛兰西把社会对革命的遏制作用表达成具体的命题，而在列宁那里完全没有社会的概念。

既然资本主义既没有为自己播下灭亡的种子，也没有必然地深化阶级斗争，也没有自发地创造新秩序的基础，葛兰西便把关注点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它们形成了一个包括国家和社会的相对自主的领域。葛兰西划分资本主义的标准不再是经济基础（早期的和发达的，竞争的和垄断的，自由放任的和帝国主义的，自由的和有组织的），而是根据上层建筑。由此，他使列宁潜在的洞见引起了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和扩张的国家紧密相关的公民社会是否发达。此即葛兰西的重大理论突破。

从卢卡奇到波兰尼

如果说列宁到葛兰西代表了马克思以降进入政治和意识形态

① 佩里·安德森详细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列宁，早就用霸权的概念来指称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对同盟阶级的领导。但用它来表示资本主义的统治是有独创性的。参见 Anderson，“Antinomies，” pp. 15 – 18。

领域的一脉，那么卢卡奇到波兰尼这支仍然植根于经济分析中，只是他们把重点从生产转向了交换，从异化转向了商品化。[①] 卢卡奇从马克思在《资本论》卷首对商品拜物教的著名论述出发，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才华横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市场交换掩盖了生产的核心，那里包含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秘密，也是剥削和阶级形成所在。生产规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具体经历。市场不过是一个媒介，藉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推向它的归宿：社会主义。与此相反，卢卡奇认为，商品化不是附带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过程，波及一切领域和阶级。资本主义的本质即把各种关系变成商品的过程。卢卡奇把该过程称为物化（reification）。更进一步，物化侵入生产过程，塑造了劳动本身，形成了一种（虚假的）阶级意识。一边是只顾眼前利益的资本家把资本主义逼入绝境，另一边则是被物化吞噬的工人看不清他们在共产主义中的集体利益。用卢卡奇的话说，虽然资本家主观上面对着不断威胁自身生存的宿命，他们却无法客观地认识其命运；而工人在主观上受到阻碍，（所以只是暂时地）无法认识到其客观的历史使命。

但是，这种革命的必然性仅仅局限于哲学领域。如果说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何以可能遏制革命势头的描述是残缺不全的话，那么卢卡奇对工人如何能够看透被物化的经历，把握革命机会的解释也是特例性的，缺乏说服力。卢卡奇笔下的产业工人只在体力劳动中被物化，他们的精神生活毫不受污染。他也描绘了不断

① 我这里是指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a collection of essays first published in 1922。卢卡奇在 1967 年为此写了一篇著名的序言，收回了他年轻时的“救世空想”（messianic utopianism）。

深化的资本主义危机，认为当危机能够阻挡资本主义发展之时，也就是把资本主义去魅之日。他提出先锋党在把共产主义观传递给工人阶级的同时也保护了党内干部免受物化。他的这些话延续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路，旨在消除物化理论的消极作用。然而，卢卡奇的努力不过是竹篮打水。他没能提出一个和他的物化理论相协调的、有说服力的革命理论，而物化理论才是他薪火永续的遗产。此后，法兰克福学派把卢卡奇理论的消极面发展成一种批判理论。该理论认为，即使当革命在“客观”上变得更有可能，乃至成为必要时，统治和工具理性仍会否定革命的主观性。

正如葛兰西对列宁的资本主义理论做了历史的研究后，指出了西方的特殊性和社会的兴起，波兰尼对卢卡奇的哲学理论进行了相似的历史研究。他考察了市场的历史、起源、再生产和衰落。这些考察主要是针对英国的，也附带涉及其他西欧国家。他揭示了商品化是如何通过否定土地、劳力和货币的固有功能而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土地的商品化威胁到农业和环境，劳力的商品化使工人变得无能而堕落，货币的商品化引起的资本不确定性致使现代商业不可能运作。波兰尼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延续只能通过构建“能动社会”来抵御商品化的毁灭性后果。卢卡奇的物化是同质性的、整体性的，除了一个同时既是历史的客体又是历史的主体的神秘的工人阶级，既没有抵抗的力量，也没有平衡的势力。和卢卡奇不同，波兰尼用能动社会来制衡市场经济。能动社会是由各阶级为免堕落而采取自我保护行动所推进形成的。它具有卢卡奇的工人阶级的某些神秘特征，同样兼为历史的客体和主体。然而我们会看到，积极社会也具有一些很具体的特征，它们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命题

波兰尼和葛兰西从迥异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达成了相似的社会的概念：社会既是资本主义矛盾的遏制器，也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场所。图 1 总结了其理论的不同路径。葛兰西和波兰尼能从迥异的出发点达成以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为核心的相似的理论框架，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突显真实社会过程的意义。这些过程把发达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并开始假定全球均衡而不是简单的国家均衡（national proportions）。本文余下部分将考察葛兰西和波兰尼到达这个未被注意的共同框架的不同道路，以及这两条道路是如何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起互补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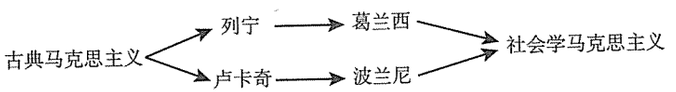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谱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命题将被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命题取代。在讨论每一个命题时，我们从葛兰西的表述开始，继而指出其不足，并揭示波兰尼可能如何弥补葛兰西的不足。

1. 我们不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为其自身的覆灭埋下了种子，相反，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能动社会或公民社会来抑制（但不能消除）资本主义走向危机和矛盾的趋势。虽然葛兰西把公民社会作为理论核心，但未能阐明它的起源，即为何它在有的国家出现，有的国家不出现。通过把社会看做对市场的一种回应，波兰尼指出了一种社会起源的理论。

2. 我们不再认为阶级斗争随着阶级结构的两极分化而激化，相反，阶级斗争要在能动社会或公民社会中组织起来。虽然葛兰西提出了令人信服的霸权理论，把霸权当作资本主义限制下阶级斗争的组织，但他没有反霸权理论。波兰尼虽未理解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但他把关注从生产过程转移到交换过程，为潜在的反霸权理论创造了条件。

3. 我们不再认为社会主义的条件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受到限制而自发地成熟，相反，社会主义是一项政治计划——使经济服从于自我调节的社会。既然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最后的危机，阶级斗争也不必然会激化，所以资本主义内部会形成不同的政治计划——既有社会主义，也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制。葛兰西认为三个因素形成政治的发展道路：历史传统、有机危机中阶级力量的平衡，和知识分子推进的国家模式。如果说葛兰西的理论集中于国家层面，那么波兰尼的回应市场理论则适用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摈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即每种生产方式的运作规律和生产方式间的线性更替——而是以在一个世界经济体中，多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和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共存来替代这些规律。不过，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所有形式的决定论。反而，它认为，经济的制度结构和政治体制限制了历史的结果。这种限制决定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正是本文余下部分的主题。下面三个部分各自讨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命题：第四部分讨论社会的起源和功能，第五部分讨论霸权和反霸权的组织，第六部分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每个部分，我们先讨论葛兰西，然后是波兰尼，最后再试图把他们综合起来。

社会：起源和功能

波兰尼和葛兰西二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分歧在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应根据能动社会/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不是经济形态来划分时期。波兰尼认为，社会与市场相抗衡；葛兰西则认为，社会是国家的一种扩张。他们都意识到社会是一种“有组织的”或“受规制的”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基础，它为资本主义内的世界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创造了新的可能和障碍。但是，这个“社会”来自何方？它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在此出现了分歧：葛兰西对社会的起源令人惊异地几乎只字未提，而波兰尼则把它追溯到市场革命，但他的这个观点建立在一系列值得质疑的假设和主张上。

葛兰西：公民社会的政治功能

葛兰西的狱中著作试图解释革命在西方的失败，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目睹了在都灵占领工厂行动的失败和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战后各种各样的工人斗争，葛兰西的理论关注不断地转向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义。他确认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兴起——霸权（hegemony）。

> 霸权在议会政体传统下的“一般”形式是一种强制力（force）和认同（consent）的混合。二者互相平衡，权力不能过高地凌驾在认同之上。事实上，要确保的是权力必须表现为基于多数人的认同。[①]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80.

随着认同范围的扩大，权力不会消失，只是隐退到看不见的地方。权力在幕后运作，只在对付个别的越轨者和预期危机来临时才被调动起来。[①] 社会学家把对制裁的恐惧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和“价值共识”所维系的社会秩序相对照，而葛兰西的霸权却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由此，认同不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维系社会的“自发的共识”，而是通过特殊的制度组织起来，并总是（也必然地）被权力潜在的实施支持。

很清楚，这种统治的新形式在国家的扩张（expansion）中找到了实证的制度表达方式。阿尔都塞后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包括教育、法律，还有葛兰西一笔带过的福利机构。霸权不仅是“政治的”，也是“公民的”。这说明，霸权不仅意味着国家的扩张，而且意味着国家向新兴的公民社会的延伸（extension）。后者是屹立在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的联合体。于是，葛兰西引进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分期方法。资本主义不再由经济类型来划分，而是看是否存在一个稳健的、与扩张的国家相联系的公民社会。

和国家相联系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标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同时期，而且标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同地域。公民社会只适用于“现代国家”，而不是落后国家或殖民地。[②] 于此，葛兰西区分了“东方”和“西方”。

> 在俄国，国家代表了一切。公民社会处于初始的、混乱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2. 为强调认同的重要性，葛兰西有时把统治的新形式称为“受强制工具保护的霸权”（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63）。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43.

的状态中。在西方，国家和公民社会有着本质的联系。当国家发生危机时，公民社会的稳健结构立刻显现。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它的背后竖立着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系统：不用说，其强弱需要因国家而异，但这恰恰产生了仔细考察每个国家的需要。①

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或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面临的是正面进攻，即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War of Movement），那么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即能够在掌握国家权力前逐渐占领公民社会“战壕”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

现代民主制的广大结构，包括国家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社团联合体，成为政治之道。它是阵地战前沿的“战壕”和永久的工事：它们只产生运动战需要的部分条件。而在过去，运动战是战争的“全部”。②

公民社会扑灭了任何直接夺取国家权力的企图，使革命变成需要重新组织协会、工会、政党、学校、法制系统等等的漫长的进程。运动战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革命”的政治策略，这种迅速、激烈地占领国家的形式，只属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

在没有大型政党和工会之前，可以说，社会从各方面来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38.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43.

看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农村极为落后；政权和国家权力几乎被垄断在少数城市，乃至一个城市手中（比如法国的巴黎）；国家工具相对不健全，公民社会有更大的自主性不受国家行为干预；军事力量和国家武装具有特殊的体系；国民经济有更大的自主性不受世界市场影响，等等。①

每当葛兰西谈到国家和公民社会，他都提到它们在阶级斗争组织方面的政治功能。事实上，从他的定义看，国家具有容纳任何制度的潜能：“国家是实践和理论行动的全部联合体。统治阶级凭借这些行动不仅能够证明、维系其统治，而且能够赢得那些被统治者的积极认同。”② 但是，他对功能的讨论忽略了起源的问题。这个新兴、稳健的公民社会和它与国家的密切联系来自何方？葛兰西在好几处暗示“生产的经济工具的不断发展”要求提高“最广大民众的文明和道德程度”，③ 但是具体的，造就这种壕沟、堡垒和工事新布局的机制从未被研究。就像大多数的功能分析那样，制度的出现是因为它们必须出现！

葛兰西没有探究现代国家扩张和延伸的一般机制，但他对一种特殊形式的起源深感兴趣，即国家吸收并规制公民社会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他的分析集中在法西斯主义的阶级起源上：第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43.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44. 在使用这个国家的功能定义时，葛兰西只是说公民社会的所有制度（家庭、学校等）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影响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再生产。当然，国家的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制度是有区别的，虽然这种区别在法西斯主义和在自由民主制下的形式不同。我们将在本文结论部分看到，国家制度和公民社会的界限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也就是说，界限随时空变化。

③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42.

一，没有农民起义；第二，排斥工人阶级的压迫型的农业社会结构；第三，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应对。[①]

葛兰西的参照点是法国大革命。革命中，雅各宾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利用了农民的革命力量。

> 因此，雅各宾派是发展中的革命的唯一一方。因为他们不仅代表了法国资产阶级个人的直接需求和理想，也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的革命运动。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同时代表了未来的需求；同样，这些需求不仅是资产阶级具体个人的，也是必须被同化为社会主流群体的所有群体的。[②]

然而，雅各宾派在意大利的相似角色，加里波的（Garibaldi）的行动党（Action Party）却是软弱无能、有依赖性，无力弥补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落后性。它没能发起本可把农民召集为一支革命力量的土地改革，没能率领资产阶级形成国家霸权，反倒陷入与在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中掌握了政治统治权的保守的温和党（Moderate Party）的竞争。以葛兰西比较的视角来看，这场国家统一运动是自上而下的，是一场消极革命

① 巴灵顿·摩尔在他对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权威比较中，把这些因素称为法西斯主义的诱发条件。民主需要的是独立的资产阶级和/或农民革命。然而，我们会看到，摩尔的理论具有葛兰西避免了的错误，即假定各国是独立发展的，假定现代性来到后的发展道路是不变的、预设的。而且，摩尔没有关于阶级利益、阶级形成和阶级同盟的精致理论，而这些都是葛兰西关注的中心。参见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1966)。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78.

（passive revolution）——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一场被认为是转型（trasformismo）的分子式进程。它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保护自由民主制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

消极革命的后果不仅是一个软弱的公民社会，而且是一场有限的社会主义的运动。由于缺乏革命传统，南部的农民被领主、牧师、教师和官员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禁锢在封建钳制之下。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北部产业工人的革命契机成熟时，他们却没有革命的盟友。他们无法把对工厂的占领扩大到都灵之外，不仅因为无法得到农民的帮助，而且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由南部地主阶级和北部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权力集团。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阶级斗争确实激化了，但这场政治危机的结果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者和之后的共产主义者失去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如果说他们还曾经有过控制的话），让位于把社会变为专制工具的法西斯主义。

葛兰西提出的是发达资本主义中，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比较史，而不是公民社会起源的一般理论。在研究公民社会起源的一般机制时，他用功能分析李代桃僵，即提出一种公民社会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尽管如此，这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性突破，是对列宁的国家理论的发展：首先，扩张国家的意义，使它不仅包括压迫工具，而且包括有积极意义的工具；其次，延伸国家，把公民社会包括进来。他发现了一种统治的新形式——霸权。它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意义和策略。虽然他没有霸权制度起源的完备理论，但他以阶级力量和阶级联盟为核心提示了一种思路。波兰尼通过把关注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从生产转移到交换，深化了这种社会的阶级起源论。

波兰尼：社会的经济起源

我们知道，波兰尼的参照点不是意大利而是英国，不是政治和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经济和市场革命，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而是国家市场的形成。然而，其理论的关键仍在于“社会”，更确切地说是“能动社会”。而且，能动社会的出现和葛兰西的公民社会在时间上正好是重合的。

> 在1879～1929年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社会发展成紧密交织的单位，把强大的破坏力暗藏其间……因为社会被用来满足市场机制的需要，所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制造了社会中积聚的冲突。①

市场经济需要能动社会。随着市场成为经济规制的主导模式，社会根据市场改造自己，成为市场的冲突和矛盾的排泄渠道。

> 不是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中，而是社会关系嵌入经济系统内……因为一旦经济系统基于特定的目的，确立了一种特殊状态，在不同的制度中被组织起来，那么社会必须被塑造成某种形式，以使经济系统能够根据它自身的规律来运行。②

但是对社会来说什么叫做让市场“根据它自身的规律”来运行呢？

这意味着生产的三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必须免于商品化。把劳动力简化为可以买卖的商品破坏了它鲜明的人性特征，正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劳动力的有用性。同样的，土地的商品化威胁到环境和农业，土地由此丧失使用价值。最后，货币的商品化会引发巨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危害交易过程。这里再三强调的是，把生产要素简化为交换价值损害了它们的使用价值。社会必须对市场制造这三种虚构商品的趋势做出反应。“此即这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特征［19世纪］。”① 是什么保证了社会做出反应？是什么促进了反对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我们是不是要再次回到葛兰西那里，用一种粗劣的功能主义来解释呢？是不是“社会的本体”（the reality of society）拥有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的力量来自发地遏制商品化呢？绝不是！社会加诸市场的限制是由阶级力量推进的，而阶级力量总有历史偶然性。

波兰尼用英国历史的特例来证明其社会的阶级起源观。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考察斯宾汉姆兰制（Speenhamland）。这是一种对工资进行补贴的初级福利制度，其后果是制造了一个具有依赖性、没有自组织能力的工人阶级。随着1834年斯宾汉姆兰制的废止，虚弱的工人阶级被抛入了市场的激流之中，他们不得不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奋斗。

> 如果说斯宾汉姆兰制曾阻止了工人阶级的形成，那么现在那些穷苦的工人在一种隐性机制的压力下正在形成一个阶级。如果说斯宾汉姆兰制下，人们得到的照顾丝毫不比珍禽

①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01. 同时参见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82。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57.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76.

> 异兽得到的更好，那么现在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而这么做成功的希望实在渺茫。如果说斯宾汉姆兰制意味着一种软性的屈辱，那么现在的工人在社会中彻底无家可归了。如果说斯宾汉姆兰制曾忽视了邻里、家庭和乡村环境的价值，那么现在的人已经疏离了家庭和亲戚，从他的根基和所有有意义的环境中分裂出来。总之，如果说斯宾汉姆兰制意味着静态下的腐朽，那么现在的危害则是通过暴露而直接死亡。①

工人阶级为了生存，就必须把自己组织成自卫的力量。“斯宾汉姆兰制的废除宣告了现代工人阶级真正的诞生。他们直接的自我利益决定了他们将成为反抗机器文明本质危险的社会保卫者。”② 这个曾经消沉的、昏睡的、没有判断力的工人阶级突然间自发地来保卫“社会”以对抗市场的冲击。

以此看来，一个有回应的能动社会的产生和诸如工会、合作社这样的工人阶级制度的产生，以及诸如限制劳动力商品化的工厂法案这些立法的产生是相关的。总之，一旦旧的社会组织遭到破坏，社会就会在阶级力量的颠覆性作用下进行扩张。不过，这些阶级力量是否总是保护社会的呢？读了波兰尼对英国的描述，读者或许会这么想，但是看到他的殖民主义理论，读者很容易明白社会的产生是要有特殊条件的。在殖民地，社会反应的无能引发了一场文化和社会灾难：资本主义之前的亲缘组织、邻里、职业、信条，或者说，一个本土的有机社会的所有形式都遭到了破坏。③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83.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01.
③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63.

殖民地缺乏能动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主权（sovereignty）。波兰尼认为，由于国家不独立，殖民地社会无法保护自己对抗掠夺成性的国际贸易和帝国主义。① 此即欧洲强国与其殖民地的重要区别。

现在我们看到葛兰西和波兰尼之间进一步的相似性。葛兰西根据公民社会的强弱区分了“西方”和“东方”，波兰尼也根据社会对市场的回应区分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他们的相似性延伸到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的起源上。这个问题即社会的两种病态——葛兰西看到的政治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波兰尼看到的市场专制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葛兰西醉心研究19世纪后半叶自上而下的意大利统一运动这种消极革命的结果；波兰尼关注的是消极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即斯宾汉姆兰教区福利制这种阻碍进步的父权主义（reactionary paternalism）。正如葛兰西所见，复兴运动不过是精英集团在操控农民，使他们牢牢地依附于封建等级制，18世纪末创立斯宾汉姆兰制的目的也是要把劳工束缚在地方地主阶级那里。复兴运动和斯宾汉姆兰制都旨在遏制革命（分别是在政治和市场方面），而且都需要对底层进行安抚。

他们的相似性还不止上述这些。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斯宾汉姆兰制，这种根据面包的价格，把工资压到最低限来补贴工资的济贫制度。由于有补贴，雇主为利益所驱必然只肯支付最少的工资，而让工人向教区索要余下的部分。这个制度不利于工人发挥能动性，因为他们的所得不再依赖于他们的表现，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去努力劳动。因为教区的资源不断被消耗，它们能够提供的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182 – 83.

“工资补贴”和维系的最低水平越来越不能满足工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斯宾汉姆兰制不但没有消除贫困、依附、救济和罢工，反倒促使它们大行其道。如果说这项制度的本意是要在劳动力市场下保护工人，那么事实上它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一切独立性。波兰尼毫不掩饰他对斯宾汉姆兰制的厌恶，不遗余力地谴责它是大众堕落之源，是反人道的罪行，刺伤了工人阶级的情感，并把他们拖入最糟糕的救济依赖下。在它的手里，“生存的权利”（the right to live）成了“一直到死的疾病”（sickness unto death）。[①] 斯宾汉姆兰制的腐蚀作用激发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汤森（Townsend）的自由信条，使他们把市场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正是这种对市场作用的乌托邦式的信仰支持了1834年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禁止了所有对不住在救济院的贫民的救济。

有趣的是，葛兰西几乎用了相同的语汇来谴责乡村的等级制度：麻痹农民使他们不会抵抗，顺从于一切传统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小官吏、牧师和意大利南部的大知识分子们。他把沉闷的乡村社区和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做了鲜明的比照，后者虽然受到剥削却能自由地推进历史发展。葛兰西把希望寄托于乡村和城市受压迫阶级的联合，而波兰尼则认为斯宾汉姆兰制的废除足以解放工人阶级。最后的结局是，复兴运动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而斯宾汉姆兰制则被市场革命一扫而尽。

综合：阶级和社会的起源

葛兰西和波兰尼都淘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为自己播下毁灭之种的观念。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01.

会引起自己的灭亡，而会创造一个社会，为资本主义的新形式（与社会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打下基础。图2总结了葛兰西和波兰尼的区别。葛兰西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缓冲了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受到的挑战。由此，他描述了资本主义内部从政治独裁转向政治霸权的一次转折。这个转折只发生在西方，没有出现在东方。波兰尼的能动社会遏制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在他这里，转折是从市场专制转向市场规制。这个转折只发生在欧洲，没有出现在欧洲的殖民地。政治独裁（法西斯主义）和市场专制（自我调节的市场）都是源自没能把底层动员起来的消极革命。葛兰西和波兰尼都认为，茁壮的“社会”是和动员起来的底层相关的。在此，我们遇到了他们理论的一个永恒难题：阶级和社会谁先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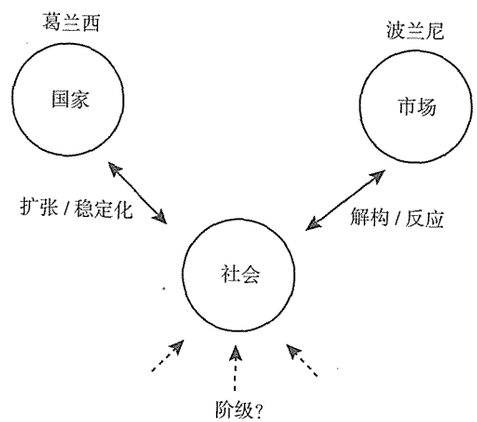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的起源和功能

葛兰西通过讨论公民社会的功能简单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联合方式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由此，我们还是不知道社会从何而来。波兰尼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

勇敢得多，但最终还是走进了死胡同。他关注的是社会的起源。他认为既然社会要自我保护来抵御商品化，那么它必然是阶级动员，尤其是工人阶级动员的产物。由此，问题回到了阶级动员的起源上。波兰尼是这样解释的：因为自我调节的市场威胁到工人的生存——他们除了身上的锁链外已经一无所有——以致工人能够克服自斯宾汉姆兰制继承的弱势来组织成为一个阶级。然而，这么一群无组织的工人是怎样如此迅速、自发地突然形成一个阶级的呢？为什么他们形成于英国而不是社会遭到市场破坏的殖民地呢？

波兰尼采用了一种过时的阶级形成观，即无组织的状态可以奇迹般地变成有组织的状态。他在著述之前没有读过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具有革新意义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①] 书中突出了在阶级形成中，工人阶级传统的作用，尤其是“英国自由民”传统的作用。阶级要动员起来需要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源”。它必须有能力。波兰尼的论述中，这些资源可能来自何处？最近的历史资料表明，波兰尼误解了斯宾汉兰姆制。他夸大了这个制度引发的灾难。例如，布洛克（Block）和索莫斯（Somers）指出，波兰尼被“自由信条”轻易地欺骗了。斯宾汉兰姆制并没有导致低生产力、低工资和道德堕落。[②] 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波兰尼的史实显示斯宾汉兰姆制的废除和工厂运动、宪章运动、合作社运动以及欧文主义的兴起并无关系，因为这些运动的大本营是在

① Edward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②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Social Policy and the Old Poor Law," *Politics & Society* 31, no. 2 (2003).

英国北部，而斯宾汉兰姆制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南方！事实上，说英国南北部的区别好似意大利南北部的区别并不牵强——在南部，意大利是农业封建制，英国是斯宾汉姆兰制；在北部则都是工业社会。工人阶级动员的推动力不是混乱和绝望，而是北部早期工业化的组织传统。

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纠正波兰尼的理论：工业化的背景，尤其是把劳动力商品化的企图，为阶级动员创造了条件。但是，这出戏的导演，乃至决定它是否上演的，都是此前已经存在的共同体（community）。英国工人阶级不是一块毫无抗御市场之力的白板。它早已嵌入共同体当中。正是共同体赋予它武器以自卫，并让它以阶级的名义推动能动社会的发展。玛格莉特·索莫斯（Margaret Somers）引人入胜的研究表明：事实上，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有赖于此前已经存在的“公民社会”，或者用她更常用的话说，是主要控制在底层手中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①] 索莫斯指出，参与式的民主制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出现，而当时英国的经济实为牧场农业而非耕植农业。在牧场农业下，政治控制授权给村庄，工人从法律系统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发展出一个权利社会，可以被看做阶级形成的先驱。工业革命引起的市场的扩张可能激励了工人阶级，但绝不是从头开始创造了这个阶级。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波兰尼的殖民主义理论呢？和英国的情况正相反，那里的社会完全无力抵御市场。为什么殖民主义比斯宾

① Margaret Somers, "Citizenship and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Law,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no. 5 (1993): 587 - 620.

汉姆兰制对阶级形成更有破坏性呢？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纠正波兰尼。波兰尼使用的是南非史，但他没有看到爱德华·罗克斯（Edward Roux）、杰克·西门（Jack Simons）、雷·西门（Ray Simons）和查尔斯·凡·昂色朗（Charles van Onselen）笔下的非洲人是如何挑战资本主义，防止自身堕落，和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市场的毁灭性不是没有限制的。非洲人真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当然，这个工人阶级不是从一片空白里长出来的。虽然殖民主义具有破坏性，但它没有把“高贵的蛮族”退化为“没有自尊或标准的一般生物、真正的人类垃圾”。①

殖民秩序不仅没能摧毁本土社会，反倒用积极的行动来支持这个社会。殖民者自身为市场对非洲社会的入侵制造了障碍。殖民统治力图保护本土社会，一方面是为了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政治的稳定。缩小的土地、和白人农民竞争的劣势（白人有各种价格补贴和垄断权力），更重要的是税收压力，迫使非洲人涌入城镇寻找就业机会。② 当他们进入采矿业（或其他行业）时，他们是以在城市受到居住权限制的个体工人的身份来出卖劳动力的。工资不够维持基本生存。低工资不仅为资本保障了廉价劳动力，而且迫使城市工人维持和乡村社会的联系。他们的家人在那里为他们补充了生存必需的物质资料。以种族隔离和间接统治为特征的殖民体系依赖本土社会的生命力来防止可能给种族隔离带来政治威胁的（最后也确实如此）工人们在城市聚集。如果说对利益和政治稳定的考虑限制了对社会的殖民掠

①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57.

② 事实上，非洲农民的利益可能在于深化市场的扩张，推动白人和黑人农民间的自由竞争，结束给予殖民者的保护。

夺，那么也正是它们为最终摧毁种族隔离的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从我们现在对英国和南非了解的情况看，我们赞同波兰尼和葛兰西认为社会和阶级是共生的思想（即二者互相需要）。但是，波兰尼认为是市场把社会从无至有地制造出来的看法是违背史实的。为了弥补其错误的社会历史论，他构想了一套错误的阶级形成论。这套所谓阶级是从虚无中形成的理论最终高估了工人阶级可能的现实成就。也就是说，由于忽视了组织传统的重要性，波兰尼不仅误解了阶级的起源，而且没有理解这些传统是如何塑造、限制和禁止阶级目标的。与之相反，葛兰西没有过多地困惑于起源问题，却对阶级和社会的共生有着更现实的（也是悲观的）理解。① 这个共生不是由市场干预的，而是由国家干预的。通过强调阶级、国家、社会的三足鼎立，葛兰西不再把市场看做一种物质力量，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要理解葛兰西的三足鼎立说，我们需要理解他的霸权的第二层含义。

阶级：霸权和反霸权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命题是阶级斗争激化论。阶级行动者和阶级利益是由和生产资料的共同关系决定的。为了争夺生产资料，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展开了日益深化的、不可调和的对

① 葛兰西也有乐观的、目的论的一面。他虽然意识到传统思想的保守力量，但相信知识分子如果具备了充满生机的马克思主义，就能够融解传统中“常识”的渣滓，把“善识”的无产阶级精华解放出来。

抗，而这种对抗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历史的引擎。葛兰西和波兰尼反对这种经济学家谬论（波兰尼用语），他们倾向用霸权的（第二种）概念（葛兰西用语）来解释。霸权在此处指的是社会把阶级组织起来的方式（包括阶级的含义、阶级的能力、阶级的利益、阶级的同盟）和具有变革作用的阶级斗争的潜力。他们虽然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会自动激化的理论，但都沿用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法（地主、农民、工人、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等等——都是根据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定义的），保留了阶级分析。不过，他们认为没有阶级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对阶级利益、阶级能力、阶级同盟等等也不做预设，而是让总的国家政治结构来决定。

葛兰西：霸权和生产

无论是考茨基、卢森堡、伯恩斯坦，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都赋予了经济结构一种自生的动力。事实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优点即是它为社会变迁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释，尽管后来人们发现这些理论其实好似形而上学。虽然葛兰西的著作中仍有目的论的痕迹，但他突破性地重新开始对复杂的历史情势（historical conjunctures）进行截面分析。如果有什么激发了他的灵感，那么一定是马克思对 1848～1852 年法国的政治局势的分析，即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Class Struggle in France and The Eighteenth Brumaire*）。葛兰西比马克思走得更远：他试图理论化的是社会变迁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而不是它固有的方向；是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种种机会而不是预设任何推动历史发展的引擎。

在“局势分析”这个标题下，葛兰西考察了各种力量的平衡，他称之为“力量的各种关系”。一方面，产生于经济结构、

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种种“社会力”之间存在某种关系。[①] 如其所言，没有人能改变“公司或是其雇员的数目，城市或是指定的城市人口的数量”。[②] 在经济领域里，不受控制的物质现实规定了什么是可能性的条件。如果没有工资制劳工（wage laborer），就根本不可能有工人阶级革命。另一方面，种种军事力之间也存在某种关系。军事力指的是：第一，严格的技术上的含义（即国家暴力的客观手段）；第二，主观含义上的军事人员的准备和忠诚。[③] 社会力和军事力构成了两侧的界限，种种政治力之间的关系在界内左右摇摆。葛兰西认为，这些政治力包括“各阶级的同质性程度、自我意识，和组织”。[④]

在政治方面，阶级形成可分为三个集体政治意识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团体（economic corporate）。此时，阶级成员在经济团体中为了本地的经济利益而行动。比如，工厂主阶级或工人阶级在各地的分支，像商会或工会。第二个阶段是经济阶级（economic class）。此时，整个阶级一起追求共同的利益，但仅在经济层面上。工厂主可能为了降低食物价格（如：通过废除《谷物法》），为了组织银行业，或仅为了增加政治上的代表性而斗争。工人可能为了争取在保护集体议价、最低工资和保险等方面进行立法而成立工会联盟乃至政党。

最后的第三阶段是纯粹的政治阶段，即霸权阶段（hegemonic level）。此时，一个阶级把本阶级的利益表达为所有人现在和将来的利益。这里我们看到了霸权意识形态的运作。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80.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81.
③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83.
④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81.

所谓霸权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有等级制的意识形态体系。为了成为一种有效的霸权力量，统治阶级或是潜在的统治阶级必须在经济上做出让步，以换取被统治阶级或同盟阶级的认同。但是，这些让步不能伤及根本，就资本家而言，就是必须保证利润无损。[①] 这里，葛兰西发展了“霸权”统治的第二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指暴力和认同的联合。这层意思把霸权和独裁区别开来。第二层意思指阶级统治的结构。这层意思用经过协商的利益让步取代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用合作式对抗取代零和式冲突。

除了上述两种霸权的理论含义外，还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霸权（资本家进行统治）和社会主义霸权（工人阶级和其盟友成为全体利益的代表阶级，结合暴力和认同进行统治）的区别。葛兰西对社会主义霸权只做了一些提示，我准备在下文中展开更详细的论述。只要谈到“霸权”，他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指资本主义霸权。在上述阶级形成的三阶段论中，他的例子全都来自资本家的阶级形成过程。事实上，葛兰西对阶级霸权的所有有趣的解释都是以资本主义霸权为前提的。亚当·普尔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资本主义中阶级妥协的意义——不仅协调了经济利益，而且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展开了一次深入的讨论和模式上的探索。[②] 香代·穆菲（Chantal Mouffe）揭示了霸权意识形态的灵活多样性，指出它其实是各异的因素带有等级的结合，而不是如通常设想的那样，宛如一块从天而降笼罩一切底层阶级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61.

② Adam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的密云。[①] 穆菲解释说，工人阶级无法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必须利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体系，扩展、发挥和评价其中最符合本阶级利益的部分。通过吸取社会正义、平等、民主等概念，工人阶级，或是该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深化了这些概念并使它们更加激进化。也就是说，阶级斗争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而是在霸权意识形态内进行的斗争。

这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葛兰西没有提出一个潜在的、自生的反霸权（counter hegemony）——也就是基于工人阶级的经历和利益的另外一种霸权。工人阶级是难以把自身的利益表达为一种普遍利益的。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家的物质资料，他们既要说服农民和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又无法对其盟友做出物质利益上的让步。所以，他们能做的一切只是宣称（许诺!）盟友的长期利益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霸权是一致的。再来看看霸权的制度基础，工人阶级的困难就更多了。资本家能利用国家把暴力和认同协调地结合起来，而工人阶级只有被称为现代巨头（Modern Prince）的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公民社会的战壕内推进平等、正义和民主。看看葛兰西是如何描绘的吧。

> 极权（totalitarian）政策的目的很明确：①保证某个特殊集团的成员能在集团内取得他们过去在各种组织中取得的一切，也就是割断成员和一切外在文化的联系；②摧毁一切其他组织或把它们吸收到由这个特殊集团独裁的系统中。[②]

①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edited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9), pp. 168 - 204.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65.

即使 totalitarian 用作“totalistic”即“无所不包”这层意思，这个要求对现代巨头来讲仍然高得离谱！葛兰西幻想在共产党内部或在其监管下，能够培养出一种替代政策，即民主的公民社会，希望藉此调和“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霸权。只要想到阵地战需要大量的牺牲和忍耐，它必须在公民社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进行，而且不能诉诸暴力，就能理解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多么难以实现了。

葛兰西确实也曾打破沉默，提到基于工人阶级特殊经历的另一种道德和思想秩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一种“反霸权”）。他说，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打破工人“继受自以往、不加批判地接受”而导致的“道德和政治上消极、顺服”的常识（common sense），发扬工人共有的善识（good sense）核心，也就是“对世界的实践改造”。[①] 在下面一段引文中，葛兰西罕见地、清楚地把生产领域作为社会主义霸权取代资本主义霸权的基础。

> 因袭主义（conformism）一直存在：今天面对的是一场“两种因袭主义”间的斗争，也是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是一次公民社会的危机。社会的老派知识分子和道德领袖感觉到脚下的基石已经松动；他们发现他们的“说教”真的仅仅只是“说教”了：脱离现实；只剩下言而无物的空洞形式，仿佛没有灵魂的幽灵。此即他们持反动保守倾向的原因；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文明、文化和道德的形式正在解体，他们就大声宣告一切文明、一切文化、一切道德的死亡；因为危机会引发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衰落，他们于是呼吁国家采取镇压措施，并组成脱离真正的历史进程的抵抗组织，试图用这些方法来拖延危机。另一方面，还在孕育中的新秩序的代理人，受到对旧秩序的“理性主义的”仇恨鼓舞，传播着不切实际的、想象丰富的计划。什么是这个新社会的参照点？是生产领域、劳动领域。最伟大的功利主义必须为这些将被创造出来的道德制度、思想制度，和将被传播的原则创立它们的理论。集体和个人生活的组织原则必须是生产工具的产出最大化。新经济力量的发展和新上层建筑的确立将解决必然存在的矛盾。而且，当一种新的“因袭主义”自下而上地创造出来时，这些新经济力量和上层建筑就会提供自我约束，也就是自由（包括个人自由）的新的可能性。[①]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333.

社会主义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解放相适应的扩大化生产，大致就像都灵工厂委员会那种。“正是在这些把工厂当作实物的制造者而不是利益的生产者的组织中，他（‘集体意义上的工人’）把自己习得的意识外化地、政治化地表现出来。”[②] 葛兰西认为，另一种霸权出自生产领域的这种想法是很正统、保守的思想。固然，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把工人退化为“分割的零件装置”，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工人如果认识到他们在本国和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就会意识到他们团结一致的潜力。在这潜力里，有工人常识里的善识核心，有经济分化中的社会底层，有为了从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霸权下把自己解放出来而斗争的反霸权。

然而，这种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足以激励工人阶级在公民社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42.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02.

会的战壕中联合盟友进行一场阵地战么？别的阶级不为生产中心论“所动”，这不正是工厂委员会失败的原因么？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工人阶级本身又何曾诉求过这种委员会的想法呢？难道这不是政治危机下，新兴的汽车工业中，技术工人统治下的一个特例么？一旦福特主义的诱惑赢得了赞美，那么这种生产主义就会被扑灭。虽然如葛兰西所望，意大利工人没有把福特主义信奉为一种新的更高形式的生产方式，反而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以造成经济瘫痪的罢工来反对它；但是，没有建立新秩序的意识形态，没有吸引盟友的物质让步，没有通过暴力和认同进行统治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怎能用自己的霸权替代资本主义霸权呢？如果说葛兰西使我们信服于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那么波兰尼是否发现了资本主义霸权铠甲上的缝隙呢？

波兰尼：社会利益和市场

虽然葛兰西厌恶所有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但无疑他也宁愿历史能以社会主义为终点。他对一切历史发展道路的看法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我们将会看到，波兰尼也是如此。在他欣赏的情势历史观中，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他对英国历史的密切关注和对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不同结果（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关心，足以表明他对任何的未来必然性的反感。在他关于斯宾汉姆兰制兴衰的随机论解释中，我们不难发现市场的出现并非必然。“自我调节的”市场只有在英国取得统治地位后，才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虽然各地市场的发展不平衡，但它引起了潮水般的各种回应和不同的政治对策，其中至少包括以后的社会主义。

不同于葛兰西的情势三要素理论（经济、政治和军事），波兰尼把分析的重点转到完全不同的领域，即他的三种虚构商品

（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商品化破坏了它们的本质特征。我们早已看到，这三种商品化的过程为动员阶级抵抗市场的腐蚀作用准备了条件。英国的工人就是以合作社运动、工会组织和宪章运动来反对把劳动力非人化的。通过几种渠道，工厂主被制止盲目地追求一己私利。在土地方面，以农为业的各阶级通过引入环境法和关税，保护他们在农业上的利益。货币则涉及每个阶级的利益。开放的国际市场下的浮动汇率制给商业继而是一切产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设立受中央银行保护的国家通货代表了国家的共同利益。

既然商品化为各阶级的回应提供了条件，那么当能动社会出现时，是什么把阶级切实地动员起来的呢？什么决定了阶级利益的组织形式呢？波兰尼有没有类似葛兰西阶级形成三阶段的理论呢？葛兰西认为，狭隘的经济团体乃至经济阶级的利益是阶级组织的受限制的基础，所以，波兰尼一再强调只是把“部分的”或“狭窄的阶级利益”动员起来不能产生意图的结果。[①] 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相似，波兰尼的阶级只有在保卫普遍利益时才更有效。不过，自此波兰尼和葛兰西分道扬镳。波兰尼的普遍利益并不是资本主义利益的代名词，而是代表了一种社会利益。“最后真能起到作用的是代表整体的社会利益（interests of society），虽然捍卫社会利益的任务有偏向性地、主要落在某部分人的身上。”[②] 由此观之，在19世纪的英国，代表社会利益反对商品化的是地主阶级。他们活跃在立法的最前线来规制工作日的长度，从而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反抗剥削。其他时期似乎又是工人

① See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p. 154, 156.
② See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62.

阶级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来捍卫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在抵制开放汇率时就是保护大众利益的先锋。阶级之间互相竞争以保护、扩张社会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利益。

波兰尼的理论假设是："阶级的命运是由社会的需要（needs of society）决定的，而不是社会的命运决定阶级的需要。"[①] 阶级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那么他们注定失败；但若为保卫、扩张社会而斗争，他们则更有可能成功。换言之，波兰尼认为，社会，而不是阶级，才是超验的历史范畴！这就能解释为何他如此执著于"社会的本体"，为何我们把他的"社会"称作"能动社会"。他用从"自在的社会"（society-in-itself）到"自为的社会"（society-for-itself）的过程替代了经典的从"自在的阶级"（class-in-itself）到"自为的阶级"（class-for-itself）的过程。社会主义只是意味着社会实现了它的潜能："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工业文明通过有意识地使市场服从于民主社会来超越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一种内在趋势。"[②]

波兰尼在这里明显地表现了目的论的意味！社会主义或许不是必然的，但"工业文明的内在趋势"为时不远。这使我们想起了爱德华·伯恩斯坦描绘的民主制必从政治领域扩张到经济领域的进化社会主义。但另一面则或多或少地暗示这一过渡并不会轻易发生，要消灭私有财产制绝非一个平坦的、没有冲突的过程。

> 从经济体系的角度看，它［社会主义］反倒和不久前的过去相去千里，因为它不再激励私人资本投资于生产活动，也不再认可私人有权处置主要的生产工具。[①]

① See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52.

② See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34.

波兰尼从未说明"和不久前的过去相去千里"的这种断裂将会如何产生。他未能对社会主义的过渡进行考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他没有理解阶级统治（domination）的力量。[②] 由于谈论的只是工业文明而非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波兰尼没有对拼尽全力反对废除私有财产制、迷恋追求利润的资本家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波兰尼看来，任何阶级都能把本阶级的利益表达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整体利益或社会利益。这种代表能力不是资本家的特权！换言之，波兰尼虽然讨论了表达整体利益的阶级概念，但为整体表达利益不是巩固统治的手段；这不是霸权。[③] 波兰尼说的

① 参见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34。

② 他的国家概念中也有同样的错误。他认为，国家在产生自我调节的市场时是有作用的，但是一旦市场建立，社会的回应就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成为监督者："社会保护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在现代，这个需要的代表通常是负责社会普遍利益的人，即今天的政府。"（同上，第 154 页）。这里根本看不出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也看不出这个"普遍"利益可能是"虚幻的"，实际上代表了资本的开明利益。国家反倒成了工具，成了"社会"的守护者。

③ 波兰尼确实好像在 *New Britain* 的一篇晦涩的文章中发展过"霸权"的概念："某个群体的利益没有魔力能够使利益冲突的大众跟随这个群体的领导……不是这个群体自身利益的力量使之成功的。事实上，成功的秘密不在他们自己，而在他们能够代表别人的利益（也包括他们自己的）。为此，他们必须有效地经常使自己的利益和他们希望领导的更广大群体的利益相适应。""Marxism Restated," *New Britain* 4 July 1934. 葛兰西也不会比这说得更清楚！这段话确实能给 Fred Block 的观点一些支持。他认为，波兰尼后来在《大转型》中从马克思主义偏向了一点涂尔干式的社会观。参见 Block,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是一种联合了所有阶级的共同利益或者说利益的偶合（coincident），而葛兰西说的是对立阶级利益的协调（coordination）。在英格兰地主阶级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和波兰尼的区别。他们都认识到当地主代表工人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时，他们表达了一种普遍利益。但是，波兰尼把这种普遍利益看做所有阶级共有的社会利益，而葛兰西则认为这是伴随资本主义而盛行不衰的资产阶级的开明利益。

> 工业文明缔造的阶级关系下，资产阶级并不会全力去反对旧的体制，而会保留旧体制的某些方面，好在其后掩饰自己的真实统治。①

波兰尼把“社会”（能动社会）视为各阶级团结的基础，而葛兰西则认为“社会”（公民社会）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工具。这种霸权极其强大，以致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须有一场艰辛、困苦乃至无法实现的阵地战。虽然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比像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极权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阵地战，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变成激进民主制的内在必然性。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通过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连接来运作，必须经扩大化的斗争转变为一种根本上不同的道德和思想秩序——即所谓的受规制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终点在他们那里是相似的——经济服从自我组织的社会——只不过葛兰西对它的实现更为悲观。

综合：斗争的基础——生产还是交换

葛兰西如此重视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以致他终不知霸权如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83. See also Ibid., pp. 115, 216.

何才能被削弱。工人没有必要的手段（物质资源或强制力手段）来进行一场有效的阵地战。他们的一件武器似乎是有机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和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可能发展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来促成对另一种霸权的集体意愿。葛兰西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必须基于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心，即生产组织。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已不太有说服力了。在一篇富有先见之明论述“福特主义和美国主义”（Fordism and Americanism）的文章里，葛兰西刻画了福特制下霸权是如何在工厂里产生的，而这和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落后性又有何关系。福特制被移植到世界各地，尽管开始时遇到抵制，但一旦它扎牢了根，立即成为认同资本主义的基础。生产从此不再能被当作（即使曾被认为是）某种反霸权的基础了。①

波兰尼或许并不理解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不过有意思的

① 进一步了解这个观点，请参见 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Giovanni Arrighi 和 Beverly Silver 给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资源（车间议价能力，组织或联盟能力）是解释过去一个世纪不同国家出现不同的工人阶级动员模式的关键。Silver 在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加入了波兰尼的思想成分，即资本主义总在盈利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间摇摆。盈利性危机加剧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堕落、工资下降、失业等），后者又反过来引起工人阶级保卫自身、去商品化的一场反运动（通过工会、福利国家等对工人进行保护）。他们假设劳动力的自发利益在于挑战资本主义——只要工人被逼到走投无路，或掌握了充足的资源，这个挑战就会成功。他们复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大胆之举却没有探寻什么是劳动力的利益，或更广一些，阶级利益是如何在社会中组织的（或如何被国家和经济组织）——这就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目标。参见 Arrighi, “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New Left Review* 179 (1990): 29 - 63, and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是，他为反霸权提出了一种更可信的解释。吸引所有阶级的不是生产而是市场过程。在工人眼里，市场是失业、贫穷、漫长的工作时间和血汗工厂的根源。在农民眼里，市场致使他们丧失土地，被迫沦为工资劳力。在地主眼里，市场贬损了土地的价值，引进了大量的廉价食品。在资本家眼里，市场的混乱无序带来激烈的竞争，威胁了他们的生存，而且因为全球化而愈演愈烈。妇女面临着家庭和工作中工作量同时增大的双重变化。人人都因为不受制约的市场而遭受苦难：环境破坏、全球变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自由时间被占用等等。然而，“反霸权”的阶级特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定义）能否成为组织反霸权的霸权力量？表 1 总结了葛兰西和波兰尼对霸权和反霸权的认识。

表 1　葛兰西和波兰尼的霸权和反霸权

	霸　权	反霸权
生产领域	1. 生产是组织霸权的场所 2. 资本主义积累是霸权的物质基础	葛兰西几乎没有反霸权概念：基于对另一种道德和思想秩序的幻想的、生产主义的视角
交换领域	波兰尼几乎没有霸权的概念：引起对资本主义弱点的幻想	1. 商品化是反资本主义的场所 2. 限制市场是普遍利益

葛兰西令人信服地说明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积累是资本主义霸权的物质基础，但他认为，生产，至少是生产的经验，也能提供反霸权的基础是错误的。和马克思一样，葛兰西认为，市场是附带现象，掩盖了资本主义导致旧秩序衰亡、新秩序诞生的生产核心。虽然异化的、堕落的工人可能是另一种效力有限的解释，但绝没有市场以多种方式关系到所有人的那种普遍性。所

以，是市场提供了反霸权的条件。这个道理处处可见，但在反对全球化种种伪善面具的运动联合中突现得最明显。[①] 从建设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看，葛兰西提出了霸权理论，但没能提出有说服力的反霸权基础；而波兰尼为我们指出了通往反霸权结构的道路，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这条道路上的障碍。

国家：世界秩序下的国家发展道路

至此，我们已经置换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前两个命题。命题一，资本主义不会必然产生自身灭亡的条件，反倒产生了遏制和吸收这种自灭趋势的社会。命题二，阶级斗争没有深化和形成两极分化，反倒在霸权范围内形成了斗争组织。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命题：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摧毁，它同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秩序创造出物质基础。葛兰西和波兰尼虽然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内发端，但都把这个过程看做有自我意识的组织发起的一场有预见性的政治运动。不过，预示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自发形成

① 如，可参见 Marcos Ancelovici 对“促进公民援助金融交易税联盟”的论述（ATTAC：the 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 for the Aid of Citizens）。该组织是影响许多国家的一个有名的反全球化运动。据 Ancelovici 解释，ATTAC 在法国是利用了一种反市场意识形态，即他所称的“反世界市场的政治”，来动员法国加入组织。通过法国政治这个明确的国家场所，我们更好地理解了 ATTAC 的起源和组织。在这个场所内，ATTAC 的目标是国家，但用的方法是刺激公民社会，建立 Ancelovici 所称的“联合的集权经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超国家机构威胁到人类社会，但其影响要由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结构来居间，因为后者仍然是有效地进行政治统治和重建的场所。换言之，波兰尼提供了 ATTAC 的意识形态，而葛兰西解释了 ATTAC 的政治形成和策略。参见 Ancelovici，“Organizing against Globalization：The Case of ATTAC in France，” *Politics & Society* 30，no. 3（2002）：427－63。

的，也不是必然出现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命题是其线性历史观的顶点。这种历史观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最先出现在产生新秩序的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它的条件成熟度依次进入社会主义。它们好似跑道上的飞机，按照严格的次序升入天空，每一个都以前一个为方向。正如马克思告诫德国人的名言“这正是你们的故事”（de te fabula narratur）——你们在英国看到的是你们的未来。[①]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摈弃了这种机械一致性，认识到经济和政治是独立发展的。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在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且每条路上又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政治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担任了扳道工的角色，把各国引向不同的道路。而且，每个国家处理危机的特殊方法都会重新形成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这点彻底终结了线性历史观——因为不仅没有单一的衡量条件成熟性的维度来排列国家，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共同组成了发展的引擎，而且发展的压力和障碍来自其他国家，也来自本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

上述这些对线性历史观的不同看法在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作中都能找到。他们反对（客观的。——译者加）目的论（teleology），

① 列宁和托洛茨基（更重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线性假设。从 *Results and Prospects*（New York：Pathfinder，［1906］1969）到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Pluto，［1936］1972），托洛茨基在解释资本主义的联合同不平等的发展是如何导致世界格局的边缘发生革命时是连贯一致的。一方面，俄国为了和经济更发达的国家竞争，过度赚取经济剩余，从而扼杀了国内刚起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俄国的资产阶级羸弱、有依赖性（受到外国金融资本支持），无产阶级好战，而且后者刚刚摆脱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就被移植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因此，要推动生产力发展就必须革命，而唯一的革命行动者就是工人阶级。总之，在西方，只有革命才能成功地推动经济发展。

但认为应该有 telos，即一个终极的主观目标，作为评价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标准。葛兰西的问题总是：给定国家的社会组成，什么是社会主义转型的条件？有多少可能性？显然，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发生这一转变。类似地，波兰尼根据对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各种替代方式所能提供的自由度来评价这些方式的优劣。不过，他们在一个方面确实不同。葛兰西把国家的发展道路看做由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结构所决定，而波兰尼则视其为经济和能动社会互相平衡（或不平衡）的结果。这一区别不仅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密切相关，而且和他们做比较研究关注的国家有关——葛兰西的意大利和波兰尼的英国。

葛兰西：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结构

我认为，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是他给资本主义分期和归类的基础。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公民社会羸弱，独立于国家实行自治；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公民社会得到最广阔的扩张。它通过扩张教育交通、邮政电信、警察系统、政党政治和大众传媒等领域把日常生活和国家联系起来。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公民社会达成“恰当平衡”的标准。法西斯主义是国家吸收社会、粉碎社会的自主权、规制社会跃动的怪胎。它抹杀了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界限。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后者有解散国家强制工具的倾向，它通过自我调节的社会以扩大自由。[①] 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照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各种发展可能性，不过它们是通过和美国、苏联的进一步比较得出的。葛兰西用三个原因来解释国家和社会的这些不同结构：①历史传统（过去的沉淀）；②阶级斗争催化的有机

①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 268.

危机；③民族国家相互间的挑战。让我们逐一来看。

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葛兰西把“美国”设想为一个经济发达、政治落后的社会。由于没有需要斗争的封建传统，没有必须由国家来组织认同的寄生阶级，美国能够有效地对经济和上层建筑进行合理化设计。

> 美国虽没有“伟大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也因此，无需背负这份沉重的负担。这是美国能够在让人民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仍能积累起巨大资本的主要原因之一（显然，这个原因比所谓的自然财富更重要）。历史没有给美国留下累赘的寄生阶级，使工业，尤其是商业，得以在一块健康的土壤上发展。①

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本是一种生产的组织方法，逐渐延伸到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葛兰西这样总结福特主义的特点。

> 巧妙地合用强制力（摧毁以地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和劝服力（高工资，各种社会福利，特别是微妙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就能比较容易地、合理地进行生产，使用劳动力。于是，整个国家成功地被用来为生产服务。霸权产生于工厂之内，只需要一点点专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干预，它就能运作起来。“大众”现象……只是这个“合理”社会采取的形式。这个“合理”社会中，“基础结构”更直接地统治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同样也被“合理化”了（被精简）。①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85.

当霸权通过暴力和认同的有效结合在生产中被组织起来时，公民社会替资本主义组织认同的作用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公民社会这条战壕也就不用挖得很深。美国经济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它对公民社会的需求小于任何国家。所以，或许我们真的可用“大众社会”的观念来替代公民社会了。

由于没有持异见的阶级需要组织，国家就永远不需要上升到霸权阶段，只需维持在能直接促进资本经济利益的经济合作阶段就可以了。② 事实上，因为工人还在忙于保卫他们的手工传统（在欧洲，这场保卫战早在18世纪就已发生），在美国争夺霸权的斗争甚至尚未开始。因为没有席卷欧洲的那种捍卫政治自由的革命斗争，美国工人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不仅如此，美国没有民族同质性，各种族和文化是相互混合的，还有黑人的问题。”③ 因此，葛兰西没有对发达的生产力能够起到解放作用抱有幻想：美国由于具备了超级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的立场看，它在政治上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要落后。不过，这些发达的生产技术并非一定是保守的。在充满阶级意识的意大利工人手中，尤其是在工厂委员会的组织下，福特主义可以用来产生社会主义的效果。

与美国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俄国：陷于封建传统和政治早熟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285 – 86.

② 这和美国史威斯康星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包括学派成员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Gabriel Kolko, and James Weinstein。

③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87.

的泥潭中的落后经济。在这里，社会主义革命替代了意大利的消极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在革命成功之后通过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主义霸权来建设。政党国家必须播下公民社会的种子，希望这些种子能在一片不毛之地生根发芽。对没有做好道德和思想准备的群体而言，夺取国家权力后就必须决定要在政治社会的外壳下建立一个复杂的、发达的公民社会，使个人无需自我管理就能够管理自己；因为自我管理会使个人和政治社会发生冲突，而不能成为它正常的延续和有机的部分。[①]

危险在于，这种革命后的“中央集权”会不受约束，成为“理论狂热”，或被当作是“永恒的”。[②] 这大概就是葛兰西对斯大林主义晦涩的批判吧。不过我们再一次看到，对葛兰西而言，经济因素不能以任何简单的线性方式限制政治的可能性。

目前为止，葛兰西对 20 世纪意大利、俄国和美国的分析看上去很像巴灵顿·摩尔的比较社会学。在摩尔的研究中，他通过把不同国家的历史和它们的结果（假设这些结果是明确的、确定的、互相独立的）相比较，解开了民主制和专制独裁的阶级起源之谜。[③] 不过，葛兰西以下的两步使他超越了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传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后者可以引发各种危机从而改变国家的政治形式。经济危机，在葛兰西看来，不过是传播其他意识形态的可能条件，和统治阶级用来重申其霸权的机会。[④] 政治危机或者说有机危机更加严重，因为它们往往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68.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68.
③ Moore, *Social Origins*.
④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184, 234 – 35.

是国家历史的转折点。[①] 阶级斗争引发的霸权危机有两种形式：要么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无法修复的裂缝，要么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达成灾难性的权力平衡。虽然意大利法西斯似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和劳动力的灾难性的权力平衡中战胜了社会主义，但并不总是很清楚葛兰西到底在指哪种霸权危机。[②] 有机危机或者说霸权危机是当传统和基础结构失去回应、坚持的能力，当未来展现惊人的开放性的时候的历史情势。这个时刻是真正可能走上其他发展道路的时候，是民主制可能让位于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时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可能让位于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

历史传统不仅会受到霸权危机的干扰，还会受到能够产生客观限制或新的意识形态的其他国家的变革的影响。[③] 也就是说，国家的历史不仅是一个隔绝、独立的“事实”，用来和其他事实一起解释影响政治结果的各种因素。它可能会改变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任何一次成功的国家革命后，都会出现他国统治阶级抵制革命在本国重演的“消极革命”时代——强制和妥协的新联盟成为时代秩序的反动时期。[④]

这也是为什么法国革命后，簇拥土地贵族上台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英国、德国、意大利，甚至在法国本土，从热月革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219 – 23.
② 用葛兰西式的理论传统，一些学者认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是统治阶级集团分裂的产物。同样，葡萄牙共和国的解体和萨拉查（Salazar）极权统治的上台是由各统治阶级的组织纷纷瓦解造成的（归咎于葡萄牙在世界体系中经济上的半边缘地位）。参见 Davi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Kathleen Schwartzman,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tic Collapse; the First Portuguese Republic in the Global Economy*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89)。
③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82.
④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118 – 20.

命开始直至1871年的巴黎公社。

> 只有在那时，争夺权力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打败了那些不愿承认旧社会已一去不复返的守旧代表，而且打败了那些坚持认为1789年大革命创造的新结构已经过时了的更加新潮的群体；通过这场胜利，资产阶级面对面地向老派和最新派显示了它的能量。①

换言之，1871年革命标志着大革命后的法国最终超越了消极革命，也标志着资产阶级霸权获得了巩固。

相似的，在俄国革命后，各国的反动阶级利用社会主义的威胁，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通过法西斯政权来巩固权力；而在那些现有权力平衡对该阶级有利的国家，采用的则是社会民主制，和美国实行的新政。虽然葛兰西对20世纪20年代末苏维埃政策转向中央计划体制和强制集体化的解释很谨慎，但这个过渡也能被解释为这个给意大利和德国带来法西斯主义的“消极革命”时代的一部分。②

不仅是政治威胁，经济威胁也在那个时代的世界上空回荡。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是受到传统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是能和建立在更合理的上层建筑之上的经济，尤其是美国这样毫无封建残余的经济展开竞争的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③ 受到惊恐的传统阶级支持的法西斯领导人，通过煽动对美国主义和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79.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20.
③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20.

现代化的仇恨来巩固其统治，以达到其一统经济、抵御国际竞争的目的。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正好相反，至少在葛兰西看来如是。他们根据福特主义把美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进步一面。因此，美国发达的经济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经济竞争，还带来了美国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后者在意大利被对立的各阶级拥护或反对。今天，当市场意识形态被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用来获取援助、刺激经济、疏导权利被剥夺者的愤怒时，美国主义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不再是福特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成为了相似的战场。

不总是统治阶级才会吸取或抵制外国的意识形态。葛兰西在早期著作中就指出，俄国工人阶级不需要经历所有阶段的斗争，他们完全可以直接吸取更先进的欧洲工人阶级的教训，借用他们创造的意识形态。俄国工人阶级可以跳跃意识形态的阶段，直接从英国工人阶级停下的地方开始。① 他们可以直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激励被压迫阶级的集体意志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已经掀起了抵制全球化的国际运动。“反全球化”即一种易于传播的意识形态。

虽然葛兰西有民族国家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世界观，但他的这个世界是没有自身的逻辑的。虽然认识到有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的集团可能是霸权式的，把世界组织成一种多维度的等级秩序，但是他尚没有和“国家间”（internationality）相对的“跨国家”（transnationality）或“超国家”（supranationality）的观念。在他那里，民族国家一直是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历史的和外来的力量的交汇处，是产生霸权危机的所在。②

①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p. 36.
②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p. 240 – 41.

波兰尼：对市场的不同反应

葛兰西提出了一个比较各国的模式，即把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追溯到各国的历史和情势中去，因为是它们提供了阶级斗争和未来发展的条件。他最后认为，历史没有潜在的、必然的发展道路：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理论不适用；阶级斗争是一系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随机产物。与之不同，波兰尼则通过摈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考察连续的时期内社会对市场的反应如何为阶级斗争创造条件，以此复兴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观。

>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概括那场形成了19世纪社会史的运动。一个角度是导致了深刻的制度对抗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护主义在组织原则上的冲突；另一个角度是与前一种冲突相交织的，把危机激化为灾难的阶级冲突。①

我们从对市场回应的角度来看看他的理论是如何具体发展的：首先是地方层面，然后在国家层面，最后在国际层面。

“19世纪的社会史是一场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的结果：真商品的市场组织得到扩张，同时，虚构商品的市场组织受到限制。”② 那么限制是怎么产生的呢？波兰尼大部分是在解释英国的例子。在英国，反对斯宾汉姆兰制的行动酝酿了自由主义的信条，后者把市场颂扬为通行于世的灵丹妙药。19世纪30年代的改革法案把市场无条件地解放出来，迫使地主阶级，尤其是

①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34.

②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76.

工人阶级尽其所能地自谋生路，从而阻碍了商品化的发展。市场一下子释放出来的阶级动员力量迫不及待地被投入到（重新）建设社会的运动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是有意的国家行为的产物，但后来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发开始的。自由放任主义是计划出来的，但真正的计划反倒不是。”① 工会组织、宪章运动、合作社运动和欧文制都是针对市场引起的大破坏的地方性回应。这些回应虽然开始时只是地方上的非主流运动，但最后都融入国家性的运动。

然而，这条历史道路只是针对英国，第一个国家市场的发源地。他用四页篇幅批判性地总结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区别。在欧陆，工业革命整整迟到了半个世纪。② 那里市场的入侵是渐进的，比较温和，因此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阶级力量的组合。英国的工人因为被剥夺了基本的生活资料而沦为工资劳力（如：由于圈地运动）。而在欧陆，工人则是因为金钱的诱惑而成为工资劳力的。因此，欧陆工人的地位要比英国高得多。他们形成了一股具有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促成了社会主义政党的早期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扫清了城市工人的视野。”③ 而在英国，工人对自己的命运仍然采取自愿的、自助的方法。“欧陆的工会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物；而在英国，政党是工会的产物。”④ 在阶级同盟方面，两地的工人也不同。在英国，地主阶级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反对资产阶级；而在欧陆，具有更高地

①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41.

②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p. 173 – 76。欧陆在这里主要指中欧（奥匈帝国和德国），部分观点也适用于法国和意大利。

③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74.

④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76.

位和尊严的工人阶级更可能支持工厂主来反对地主阶级。

正是在这里，波兰尼讨论了国家，这个他分析英国时放在次要位置的因素。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了。在欧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要比英国长，直到19世纪后期依靠政党代议制获得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后才最后成功。阶级力量在国家中的成形被反映到有利于工人的立法中：社会保险，劳动法，扩大选举权——都保护了工人免受市场侵害。只要看看海峡那边的情形，欧陆的工人就很清楚他们要避免什么。他们不像英国工人那样自己动手来建立社会，而是由国家代表他们增进社会的自我防御功能。在《大转型》第十四章末尾不起眼的几页里，我们找到了波兰尼和葛兰西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的分歧的历史基础。波兰尼的能动社会论反映了19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而葛兰西的国家向公民社会扩张的理论反映了19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尤其是意大利的国家行为。[①]

到这里为止，我们还只是讨论了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的限制，[②] 二者在19世纪后半叶发生多少都有些偶然因素。现在我们来看看国家通货兑换的限制。在自由贸易时代，浮动汇率制不

① Gosta Esping-Andersen 的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是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一次有意义的当代比较研究，广义地讲也属于波兰尼式的理论框架。Andersen 把自由的、社会民主制的，和保守的福利制度看做劳动力去商品化的不同模式。他根据制度传统、工人阶级的力量，和阶级联盟来解释它们的差异。和 Andersen 同时的葛兰西式的分析见 Claus Offe 的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 MIT Press, 1984）。此书以积累为出发点，把国家看做使劳动力重新商品化，同时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的工具，由此产生了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在 Andersen 的理论中没有 Offe 运用得好。

② 事实上，波兰尼没有详细阐述反对土地商品化的保护措施，只简单地提到保护国内农业的关税制度。

仅给商业而且给社会的每个团体都带来了一场浩劫。[①] 保护本国抵御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金本位制，成为一个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主要通过国家银行规制汇率来实现。随着国民经济受到的压力增大，退出金本位制的动力也逐渐增加。20世纪20年代全世界重申自由放任主义的严重结果是到了30年代各国陆续退出了金本位制体系。国际货币系统宛如纸牌房子一样分崩离析。那些要支付巨额赔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是最先的退出者。

任何一个退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必然会马上由国家来控制国内市场，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而已。美国新政以法律来保护土地和劳动力，苏联实行了集体化和中央计划经济，而德国和奥地利采取了法西斯方法，使市场和社会都服从于国家的管制。如葛兰西所言，国家走上哪条道路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取决于历史条件塑造阶级斗争的方式。在德国，各阶级力量的灾难性平衡，也就是葛兰西所谓的霸权危机，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

> 劳工进入议会，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资本家把工业当作领主的城堡，对国家作威作福……最后，当政治和经济面临全面瘫痪的危险时，时机就成熟了。恐慌钳制人民的理性。他们把领导权交给那些能够提出简便出路的人，哪怕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成熟的时候。[②]

国际经济传递了变革的压力，但是变革的形式是由各国在国

①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05.

②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35.

际经济中的位置和由各国特殊的危机下阶级力量的平衡所决定的。没有比美国和苏联更清楚的例子了。美国采取了新政，而苏联采取了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从德国的例子中也能看出这点。

波兰尼没有像葛兰西的三种“力量”（moment）（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和阶级形成三阶段那种对情势的充分分析，但他确实用市场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发展趋势和反趋势对变革和过渡进行了动态的分析。这对独特的矛盾，即所谓的双重运动，即是各国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根本所在。它使一切基于国家先发优势的线性历史观不再成立。

综合：国际新秩序？

波兰尼和葛兰西留给我们的是否一种对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情势分析呢？真的没有规制各国的国际秩序吗？在这点上，波兰尼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启示，因为葛兰西的理论是牢牢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大转型》的开篇即铺开了一幅19世纪世界秩序的画面。这个秩序由四个互相关联的部分组成：自我调节的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象征金融资本统治的金本位制，和一个世纪以来阻止了大战爆发的力量平衡。然而，这个秩序在20世纪崩溃了。在阶级斗争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压力下，自我调节的市场被受规制的市场取代，自由主义的国家被干预主义的福利国家取代。在旨在抵御货币价值波动的国家保护主义的压力下，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土崩瓦解，同时结束的还有旧的平衡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围绕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的新的权力平衡。波兰尼在1944年表明，他希望民主社会主义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秩序的主流。虽然他的希望没有完全实现，但战后初期确实为左翼提供了机会。他们虽然开始受到排挤，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了复兴。六七十年代以后，世界的发展趋势

再次倒退，重新把波兰尼提出的19世纪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当作未来的蓝图——至少主流的愿望是如此。

波兰尼若是在世，必然百思难解。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市场意识形态的溃败是永久性的——那时已经普遍认识到如果要遏制市场的破坏力就必须对它进行规制。“从未来看我们这个时代，这将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终结时代。”[①] 波兰尼错了。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把市场理想化是政治统治的一件利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都是一种虽然不光彩、却不断被复兴的意识形态。自由信条的复生会产生怎样的回应呢？我们先来重释一遍波兰尼是如何解释自我调节的市场引发的一系列反应的，看看它们对未来预示了什么？最后，我们将对比一下波兰尼的乐观想法和葛兰西的悲观想法。

我们知道，波兰尼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引起各国的不同回应的解释可以看做一场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国际层面的运动。市场革命首先爆发于英国。为保护劳动力免被商品化，社会以自发的壮大来作为回应。虽然这些回应可以联合起来成为国家层面的运动，但它们都植根于地方。对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第二轮回应是在19世纪，主要发生在欧洲大陆。这轮回应以国家规制为内容，不仅包括福利法案，还有保护农业阶级的关税和土地法。摧毁国民经济的金本位制促发的第三轮回应是退出国际经济体系，满足于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今天虽有迹象显示国家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但绝没有20世纪30年代重申国家规制和计划经济时的规模，无论那种规制到底是建立在社会民主制、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

①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42. 我再次想到了帕森斯在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正在复兴的契机上试图把它完全划入19世纪——无论在世界何地。分别作为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信条和马克思主义都不会在资本主义之前消失。

主义之上。相反，今天反倒可以感觉到向波兰尼的第一轮市场回应的回归，即社会自发地保护自己。只有在今天，这种自我保护才具备跨国特征，把非政府组织、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劳工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旨在保护全体以抵御市场破坏的跨国公共领域。表2总结了历史上国家和社会对市场相继的回应。

表2　对市场相继的反应

	对国家市场的反应	对国际市场的反应
社会的反应	1. 地方社会：19世纪中叶的英国	4. 跨国的公共领域：正在兴起的未来
国家的反应	2. 起规制作用的国家：19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	3. 自给自足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制

波兰尼之所以勾画出这样一幅自下而上的乐观图景，和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没有强烈的资本主义霸权的概念有关。他虽然认为，19世纪的国际秩序非常强大，本应该持续长久，但仍把这个国际秩序的基础看做是国家间有机的互相依赖和权力的平衡。他对帝国主义权力或世界霸权这些构成葛兰西世界秩序的基础毫无概念。

乔瓦尼·阿瑞奇（Giovanni Arrighi）和贝弗利·西弗（Beverly Silver）很有意义地把葛兰西融入波兰尼的世界体系理论中。[①] 简言之，他们认为，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秩序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霸权”危机后出现的。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以把交

① 参见 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Arrighi, "Antisystemic Movements and Gramsci's 'Piedmontese Function'"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2); Silver and Arrighi,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易成本纳入现代公司制为基础的旧的积累模式的活力已经耗尽。它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中不断升级的阶级矛盾。短期来看，这场危机是一次有利于美国资本的重建资本主义的机会——在国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对外贸易扩张，福利国家的收入保障制被取消等等。然而，以葛兰西的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是一场国际层面的“消极革命”，一场由上层煽动的、保守的、防御性的变革。现在，资本主义不再像在新政和美国称霸下的和平时期那样对国内劳工，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做出让步，而是呈现出它更为野蛮的一面——它无与争锋的强大军事力量。美国的独裁代替了国际霸权。美国霸权的衰弱在经济领域里不仅表现为旧积累制度的活力已经耗尽，而且表现为寻找新投资机会的金融资本的兴起。阿瑞奇和西弗认为，这一新秩序将建立在中国和东亚灵活的新积累模式的动力之上。

我们再次遇到了两种视角。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种新的自上而下的独裁。它以美国这个安全国家为中心，和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这些超国家霸权体相结合。另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到自下而上的跨国运动。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一种可能的反抗帝国权力，尤其是美国的运动战，而世界各地的运动（反全球化、女权主义和环保运动）汇集起来构成了一场阵地战。如果分析正确的话，现在的情势给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提出了一个从未如此严峻的问题——葛兰西回避了它，但我们不会。

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带入21世纪。目前为止，我们已从葛兰西和波兰尼的著作中发

掘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并仔细考察了他们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三条原则的分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自蹈灭亡，而是强调社会的建构协调了国家和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阶级斗争会自发扩张，而是强调阶级有霸权体系，各阶级利益通过妥协和联合相协调；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社会主义的条件会自动成熟，而是看到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因为至此，我们关注的都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历史起源，我们对眼下的世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背对着走入未来。现在，我们必须转过身正视未来。我们必须根据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假设建立一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些理论解释究竟有何裨益？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在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谓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后，我们现在究竟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模式间的过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决定了时期的划分。由是观之，现在无疑是后共产主义时代。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没有认真思考过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经建立必将永世长存。因此，他们既不必思考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也不必思考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①] 有些人甚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当作国家资本主义的特

① 托洛茨基在此又是一个例外。他的《被背叛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finder, [1936] 1972）冠以“苏联是什么？苏联向何处去？”（*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的副标题再贴切不过了。此书考察了决定苏联将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资本主义的阶级特点。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未来也尚不清晰，因为许多因素要根据国际力量的平衡待定。事实上，在1936年，革命的19年之后，他仍然认为苏联秩序和他自己的想法一样不成熟。

殊形式，因此不需要对它们进行个别的分析，也不需考察它们的历史。但是，我认为苏联和依附于它的国家，无论好坏，都是建立在一类可以从中吸取许多教训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们的问题是：苏联是否存在“社会”？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社会”的有无对苏联的发展方向、它最后的解体和后果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影响？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

共产主义所遭受挫折不仅给社会主义的声誉，而且给大众对社会民主制的热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后共产主义时代，激进斗争的中心已从分配政治（distributional politics）转向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称后者为承认政治（a politics of recognition）。当代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必须跟上这次重要的转折，但同时也不能失去对阶级的关注。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把社会看做一个有序一致、天衣无缝的整体。我们必须看到它被种族和民族分割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只能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方可理解。我们从殖民主义开始论述不光是因为世界在这里完全分成了两半，而且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考察发达资本主义下“社会”的意义，也需要考察世界格局边缘的“社会”。同时，我们需要更深刻地反思社会和国家、经济的界限；而另一方面，也需要思考社会和以家庭为主导的私人领域的界限，以及需求是如何跨越这些界限被表达和满足的。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它们已经跨越了国界（不再是根植于国家之中），通过跨国非政府组织相联系，受到分散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的推进。在以上所有方面，我们只能把葛兰西和波兰尼作为始点，而不能作为终点。是他们二人把社会描绘在马克思主义的地图上，但是对它的幅员、轮廓、山

川、沟壑至多只是一笔带过。在探索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时，我希望发现一个能够唤醒社会学家想像力的“真正的乌托邦”，无论它还是多么原始。

共产主义：挫折和余波

让我们从显而易见的地方开始。由于把社会置于马克思理论的中心，葛兰西和波兰尼赋予了社会主义一种全新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意义。与过去的理论家不同，他们不相信不受干预的或受政党干预的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能够保障社会主义的自由。葛兰西提出通过工厂委员会对生产进行社会规制，而波兰尼建议使市场服从于社会，也就是戴安娜·埃尔森（Diane Elson）等人所谓的“社会的市场”。[①] 二人的建议都把社会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用来表达和汇集需求，保证领导者实施民主的回应。若没有这个自主的社会领域，社会主义就容易堕落为一种极权主义，好一点的话，也是一种“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管制”。

不仅如此，缺乏能够做出回应的社会，社会主义甚至无法在它自己制造的危机下生存下来。这里有必要比较一下早期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生产关系限制时，也就是当竞争引起利润和生产过剩的危机时，早期资本主义便深深地陷入经济危机。此时在国家的作用下，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兴起重新使经济达到均衡。同样，国家社会主义用吸收市场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当然，其程度随国家而异。此即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得以存续的原因。经济危机只有在变为有机的危机，也就是政治危机时才会威胁到现有的秩序。为了遏制政治危

① Diane Elson,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New Left Review* 172 (1988): 3-44.

机，社会主义必须和资本主义一样产生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虽然公民社会确实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它从未像葛兰西期望的那样足够巩固来建立社会主义霸权。

为什么葛兰西的希望没有实现呢？波兰尼告诉我们，社会是在对市场的回应中产生的。虽然市场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苏联繁荣起来，但随着计划经济和集体制的实施，市场便不再存在了。没有市场的社会是有限而且不稳定的。东欧的市场改革，尤其是在匈牙利，确实一度出现了初级的社会霸权，尽管它还不足以抵御国家社会主义。今天在中国，市场同样产生出一个还不稳定，但充满活力的社会，虽然这个社会将把中国指向何方尚不得知——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或者更可能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独特的转型策略：市场是由政党国家孵化的。事实上可以说，俄罗斯的做法重复了布尔什维克的运动战策略，即把摧毁社会主义的旧秩序作为资本主义新秩序自发成长的先决条件。中国的策略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阵地战，一场用变革来阻止革命的消极革命。

因此，不仅有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有俄罗斯的市场转型，都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上了教训惨痛的一课。市场或许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可能是充分条件。前苏联发生的后社会主义市场化转型并不是一场“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我宁愿称其为一场“大倒退”（Great Involution）。[①] 不仅工会和合作社没有发展起来保护劳动力免于被商品化，工业反而倒退到家

① Michael Burawoy, “Transition without Transformation: Russia's Involutionary Road to Capit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5, no. 2 (2001): 269-90.

庭经济状态；不仅地主阶级没有组织起来通过关税和补贴来保护农业，农业反而倒退到小农经济状态；不仅国家银行没有规制货币，企业反而倒退到以物易物的状态。虽然俄罗斯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后，金融业和自然资源采掘业蓬勃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但是这些发展是以大多数人的贫穷、堕落和退出市场为代价的。那里并没有很多能动社会或公民社会的特征。恰恰相反，那是一个相当消极的、从市场和国家中撤出的防御性社会。然而，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些社会传统较强大、市场转型破坏性较小的国家，它们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历完全不同。那里的被统治阶级为保卫自己和加入国家重建做好了更充足的准备。①

我们不应当把波兰尼的双重运动变为一条铁律，而应该考察其运作的条件。市场不一定就会产生一个生机勃勃的能动社会。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已经过十年的市场转型，但至今都未激发起有活力的针对休克疗法的社会回应，反倒引起了社会从市场大规模的撤退。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况。由于历史环境不同，市场的扩张可能带来积极的回应，也可能带来消极的退守；可能带来一场大转型，也可能带来一场大倒退。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国家和社会将以怎样的形式支持市场化的潮流，阻止或逃避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

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

我们在建立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时，主要关注的是波兰尼和葛兰西对发达资本主义本质的洞见。不过，他们自己所在的

① 本文没有篇幅来深入讨论波兰尼的市场转型理论在俄罗斯和中欧的适用。但可参见 Maurice Glasman, *Unnecessary Suffering* (London: Verso, 1996) and David Woodruff's remarkable *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社会却并不适用这个模式。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祖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落后局面，但他们的关注点又总是和以西欧和美国为目标的未来相关。换个方向来看看东方而不是西方（南方而不是北方），他们对欧洲边缘国家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第三世界。例如，葛兰西对《意大利南部问题》（*Italy's Southern Question*）的专题讨论和后来的《意大利历史札记》（"Notes on Italian History"）就蕴含了研究世界格局边缘国家的因素，对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和半封建的农业部门做了清晰的解释。葛兰西的个人兴趣在于研究阻碍工人和农民结成革命联盟的因素。他相信，正是这种联盟使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和过去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他毫不怀疑只有工人阶级才具有革命的潜能。

虽然波兰尼面对的匈牙利的社会结构和意大利并不相差很大，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和葛兰西正好相反。无论是因为他的城市资产阶级背景使他更容易对乡村生活抱有浪漫主义态度，还是因为受到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波兰尼自青年时代直至去世从未放弃他对农民的革命潜能的信念。他的最后一本书，和他妻子杜可钦斯卡一起编辑的《犁与笔》就是献给创造了一种农民文学、农民民族志学和激进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民粹主义者的。在波兰尼看来，这些民粹主义者和改革派的共产主义者一起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背后创造性的力量源泉。这场革命是一场"进行中的事业"的重生，寻求的是"一种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联合"。①

虽然波兰尼和葛兰西都清楚地认识到奥匈帝国是殖民大国，

① Ilona Ducyznska and Karl Polanyi, *The Plough and the Pen* (London: Peter Owen, 1963), p. 13.

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亚非殖民地的宗主国。直到弗朗·法农（Frantz Fanon）才把波兰尼的民粹主义情绪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连接起来。[①] 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法农读过葛兰西，但法农分析社会情势的方式和葛兰西惊人的相似，即用经济、政治、军事关系和不同层次的阶级形成来区分社会情势。不过，法农是从两个世界的社会出发的——一边是殖民者的世界，另一边是被殖民者的世界。不存在单一的公民社会，但是有一个进行霸权式殖民统治的统治阶层，还有一个通过传统的头领和独裁命令受到殖民管理的被统治阶层。因此，反殖民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场反对殖民秩序的斗争；另一方面，它是一场在殖民社会内部争取霸权的斗争。正是第二种政治斗争决定了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的道路。

和葛兰西一样，法农提出了未来发展的不同道路。第一条非殖民化的道路是城市集团引领的。它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成员包括非洲的精英阶级、技术人员、教师和公职人员，并受到不发达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都是使自己取代殖民者的位置，而且要保留根本的社会结构完好无损。[②] 葛兰西或许会称之为消极革命。第二条非殖民化的道路是民族解放的道路，让人想到了波兰尼的民粹主义运动。它以革命性的农民为主要力量，由那些由于政治异见被流放出城市的激进派知识分子领

①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1] 1991).

② 法农早期著作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Pluto, [1952] 1986) 描绘了这个抱负满怀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当法农试图解释法国出人意料的种族主义时，他开始用新的视角看待他的故乡马提尼克岛——无意识的、内化了的压迫。法农认为，只有暴力革命的宣泄作用才能去除黑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感。

导。但是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吗？由于殖民者支持民族资产阶级，这两大“历史性的集团”（分别来自城市和乡村，以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为主）为获得其他阶级（流氓无产者和部落首领）的支持展开竞争。这场争夺霸权、争夺被殖民者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决定了非殖民化的道路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改革还是革命。

和葛兰西一样，这里的知识分子也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他们有两大类：一类是为了防止社会变革而支持非殖民化的传统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希望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殖民制度，进入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法农比葛兰西更加清楚地表示了社会主义若要成功，总要把来自本土社会内部的阵地战和反抗殖民制度的激烈的运动战联合起来。特别是通过阵地战，民族解放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民主的、参与式的社会，隔绝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威势之外。法农的观点和波兰尼的民主社会主义和葛兰西的受规制的社会是很相近的。

那么这究竟能否实现呢？法农对军事和经济实力加诸“政治”上的限制进行了一种葛兰西式的分析，不过他的分析是不现实的。他首先假定国际资本准备为它过去的殖民掠夺做出补偿。其次，宗主国能够悠闲地看着社会主义的建立而袖手旁观。法农对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仿佛熟视无睹，天真地相信殖民者的根本人性，相信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和联合国会议上人权讲话的真诚。

法农认为，如果民族解放斗争失败，民族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么将出现最坏的结果。由于依赖国际资本，又没有自己的物质资料，原殖民地无法建立自己的霸权。它成为对宗主国资产阶级拙劣的模仿和附庸。为了缓解不安全感，它倡导奢靡的消

费。为了对付反对派，它从民主走向专制，从政党国家走向独夫统治。由是，后殖民秩序压垮了公民社会，堕落为集权统治。虽然在过去的40年里曲曲折折，但法农悲观的论调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站在非殖民化的末期，立身于后殖民时代之中，让人不禁怀疑法农的民族解放可曾有过可行性。①

通过反思非殖民化运动低落的半个世纪，南亚底层研究学派（the school of South Asian Subaltern Studies）——古哈（Guha）、斯皮瓦克（Spivak）、查特吉（Chatterjee）、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认为反殖民主义斗争根本上还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无形泥沼中进行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根本上是虚幻的，是在非殖民化欢欣鼓舞的时刻形成的。无论哪种选择都被民族独立的观念迷惑，而民族独立只能指向一条道路——“缺乏霸权的统治”。例如，为了解释印度独立后为何没能实现独立运动时的希望，帕塔·查特吉借用了葛兰西“消极革命”的概念——即“没有革命的革命”。② 印度议会党（Congress Party）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计划就好似19世纪末意大利

① 南非是一个明显的反例。那里的工业化在殖民主义下快速发展，创造了同时处于阵地战和运动战中心的激进工人阶级来终结种族隔离。参见 Gay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in South Africa, 1970~19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虽然阶级基础不同，反殖民斗争仍在后殖民统治下产生成效，开始吸收、压制公民社会，为工人运动设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有人会认为，这证明了法农认为后殖民背景下工人具有保守性的观点，但这种想法忽视了国家和国际力量的复杂性。参见 Edward Webster and David Adler, "Towards a Class Compromise in South Africa's 'Double Transition': Bargained Liberaliz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Politics & Society* 27, no. 3 (1999): 347-85。

②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温和党组织的分子式改革：平息了下层的叛乱，以软弱的资产阶级取代了国家。后殖民研究者放弃了西方的目标，提出如果能利用被殖民者经历所产生的新观念，那么反殖民运动可能会进行得更好。然而，这些新观念可能是什么呢？如何可行呢？后殖民理论对此却缄口不谈。①

法农把葛兰西的理论适用于第三世界时，颠倒了革命和回应的阶级基础。在殖民环境下，工人阶级成为饱食碌碌的劳工贵族，醉心于维护自己的特权；而农民由于无所可失，便怀有自发的激进主义。法农认为，阶级利益的组合形式是由殖民环境决定的。他对“西方”的看法延续了葛兰西的观点：公民社会强大，资产阶级霸权深厚；农民在政治上是落后的，而工人阶级仍是革命的先锋。他把葛兰西的理论扩展到第三世界，但没有修改葛兰西对第一世界的观念。不过，法农在西方的诠释者们却不这么认为。从麦考姆（Malcolm X）到休·牛顿（Huey Newton），美国民权运动的激进派推崇的是被排斥和被压迫的阶级——这个世界的悲惨不幸者们。他们总是比被剥削和被同化的阶级更具有革命性。具体到美国，法农的殖民主义理论把破败的城市聚居区中一无所有的黑人视作革命的力量，而不是那些生活安定的工人阶级。比如，在黑豹党（Black Panthers）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

① 也有重要的例外。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例子就很有意义。那里一个强大的、受大众支持的共产党通过重新分配和大众动员领导了反殖民运动的发展。它的成功不是依靠复兴某种底层的思想，而是通过先摧毁封建制，再继续扩大参与式的公民社会。参见 Patrick Heller, *The Labor of Development: Wor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in Kerala, Ind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Mov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Decentralization in Kerala, South Africa, and Porto Alegre," *Politics & Society* 29, no. 1 (2001): 131-63。

就已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重建了一个以白人权力为攻击目标的黑人公民社会。和别处一样，虽然这次运动惩戒了种族主义的所有罪恶，但革命的乐观主义最终还是换来了令人遗憾的结果。

无论法农的殖民理论和发达资本主义在细节上多么相近，清楚的是，我们再也不能把社会看做一个整体或是团结一致的了。这一条用在波兰尼这里比在葛兰西那里更为合适。我们必须舍弃波兰尼那种抗衡市场破坏性的社会是纯洁无瑕的观念。在波兰尼看来，社会和市场间的战斗仿佛善神和恶神之间的一场大战。葛兰西对公民社会和对它发展成社会主义的能力不抱有如此大的期望。由于被国家利用，公民社会既是抗争的空间，也是统治的工具。但即使在葛兰西的模式里，统治也不是公民社会的固有特征，而是基于各种制度和国家的联系，且往往要通过知识分子来运行。我们已经在概念上区分了公民社会的宏观分野和微观权力。前者分割了整个公民社会，诸如种族和阶级；后者凝结在工作场所、家庭这样的制度内，散布于公民社会各处。至此，我们已经思考了公民社会在种族秩序下的分化，现在要思考的是公民社会如何分裂成一系列具有父权色彩的领域。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葛兰西对性别问题，是通过对现代工业经济的前提条件进行功能分析来解答的。在《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一文中，他解释了福特倡导的这种生产新形式为何需要对性欲做出相应的规制来最大地保存工人的能力。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在严格的管理控制之下是用来规制性欲的制度。波兰尼则是从相反的角度，即社会保护而不是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待家庭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破坏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但是，他们二人都没有重视

家庭作为政治的内在组织的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来对葛兰西进行女权主义方面的补充。妇女被束缚在家庭中，她们和公民社会的唯一联系是她们的丈夫。[①] 在妇女得以自己的身份跳出家庭的小氛围之前，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女权运动的。与黑人和工人的社会处境不同，在单个女人服从单个男人的分散的霸权之间要建立团结一致是不可能的。[②] 正是部分地归功于波伏瓦的作品，和它作为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效力，鼓舞了妇女摆脱对丈夫的依赖，促成了超越父权制度体系的女权运动。为何这是可能的呢？

如果说波伏瓦的理论中有一个具备更大自由、可以实现性别平等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就是公共领域。她本人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波伏瓦的公共领域把葛兰西的公民社会转化为一个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碰撞、较量，有的甚至联合起来主导着一种不稳定的均衡状态。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她解释需求的女性主义理论中研究了这种思想。[③] 公民社会再一次分化，但这一次的分界线不再是一种社会关系，而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空间—功能区别。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经对话来实现政治参与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场所。它是公民

①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1949] 1989), pt. V.

② 参见 Inderpal Grewal and Caren Kaplan, eds., *Scattered Hegemon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他们创造了这个精妙的措辞。

③ 尤其要参见 Nancy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and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Kegan Paul, 1997)。

商讨他们共同事务的空间”。[①] 弗雷泽更常用“社会”域来标示她和哈贝马斯的区别，以突出它的边界流动性，强调它是争夺如何解释需求的场所。私人领域是公共领域剩余的范畴，它不牵涉任何政治讨论，只关心经济和家政。虽然弗雷泽主要关注的是家政，但她未阐明的对经济的比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葛兰西毫不怀疑地认为，需求由经济领域传导到社会领域，并在社会中作为阶级利益而被解释和争夺直到形成一种或几种联合模式使这些需求成为对国家的要求。此时，他们变成国家用来使原需求非政治化的政策。可以想到的例子是，规制工会身份的立法、集体议价，或失业保险。

弗雷泽的原创性贡献是分析了需求从家庭“渗入”或“流入”社会领域的方式。在社会领域中，它们可能也可能不被确认、阐明或得到满足。[②] 虽然劳工的利益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代表机构，但是母亲和家庭妇女的需求还没有得到肯定。因此，斗争的首要任务是确认妇女的需求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女权运动为这场斗争开辟了道路。它通过把性骚扰、强奸、家庭暴力和妇女身份的双重转换纳入社会域的政治话语中，迫使国家设立管理这些需求的机构。这场斗争一直步履维艰，因为同在公共领域中运行的保守势力试图把这些不受控制的需求重新私人化，把它们重置于家庭的桎梏之下。

重新私人化是保守势力抗击这些需求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是试图把这些需求在政治上中性化，不确认其地位。社会运动或许可以成功地迫使国家代表妇女的利益进行干预，但是对需

①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p. 70.

②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chap. 7 and 8.

求的管理可能起到分裂作用，使其失去政治影响。弗雷泽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福利政策的。美国政府创造了两种福利——一种保障雇员的权利，另一种救济被污名化的受赡养者。这个系统对妇女和少数族裔构成了歧视，因为他们往往被归入第二类福利制。在那里，他们就好像不劳而获的乞讨者一样，根本不是劳动力中的合格成员。更广泛地说，国家管理两种福利的方式都是对一开始的社会运动激进分子进行规范，实施监督和审查，把他们转化为附庸。去政治化的过程可能也会激起社会域内产生政治化的反应，但这绝不是常情。

弗雷泽的女权理论对葛兰西进行了诸多有益的补充。不仅因为她对性别统治特别关注，更主要是她对国家、公民社会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提出了质疑。葛兰西没有明确地说明界限究竟在哪里，而弗雷泽把隐含的界限明确地揭示了出来，即界限决定于政治斗争的结果——政治斗争划清了政治的合法客体和在政治以外的私人需求之间的界限。女权主义一直以来都在争取把家庭领域政治化。与此同时，其对手们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试图彻底把公民社会和国家划清界限，把它变成没有政治的无用之地。公民社会里的许多女权主义斗争注重控制再生产条件——比如，打破国家对妇女堕胎权的限制，把决定权还给受决定影响的人。这无疑包含了阵地战的全部内容。

担任保卫或突破领域边界任务的主要是知识分子。这里又可以看到弗雷泽和葛兰西的潜在联系。一方面，一批有机知识分子把需求从私人领域带入社会领域，或把社会领域的政治功能扩大到私人领域。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担任着驯化需求的职能，或是把它们逼回私人领域，或是以专家的面目来管理它们。弗雷泽只讨论了话语，但没有讨论作为说话人的知识分子，及知识分

子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关系。由此，她的前提便有问题了：因为她假设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自称代表的妇女是一样的。

跨国社会？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必须思考社会的起源和功能问题：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多种结构；这些结构是如何影响阶级力量的平衡又反过来被后者影响的。葛兰西和波兰尼都没有讨论社会作为斗争场所的结构——被种族分割，被各种父权制度分裂。我们还知道，社会界限的变化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最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探索社会如何突破国界，组成一个由不同地域的民族或国家、非政府人权组织、环保组织、劳工组织，或许还包括跨国公司内部或外部的经济网络组成的跨国社会。同样，我们还要思考跨国社会的结构，它和那些自上而下建立的跨国组织的关系，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有民族国家。

波兰尼和葛兰西都认为，地方上不同阶级的经历能够发展为国家层面的阶级动员，再上升到国际层面上阶级对各国发展道路的干涉。这是一个非凡的过程，可是他们都没有思考过社会的跨国特点。我们可以像本文第六部分的结尾那样来发展他们的理论，对跨国社会提出一些新洞见。从波兰尼的理论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跨国社会是对泛商品化，尤其是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商品化做出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它想得太理想化，它同样也是一个被各种权力等级占据的不平衡的政治空间。世界格局的中心是它的中心，世界格局的边缘是它的边缘，并且布满了浅沟深壑。[①]

① 例如，参见 Millie Thayer 对跨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分析。Thayer，“Transnational Feminism：Reading Joan Scott in the Brazilian Sertão，” *Ethnography* 2，no. 2 (2001)：243－72.

从葛兰西的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思考跨国社会和超国家机构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仅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样也遏制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

既然困难重重，那么这一超越需要什么条件呢？社会主义转型不能再被看做旧制度整体瓦解、被新制度完全取代的过程。它再也不是由三个条件（经济矛盾、阶级斗争，和新秩序的萌芽）在时空上的同时成熟决定的了。未来的社会主义转型也不会只集中于民族国家，而会包括各种地方斗争。这些斗争在一场同时发生的阵地战和运动战中超越国界联系在一起。它在呼唤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为资本主义制定了必然灭亡规律的立法者，也不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是从事田野调查的考古学家：寻找地方的先例、新的制度形式，还有现实中的乌托邦；并把这些都放到它们的环境中，把它们译成一种公共语言，把它们从世界各地联系起来。[①] 用齐格蒙德·鲍曼（Zygmunt Bauman）的术语来说，阵地战需要超越立法者的解释者，他同时还是一位不断发现新疆域的旅行家。[②]

最近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斗争可能不会比过去的斗争更成功。然而，它被阐释得越清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越有力，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会变得更有人性。

①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来自 Erik Wright 的真实乌拉邦项目（Real Utopias Project）。参见 Archon Fung and Erik Wright，eds.，*Deepening Democracy：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London：Verso，2003）；另参见 Michael Burawoy et al.，*Global Ethnography：Forces，Connections，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② Zygmunt Bauman，*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Cambridge，UK：Polity，1987）.

从资本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

——一个学术工人的回顾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复兴往往局限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教育的理论，以及将资本主义看做一种经济体系，而马克思关于生产的分析则在很大程度上不被触及。这种状况直到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出现才得以改观。对生产的分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柱。是布雷弗曼承担起了重写《资本论》第一卷的挑战，他揭示了一段资本家如何从直接生产者手中夺取控制权的资本主义历史。首先是无产阶级化，然后被去技术化，工人阶级——布雷弗曼也是其中一员——屈从于资本的残酷逻辑。

工业社会学和工业心理学旨在让工人适应工作，而布雷弗曼关注的则是工作本身的变迁。布雷弗曼从工匠的立场出发展开对

* 本文原题为“Dwelling in Capitalism, Traveling Through Socialism”，发表于 Baldoz et al.（eds.）*The Critical Study of Work*, pp. 21 – 4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译者及单位：闻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以此取代了对工作的主观层面——态度、感知、意识甚至冲突的经验研究。通过排挤工匠，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开，这样的话，工人就再也不能想象地构思他们劳动的产品了。在他对劳动衰退的历史分析中，布雷弗曼同时也在记叙工人的客观经历和阶级结构的重组。

我自己的工作也是要研究工人的经历及其与阶级形成的关系，但却是从主观层面入手。首先，管理者如何获取工人在生产剩余价值过程中的合作？工人为什么愿意付出大于他们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的劳动？马克思将19世纪的英国当作他的实验室，他解释说，剩余价值的榨取是通过威吓，工人出于生存需要而害怕丢掉工作，因此只好服从。我面对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有工会组织的工业部门，我认为管理者几乎不能任意解雇工人，即便可以，这种权力也因为失业赔偿和替代性工作机会的存在而削弱不少。榨取剩余价值需要更加精细微妙的手段。因此，布雷弗曼将垄断资本主义看做不断加剧的劳动的衰退，而我则将垄断资本主义视为规训劳动的新技术，一种同意（consent）压倒了威吓（coercion）的新技术。

以上的分析直接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生产在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发现，在研究自为阶级、作为行动者的阶级时，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教育、政党、意识形态以及在所有这些之上的国家。这是喧宾夺主的做法。如果生产不是阶级形成的熔炉，那么这将导致我们重新去理解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它们不再作为对经济活动引起的政治挑战的抵制物而存在。我的研究指出，生产领域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刚开始我把它称作“内部国家”，后来我称之为“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apparatuses）”，或

者，更宽泛地称之为“生产政体”（the regime of production）。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效果的确存在，但也存在着规训劳动过程和形塑了一种生产的政治的独特的机构。

生产政体的概念为研究围绕着工作现场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和认同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例如，我用这个框架来重新解读我关于赞比亚和南非的种族劳动分工的民族志，并将这样一种生产政体称为“殖民专制主义”（colonial despotism）。也有人使用同样的框架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方的性别政体。[①] 生产政体的概念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比布雷弗曼线性的以去技术化为基础的控制概念更为丰富多彩的方式理解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

我自己的兴趣，主要是落在资本主义生产政体的特质以及社会主义的意义之上。布雷弗曼从未交待过他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但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我推断出以下几点：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再统一，这种统一在集体层面是存在于必然王国中，在个体层面则是存在于自由王国中；物质必需品的生产应该由工厂委员会（factory councils）来组织，这个委员会则是通过一个民主的计划机制来协调的，从而可以在必然王国之上创造出类似于工匠的自我实现的基础。从这些线索中，我推测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政治，即集体协商的共产主义（a council communism）。在俄国的苏维埃革命、1919 年攻占都灵工厂事件、匈牙利 1956

① 例如，Ruth Milkman, *Gender at Work*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Robert Thomas, *Citizenship, Gender and W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Ching Kwan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Leslie Salzinger, "From High Heels to Swathed Bodies: Gendered Meanings under production in Mexico's export processing industry," *Feminist Studies* (1997) 23 (3), pp. 549 - 74。

年的工人委员会等事物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萌芽。

尽管这样的悬思非常重要，但是对一个基于倒置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猜测并不能够令人满意。它是拿一种体制的现实和另一种体制的理想化进行比较，因而是错误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如果将自己限定在资本主义，那么就无法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以及什么或许可能只是工业主义的必然产物。其次，以一个不明晰的、没有明确阐述的乌托邦的名义来拒绝资本主义，而不去检验这个乌托邦是否能够生存（比如自我维持）以及是否可行（比如能够达到），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此，我决定，舍弃前面的做法，而去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或者我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事物。这样的研究将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劳动及其规训的本质，同时，反过来也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个生产者管理自己生活的社会主义。

我研究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生产政体。将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政体区别开来的共同点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工人的社会主义中的生产政体？要研究这些体制，需要进入生产的日常生活世界，需要对劳动及其规训的真切体验。从非洲开始，我最偏爱的研究方法就一直是参与观察。我在芝加哥南部的一家钢铁厂找到一份操作员的工作，在那里待了一年（1974 ~ 1975）之久。这段经历产生了“霸权生产政体”（hegemonic production regime）的概念，我用它来与“专制政体”（despotic regime）的概念相比较，后者是我从对罗纳德·罗伊（Ronald Roy）早期在同一工厂的民族志的重新解读中提取出来的。与 20 世纪 70 年代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的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的维续——它如何抵挡那些关乎它存亡的威胁，又如何克服自身固有的矛

盾？我推测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工厂政体可能产生更加不稳定的工人阶级。既然我们对东欧和苏联的生产政体所知甚少，并且即使是我们所知道的也严重地受到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扭曲，那么我更应该继续我的民族志田野。1983～1985 年，我在匈牙利的香槟酒厂、纺纱厂和自动化厂工作。接下来的三年里，我间歇性地在匈牙利最大的一家钢铁厂做火炉工人，加在一起有一年之久。但我是如此专心致志地关注社会主义生产的特质，却没有对更加广泛的政治体制的瓦解予以注意。当后者来临时，我丝毫没有考虑要不要看一看社会主义的瓦解，而是毫不犹豫地转战苏联，当时它已经对外国研究者开放。1991 年，我和凯西·亨德里（Kathryn Hendley）研究了莫斯科的一家橡胶厂，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我又开始在北科米（Komi）共和国的一个家具厂上班了。来自天堂（资本主义）的暴风雨却似乎总是伴随着我，我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因此，我决定哪儿也不去了，丢掉民主社会主义的圣杯而去研究一个无拘无束的市场所带来的苛政。从 1991 年开始，我就一直关注科米的木材、煤矿和建筑业的解体，我将它们称为“内卷化”（involution）。

接下来我将概要地重述我过去这 20 年的轨迹如何受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持久关怀的驱使，以及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的流动如何不断形塑我的理论，还有我自己对身后这样长长的一个旅程的理解。我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持久性（durability）、国家社会主义的脆弱性（fragility）和新出现的后社会主义的独特性（peculiarities）——这一切都是从一个一直在路上奔波着的学术工人（worker-academic）的视角出发的。最后，我将展示这样的一种经历和诠释、实践和理论的辩证法，其自身又是如何被国家和全球政治经济的深刻变迁重新形

塑，这一深刻的变迁如何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1980～1981）、共产主义在东欧（1989）和苏联（1991）的崩溃，以及伴随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开始成形。

一　霸权产生于工厂之中

我的旅程开始于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的一个理论上的困惑。为了使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更能让人接受，马克思也比较了封建主义的模式，其中剩余劳动采取地租的形式，而与必要（维持生计）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领主总是知道他从农奴那里获得了什么，因为这是可见的。相反，在资本主义之下，不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分离。工人看似是被偿付他们全部的劳动时间，但其实他们的工资并不等于他们全部劳动时间所得。如果剩余价值是不可见的，那么资本家事前岂不是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获得利润——如果剩余价值是被掩饰的，那么它又是如何被获取的呢？如果工业社会学问的是工人为什么不更努力地工作，为什么要“限制产量”（restrict output），那么我问的则是截然相反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工人如此勤快地工作？

这个理论困惑不仅来自理论，也来自实践。从 1974 年 7 月 12 日我第一天进联合企业（Allied）在芝加哥南部的机械厂工作起，我就对与我共事的那些机械操作员的工作之勤快印象深刻。在刚开始的几个月，我几乎跟不上他们的工作节奏。好像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地工作。的确，就像我的日班伙伴说的那样：“没有人强迫你来这里。是你自愿的。”并且，计件制度已经保证了每个人至少获得一份最低工资。升迁和调动根

据的是经验和资历，而并非勤奋程度。那为什么每个人拼命努力生产额外的产品，尽管这只能带来收入的边际性增加？

当我问工人们为什么如此努力地工作，他们要么是茫然地看着我，无法领会我的意思，要么就非常愤怒地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努力工作过，并且通过开小差、漫不经心等来证明这一点。他们似乎情愿同意管理者的观点，即工人总是想尽办法逃脱工作而不愿努力干活。我很奇怪为什么工人自愿同意管理者对他们的看法。管理者不仅支配工人而且还设法让他们心甘情愿，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的答案借鉴了当代对国家的分析，我揭示了在生产领域，类似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①

管理者通过将工作组织成一场游戏获得了工人对控制的同意。为了适应在工厂中一天八小时、一周五天的单调、疲乏且往往很危险的工作，工人将他们的工作变成了一场赶工游戏，这个游戏有着精心制定的规则，并且得到了车间管理者的同意。有时候你是为计件工资率而干活，有时候你不这么做，但你的声誉和自尊却总是与此相关的。只要总是有活干，一天就容易被打发过去。工作作为一场游戏也受到另外两个制度的框构（frame）。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rnal labor market）使工人个体化了，每个工人都有权利在工厂内部申请职位流动，其依据则是资历和经验。雇员在联合企业待得越久，他们继续留下来的收益也就越大，因此他们对企业的赢利状况也越关心。最后，内部国家（internal state）调节了工人和管理者的关系。一方面，集体协商在管理方

① 例如，Burawoy，*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1979）。这本书受葛兰西以及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等的影响甚深。

和工会之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这表现在集体合同上。另一方面，员工申诉机制又使工人可以根据工作场所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保护自身权利不受侵犯。

这样，在工厂中，对立的阶级利益得到了协调，同时工人也被建构成工业公民。我发现自己正处在我称之为“霸权生产政体”的体制之中。这种生产政体到底有多典型呢？根据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劳资关系的了解，上文中描述的三个特征在工业垄断部门是非常常见的。为了使这种政体有一个历史的定位，我又得到了一个惊人巧合的帮助。我进入的竟然是罗纳德·罗伊——一个伟大的芝加哥工厂民族志学者，30 年前来过的同一家工厂。① 因为劳动过程这 30 年来几乎没变，所以我能够专心地解释生产政体所发生的变迁。考察霸权在工作场所的兴起又促使我超越了工厂：从当初罗伊进入的吉尔公司如何演变成我现在称之为“联合”的跨国企业，以及劳资关系的宏观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迁。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将霸权政体定位在一个脉络之中，认识到它部门的（sectoral）和历史的两方面的特殊性。

并且，从罗伊的研究中我推断出专制生产政体的原型，即，管理者专横地使用权力，工人屈从于特别的和沉重的处罚，受反复无常的监工的任意宰割。管理者可以任意雇佣和解雇工人。除了那些垄断了某种技术或者知识的工人之外，大多数工人没有丝毫权利。在专制政体之下，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仅仅有负面功能，强迫工人劳动而压制其不满。

这种比较使我能够发展出一个霸权政体的理想类型，其中，

① Donald Roy，*Restriction of Output in a Piecework Machine Shop*，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952。

威吓的运用，不管是处罚还是解雇，都受到同时约束劳资双方的条款的限制，这个条款本身就是同意的对象。工人可以运用他们不威胁到整个协商性秩序的力量，开辟一个自组织的空间——这是对管理支配的自发性同意形成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则在于劳资双方利益的具体协调，这是以双方的相互依存为基础，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等制度来组织。刺激同意形成的动力，不仅在于未来可能获得的物质报酬，也包括对工作中的乏味和繁重方面的缓解。

《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志在将工业社会学整个颠覆过来（通过倒置其核心问题），和将马克思主义引进来（通过在经济基础之中安放一个上层建筑）。我最初的灵感来源于葛兰西。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他指的是西欧）的独一无二之处，不在于其经济，而在于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国家的扩张。资产阶级通过这些上层建筑不仅正当化和维持了自己的统治，也获取了工人的积极同意。然而，在他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Americanism and Fordism*）一文中，葛兰西宣称美国是不一样的。[①] 由于没有封建主义的历史包袱，上层建筑“在数量上是简化的和单一的”——在这里，霸权产生于工厂之中。

这成了我自己研究的一个主题，但这里却存在着“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问题。真的存在着一个美国式的“福特主义”的生产政体么？它与别的生产政体的区别在哪里？不同的生产政体——霸权和专制，它们的条件都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们对于阶级斗争是否有着不同的影响呢？

① 见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p. 277 - 318。

二　专制生产政体的比较历史

如果说我误打误撞地进了罗纳德·罗伊研究过的同一家芝加哥工厂靠的是运气的话，那么发现米古拉斯·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对他在匈牙利红星拖拉机厂所受过的磨难的记录则十有八九也是命中注定的。[①] 当我还在南芝加哥对一起干活的机械操作工的勤劳努力感到惊奇时，哈拉兹梯——一个被发配到工厂的知识分子——正在布达佩斯体验着难以想象的劳动强度。他的计件工资率建立在同时操作两台机器的基础上。他的描述打破了所有对社会主义生产的传统看法——社会主义的工人是懒虫，因为懒惰而出名，他们手中唯一的权利就是不用辛苦工作的权利。如果说罗伊的著作促使我建立资本主义的专制生产政体的理论，那么哈拉兹梯的《工人祖国里的一个工人》（*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则召唤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制生产政体的理论。

所有工厂专制的秘密都建立在工人只有依靠自己在工厂中的工作才能生存这一前提之上。正是这种依赖给了管理者压迫工人的鞭子，但它却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人屈服于监工和管理者的反复无常的意志，他们可以任意雇佣或是解雇工人。工人如果失业，没有任何福利制度可以求助。国家社会主义下工作虽然是有保障的，但工资却不稳定。在联合机械厂，不管我活干得如何，至少可以保证一份最低工资；而在红星拖拉机厂，哈拉兹梯却要为了每一分钱努力打拼。为了维持生计，他必

①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Penguin, 1977).

须操作两台机器，另外还要讨好监工以得到持续的活计，还要与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的计件工资率斗争到底。他的监工成了他的克星和全能的独裁者。国家不仅从不限制管理专制，反而站在背后为它撑腰，进行监视、算计和惩罚。政党控制着晋升和调动，工会不承认工人有自己的权利，管理者通过每一项小小的奖惩胁迫工人屈服于他们的权威。政党、工会和管理方共谋，从工人身上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劳动。不同于市场专制，他被囚禁在官僚专制（bureaucratic despotism）的牢笼里。①

哈拉兹梯的著作迫使我更加严肃地思考早期资本主义及其专制政体。我研究过《资本论》中记录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可怕形象。回到马克思对魔鬼工厂（the satanic mills），也就是英国纺织业的原始描述，我发掘出一个生产政体的连续谱——既有原始市场专制，也有父权制的和家长式的。② 拿这些与美国和俄国早期纺织工业相比较，我将政体类型与这三个国家 19 世纪的阶级斗争连在一起——美国的零星反抗、英国的改良主义斗争以及俄国的革命斗争。③

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极大兴趣最后又不可避免地将我带回对发达资本主义的霸权政体的理解。有两个因素区别了霸权和专制政

①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Verso, 1985), chapter 4.

② 我也曾考察过另一种类型的专制主义——赞比亚铜矿的殖民专制主义。在 1968～1972 年这 4 年的田野的基础上，我分析了即使获得政治独立后，在赞比亚也仍然不均衡地维持着的殖民专制主义。见 Burawoy, *op. cit.*, chapter 5。

③ Ibid. chapter 2. 要想更清晰地了解工厂政治和更广泛的斗争之间的连结，请参见理查德·布尔纳克（Richard Biernacki）对 19 世纪英国和德国的纺织业的比较研究，*The Fabrication of Labo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和杰弗里·赫多（Jeffrey Haydu）对英美两国的金属工人的比较研究，*Between Craft and Cla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体，并且这两个因素都与国家的扩张有关。首先，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人拥有谋生的替代性资源，特别是由福利国家提供的最低社会保障。这意味着，工人既然不那么容易被专制打垮，那么管理者就必须采纳霸权策略以获得工人的合作。其次，管理者实施专制控制时受到有法律效力的规则的制约，包括：工会的认可、必需的集体谈判、对劳动时间长短的限制以及健康和安全等等。国家在调节劳资关系和提供福利这两个方面的扩张，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形式，也因此导致了不同的霸权政体，同时对于阶级斗争也有着不同的意义。①

里根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生产政体（至少在美国如此），即霸权专制。这种政体既保留了早期的强迫模式，但十分吊诡的是，它又采取了霸权的形式。全球竞争引起的资本流动刺激了劳动控制的加强。向新的生产政体的转变由国家的双重撤退所引起——一方面，缩减福利和在生产领域之外对最低生活的保障；另一方面，放松对管理的专制倾向的约束。工人也许仍然不会被任意解雇，但是他们却可能因为合法的裁员而丢掉工作。工人可以罢工但是却要冒着自己的职位被永久替代的风险。工人可以组织起来但是他们的工会却可能不被承认。霸权如今以相反的形式运作：不是资本对工人做出让步，而是工人为了保住他们的工作对资本做出让步。霸权专制成了不被挑战的资本规则，以罢工的衰退和工会会员的减少为标志。②

①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chapter 3.

② 关于此现象的一个最近的分析，参见 David Gordon, *Fat and Mean*（The Free Press, 1996）；同时，也可参见本次的会议论文，乔伊·布鲁姆（Joe Blum）的“Degradation without Deskilling”，和詹妮弗·陈（Jennifer Chun），“Flexible Despotisms”。

不过，看起来仍然有一个领域逃脱了霸权专制政体的统治，那就是公共雇用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工会仍然持续地扩张，并且罢工将工人和消费者联合在一起来对抗国家。公共部门不受全球竞争的直接影响，有相对的稳定性，且预算约束又较为软性，服从于政治谈判。国有部门的雇佣人员又天生具有政治性，有一个清晰的斗争目标，同时也具备阶级斗争的机会和资源。[①]

这又将我的比较重新带回国家社会主义。东欧周期性爆发的斗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部门工人的社会运动的工联主义是否相同呢？确实，工人们都有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确实，在这两者中，斗争的目标都可以追溯到国家在生产现场的直接在场。另一方面，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人斗争不是源自其官僚制特征而是专制的特征，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种类比最好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工人阶级斗争之间进行。

这肯定就是哈拉兹梯在他对工人们的乌托邦式向往的卓越观察中试图传达给我们的结论。联合机械厂的工人可以在资本支配的框架内制定一个游戏，而红星机械厂的工人们却只能任由他们的创造力信马由缰，来对抗官僚支配。他们在工作日生产“反商品”（anti-commodities），一种虚构的无用的东西，叫做“本垒打”（homer）。引申地看，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就是一个伟大的本垒打（homer）——一个国家性的、集体性的欢腾，将专制变成了无法驯服的外在性（untamed exteriority）。

到底是生产政体的官僚层面还是专制层面导致了阶级动员，这个问题不能仅仅通过一本修饰过的社会主义工厂的民族志来决

① 这一观点在 Paul Johnston, *Success While Others Fail*（ILR Press, 1994）一书中得到详尽阐述。

定！尽管哈拉兹梯笔下的红星机械厂看似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工厂，但这是通过人为地切断它与其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背景之间的联系而得出的。接下来我将揭示出红星厂并不是一个那么典型的企业，而这又产生了对官僚专制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政体的原型的质疑。无论如何，如果我想要发现生产政治的本质以及它们同阶级斗争的联系，我就必须停止我的历史比较而回到民族志调查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三　社会主义也可以是有效率的

团结工会运动爆发于1980年8月的格但斯克（Gdansk）。即使我对官僚专制的最大胆的理论猜想也没有预测到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持续反抗。但是还没等我打点好行装去波兰找个工作，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①] 就于1981年12月13日宣布了戒严令。历经曲折，我最终在1983年的秋天踏上了去往匈牙利的路。我从看上去最容易入手的地方——农村地区开始，先是在一个国营农场的香槟酒厂工作，然后又在一个合作社农场的数个辅助车间里干过活。

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性别分工都非常显著——妇女在装瓶线前紧张地工作着，或者被纺纱绕轴的计件工资率奴役；而男人们则四处游荡，充当巡视员、机械师和监工等等。我很快发现，对男人来说，上班场所通常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他们真正出力的是在更具企业性的第二经济中，比如养猪或家禽、种蔬

① 雅鲁泽尔斯基（W. Jaruzelski），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波兰共和国总统。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时，他出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该委员会于1983年7月21日自行解散。——译者注

菜、盖房子等等。官僚专制是对妇女的，而男人则是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

这是农村地区的情况，那么城镇上的工业车间里又如何呢？工人阶级的生活似乎是社会主义保守得最严实的一个秘密。进入一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在里面工作了。但是，我的朋友，有非凡组织天才的亚诺什·卢卡斯（János Lukács）让这件事变成了现实。我们第一次访问“班基”厂（Bánki）是在1983年11月，我首次匈牙利田野之旅快结束的时候。1984年夏天我回到那里，以一个激光钻孔机操作员的身份工作了两个月。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直到那一天我发现自己用一只手压住钢铁的边缘，另一只手则努力地控制着一个大块头的摇摇晃晃的钻孔机。是的，它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像我这样的傻瓜。[①]

但这与哈拉兹梯同时操作两台机器的场面还是有所不同。我身处一个类似于红星拖拉机厂的机械车间，但是我的体验却跟他完全不同。拿我自己的处境和他的相比，我才开始真正理解在官僚专制之下产生了他的孤立、异化、繁重工作的特殊环境。第一，我发现自己很快就处于关注的中心。有谁曾经跟一个美国教授一起工作过呢（不管他是如何不胜任）？在车间里，我受到了安娜、克拉拉和阿西等“多博·卡蒂科纵队”（the Dobó Katica Brigade）的成员的保护，在车间之外我还时不时和工友们一起喝酒买醉。而哈拉兹梯，作为一个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和持异议者，则是与工厂的社会生活完全隔绝的。《工人祖国里的一个工

① Michael Burawoy and János Lukács,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chapter 2.

人》事实上说的只是一个特殊的工人而已。

其次，我被分配到车间里条件最差、计件工资率最低的工作岗位上去，每个新来者都会享受如此的待遇，哈拉兹梯也一样。更加普遍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往往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核心的关键工人，他们通常是男性且技术丰富、经验老到，这部分核心工人往往过得非常舒适，但这是以边缘工人为代价的；边缘工人是些没什么技术和经验、通常都是女性的工人，她们需要忍受难以想象的计件工资率和专制管理。因此，官僚专制生产政体和我所谓的官僚法团主义（bureaucratic corporatism）在同一个工作现场分别再生产了自身。

第三，红星厂和班基之间的区别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在里面，这一点解释了专制主义政体在整体上的减少以及为什么对女工而言它却是持续的。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第二经济开放了，给很多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提供了获得上班之外的替代性生活资源的机会，这些技术工人因此也在工作场所里有了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为了遏止核心工人外流到合作部门（cooperative sector）的势头，管理者在工厂中建立了一种自组织的合作社。这又进一步复杂和减轻了专制。但是妇女通常被排除在外部和内部的第二经济之外，所以她们仍然同以前一样脆弱。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班基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公司的分厂，它生产大巴和其他重型运输工具等经常会出口的产品。而红星拖拉机厂曾经是匈牙利最大的企业，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之后，到哈拉兹梯去那里时，它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很快就要解体了。哈拉兹梯因此体验到了在这样一个不再受国家关照的工厂工作的压力。

解构哈拉兹梯的理论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出社会主义生产

并没有什么独特和与众不同之处这一结论呢？显然不是。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内部都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但总的来讲，前者的生产政体是官僚式的，其变数主要受与国家的关系的支配；而后者的生产政体则是霸权的，其变数主要在于与市场的关系。伟大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认为，与国家的官僚式讨价还价产生了软预算约束，从而导致了短缺和供给面的约束；而市场力量和对利润的追求则倾向于导致生产过剩和需求面的约束。①

顺着科尔奈的观点，我进一步得出结论：布雷弗曼关于管理剥夺劳动控制权的理论实际上仅仅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当代资本主义中被普遍吹捧的“弹性”（flexibility），也就是被皮奥雷（Piore）和撒贝尔（Sabel）拿来与需求上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更有可能创造一个专制的工作现场而不是他们所谓的“自耕农民主”（yeoman democracy）。另一方面，在国家社会主义下，供给的不确定性，表现在原材料、机械和劳动力上，却恰恰需要工作现场的灵活自主性。通过剥夺技术来实施的管理控制反而不利于生产。

当然，我对工作现场的自组织能够实施得如此之好印象深刻。尽管我的激光钻孔歪歪扭扭，但总是有活儿等着我。当年我在联合机械厂的车间里经常能够看到的一团糟的景象——昨天就该完成的加急活还在那里放着、巡视员办公室外面排着一串长队、小偷小摸、无休止地等待卡车司机送来一些必需零部件、不见踪影的装置设定员、完工了一半的引擎堆满了过道，这些混乱场景在班基却不复存在。班基就好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天堂，反

① Já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two volume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1980),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而使联合机械厂看上去更像一个社会主义的梦魇。这是为什么？

再一次的，我在匈牙利的经历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对美国的生产所做的概念化。① 联合机械厂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企业的一个分厂，它与总部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官僚式讨价还价和软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并且就像在社会主义一样，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工作现场的短缺、突击、消耗和效率低下。联合机械厂的管理总是试图寻求对工作现场的控制，并且总是给生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如果说联合机械厂就像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工厂，那么班基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工厂了。它从出口的竞争性压力中获利，并且利用了国家赋予的自主性。

从这些经历中，我得到的理论上的启迪如下：拿一种制度的理想化与另一种制度的现实相比较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这意味着，它既误导我们去批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比不上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同时又攻击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比不上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较好的做法是，首先分清楚每一种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逻辑，然后利用它来衡量相应的现实。我们最好也先认识到，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包含了这两种类型的要素在里面。每一种秩序都包含了市场和等级制，但却是以一种相反的关系。就如同资本主义的支配原则是市场，市场的负功能需要公司和国家来抵偿，社会主义中等级制则占据支配地位，等级制的负功能也需要内部的契约性体系、外部的合作社和私有生产来补充。② 每一

① *The Radiant Past*, *op. cit.*, chapter 3.

② 镜像比较的想法受到 Ivan Szelenyi 以下两篇文章的启发，“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 or the State Mode of Production”, in M. Dear and A. Scott (eds.),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Methuen, 1981) and “Karl Polanyi and the Theory of a Socialist Mixed Economy”。

种单纯的制度里面其实已经包括了太多内在的矛盾性，这样才能生存下来。

以上我交待了社会主义工作组织及规训的独特之处，但这些又是如何形塑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产生阶级行动的倾向呢？为什么团结工会爆发在波兰而不是匈牙利？为了弄清阶级意识的多种层面，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到工人阶级的生活中去。

四　粉饰社会主义：阶级的仪式行为

当我从布达佩斯去班基所在的中世纪小镇埃塔尔（Egér）时，我必须经过匈牙利的第二大城市米什科尔茨（Miskolc）——匈牙利东部工业心脏地带的首府。在那里的山谷中，坐落着巨大的列宁钢铁厂，它拥有15000名工人，代表着这个城市跳动的脉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精神也在这里——这里有艰苦奋斗的英雄事迹，有斯大林时代的著名海报，这里曾经是辉煌的共产主义未来的承载者。加入这里的工人队伍曾经是我心中一个隐秘的梦想。奇迹般的是，卢卡斯又一次让它成为现实，我在这个钢铁厂的核心得到了一个炉前工的工作，负责照看艺术之国德国制造的碱性氧化炉。我终于可以从个体的机械操作员岗位上毕业并加入团队工作了。在1985～1988年的三年里，我有大约一年时间是该厂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纵队的一分子。

这个联合钢铁厂对于协作来说是一个梦魇。这里有从日本弄过来的一个熔炉和一个电拱炉，从德国弄过来的一个碱性氧化炉以及瑞典的真空脱气装置，还有澳大利亚的技术员帮助维持这种新式技术设备。这样的联合，不仅其本身的协商非常困难，同时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技术进了社会主义秩序后的水土不服。使用这

些技术都假定了物质输入可以做到精确校准和按时配送。但在一个短缺经济中，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你只是在材料到了的时候拿走你得到的。如果它是错误的材料，或者有不需要的杂质的话，你也没办法将这些铁皮或者废料送回去。你能得到所有的原料就已经是很幸运了。当日本人过来修理和校正数字化系统时，他们只能痛苦地抓自己的头，困惑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无法处理即时生产（just in time）的这种社会主义变型。[①]

理论上，联合钢铁厂是通过计算机系统自上而下控制着的。但在现实中，只有当车间里经验丰富的监工和工人们无视计算机并且随时准备应付持续不断的突发危机时，钢铁厂才是有效率的。中层管理者说好听点是多余的，说难听点就是到处捣乱。他们的专制管理效率极低，而他们又相当依赖工作现场中自发的合作，所以这种专制管理也经常不得不被打破。我和卢卡斯就这个问题打了个报告上去，但却惹得中层经理们大发雷霆，还特地召开了个会议谴责我们的研究，并要求我们重写！我那些十月革命纵队的伙伴们被逗得哈哈大笑：你怎么能因为效率低下而指责管理者呢，即使有什么问题那肯定也是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外的；而我们却什么都不明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开始学会了钢铁工人们的社会主义“批判话语文化”，也和他们开起了这种冷嘲热讽的玩笑。关于社会主义的非理性的数不清的玩笑，使他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和现实间的鸿沟。对他们来说，现实更像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不是后者的实现。工人们必须参加很多，可能是太多了的庆祝社会主义的仪式活动，包括政治和生产会议、为到访的官员特地

① *Radiant Past*, chapter 4.

举行的表演，以及奖状、旗帜和勋章等等因为卖力干活得到的东西。在他们的玩笑中，他们的冷嘲热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他们爆发的愤怒中，我还是看到一种对于社会主义信念的持久坚持。

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总理来访，我们被要求多加一个班做义务劳动，活的内容是将矿渣炉给刷成鲜黄色。我十月革命纵队的同伴们都拿起了他们的刷子，但是我找到的那个刷子上却沾满了黑漆，于是我就把我们的铲子涂成了黑色。我们的主管跑过来问我在搞什么鬼。我很无辜地告诉他，我只是在帮忙建设社会主义而已。ET，我们纵队的智多星，对我说："小麦啊，你这哪是建设社会主义啊，你明明是在粉刷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抹黑嘛。"所有的人都是一阵大笑，主管气得拂袖而去。

的确，工人们必须将社会主义粉饰成有效率、平等和公正的，但他们实际上看到的却都是浪费、阶级特权和不公。他们批判社会主义和党，批判这个制度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拿本是用来作为合法化工具的意识形态来对抗这个体制。对那些红色首长和他们手下的马屁精管理者，工人们发展出一种强烈的阶级敌对感；当他们抗拒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时，他们身上恰恰洋溢着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①]

在他们的冷嘲热讽背后潜伏着工人阶级运动的暗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至少匈牙利的工人说的是社会主义的语言。我认为，他们欠缺的，可能就是一种有效的阶级团结。在匈牙利，通过第二经济，工人们有太多的路子来实现其物质利益，不管是在

① *Radiant Past*, chapter 5.

工人互助小组（VGMKs）还是合作社工作，或者打零工也成。[①]工人阶级的意识被强烈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包裹着，后者对于阶级团结是个不利因素。阶级团结在波兰更有可能，因为那里的工人还要集体干活而不能在自己的乡间小别墅里单干，那里的第二经济也远远没那么发达；并且，在波兰，教会就像一个团结的保护伞，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象征。因为个人化的出路没有那么方便，所以阶级利益就在反抗波兰当局的集体行动中被组织起来。

当我忙着思考为什么团结工会产生在东方而不是西方、在波兰而不是匈牙利时，政局却自上而下崩溃了。我只顾一门心思地探求社会主义的象征和仪式。在狭窄的历史视野下，我并没有认识到或者并不打算去认识社会主义已经削弱到什么地步。当我在故纸堆里拍去陈年标语上的尘土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工人们正在支持的统治精英，他们所宣称效忠的那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不再被人相信。官僚已经准备好抛弃社会主义的粉饰了。当1989年时机来临时，解放经济奇怪地没有受到什么抵抗，至少从衰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

很多像让西（Jancsi），我们投入的车间干事这样的人物，在此时看到了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会的机会。有四年的时间，我一直骂他出卖自己的灵魂给一个破产的公司工会。当政权瓦解之时，他第一个积极投入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仿佛又回到了1956年。他承诺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会。但是最后这却成了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曾经被如此蹂

① VGMKs是建立在内部合同基础上的合作社。见 David Stark，"Rethinking Internal Labor Markets: New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1986), pp. 492 - 504。

蹦、扭曲和利用起来对付工人阶级，以至到最后它几乎不能唤起多少人的想像力。

如果意识形态可以就此蒸发，制度却要更为固执得多。就像我以后在俄国将看到的，现实落在新兴的市场宗教的后面，有时候甚至与它南辕北辙。让匈牙利的经济从过去的工业恐龙（industrial dinosaurs）中解放出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列宁钢铁厂，虽然改了个名字，但还是生存了下来，从国家那里得到了补贴，直到最终于1997年被卖给一家斯洛伐克公司。但在此之前，它的工人就开始被大量精简。在原来的15000雇员中只有两千多人留了下来，我在十月革命纵队的同志们也被留下来了，继续守着那些熔炉。在匈牙利的工业废墟地带，失业率超过了25%。对于米什科尔茨的很多人来说，过去的每一天竟然真的要比现在辉煌得多。

我得到的理论启迪如下。国家社会主义依赖于中央对剩余的剥夺和再分配。支配和剥削是透明的，因而需要被合法化。透明性要求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将党国装扮成一个无所不知的形象，并且党国还在自己的宏伟计划中体现全民的利益。[①] 然而，这样一种基于一个辉煌的未来而不是古老的传统的合法化，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招致了要求党国实现其承诺的批评。随着压力的增加，统治阶级最后也放弃了其社会主义工程，而着陆到一个市场经济之中。

资本主义正好相反，它受到了积累的灵活形式和剥削的不可见性的庇护，因而合法化相对于霸权——各阶级物质利益在统治

① 在这里我受到 Georg Konrád 和 Ivan Szelenyi 的经典作品，*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9）的启发。

阶级的总体利益下的调和——来说是第二位的。霸权的力量在于将异议引导进边缘的斗争，而不是指向核心；将异议引导进妥协性的斗争而不是原则性的斗争。霸权或许会被对合法性的反复无常的信任增强，但却不依赖于此。它依赖于在生产、学校、家庭等领域组织同意的实践。匈牙利试图通过在公民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生气勃勃的霸权来支撑起社会主义脆弱的合法性，但是这一基础无法阻止外部的破裂。

五　在改革和私有化的交叉点上

我跑到匈牙利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及其生产政体。我想要搞清楚为什么第一个席卷了整个社会的工人革命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前景以及工人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充满了好奇。[①] 我原本就不是为了研究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而来，因此政局变动后我又打点行装去了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我离开了匈牙利，同样重要的是苏联的吸引力——在改革的后期，它正经历着重大的政治变迁。外国人第一次可以在这个国家自由地旅行和谈话。

我从1991年初与凯西·亨德里一起开始对苏联企业的研究。我们在列济纳（Rezina）——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著名的橡胶厂，待了两个月的时间。凯西为该厂的幼儿园弄了两台电脑，于是工会允许她不受限制地出入工厂。他们保证说列济纳是“一滴水珠”，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整个改革的汹涌海洋。我们没有

① 例如，Linda Fuller，揭示了古巴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分权导致了生产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后者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政治，见 *Work and Democracy in Socialist Cub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失望。[①]

列济纳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一个属于19世纪的幽灵。它和我想象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魔鬼工厂一模一样：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她们在阴暗潮湿、通风和光线都很差的地牢里辛苦工作，忍受难闻的树脂气味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呼吸道疾病，然后只有微薄的收入。每当我们想跟工人交谈的时候都有管理人员跟着，谈话因此很快就陷入难堪的沉默之中。即使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但她们又能对两个老外说些什么呢？她们的屈辱是一望即知的。

我们设法混进了每天早上所有管理人员和车间主管都要参加的例会。这个会倒是很有看头，每天我们就看着各种含沙射影冷嘲热讽的话从会议桌的一头抛向另一头，管理者们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通常后勤经理要承受各方的口头责难。他的倒霉差事就是乞求、哄骗、贿赂和威吓分散在苏联全国各地的供应商，但这仅仅是他工作的一半内容。他接下来还需要继续挥舞他的魔棒来对付卡车司机和铁路官员以保证材料运输。他从来也不曾跟我们吐露过他交易的秘密。

1991年的冬天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时期，整个计划体制一片混乱，生产也因此很难协调。新兴的第二经济又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经理将国家的拨款装进了监工、管理者以及那些在工厂里拥有所谓的合作社或者自己的小厂的文质彬彬的年轻老板的腰包。这些半自主的单位以经理规定的极低的折扣使用官方工厂的原材料、机器和劳动力，然后以在短缺经济的压力之下产生的所

① Michael Burawoy and Kathryn Hendley, "Between Perestroika and Privatization: Divided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a Soviet Enterprise", *Soviet Studies* 44 (1992), pp. 371 - 402.

谓"合同价"非常赚的将产品卖出或进行实物交易。工人们没见过一分一厘的利润——老板们希望他们明白自己能够保住饭碗就已经是足够幸运了。

我1988年和1989年在匈牙利的时候也曾见过类似的情形。列宁钢铁厂的经理们与外国人勾结，利用工厂还能盈利的那部分建立了新的有限公司，自己当上了股东。国家继续拥有的只是公司的外壳，还要为企业管理费和不断升高的损失买单，而有限公司和它们的股东们则将大把大把的利润装进自己口袋。毫不稀奇，对这所谓的"私有化"或者用一个委婉的叫法——"自发私有化"，工人们感到非常愤慨。

与工人们无关但是却以工人集体（labor collective）的名义进行的斗争正在分裂列济纳的管理阶层——这也是更宽泛的苏联政局的一个缩影。一边是苏联统一的捍卫者，包括公司经理、总工程师和很多保守派。他们称，列济纳依赖来自苏联各地的材料供应，因此分裂就意味着自杀。他们主张继续对养活他们的苏联政府保持忠诚。而以工厂委员会的头头为首的少壮派，则叫嚣着要将列济纳的隶属关系改到俄罗斯和叶利钦政府。他们攻击苏联政府是列济纳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俄罗斯推行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不可能要比现存的计划体制更糟糕。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工厂内战已经在会议桌上爆发，两派人马都声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集体的利益，而斥责对手搞特权和腐败。

在西方文献中，工人集体被公认为是团结一致的，而计划经济中的企业则是一个与国家就业绩指标和计划任务讨价还价的一个统一实体。在戴维·格拉尼克（David Granick）、亚历克·诺夫（Alec Nove）和约瑟夫·伯林纳（Joseph Berliner）等人的经典描述中，企业就像一个机械操作员——在任务很紧时，将产量

限制在100%以下（怠工）以显示原计划过于紧张；当任务很容易达成时，又仅仅保持产量略高于100%（限制配额）以隐瞒原计划目标过于松弛。企业总是企图调整自己以增加它们在与中央博弈时的力量，比如将上游整合到供应中，以克服短缺，或者进一步进入那些可以增强其面对国家时的优势的核心产品的生产中。在所有的分析中，企业都像一个整体一样活动，每个企业的利益都在于最小化他们被迫让渡给国家的以及最大化他们从国家那里得到的。除了这些文献之外，我们从未听说过工厂内部围绕着分化的利益和策略的斗争，就如同席卷列济纳的那样。随着在国家层面上的整合的解体和二元权力的出现，企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这是一个组织性危机：旧的尚未下台，新的已经急不可耐要登场。

党组织曾经是企业团结的象征和保证。苏联统治时期，党组织试图建立企业内部的团结，并且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到了1991年1月，列济纳的党组织已经瓦解了。我们或许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列济纳新党委书记那间宽敞办公室里拜访他的人了。办公室的家具都被搬走了。一个孤独的老头坐在桌子后面，一台巨大无比的电话总机就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已经消逝的权力的象征。电话线早就被从墙上剥掉了。他回忆起过去，以及他自己长久以来对于党委书记一职的渴望。他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但是党本身除了少数几个老顽固以外已经失去了追随者。权力斗争到处都是，但却从未进入他空空如也的办公室。远远在1991年8月之前，他就已经被扔进了共产主义历史的博物馆。

列济纳处于一场发生在苏联经济领域中的静悄悄的低强度地震中。依靠来自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供应，列济纳自己成了非常重

要的汽车产业的一个主要的橡胶供应商。当经济震荡时，列济纳就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威胁。苏联的解体是灾难性的，非常不同于匈牙利的原子化转型。即使在匈牙利最大的钢铁厂的核心，分裂的政治也看上去离工作现场十分遥远。匈牙利用了20年的时间孕育一个替代性的政治经济，一个初步的协调不同利益的霸权，并且一直养在深闺等待党国的崩溃。而在俄国，并没有一个合法化的替代物准备接手，因此过去的力量很快又重新组织起来争夺分裂带来的新机会。但是这些都走在我前面。眼下我逃离了列济纳的灾难场景，来到北方尚且比较平静的地区，在这里我可以更好地观察过去和未来。

六　工业内卷化：俄国进入资本主义

科米共和国的首都瑟克特夫卡尔（Syktyvkar）有25万人口，坐落在乌拉尔河西岸，是俄罗斯在欧洲最北的一部分。相对于稀疏的人口，它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煤、矾土、石油和天然气——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很多尚未开发。科米从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开始就是一个流放之地。共产主义时期它是古拉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设有劳工集中营，专门供应木材和煤矿工业。这个地方本来不对外国人开放。1991年春天我才有机会到那里去继续我不称职的工厂工人生涯。在当地一位社会学家科诺托夫（Pavel Krotov）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在市里的模范家具厂当钻工的机会。[①]

① Michael Burawoy and Pavel Krotov, "The Soviet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orker Control and Economic Bargaining in the Wood I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 pp. 16 - 38.

与列济纳的管理层分裂成敌对的各方相比，北极家具厂（Polar Furniture）拥有一个紧密团结的管理团队，且充分利用了它有利的经济地位。该厂垄断了该地区的劣质组合柜（wall units）的生产——在每一间苏维埃住宅里都能看到的一件家具。因为需求旺盛，组合柜可以很轻易地用来交换其他短缺商品——克里米亚半岛度假村的一个床位、住房、糖和肉罐头等珍贵食品。最大的交易商是当地工会的头头，他就像一个封建男爵，将他的战利品分配给奴才们以维持和平。

组合柜非常容易生产，只要原料供应能够保证的话。这对北极家具厂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有两个原因：首先，供应非常简单，而且主要的“加压木材”在当地即可获得，依靠科米的森林就能够生产；其次，北极家具厂与科米木材联营公司有特殊关系，后者负责分配整个产业的资源。

北极家具厂较好的经营状况使它的总经理可以在别的地方都对我关上大门的时候雇用我。在工作现场，情况就和匈牙利不一样了。热情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我被与大多数集体活动隔绝开来。我猜想我这样一个想在车间里工作的美国教授在他们看来可能太奇怪了，以至于那里的人无法接受。我的工友们从来没见过美国人，更别说像我这样奇怪的了。我的俄语还很蹩脚，另外我的活干得也不怎么样，这使得我处于地位等级的底层。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我与别的人拿的工资还差不多。但是，在差不多一样的情况下，匈牙利工人们却接纳了我。我推测文化的因素应该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斯大林主义的猜疑以及工人集体团结的遗产。但最终我发现原因要更加简单。管理者，特别是我所在车间的监工，在利用我规训工人的力量。斯特万，我的“老板”，会说：“伙计们上工啦，有个美国佬在看着我们呢。”

但是这一招好像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工人们往往迟到早退。在工作过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停工。到了月底他们才拼命干活以弥补浪费的时间，传说中的“突击生产”就又出现在我面前。看来至少我来到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厂！这里的生产节奏与我在联合机械厂经历的赶工游戏相比太不固定了。我们在一边玩牌或者多米诺来打发剩余时间。我们被建构成一个工人集体，而不是拥有义务和权利的个体。工会没有什么申诉机制，甚至不与车间的管理层以及企业经理就生产计划的实施讨价还价。工会显然是管理层的一部分。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生产游戏的话，那么也是在车间的生产纵队与企业经理之间围绕计划实施展开的。这不是一个像在联合机械厂或者班基那样的个人化的游戏，而是一个交易的一部分；其中，管理者放弃了对生产的控制，但却提供工作条件以换取工人最大限度地实现计划产量。从这里，讨价还价沿着一个前后相继的水平螺旋性上升。

随着共和国中央计划的控制在 1991 年春天的放松，我得以目睹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内部的酝酿。也因为党失去了权力，一些像北极家具厂和它嵌入的联营公司这样的垄断企业，变得更加自主，也更有能力利用它们的市场地位，强制规定交换条件。货物交换虽然本来就存在，但总是在党的监督下进行，现在却像野草一样在整个经济中蔓延。管理者，以前考虑的都是竭力获得供给，现在却千方百计要最大化交易所得。同时，工作场所的自主性也有所增强。自主性一直就很高，因为需要灵活的随机应变以适应供给的不确定性，也因为工人们不能被解雇；而现在随着党作为一个控制体系的解体，自主性就更强了。这看上去就像是管理者变成了商人，将工作转包给工人集体。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与现代中产阶级资本主义还有着遥远的距离，后者的核心是在生产

过程和产品创新上的积累和投资。但它毕竟也是资本主义——利润获得了统治权——尽管这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西方中产阶级的禁欲式资本主义。

初生的商业资本主义为企业对莫斯科发布的经济改革的反应设置了限定。1991 年 8 月，在那场失败的政变的前两个月，我停止了工作。这场政变标志了苏联的解体，和叶利钦及他所属的经济改革派的上台。我在 1992 年夏天回到北极家具厂，这已经是价格自由化和计划体制被废除六个月之后了。北极家具厂依然左右逢源，在组合柜体系供不应求的状况下，它们利用新得到的自由提价权从中渔利。但是，到了 1992 年的秋天，改革开始显出负面的影响。北极家具厂的工资涨幅落后于别的相邻企业，也失去了与宜家（IKEA）的出口合同，私有化又迫在眉睫。一场工厂内的叛乱以独裁和贪污的罪名赶走了老谋深算的老经理。大多数原管理层的人也随他一起离开。

1993 年，北极家具厂的财产显著缩水。来自前苏联各地甚至是欧洲的家具出现在商店里，大部分比北极家具厂的物美价廉。接着就是科米木材联营公司的解体和北极家具厂在获得贷款和物质资源方面的特权的丧失。影响在 1993 年逐渐显示出来，到 1994 年则更为凸显，首先是实际工资减少，接着则是暂时停工和发不出工资。1994 年春天，工人集体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又立了一个新经理，但是他能够做的却不多。企业因为积累了太多的债务以致无法贷款。它试图卖掉手头剩下的股份，却没人愿意买。最后企业宣布破产，但通过用它的产品交换原材料的形式仍然维持着有限的运营。衰退是无法避免的。当我 1995 年夏天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大多数企业都处于困境之中。

北极家具厂的经济在俄罗斯的工厂中是相当典型的。俄罗斯经

济的衰退是空前的——从 1989 年开始，GDP 产值每年都在下降，有时降幅达到了 20%。自由化、私有化、货币化（monetization）以及稳定化（stabilization）非但没有促进积累，反而是以生产为代价的。一种经济内卷化（involution）的过程支配着经济衰退，而这个经济是自我毁灭的。交换领域的各种力量——工厂主、商人、金融家、黑手党——从生产中分流资源，迫使工人倒退到必需品与小商品生产中。不是原始积累，而是原始去积累（primitive disaccumulation）标志着俄罗斯的现状，它抵消了建立在巨大人力成本上的苏联的工业化。内卷化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于一个管制经济的持续性后果。在转型的第一阶段——解体阶段，垄断力量得到了加强。党的控制的取消使它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第二阶段——自由化阶段——通货膨胀继续给企业以敛财的机会。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通过掠夺资产或价格欺诈来侵占利润，而工人们则开始偷窃。国家在垄断产业的压力下加大对企业的贷款，并将此业务纳入新建的独立银行，这些银行借此迅速取得它们对企业利润的占有份额。新建的银行实际上都是由同样的获得贷款的企业所有的。预算约束没有变硬而是被货币化了。在第三个阶段——稳定化阶段，贷款的供应开始减少，利率变高，通货膨胀率下降。企业并没有破产，而是撤出金融领域，退回物物交换的关系中。银行则要么倒台，要么被黑手党吸收，后者已经成为一个保护交易的影子国家。在第四个阶段——调整巩固阶段，财富集中到金融工业集团中，这些集团围绕原材料、能源和媒体组织起来，并与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支持那些从原共产党干部摇身一变而成的地方和国家统治小集团的回报，俄罗斯的新兴经理阶层获得了那些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可计数的财富聚集在一端，贫困则聚集

在另一端。

工人退缩而不是反抗。工资发不出来，但是工人们仍然怀着某种改变将会发生的徒然希望坚持工作。社会主义能够提供的只有对过去的乡愁。没有一个意识形态可以黏合对立面或者提供对某种替代性可能的想象。生产的政治被剥去了本质，而商品拜物教则赢得了无可置疑的忠诚。

七　苏联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距瑟克特夫卡尔1000公里之外坐落着沃尔库塔（Vorkuta）——北极圈内一个20万居民的城市，这个城市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丰富的煤炭资源。这是古拉格的一个人造城市，由监狱犯人于20世纪30年代在冰冻的苔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内部殖民地。没有人能够逃离这一片死亡山谷——这是其中一个区域的名字——因为那里就没什么路可走。沃尔库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被德国人占领后，成为一个重要的炼焦煤供应地。战犯和俄国本国的犯人被流放到沃尔库塔，这里因此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社区。来这儿的很多都是政治犯——作家、画家、科学家和音乐家——这个城市很快因为其艺术气息和剧场而出名。一些野心勃勃的官僚通常会先在荒凉的沃尔库塔镀镀金，然后再伺机晋升到更高一级的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20世纪50年代集中营关闭以后，来自苏联各地，特别是从乌克兰的矿区城镇过来的工人都到沃尔库塔以追求更高的工资。为了适应地下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地面上的暴风雪和北极圈的寒冷，这里的人发展了一套自己的粗犷文化，他们可以面对一切逆境。

1989年，沃尔库塔的矿工联合西伯利亚库兹巴斯（Kuzbass）

和乌克兰顿巴斯（Donbass）等地的矿工们发动了一场令人瞩目的持续的暴力罢工。他们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和养老金、更长的假期、星期日要休息、改善住房条件、保证基本食物的供应以及废除将工人们牢牢限制在某一个矿井工作的封建制度。他们第二个层次上的要求则攻击了经济制度，呼唤企业自主决策。第三个层次的要求则是政治上的：废除命令经济，撤销宪法第六条关于党垄断一切权力的规定。他们号召一切政府职位都由自由选举产生，要求获得组建独立工会和政党的权利以及出版自由的权利，并要求政府承认他们自己的罢工委员会的合法性。这彻头彻尾是一个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激进方案。

抗议在1989年持续了一整个夏天，1991年又开始复苏。当时已经是俄联邦总统的叶利钦，为了对抗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就利用他们作为自己的棋子。矿工成了打倒苏维埃体系的关键力量，但同时他们也成了新统治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政纲接近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政体的纲领。1992年，经济改革带来了每月30%的通货膨胀率，耗尽了矿工们一辈子的储蓄。按照规定，煤矿有权以任何价格出卖煤产量的17%，因此管理层和新建立的独立工会为进入世界市场展开了竞争。沃尔库塔充斥着来自西方的消费品——电视、录像机、冰箱和服装——对于为更多的利益而战的矿工来说，这仅仅是一碟小菜而已。罢工委员会背叛了它的追随者，委员会的头头们获得了地方或者联邦政府提供的报酬丰厚、工作清闲的职位，或者进入了一些效益很好的“商业组织”。

在沃尔库塔，社会主义至少制造出它自己的掘墓人，即这个政体曾大力歌颂过的无产阶级。在领导们攫取了社会主义的遗产、将手下丢在了为每一天的面包而斗争的境地后不久，工人们

也很快扔掉了自己的铁锹。沃尔库塔出现了自己的黑手党——煤炭商人，他们将自己的网络扩展到前苏联和欧洲各地，组织货物交换的链条，利用已经很低的生产成本为自己牟利，这样的低成本是建立在可观的补贴和低工资的基础上的。就像在木材业一样，大量涌入的资本将世界价格带进了俄国内地。

然而，煤炭工业的内卷化从来没有像木材业那样达到一个破坏性的地步。木材业是一个垂直的商品链，其中，林区村庄和木材中心处于等级体系的底层而被剥削。当改革来临时，它们怀着在开放市场中不可能比现在要糟糕的预期而退出。它们的退出导致了整个产业的崩溃，没有买主来买他们的原木了。相比之下，煤炭业控制了一种稀缺资源，因而可以用它来获取政治权力。当进入世界市场的最初恐慌过去之后，煤矿和工会就围绕着联合公司重组以从联邦政府争取更多的补贴和工资收入。罢工是仪式性的，目的是使矿工的处境获得政府注意。他们的罢工更多的是一种表达的策略，而非真的要退出。

在世界银行的监督之下，俄国煤炭业的规模一直在缩小。沃尔库塔煤炭联营公司已经关闭了十三家煤矿中的五家。世界银行尽可能理性地运作，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一个安全网，如何才能使社区参与把握其自身的命运（participate in its own demise），同时努力保证政府不创造错误的预期。世界银行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策略试图在抗议威胁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任何地方都灌输一个霸权性的生产政治。[①] 为了促进资本流动，启蒙者

① 见 Michael Cernea and Ayse Kudat, *Social Assessments for Better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 i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1997), Michael Goldman, "Green Hegemony", (Unpublished MS, 1997) and 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试图将西方的生产机构（apparatuses of production）输送到一个陌生的土地上，以组织工人的同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霸权政体可以如此轻便地移植！

八　灵活的资本主义、脆弱的社会主义及其后果

布雷弗曼捕捉到资本主义扩张的节奏及其通过去技术化、再技术化和随之而来的更进一步的去技术化的辩证法来重组工作，从而重新组织自身的能力。但他并没有捕捉到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可持续性"的来源，而我则认为后者首先在于其专制的、其次在于其霸权的生产机构。资本主义被证明是持久的，而社会主义则是脆弱的。当我沿着格列佛的足迹从匈牙利来到俄国，从莫斯科来到瑟克特夫卡尔和沃尔库塔时，每到一个地方，资本主义就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为什么社会主义如此轻易地被颠覆，甚至大部分情况下都来不及喘息一声呢？关于资本主义的脆弱性，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而社会主义的脆弱性则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解释。

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理论。有些理论认为是社会主义内在的经济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显现出来，但是所有的经济秩序都存在矛盾啊。另外一些则提出社会主义太僵化以至无法适应信息时代。但是这不能解释当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为什么反抗总是缺席。还有一些全球主义的观点，但是它们过于强调一个席卷一切的国际性资本主义的作用，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脆弱性。除了这些经济论调外，还有一些将社会主义描述成一个等待崩溃的多米诺骨牌的政治理论。没有一种秩序可以仅仅通过宰制

就维持下来。但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确存在了70年的时间，而且它是在宰制最薄弱的时候垮台的。肯·乔伊特（Ken Jowitt）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先见之明的分析，认为这样一种政体在将其克里斯玛型权威常规化的同时已经失去了其进取心。

从我自己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经历出发，从我观察到的生产领域出发，我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离的。发达资本主义的霸权政体通过协调利益来运作，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社会主义的官僚政体通过将明显的剥削和支配合法化而运作。霸权将斗争组织和孤立起来，而合法性则引起批判而不是对其自身秩序的挑战。讨论发达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霸权危机，实际上是混淆了它们各自的独特之处。

但是政治危机或者稳定的经济基础远远比简单地将霸权对应于一种政体而将合法性对应于另一种政体要复杂。每一种制度都只有在有另一种制度的补充时才能存在。资本主义要求国家弥补经济的非理性后果。因此，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在于其最薄弱的环节，即国家，使其规训政治化。同样，社会主义也需要一个精致的私人领域，通过市场关系来调节，以对付计划经济的失灵。在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互补世界中，利益才能被组织和协调，霸权才能建立起来以支撑合法性。这在匈牙利被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而在中国，这更是整个秩序的支柱。私有的、市场般的调和对于维持社会主义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但这也可能被视为与社会主义相悖的，因而或许又会深化合法性的危机。这就是俄罗斯的情况。简短地说，每一种制度都孕育着其对立面，后者既可能加强也可能削弱统治秩序。

那么这些比较又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后社会主义的秩序呢？

计划和市场的特殊结合是否预示着一种新兴的政治经济呢？这样一种决定性的路径依赖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这么认为，那就是将旧秩序的动力机制及其崩溃与新秩序的非常不同的产生过程混为一谈了。我们还是应该将转型视为一个拥有自己的组合的和不平均的逻辑的独特过程，在其中，政府干预及其无意识的和非预期的后果都非常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秩序的崩溃，它的方向则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社会主义秩序的崩溃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公民社会和霸权相结合的结构的来临，就像我们在俄罗斯可以看到的那样。因此，一种替代的合法性必须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中构造出来，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新自由主义，它有着自己无法预期的后果及内在的矛盾。

公共社会学　　·清华社会学教参·

策　　划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著　　者 /〔美〕麦克·布洛维
译　　者 / 沈　原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 ssap. com. 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 ssap. 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汪建根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20. 75
字　　数 / 238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646 - 2/D · 18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 01 - 2007 - 2357 号
定　　价 / 39.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清华社会学教参近期书目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马克·格兰诺维特/著
《公共社会学》
……麦克·布洛维/著

清华社会学讲义已出书目

《组织社会学十讲》　周雪光/著
《社会网分析讲义》　罗家德/著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赵鼎新/著

3A 设计艺术工作室 o 装帧设计 / 孙元明